

# 瞿秋白与 鲁迅

QUQIUBAI YU LUXUN

许京生 著



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华文出版社

J1027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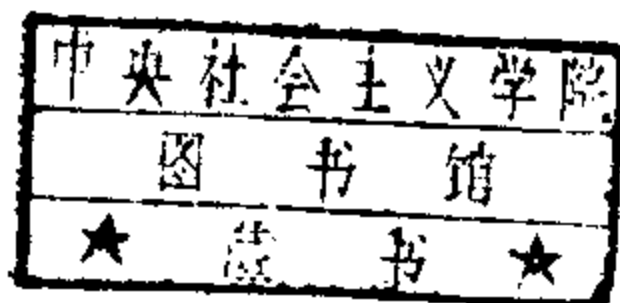
K827.1  
151



\*201027432\*

# 瞿秋白与鲁迅

许京生 著



华文出版社

135010

D101/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瞿秋白与鲁迅/许京生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 1  
ISBN 7-5075-0659-2

I. 瞿... I. 许... II. ①瞿秋白-生平事迹②鲁迅-生平事迹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5117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话(010)63096781 (010)66063891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科 普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193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6000 册

定价:17.00 元

瞿秋白同志死於五十年了。在  
 他生前，許多人不理解他，或者  
 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  
 並沒有埋下來。他在革命困難  
 的年月裏，站第一線的堅立  
 地心，這顆心創之手的腐力充  
 足，不須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  
 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  
 意志和他在工作中的任何不來  
 的感想，將永遠活著。不僅他  
 去。瞿秋白同志是有用的人，他  
 引道的，他是有意識的。他的  
 遺著和遺稿，將有益於青年  
 人們有志於人民的事業，  
 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面。

毛澤東  
 一九五〇年  
 十一月一日

毛澤東題詞



瞿秋白遺像



一九二七年，瞿秋白在汉口中共中央办公机关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三日，鲁迅五十岁纪念摄于上海



鲁迅与瞿秋白  
(徐悲鸿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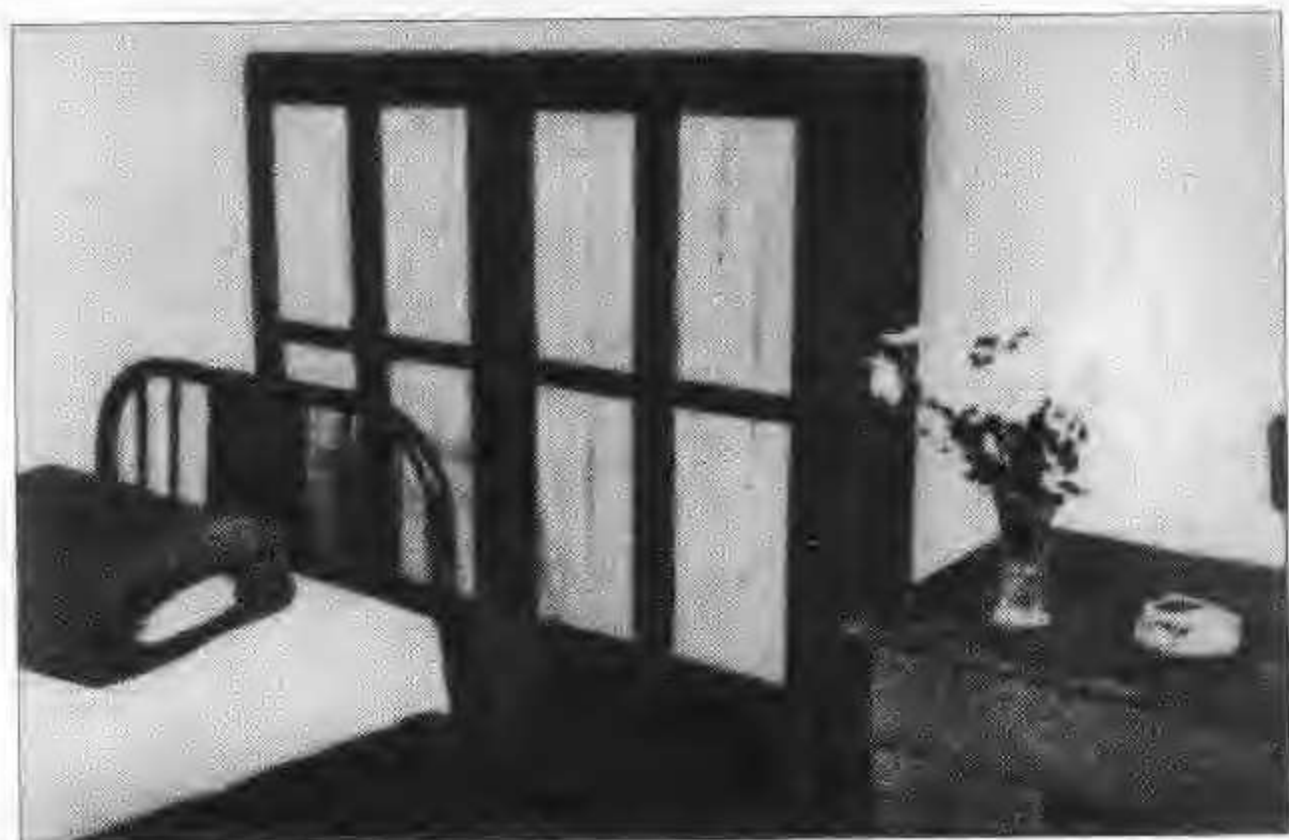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一年七月- 瞿秋白、杨之华  
回国前在莫斯科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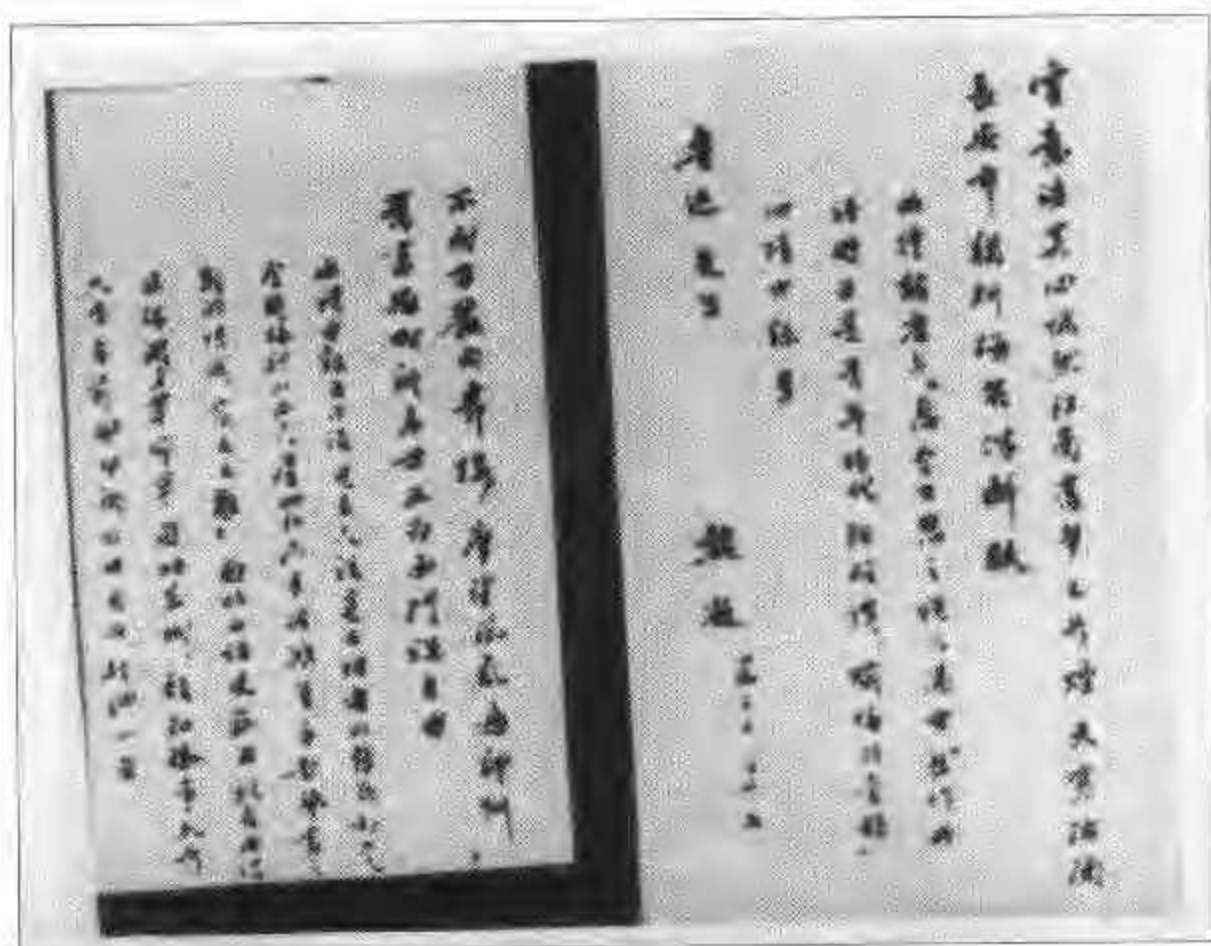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三日，鲁迅五十二岁  
生辰，与夫人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摄于上海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鲁迅(右三)与“八艺社”举办木刻讲授会时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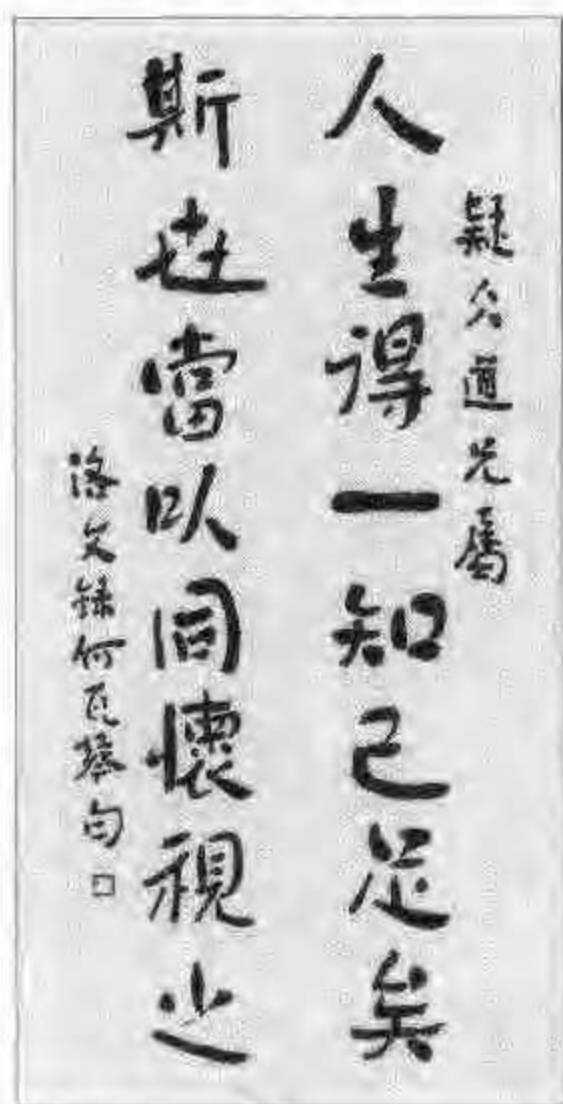
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时，鲁迅和许广平把自用的双人床让给瞿秋白夫妇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瞿秋白赠给鲁迅的两首旧体诗，从中可看出他把鲁迅当成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瞿秋白到苏区后留在大陆新村鲁迅家的一张特制“西式书桌”



鲁迅手书条幅，为清人何瓦琴语，用“洛文”笔名题赠给瞿秋白。一九三三年三月，瞿秋白避居上海北四川路东照里时，曾将这一条幅挂在卧室的墙上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操场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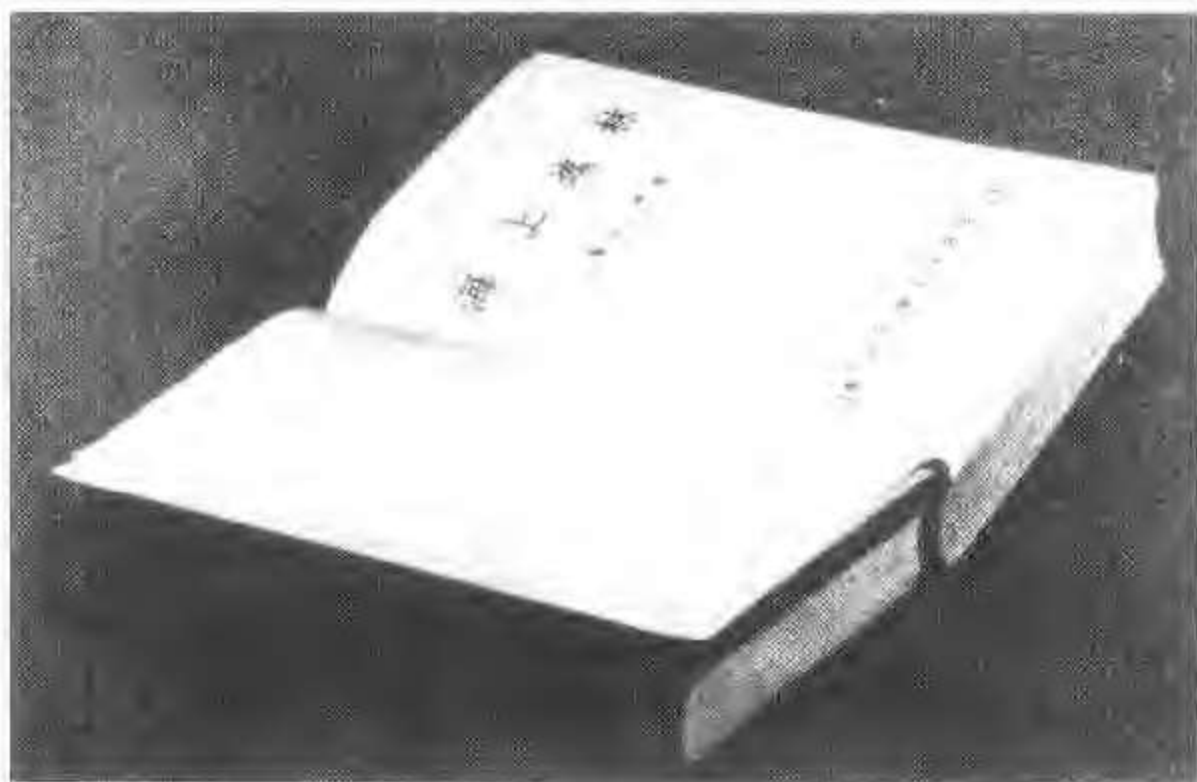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  
上海

鲁迅编定《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后与他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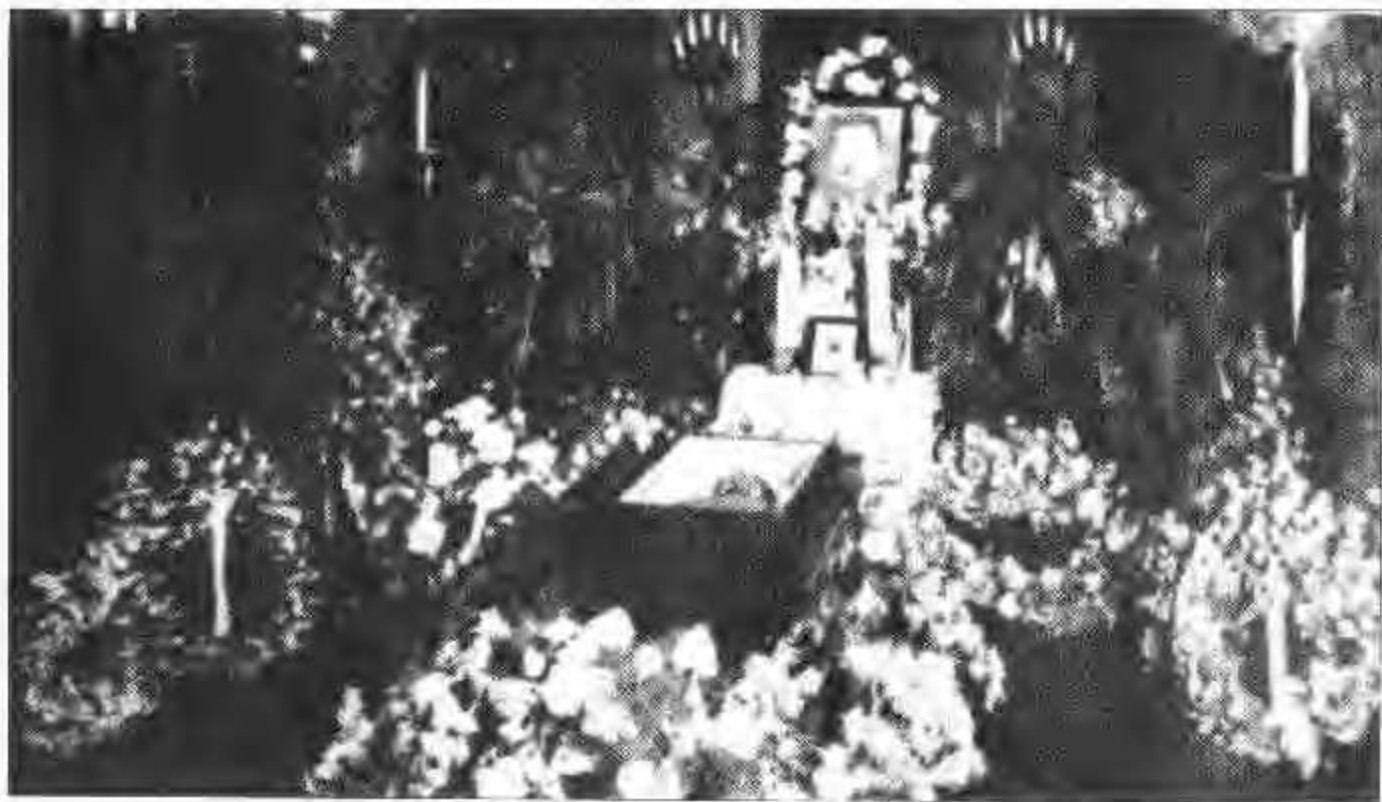


鲁迅与萧伯纳、蔡元培合影，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摄于中山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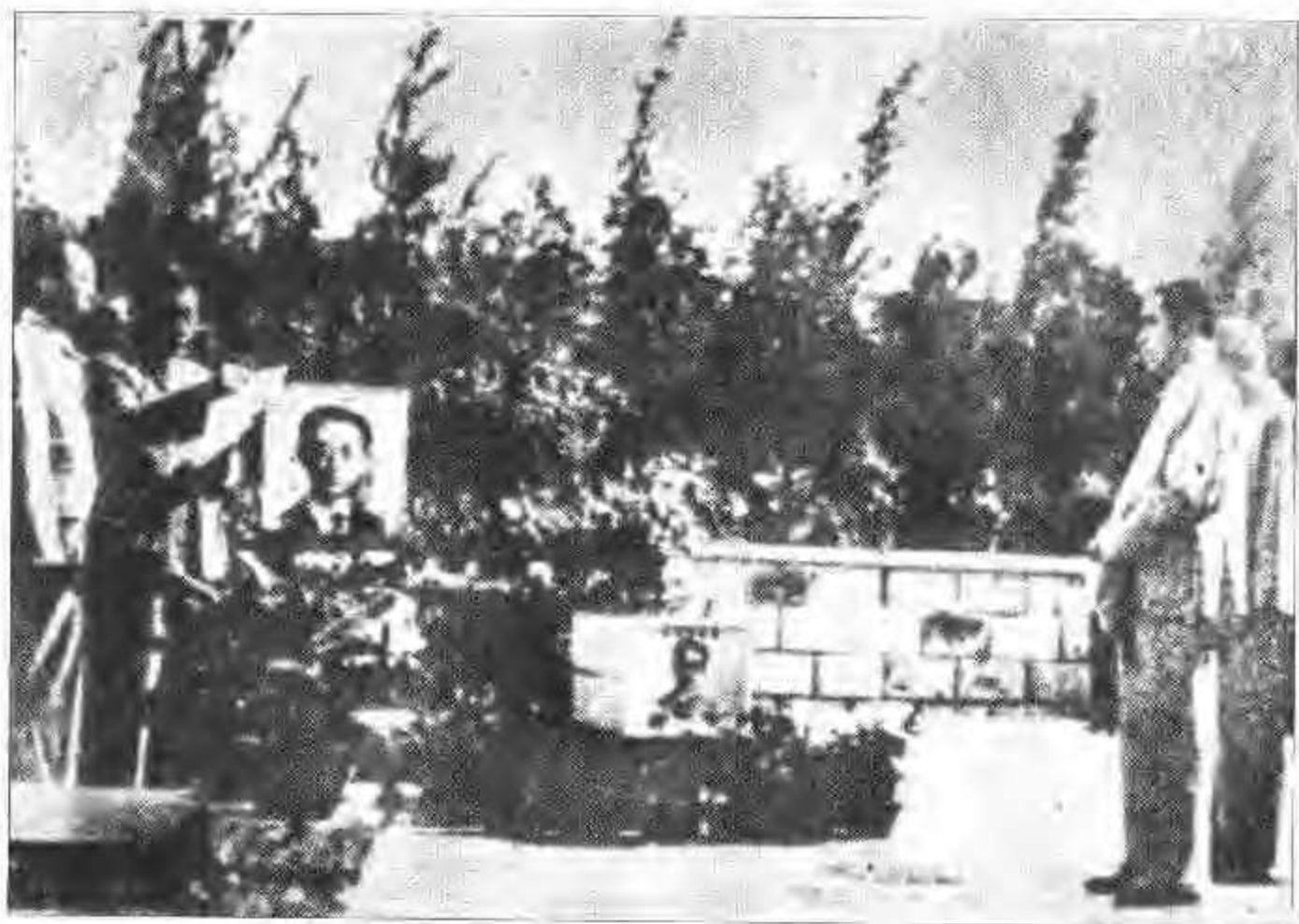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 瞿秋白就义前摄于福建长汀



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无限悲愤扶病将瞿秋白的译文编为《海上述林》。这是一九三六年在日本印成的《海上述林》。



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逝世，遗体停放在上海腔州路万国殡仪馆大厅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

## 《统一战线人物传记》丛书总序

王兆国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从统一战线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光辉历程,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袖风范和人格魅力,看中华民族众多的爱国人士的报国情怀和卓著业绩,看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艰难曲折和必然发展趋势,是中国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一直受到史学工作者和统战部门的关注,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

《统一战线人物传记》丛书是“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项目。编撰和出版这套丛书,既具有重要文化价值,更可以发挥以史为鉴、以史育人的作用。丛书通过反映我党领导人与著名爱国人士的交往与友谊、团结与合作,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我国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的历程,有助于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了解爱国主义在现代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凝聚力,体会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结论的真理性。丛书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崇高的品格,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宽阔的胸怀以及深厚的文化素养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并将会成为感染和激励读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的有益精神食粮。丛书还通过对著名爱国人士与我党领导人交往过程的记叙,歌颂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中华民族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必将进一步调动统一战线各方面人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实践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实践必将继续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没有一个包括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各方面人士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促进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祖国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相信《统一战线人物传记》丛书的出版,将对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

一九九八年八月



# 序 言

蔡清富

《瞿秋白与鲁迅》一书付梓之际，作者许京生邀我为该书说几句话，我想借此机会发表一点意见。

跟一般的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的统战关系不同，瞿秋白与鲁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统与被统之间的关系，而是两个共产主义战士之间相互帮助、并肩战斗的关系。因为鲁迅虽然没有在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跟瞿秋白交往时他已经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了。毛泽东在评论鲁迅时说过：“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的党员，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的统战关系，有不同的思想基础，可以是爱国主义的，也可以是民主主义的，更可以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作为一位党外人士，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统战的思想基础，可谓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兼而有之，达到了统一战线思想基础的最高层次。对鲁迅、瞿秋白都很了解并且曾做过他们中间联系人的冯雪峰，对瞿、鲁之间共同战斗的思想基础做过十分正确、深刻地概括：“他们的友谊的主要根源，是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人类的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奋斗的共同的思想和行动。这是决定一切的前提条件。”正因为鲁迅与共产党人有这样共同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对李大钊、瞿秋白、陈赓，特别是毛泽东等，都是赤诚相待，以引为同志而感到无比自豪的。一九三六年，鲁迅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表示了由衷的拥护和无限的信赖。他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

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表示愿意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当一名“小兵”。与党同心,步调一致,这是鲁迅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发扬。

瞿秋白从党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便转移到文化战线继续为革命而工作,他与鲁迅共同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茅盾称他们为“文台两领导”。瞿秋白对鲁迅的帮助,主要是在文化问题上而不是在政治问题上。三十年代,鲁迅用以进行社会斗争的主要武器是杂文。但对杂文这种文字样式,不仅敌人想用种种方法压杀它,就连进步文艺界内部也有不少人轻视它,这当然会多少削弱鲁迅杂文的战斗影响。就在这时,瞿秋白认真研究了鲁迅的杂文,与鲁迅促膝谈心,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还为该书撰写了高度评价鲁迅杂文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序言。冯雪峰说:“对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文章,鲁迅先生是尤其看重的,而且在他心里也确实发生了对战友的非常深刻的感激,因为秋白同志对于杂文给以正确的看法,对鲁迅先生的杂文的战斗作用和社会价值给以应有的历史性的估价,这样的看法和评价在中国那时还是第一次。”此外,在大众语和文艺大众化问题上,在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中,在对反动或错误文艺思想斗争方面,鲁迅都得到了瞿秋白的帮助或受其影响。比如:在跟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斗争中,瞿秋白率先写了《屠夫文学》,鲁迅接着写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在批判“自由人”、“第三种人”的错误文艺思潮时,瞿秋白率先写了《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鲁迅接着写了《论“第三种人”》等。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结成了攻无不克的阵势。瞿秋白对鲁迅的帮助和影响,不仅是在具体问题上,更主要的是在思想和精神上。熟知内情的许广平说:鲁迅“由于得到秋白同志之助,得到党给予的力量,精神益加奋发,斗志更加昂扬地勇往直前了”。

鲁迅不仅受到瞿秋白的影响,而且还影响着瞿秋白。在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观察与分析上,鲁迅要比瞿秋白深刻一些。关于这点,鲁迅的文章和鲁迅跟瞿秋白的交谈,都对瞿秋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瞿秋白多次对冯雪峰说过:“鲁迅看问题实在深刻。”一九三三年春天,瞿秋白夫妇避难居住在鲁迅家里。这期间,瞿秋白通过跟鲁迅交换意见,写了《王道诗话》、《伸冤》等十多篇文情并茂的杂感,这些文章由瞿秋白执笔,以鲁迅笔名发表,在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鲁迅全集》和《瞿秋白文集》分别收录了这些文章,这的确是他们合作战斗的结晶。至于煌煌宏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之产生,更是瞿秋白学习、研究鲁迅杂文的结果,也是二人彻夜不眠、倾心交谈的结果。

瞿秋白与鲁迅相交的另一个特点,便是瞿秋白不摆党的领导者的架子,鲁迅不摆文坛领袖的架子,他们平等相待、彼此尊重、互相学习、肝胆相照。瞿秋白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革命家,鲁迅对他十分敬重,鲁迅称赞瞿秋白“真有才华”,说“何苦(瞿秋白笔名——引者)的文章,明白畅晓,是真可佩服的!”“这问题,何苦是这样看法的,……我以为他的看法是对的。”他还赞扬瞿秋白的翻译“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在瞿秋白英勇就义后,鲁迅“捏着一团火”,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编印了亡友的译作《海上述林》,制作非常考究。鲁迅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瞿秋白对鲁迅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们未见面之前,瞿秋白就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写给鲁迅谈翻译的一封信中说过:“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由于他们思想基础一致,所以彼此才能这样亲密无间,成为知己。与鲁迅接触之后,瞿秋

白更感到鲁迅看问题深刻,认为鲁迅在做着共产党人应该做的革命工作。瞿秋白常对人说:“这个问题,鲁迅是这样看的”,“鲁迅做了这些我们必须做的工作”。只有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人,才能做到思想相通、心心相印。关于鲁迅与瞿秋白亲密相处的情形,许广平在回忆里曾有生动地描绘:“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总之,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的吗?那情形就仿佛相似。”鲁迅曾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把鲁迅的题签高挂室内,视之为最珍贵的礼物。鲁迅书写的这幅何瓦琴联句,确实道出了瞿秋白与鲁迅相交知己、肝胆相照的共同心声。

瞿秋白与鲁迅交往的时间不算长,但他们留给人们的精神财富是丰盛而深刻的。《瞿秋白与鲁迅》一书,以翔实材料、生动的笔触,对瞿、鲁二人的交往以及他们的高风亮节,做了具体而富有感染力地描述。读者阅读此书,定有所获。革命先驱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十分宝贵,它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弘扬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荣传统,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学习之、体行之。

一九九八年三月 于北京师大

# 目 录

---

	总 序
1	序 言
	<b>第一章 风云突变</b>
1	一、家世与童年
14	二、苦闷与探索
21	三、“饿乡”行
30	四、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34	五、支持毛泽东
38	六、做最高领袖
44	七、教书和写文章
54	八、参加“六大”
57	九、“顶撞”米夫
64	十、被排挤出中央
	<b>第二章 重返文苑</b>
75	一、文化阵地
80	二、建立联系



- 
- 87        三、神交已久  
90        四、安排会面  
96        五、回访秋白
- 第三章 领导“左联”**
- 109       一、大论争  
117       二、成立“左联”  
120       三、鲁迅与左翼文化运动  
125       四、遵命文学  
129       五、文台两领导
- 第四章 避难生活**
- 145       一、第一次避难  
152       二、第二次避难  
158       三、第三次避难
- 第五章 并肩战斗**
- 165       一、短兵相接  
177       二、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84       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 第六章 告别鲁迅**
- 196       一、接到命令  
201       二、惜别之情  
207       三、在中央苏区
- 第七章 转移被俘**
- 219       一、战略大转移  
230       二、突围

---

236	三、被俘之后
240	四、狱中斗争
	<b>第八章 不朽的丰碑</b>
260	一、奔走相救
267	二、饮弹洒血
272	三、“捏着一团火”
280	四、不朽的丰碑
289	<b>后 记</b>

# 第一章 风云突变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一。他见过列宁，帮助孙中山改组过国民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力挽狂澜，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一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然而，这样一位风云人物却在一九三一年，突然告别政坛，在上海隐居起来，与已是文学大家、“左联”主帅的鲁迅秘密建立了联系，并结成了生死之交。这不能不让世人感到离奇，要解开这谜一般的历史，话还得从头说起。

## 一、家世与童年

江苏省常州青果巷，有一座八桂堂天香楼，楼里住着瞿世玮一家。这人家世代读书做官，父亲廷仪做过云南白盐井大使，叔叔廷韶在清朝中叶曾任湖北按察使、布政使，天香楼就是那时修建的。但到了世玮这一代，坐吃山空，家庭日趋衰败，濒于破产。

瞿世玮（一八七五～一九三二），字稚彬。他排行第七，好击技，习黄龙，擅长山水画。曾捐过浙江候补盐大使，只是个虚衔，一生没做过官，也就没有职业，只是在家侍俸病瘫的寡母庄氏。因赋闲在家，不事生计，平日郁郁寡欢，沉默少言。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瞿世玮的妻子——一个漂亮、贤慧

的女人，为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孩子的出世，使他那张终日愁苦的脸上露出了一些笑容。妻子半躺半靠在床上低声说：“给孩子取个名吧。”瞿世玮捧起刚出世的婴儿，仔细端详着，见孩子天门顶端有双旋，俗称双顶，便为他取了个乳名——阿双。这阿双就是后来的中共领袖瞿秋白。待到阿双上中学的时候，改“双”为“霜”后又改为秋白，即秋霜之意。

一九〇三年，秋白的叔祖瞿赓甫在湖北任上病故了。他的家属将棺柩运回常州安葬，众多的亲戚也随之迁来八桂堂居住。瞿世玮不能忍受亲戚的“白眼儿”，便离开天香楼，将家人搬到河对面的乌衣巷去住。

秋白自幼聪颖好学，五六岁时，在母亲的教育点化下，已能背诵一些唐宋诗词名句了。清晨，屋里常传出“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等诗词名句。有一次，母亲为他讲《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听后他说：“焦仲卿与刘兰芝很好，为什么婆婆不要她，太可恶了！”秋白六岁那年，全家又迁到城西织机坊祖母的娘家庄氏星聚堂居住。同年秋天，秋白入星聚堂的庄氏书馆读书。由于入塾前，母亲已教会他许多字，所以学起来很省力，课余的时候，就帮助老师浇浇花。因此，塾师庄先生非常喜欢他。七岁，母亲送他入常州冠英两级小学堂读书，秋白的各门功课都很好。十岁时，父亲送给他一部小说《绣像三国演义》，当读到张角黄巾起义、张飞鞭打督邮的故事时，他想：“你们要打人家的屁股，人家自然要造反，为什么又要叫人家黄巾贼呢？”他感到不平。这件事，在他幼小纯真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后来，在致鲁迅的信中曾说：“张飞大打督邮那一回书，我看的特别有滋味。”

夜晚，父亲就教阿双绘画，他还从伯父那里学会了金石篆刻。

在父母和老师的培养教育下，秋白渐渐长大了。十一岁那年，考进常州府中学堂。

幼年时的秋白，家庭经济主要靠在浙江做知县的四伯父瞿世琥的官俸。因为秋白一家和祖母一起生活，四伯父为侍俸母亲，每月都寄钱来。出嫁在江阴贤庄的大姑母不时有柴米接济。所以一家人生活还比较富裕，照秋白自己的话说：“过了好几年的十足的少爷生活。”但好景不长，四伯父弃官闲居，将母亲接到杭州，不再寄钱来。大姑母去世后，“诸子分炊”也终断了柴米接济。为了节省每月七元的房租，秋白一家由星聚堂搬到瞿氏祠堂，在当时住祠堂是极不体面的事，为世人耻笑。但为了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计，也只能忍辱苟活。

有一次，他在同自己的朋友闲谈时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好汉的酒保。”表现了少年秋白对社会现实的愤懑之情和一定的反抗精神。

一九一五年，十六岁的瞿秋白在常州府中学堂四年级就读，与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广州起义的领导者张太雷同级。

常州府中学堂在当时算是比较进步的学校，校长屠元博和一些教员都是同盟会会员，他们在学堂里经常对学生进行民族革命的教育，瞿秋白在他们思想的影响下，关心时政，痛恨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朝的暴政，同时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也十分关注。一次，下课后，瞿秋白指着头上的辫子对张太雷说：“这尾巴似的东西，留着有什么用，我非把它剪掉不行！”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瞿秋白跑回家，自己把辫子剪了下来，兴奋地对母亲说：“皇帝没有了，辫子剪掉了。”

辛亥革命成功后，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老百姓的生活



更加困苦。秋白一家的生活也十分艰难。母亲要为秋白交纳几十元的学杂费,这对瞿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常州府中学堂除了收取学费、住宿费、膳费之外,还要求学生上课要穿制服,夏天是白制服,冬天是呢制服,母亲没有钱置办,瞿秋白就穿着母亲用父亲的旧衣服,改装成的长袍马褂去上学。一些富家子弟看不起他,有意疏远他。秋白也不愿理睬他们,下了课就在校园比较僻静的树下与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谈论诗词、小说、篆刻、绘画。后来,秋白的同学李子宽先生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间,秋白课余时间付诸吟咏者不少。最初,我班同学年龄较幼者,四人即江都任乃闇、宜兴吴南如与秋白和我,相约学作诗词,从咏物开始。我未得其门径,不久即退出。秋白与任、吴乐此不疲,各存二三百首,抄录成帙,秋白与任君进步尤速,惜稿早失。三人中惟秋白间亦作词。”

瞿秋白的母亲金璇,是江苏江阴县西乡大岸村人。自幼聪慧,通晓史书,爱好文学,擅长诗词,旧学颇有根底。因此,特别注意培养秋白对文学的热爱。他的另一位幼年同伴羊牧之曾回忆说:

秋白在中学中,旧小说如《西厢记》、《牡丹亭》、《聊斋》、《花月痕》等,都看过。以开始读《太平天国野史》、《通鉴纪事本末》、《中国近世秘史》、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群学肄言》、《陈曼生印谱》、《百将百美图印谱》、《吴友如画宝》,以及《庄子集释》、《老子道德经注》。枕边书桌上经常放置《杜诗镜》、《李长吉歌诗》、《词综》等。

一次秋白来我家吃饭后说:“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文学如孔子与《五经》,汉代的词赋,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先秦的诸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

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

瞿秋白的这些思想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母亲旧学思想的影响。

每逢假期，瞿秋白就随母亲到江阴贤庄去探望大姑母。秋白的大姑母嫁给了贤庄的金翰如。金家家资富足，是当地有权有势的人物。但贤庄四周的老百姓，生活都很穷苦，以租种金家的土地为生。在贤庄期间，秋白目睹了他们的悲惨生活，对他们的苦难的境遇，非常同情。一次，瞿秋白与一个贫苦农家的小伙伴从外面回来，母亲发现他身上穿的褂子不见了，就问他：“你身上的褂子那里去了。”瞿秋白低着头，小声说：“看到一个小朋友光着背在冷风里发抖，就把衣服脱下来送给他了。”母亲听后对他说：“这种事情好是好，可我们也不多啊！”

“不多！不多！我们总比他们多些。”秋白不高兴地说，母亲苦笑着摇摇头，叹息了一声，走开了。

十年之后，瞿秋白在土海与杨之华、好友羊牧之闲谈时谈及此事，还深感遗憾地说：“我一生就那么一次回过母亲的嘴。”

一九一三年“双十”节快要到了，这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个国庆日。许多人家都挂上了红灯笼，表示庆祝，有的还在红灯笼上面写上“国庆”。

一天，瞿秋白放学回家的路上，在街头看见一位衣衫褴褛的农民蹲在一家未开门的店铺的门前，旁边站着一个头上插着草标的女孩，那农民不住地喊声：“卖孩子，卖孩子！”声音极为凄惨。周围有一群人在观看。秋白不忍心看下去，他痛苦地对同伴说：“那小孩子低着头，就好像出卖我的妹妹似的。”当时有许多穿着华丽的富人无动于衷地从旁边走过。秋白指着一个头戴阔边礼帽的胖财主对同伴说：“什么时候，大胖子要饿瘦了，天下就好过了。”

回到家里，那在秋风里发抖的小女孩的身影仍在眼前浮动，于是他找来纸笔和一些工具，做了一盏白纸灯笼，并在上面写下“国丧”两个大字。做好后，就用竹杆挂在自家的门前。妹妹不解地问：“又不办丧事，为什么要挂白纸灯笼？”秋白抚摸着妹妹的头，对她说：“孙中山已经退位了，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并且抓着兵权，还有什么可‘庆’的呢？这个‘民国’就要名存实亡了。”

过了几天，羊牧之提着一篮芋头，去看瞿秋白，到了中午，秋白就留他吃饭。饭端上来的时候，只有一碗白粥。秋白感慨地说：“我们天天盼望孙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我们还有一碗白粥吃，乡下还不知多少人家连粥都吃不上哩！”

自从迁入祠堂后，瞿秋白一家的生活一天天困顿下去。瞿秋白经常要出入当铺。一次，羊牧之去看他，正碰上秋白在整理一包衣服，准备送到当铺去。秋白说是母亲暂时穿不着的一件绸棉袄和几件陪嫁时的旧衣服。羊牧之关切地说：“天一冷，太夫人怎么能没有棉袄呢？”秋白苦笑着说：“天下冻饿人何止我母亲，到那时再说吧。”

渐渐地，家具衣饰等物典尽卖空，只有靠借贷度日，母亲曾悲伤地对人说：“要等到我七十岁时，才能还清这些债啊！”而那时她还只有四十几岁。到了一九一六年初，秋白的家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母亲等不到秋白中学毕业，就托外甥女婿秦耐铭在无锡为他谋了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位。不等过年母亲就催他上路，并且叮嘱他不要回来，就在无锡过年。秋白匆匆去了无锡，那知母亲为债务所逼，早就决心以死来挽救这个破败的家。大年初五半夜，母亲在一盏昏暗的豆油灯下写下遗书，将红火柴头用桃花纸包成小丸，吞了下去，初六下午便去世了。秋白接到父亲的电报后，第二天赶回家，看到母亲的遗书，扑跪到母亲的床前放声大哭。

金璇的丧事十分草率，来吊丧的人，只有秋白的舅舅金家、表舅母陆家、表姐夫秦家。瞿家众多亲戚竟无一人前来。瞿世玮悲愤地写下一幅挽联悼念亡妻，其中一句为：“受尽讥谗全太局”，说明了金璇生前的悲惨处境，后因怕得罪亲友，改为“受尽饥寒全大局”。这些都使秋白看透了破落封建家族内部的关系。

入殓后，灵柩放在祠堂东侧屋内二十多年，一直无钱买地安葬。直到一九四二年前后，私立群英中学借瞿氏宗祠开学，才将金璇葬于东郊乱坟中。

瞿秋白丧母后，十分悲痛。但是，为了谋生，母亲“头七”刚过，他就随秦耐铭回无锡杨氏小学任教。清明节，秋白由无锡回家祭奠母亲的灵柩，并写下了《哭母》诗一首：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心。

自从母亲死后，“一家星散了”。父亲带了一个弟弟到武昌二姑母家，因受不了亲戚的白眼，又往济南住在一道院里，以教书糊口。秋白的妹妹轶群带着两个小弟景白、坚白到杭州寄居在四伯父家。秋白感到非常孤独和绝望，回到无锡后，目睹地方恶势力任意欺压农民，心里牵挂着星散到各地的家人，加上学校设备破败，学生也不服训导，秋白无心教下去，于是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辞去杨氏小学教员的职位回到常州家乡。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瞿秋白怀着渴求知识、寻求光明和希望的心情，告别了让他怀念和悲伤的故土，溯长江西上武昌，投奔堂兄纯白。

一九一七年暮春，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几声鸡鸣狗吠之后，天渐渐地亮了。一列客车缓缓驶入车站，十九岁的瞿秋白跟随

着堂兄瞿纯白下了车。秋白高高的个子，清瘦的面庞，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完全是一副读书人的模样。出站后，一辆黄包车跑了过来，堂兄吩咐了几句，车夫便架起车，拉着兄弟二人在高低不平的路上奔跑起来，车的后面掀起一道烟尘……

车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羊肉胡同的一所院落的门前停下来，这便是瞿纯白的家。堂兄付了车费，车夫抹一把脸上的汗水，驾着车到别处找生意去了。瞿秋白随堂兄进了院门，三进房屋的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这里除瞿家外，还住着吴姓一家，也是常州人。瞿秋白在前院右侧的客房安顿了下来。

这次，瞿秋白随堂兄由武昌到北京，本意是想要报考北京大学，可是一经打听，才知道北大的学膳费高得惊人。在外交部作科员，每月只有二三百元工资的堂兄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这笔钱供秋白入学。无奈，为了维持生活，在堂兄的建议下，秋白只得去参加普通文官考试，结果也没有被录取。秋白一边自学，一边继续寻找求学和就业的机会。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七月一日，安徽督军张勋以“调解”北京政府与安徽地方军阀冲突为名，率领辫子军入京，发动兵变，拥立清废帝溥仪复辟，闹得北京城里乌烟瘴气。二日，大总统黎元洪避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电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在天津设立临时国务院。七日，段祺瑞的“讨逆军”向北京发动了猛烈进攻。

为避兵祸，瞿纯白让秋白护送家眷回汉口暂避。张勋复辟很快就失败了。秋白又由汉口回到北京。由于无学可上，瞿秋白就由朋友带着到沙滩北京大学文学院听陈独秀、胡适的课。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解决“求学”和“饭碗”的问题，暑假里，他考入了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

学校设在东总布胡同千号的一座西式平房里。学制为五年，而

且免收学费、膳费，毕业后还比较容易找到职业。瞿秋白非常珍惜这一学习机会，读书很刻苦，经常是夜里两三点钟，房间里还亮着灯。他除了学习俄语和法语外，还自学英语、社会学和哲学。广泛研究中国的经史子集和文学，想“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由于学习刻苦，他的成绩一直优秀，每逢考试总是名列第一二名。然而，学习上所取得的成绩并不能使他开心，京城里“民国”新官僚们与清朝旧官僚们同流合污，蝇营狗苟，欺压人民，面对种种丑恶现象，瞿秋白受到很大刺激，他感到孤独和苦闷。

瞿秋白早年的家庭和生活遭遇如此，那么鲁迅的早年生活又是怎样呢？

鲁迅是浙江绍兴人，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在绍兴城内的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宅出生时，家境还不错，有水田四五十亩，父亲虽闲居在家，但祖父在北京光绪朝中任内阁中书，按照当时的情况可算“小康”之家。

鲁迅最初的名字叫樟寿，字豫山。因为“豫山”二字按绍兴方言的读音和“雨伞”谐音，不久就改为豫才了。

鲁迅的母亲叫鲁瑞，娘家在农村。鲁迅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时，始用笔名鲁迅，就是取母姓。父亲周文郁，字伯宜，曾中过秀才，乡试却屡考不中。祖父对鲁迅的学业要求比较严格，希望他能走仕途的道路。鲁迅七岁时入私塾读书，直到十七岁一直都在私塾念书。其中有六年时间是在三味书屋度过的。其间家庭发生了两次大的变故：一次是在北京做官的祖父因科举案入狱；一次是父亲的病逝。这两次变故使鲁迅家从“小康”陷入困顿的境地。

一八九三年鲁迅十三岁时，祖父周介孚在本年度浙江省考取举人的乡试中，受几个亲友的委托，写信给主考官疏通关系。事发

后,交由苏州知府处理。苏州知府本想含糊了事,诱说周介孚患有神经病,以便使其免罪。无奈周介孚否认自己有病,遂将案情扩大,由浙江省上报刑部,经“钦旨”定为“斩监候”关入杭州监狱。官府差人借此敲诈勒索。周家为救人,卖田当物,寄钱到北京和杭州托人设法营救。科举案发生后,周家整天担惊受怕。因为在当时一人犯“法”就可能被满门抄斩,周家怕株连到孩子们,就让鲁迅和弟弟中断学业随母亲到皇甫庄外婆家“避难”。年底又跟大舅父鲁怡棠迁居到皋埠去,住在秦、胡两家大地主共有的“当台门”里。

鲁迅这次到舅父家和从前完全两样了,势利眼的亲戚称鲁迅为“乞食者”。鲁迅在舅父家虽然只住半年,但已深深的体会到世态的炎凉。由于整天和农民、渔民的孩子在一起玩,使他有接触接触到在封建势力压榨的农村生活,进一步了解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

鲁迅在度过半年的“避难”生活之后,回到家中,仍在三味书屋读书,但是另一件不幸的事情又降临到鲁家——父亲病倒了。

一八九四年七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八月的黄海海战中,中国大败。鲁迅的父亲听到消息后,心情忧虑。于是他经常喝酒、生气,身体也越来越坏。看到国家的衰败,他同情洋务派,主张富国强兵,并表示想送鲁迅去西洋或日本留学,学成归来后,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不久便因肺痈,卧床不起。家里请来了本城有名的医生姚芝轩,为父亲诊病,诊费贵得出奇,每次一元四角,而且每隔一日就要诊一次。这对鲁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因此在父亲从患病到去世的两年中,鲁迅经常出当铺进药铺,经过姚芝轩的诊治,鲁迅父亲的病不但没有起色,反而渐渐严重起来。后来姚芝轩为了摆脱责任,又推举另一位医生何廉臣,这位医生不仅诊费一文不少,而且用药比姚芝轩更加古怪,今天要“蟋蟀一对”,还注明“要原配,

即本在一窠中者”。明日要“平地木十株”一棵，还有经霜三年的甘蔗等等。医生将其制成一种名曰：“败鼓皮丸”。鲁迅的父亲吃了以后，依然不见效，不久便病故了，享年才三十七岁。

周家原有的水田，因营救祖父已卖去不少；这次为了给父亲治病和办丧事，又将余下的全部卖光。这样鲁迅一家受到亲友们更多的歧视。新台门里的十多户周家，都欺负鲁迅一家，这使鲁迅非常愤慨。鲁迅曾回忆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从这时起，鲁迅对社会现实、封建家族的虚伪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次，鲁迅以长子身份代表本家参加一次全“台门”内的家族会议。鲁迅一家属于新台门智房派兴房系，会上一些叔祖辈亲族作出了一些不利于智兴房的决议，强迫鲁迅签字，鲁迅坚决反抗，终未签字。同时，本家的一位叔祖母又制造和散布关于鲁迅的流言。这些封建家族中的黑暗现象，使鲁迅下决心离开家乡，去外省求学。

一八九八年五月一日，不满十八岁的鲁迅，在戊戌变法的高潮中，带着母亲为他筹到的八元钱，拜别了母亲，离开家乡赴南京求学。

瞿秋白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时十九岁，而鲁迅到南京读书时不到十八岁，一个失母，一个失父，他们在少年时期都苦尝了人生的不幸，共同的家庭遭遇使他们在心理感情上有了相互理解的基础，并且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目标。鲁迅在一九〇二年二十二岁时，抱着科学救国的远大理想，东渡日本求学，一到东京，便置身于孙中山、章太炎领导的民主革命营垒之中，留日七年间，一直与光复会、同盟会保持联系，形成了比较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这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一个



新的阶段，此时的日本东京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海外的活动中心。许多反清的革命志士都聚集在此，国内的许多次起义都是在这里谋划和准备的。一九〇三年，由陶成章等人主持以江苏留日学生为基础，在东京成立了革命团体“光复会东京分会”，后来鲁迅也曾参加了这个革命团体。鲁迅在革命形势的鼓舞下，在留学的弘文学院江南班中，第一个剪掉了象征种族压迫的发辫。他还专门拍了一张“断发照”，送给同乡好友许寿裳，并在照片后面写了著名的《自题小像》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四月初，鲁迅将照片和一些宣传维新思想的书刊托同学带回故乡，向家里表示要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去换取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一九〇四年四月，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毕业，得到了一张院长嘉纳治五郎名义签发的毕业文凭。八月底，鲁迅就到日本东北的一个偏僻的市镇——仙台去了，在那里开始了时间并不长的学医生涯。后来他在解释自己学医的目的时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是后来学校放映的一部纪录影片，打破了他学医的美梦。

一九〇六年初，一次上细菌学课，老师讲完后，还没有到下课时间，于是放映了一段反映日俄战争的纪录影片，影片中日军在枪决一个宣称是为俄国作侦探的中国人，而围观的中国人却神情麻木，视若无睹，鲁迅觉得深受刺激，下课后几天他都不能使自己平静下来，电影中的一群麻木的中国人总是在他眼前晃动。他感到十

分苦闷,于是有时就跑到深山里去悲歌或去苦苦思索。最终下定决心弃医从文。后来他对自己当时的决定作出了如下的解释: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如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一九〇六年三月,鲁迅向清政府驻日监学李宝巽提出退学申请。六月,鲁迅在仙台医专第二学年结束,告别了他所尊敬的藤野先生,从仙台回到东京。

在东京期间,鲁迅为了从事文学艺术活动,自修了德文、俄文。并且很快就直接从德文、日文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把当时中国革命所需要的东西介绍给国人。偶有闲暇就同好友许寿裳一起去书肆购书。每当夹着新买的书走出书店时,鲁迅总是拍一拍空空如洗的衣兜,笑着说:“又穷落了!”回到东京的三年中,鲁迅涉猎的范围极广,在学习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的同时,博览西方各国的文学著作。他一方面刻苦钻研,广泛阅读,一方面又和国内来的革命分子来往密切。他的住处便成了革命党人在一起聚会的地方。鲁迅虽然从他们的谈话中得到鼓舞,对他们的行为由衷的敬佩,但仍然做着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文化艺术活动,这便是鲁迅的性格。于是他创办杂志,出版小说集,研究尼采,撰写文章,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唤起民众的民主革命精神。鲁迅在异国的土地上不断地探索开辟着自己前进的道路。

一九〇九年八月,鲁迅为了在经济上帮助在日本读书的弟弟周作人,放弃自己留在日本从事文学活动或去德国深造的打算,决定回国。回到阔别七年的祖国后,鲁迅感到无比的亲切。好友许寿

袁先于鲁迅回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之后，便向任监督的沈钧儒推荐鲁迅，于是鲁迅回国之后便到该校任教。两年以后，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胜利，使鲁迅的心中充满了喜悦，觉得中国将会光明起来。的确绍兴城里，果然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如成立了“赞助共和”、“拥护革命”政党的组织。新任都督王金发按照革命党人的政策，实行了一些改革，如没收几个反动地主的田产，来作为纪念烈士秋瑾、徐锡麟的秋社、徐祠的祭产；枪毙残害革命党人的恶霸劣绅；限令米商平价售米以恤穷黎等，这些措施使群众欢欣鼓舞。在教育方面，王金发还派鲁迅担任了山阴、会稽两级师范学堂的监督，拨给经费二百元。鲁迅心中充满希望，想把这个学校办好，为新政权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没过多久，王金发就蜕化变质了。“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鲁迅同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斗争，最终辞去监督职务。

辛亥革命虽然胜利，但绍兴也和全国一样，恢复了旧有的模样。辞职后鲁迅本想到上海一家书店当编辑，但不久，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到教育部任职，鲁迅第二次离开了故乡绍兴。

## 二、苦闷与探索

时光如梭，转眼就到了一九一九年。这一年，二十一岁的瞿秋白和三十九岁的鲁迅同在北京，他们在不同的岗位，用着不同的方式做着各自应该做的工作。

“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瞿秋白和鲁迅在思想上都经过苦闷、探索的历程。一九一七年的时候，秋白曾写了一首七绝：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这首诗正反映了瞿秋白“厌世”的消极情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他把此诗书赠鲁迅，并写下“跋语”：

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

北京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对初来乍到的秋白来说倒也新鲜，他除了读书外，饱览了古都的风景名胜，并考察了不少地方史迹。但这一切是短暂的，不久，北京的各派军阀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段祺瑞政府对外卖国求荣，对内横征暴敛，欺压人民。京城里的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辛酸，使他感到异常苦闷，孤寂。他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刺激。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心愿。

他一方面为自立生计作准备，一方面“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拚命苦读。为了摆脱苦闷的心情，他不断追求探索，他研究老庄的哲学，研习佛经，希冀从哲学、宗教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然而苦海无边，到哪里才能找到一条通往光明的路？

后来他在《多余的话》中回忆当时的心境时曾写道：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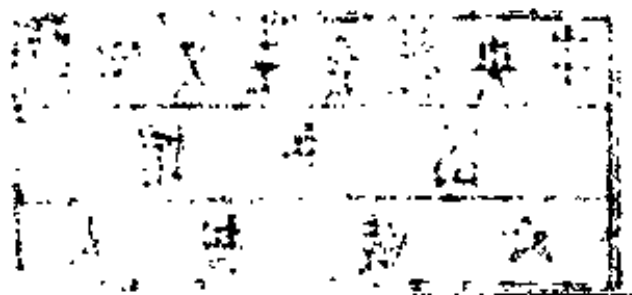
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过这一世，甚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年夏），当时我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七年九月，瞿秋白随堂兄一家迁至东城根东观音寺草厂胡同南口路西居住。不久，秋白的弟弟云白、堯白也来北京同堂兄一起生活，秋白与兄弟们住在后院东屋。纯白为他们操办了简单的家具，房间里摆上了书桌书架。兄弟们穿衣吃饭都需要纯白来负担，一家人生活非常清苦。

学俄文是为了吃饭，但在当时秋白吃的是堂兄纯白的饭，依靠堂兄来供养，寄人篱下生活的酸楚也促使他去探索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瞿秋白在苦闷、孤独、探索中度过了三年。一九一九年春天，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秋白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协约国战胜同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政府因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而成为战胜国。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成为战胜国，消息传来，中国人民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喜悦之中。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个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了三项



要求：一、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二、取消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三、收回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种权利。但是，会议在美、英、法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断然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并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项特权。“巴黎和会”成为英、美、法、意、日等帝国主义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这消息使中国人一下从狂喜跌入悲愤、仇怨的深渊。然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民他们再也不愿做任人宰割的奴隶了，他们起来抗争了；五月三日晚，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北京高师、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一千多人拥向北大法科礼堂举行会议。最后决议：“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联合各界一致力争”。并决定五月四日在天安门集会，进行抗议，第二天到天安门集会的消息传到高师，以及瞿秋白所在的俄专等学校。

瞿秋白压抑在心头很久的火种，被点燃了。

他满怀热忱，积极组织和率领俄专同学参加运动，第二天作为学生会的负责人，积极领导俄专的学生进行罢课斗争。瞿秋白代表俄专经常参加汇文大学的爱国活动，并和大家一起组成“十人团”到北京街头或旅游区去演讲，进行反帝爱国宣传。由于北京政府徐世昌下令将北京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学生们集会十分困难。瞿秋白常常夜间去开会，遇到有军阀特务跟踪，他就下了电车，上人力车来回兜圈子，直到把特务甩掉。由于瞿秋白阅历深、博学多才，对事物都有许多新的见解，所以在学生们中间有“少年老成”的美称，并被大家推为“谋主”。开会、游行、讲演等活动都是由他召集组织的。

六月初，北京政府更加疯狂地镇压学生爱国运动，下令学生



们“即日上课”，否则将予逮捕法办。三日，北京两千多名学生不顾禁令，上街演讲，秋白和俄专的同学也一起参加了。集会时，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秋白与一百七十多人被捕，他第一次尝到了铁窗的滋味。由于被捕的人太多，反动当局就把位于北河沿的北京大学法科校舍改为临时拘留所，后来又把马神庙北大理科校舍改为临时监狱，专门关押爱国学生。瞿秋白和同学们坚持狱中斗争，在全国人民“三罢”运动的声援下，反动当局只得释放被捕的学生。出狱时，瞿秋白满脸胡茬，瘦了许多，身体十分虚弱，但意志更加坚强。

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六月五日，日资上海第三、四、五纱厂的工人们喊出了“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揭开了罢工的序幕。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沪宁铁路工人、码头工人也先后加入罢工行列，罢工人数达十五万以上。随后，天津、济南、长沙、广州、九江等大中城市及其它一些小城市的工人也都先后集会游行。在工人的带动影响下，上海、天津、山东、武汉等地的商人们纷纷罢市，上海的一些商店的门前还挂起了“为国家，今罢市，救学生，除国贼”的标语，从而实现了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

北京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压力，无可奈何地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未在“和约”上签字，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不久，北京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经过实际斗争锻炼的瞿秋白，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他深感中国仍然处在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于是他写了《不签字后之办法》一文，发表在七月十七日的北京《晨报》上，提出了自己救国救民的一系列主张。

八月份，瞿秋白又因“马良祸鲁”事件，第二次被反动当局



逮捕。

“五四”运动爆发后，济南的各家报纸都对学生爱国运动表示声援和支持，惟独《昌言报》指责学生是“狂热”并主张武力镇压学潮，这些言论激怒了学生。七月二十一日，济南各界人士千余人召开联合大会。会后，群众冲入《昌言报》馆，将经理等人捆绑起来，游街示众，然后交省公署审判厅，请求依法处理。山东督军张树元在革命运动面前慌了手脚，急忙向北京政府求援。北京政府立即宣布济南戒严，并委派段祺瑞心腹大将马良为戒严司令，前往济南镇压。他派兵逮捕了请愿者十六人，不久，又捣毁山东外交后援会，并将会长马云亭及爱国分子朱春祥、朱春涛等三人杀害。马良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京、津、唐等地代表聚集北京联合请愿，要求取消济南戒严令，严惩马良。秋白与全体代表三十余人到新华门请愿，遭到警察厅的逮捕。八月三十日，在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北平政府被迫释放了拘捕的请愿代表。由于监狱条件恶劣和劳累过度，秋白又吐血了，后来他的肺病成为王明一伙让瞿秋白留在苏区的一个借口。

出狱以后，表姐夫秦耐铭写信问候秋白，他回信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五四”爱国运动，使秋白亲身感受到了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瞿秋白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起点。

同样，鲁迅在探索人生道路的过程中，也有过苦闷、探索、彷徨、奋斗、飞跃的过程。

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六年这四年间，是鲁迅的苦闷、探索期。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鲁迅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九一二年五月初，鲁迅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约请，北上来到北京，在教育部任佾事。他住在宣武门外南



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里的藤花馆。此时，他独自一人，来往的朋友较少，下了班就到街上的小饭铺或街头游动的小贩挑上买点东西吃，有时一个馒头就算一顿饭了。回到家里便抄写古书、古碑，考订整理石刻画像，斗室、孤灯一直伴随他到深夜，就是在星期天，也只是偶然到琉璃厂旧书店走走，搜集一些古书和古碑拓本。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他对现实的痛苦。是呀！辛亥革命后，革命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他在国内打击革命力量，在国外投靠帝国主义，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又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孙中山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但不到两个月，便失败了。孙中山再度亡命日本。孙中山赶跑了皇帝而现在的大总统竟要恢复帝制，鲁迅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感到失望和痛苦。

一九一七年八月的一个夜晚，天气闷热，鲁迅照旧在屋里抄录古碑的拓本。他的老朋友钱玄同来访。玄同脱下长衫，在鲁迅的对面坐下，随手翻着鲁迅抄好的拓本问道：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钱玄同有意劝鲁迅做点文章。对于老友的好意，鲁迅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

么？”

两人的对话虽然简单明了，但反映出鲁迅对祖国的前途深感忧虑和此时的一种失望的情绪。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看到了希望，重新鼓起勇气去战斗。许多年以后，鲁迅回忆说：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这“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

鲁迅终于拿起了笔，很快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他借狂人的嘴说出了几千年的礼教——中国封建制度伦理观念——吃人的本质，狂人之所以发狂，是封建礼教迫害的结果。鲁迅吹响了文学革命前驱者的号角。陈独秀频频催稿，而鲁迅“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著名的《孔乙己》、《药》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点燃了思想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火药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熊熊大火燃烧了起来。

### 三、“饿乡”行

转眼，瞿秋白已在俄文专修馆学习了三年。一九二〇年九月，他未毕业就找到了一份差事，不过并不是去做某某大员的翻译，也

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舞文弄墨，而是以北京《晨报》、《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到被称为“饿乡”的莫斯科去“啃黑面包”。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北京《晨报》、《时事新报》社，为了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的时事新闻，决定派一批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等国考察。为此，两报还在《晨报》上刊登了一则《共同启事》：

吾国报纸向无特派专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一大缺点也。吾两报有鉴于此，用特合筹经费遣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

朋友们知道瞿秋白在俄专三年的学习成绩一直是优等，就推荐了他。流利的俄语、广博的社会知识，成为秋白应聘的有利条件。事情办得顺利，他被聘用了，并且很快就要启程。由于当时年轻的苏维埃俄国正处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环境非常艰苦。敌人百般造谣诬蔑，使许多人不明真相，称它为“饿乡”。这对年轻的瞿秋白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的考验。

秋白在俄文专修馆念书期间，一直住在堂兄瞿纯白的家里，当他把要去苏俄的消息告诉纯白后，兄嫂都劝他不要去，特别是嫂嫂更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甚至还流下了眼泪：你妈死得早，你爸又不在身边，我们都希望你在北京做学问，将来好有个立身之本。嫂嫂的话又钩起了他对许多往事的回忆：秋白十八岁那年的春节，母亲因还不起债务，服毒自杀了。父亲带着弟弟去了山东。秋白离开家乡常州投奔了在武昌京汉铁路局任通译的堂兄瞿纯

白。

纯白生于一八八九年，比秋白大十岁。他是京师大学堂法文毕业生，曾做过上海南洋大学、南洋方言学堂、北京民国大学、清河陆军大学教员。瞿秋白投奔他，是想得到一个求学深造的机会，同时也求得解决“饭碗问题”。他在纯白的帮助下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谁知道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条件太差，根本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而且“饭碗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秋白只好退学，他又不愿闲散下去，于是就往黄陂去找姑父周福孙。周福孙曾作过清朝翰林院的编修，家中有许多藏书。秋白经常坐在书橱前阅读《老子》、《庄子》、《资治通鉴》等古籍，有时还画山水画，篆刻印章。一晃几个月过去了，依旧没能解决求学与“饭碗问题”。

瞿秋白抱着上大学的日的，从黄陂回到武昌，正碰上堂兄调到北京做事，于是便随堂兄纯白北上，来到北京。

现在回想起来，四年来一直住在兄嫂家中，堂兄依靠一点微薄的工资供养自己读书，实在不容易。现在要走了，心里也确实不是个滋味。但他主意已定，决心去闯一闯，为中国人去寻找出一条光明的路来。这想法又不便在兄嫂面前直言，于是只能默默无语，低下了头。纯白是知道秋白的性格的，一旦定下来，就很难改变。于是就对他说道：“既然已定，也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你到俄国后专门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辍。”

决定赴苏俄后，秋白想这一走，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应该去一趟山东济南，看一看年已半百的父亲瞿稚彬。此时，瞿稚彬也是寄人篱下，住在济南城内娘娘庙街（今岱宗街）十五号路北王璞生家里，以授人画画为生。长期穷困的生活使他显得很苍老，父子见面，望着老人家那凄惨的面容，秋白不禁

阵心酸。二人整整谈了半夜，第二天分手时，父亲又叮嘱说：“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己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

几句话说得秋白心头一热，为了不让父亲看到自己的泪水，他答应了一声，随后转身上车，列车开动了，秋白在窗口依然望见父亲呆呆地站立在那里……

在回京的途中，秋白去天津探望了二表姐丈。回京后，又向少年时代的恋人表妹纤纤告别。做完这些既琐碎又令人伤心的事后，行期也就近了。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晚，瞿秋白到位于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去找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Urin)办理出国护照。分手时优林的秘书告诉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将赴任，如果能与他同行，专车可由哈尔滨直达苏联赤塔。瞿秋白听后，自然很高兴。

办完护照后，秋白又匆匆赶往好友耿济之家中，去参加朋友们为他举行的送别聚会。一进门，见郑振铎、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等一些在“五四”时期结识的朋友都聚集在那里等他。瞿秋白不好意思地向大家致歉，说明了迟到的原因。随后大家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有的朋友劝他放弃赴俄的打算，有的则关心他的身体，怕他经受不住俄国冬天的寒冷，对朋友们的好意，秋白都心领了。最后他向大家告别说：“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妥贴，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大家都被秋白的情绪所鼓舞，聚会是热烈的，没有丝毫颓唐、悲凉的气氛。

秋天的北京是多风的季节，到了夜晚已有冰冷的感觉。回家的路上，秋白心想，清代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

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胜过了食“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既然已经决定，就不退缩……宁死亦当一行。

第二天清晨，瞿秋白告别了亲友，在北京东车站和两位同伴登上北上的列车。

车过天津时，他去看望了在家乡常州读中学时的同学好朋友张太雷，老同学相见，分外亲热，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午夜，秋白又换乘京奉列车，去沈阳，在那里再换乘中东铁路客车去哈尔滨。

到哈尔滨以后，由于谢苗诺夫的白匪在满洲里和赤塔之间活动，有时战事非常激烈，列车受阻，瞿秋白一行被滞留在哈尔滨五十多天。黯黯的天色，满地积雪，映着黄昏时的淡云。瞿秋白在到处是马粪的街道上行走着，街道两旁的小贩不停地叫卖着，年轻的俄国女郎嘻嘻哈哈地从他身旁走过。一位俄国乞丐向他乞讨，秋白给了他一角钱，那老乞丐画着十字说：“谢谢，谢谢，上帝保佑你！……上帝呵！中国人比俄国人好多着呢……”秋白显得很焦急：“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达他梦寐以求的赤都”。他买了一份报纸，希望从上面得到一些有关战事的消息。电灯光从小饭馆的玻璃窗里射了出来，瞿秋白走到里面胡乱吃了点东西，然后匆匆走向旅馆。

哈尔滨的旅馆生活转眼间已有一个多月了，天气一天天冷起来，冷酷陈死的社会空气，虽然使秋白感到烦闷，但一想到那可爱的将来，他的心里就充满了蓬蓬勃勃的春意。

在哈尔滨期间，正好赶上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十一月七日

这天，瞿秋白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在纪念会上，他第一次听到苏联朋友唱《国际歌》，这声调雄壮、浑厚的歌声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十二月初，谢苗诺夫匪帮被击溃了，列车又能通行了。瞿秋白就和同伴一起去拜访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希望能搭乘他的专列一同前往，陈广平虽然同意，但一定要收取车费，标准是每人一千元，伙食费另计。后来，又索取了他们每人一百斤面粉作为旅途中的伙食费。秋白初次尝到了现实生活的滋味——不懂得世故人情，没有经验就该受骗。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瞿秋白抵达苏俄境内的赤塔。一个月以后才结束了漫长的旅途抵达向往已久的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的第三天，瞿秋白就到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联系工作。在克里姆林宫的对面有一幢六层大楼，这是旧时莫斯科最大的旅馆，现时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四层楼上，一间办公室里，窗帘华丽而破旧。司长杨松(Yan Son)微微含笑对着远来的新客道：“我们这里怎样……可是很冷啊，你瞧我穿着皮大氅办公……中国的劳动人民自然是对我们表示很亲密的厚意，可惜协约国封锁以来，谣言四布，他们未必知道实情，或多误会。诸位到此，正可为正直的中国人民一开耳目，为中俄互相了解的先声。”客气一番后，他为瞿秋白一行安排了食宿和工作。

初到莫斯科的秋白感到很兴奋，一切都是既新鲜又陌生。为了能尽快开展工作，他决定先从研究俄罗斯文化艺术入手。为此，他参观了特列嘉柯夫美术馆。在那里他看到了俄国著名美术大师的作品，站在现实主义大师列宾的画前，他久久不愿离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使他想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劳动人民，他

称列宾的画为“旧文化沙砾中的精品”。在莫斯科大剧院，他第一次欣赏了“花露润融、高吟沉抑”的歌剧。一九二一年二月十四日，他会见了著名诗人马雅科夫斯基。诗人幽默的谈吐使会见显得轻松活泼。分手时诗人把一本诗集《人》送给他。

二月上旬，苏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病故于莫斯科，瞿秋白参加了送殡仪式并结识了克鲁泡特金夫人。对这位文质彬彬的青年人，克鲁泡特金夫人非常热情，秋白从她那里还得到了一份礼物——一袋面粉。这在苏联内战时期称得上是一份厚礼了。

旅苏期间，瞿秋白在考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同时，还经常参加“无产文化”的活动。到莫斯科不久，他带着“东方文化意趣”问题，走访了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苏联著名作家卢那察尔斯基。

苏俄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克里姆林宫内。十三世纪的宫墙，七百年前的教堂——古老神奇的建筑，富丽堂皇的大厅与北京红墙黄顶的皇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瞿秋白在一间空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卢那察尔斯基，这位苏俄当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评论家，热情接待了他。因为是事先约好，所以双方谈话都非常有针对性，秋白就苏俄教育状况，东方文化等问题作了采访。

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到十六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期间，他写了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发回国内，在北京《晨报》上连载，向中国人民报道了苏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状况。

七月六日这天，对于瞿秋白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安得莱厅召开会议。瞿秋



白见到了列宁，他把当时的情景作了真实、生动的描述：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

散会后，列宁在人们的簇拥下，走出会场。在克里姆林宫的长廊里，列宁走来了，秋白急忙迎上前去，并用俄语向他问好，由于公事匆忙，列宁一边走一边要他认真读一读有关东方的两份材料。

列宁那光秃秃的头顶和矮矮的身影，在长廊的拐角处消失了。瞿秋白也跟随着人流走出克里姆林宫。共产国际“三大”闭幕了，苏维埃为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举行了饯行宴会，瞿秋白应邀出席。席间一位莫斯科苏维埃的议员，某工厂的工人，幽默地对他说：“你原来是中国的新闻记者，你们报上列宁死了几回了！哈哈哈。”瞿秋白机智地回答道：“中国造谣机关的机器还太简陋，自己还不配制造此种世界新闻的谣言，大概中国市场外货充盈，‘舶来货的谣言’自然不少，不过我的报还算是有些左的，大约决不让此等谣言随便乱载。”他的话博得了一阵掌声，大家欢呼着：“中国人，中国人”，并把他举起，抛向天空。

一九二一年九月，瞿秋白除了完成记者的任务外，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东方大学全称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又名斯大林大学，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五月，是一所专门

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东方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印度、阿富汗、土耳其、越南等一些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革命理论。当时，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肖劲光、曹靖华等人都在这里学习。瞿秋白在中国班教授俄语，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

在苏俄考察期间的生活是艰苦的，瞿秋白需要自己烧饭和料理生活，伙食很不好，而且吃不饱，糖和一些食品都是定量供应的。由于紧张的采访、写作、教学，再加上物质生活的困难，秋白病倒了，呼吸困难，经常吐血，医生和朋友都劝他回国休养，秋白谢绝了大家的好意，仍然坚持学习和工作。直到一九二一年底，终因病情沉重，被送进高山疗养院。医生说有一叶肺已经烂了，至多再坚持三年。在死神面前，瞿秋白毫不畏惧，就是在病床上，他也还是坚持看书和写作。在苏俄的两年考察中，他先后完成了四本书：《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俄罗斯革命论》。其中的许多散文都是在高山疗养院的病榻上完成的。

经过苏俄实际生活的锻炼，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一九二一年五月，经过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在莫斯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到十二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会议。此时在苏俄考察的瞿秋白以代表团译员的身份，为陈独秀担任翻译。大会期间两人朝夕相处，秋白给总书记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

一九二二年底，瞿秋白结束了在苏俄的工作和学习，十二月二十一日与陈独秀同车回国。

列车上，陈独秀告诉瞿秋白，党中央为了就近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已于十月由上海北迁到北京，并希望他能参加工作。秋白在总书记的指引下，对革命前途充满希望。后来，秋白在陈独秀的引荐下直接参加了党中央机关工作。

#### 四、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回到北京后，瞿秋白依旧住在堂兄瞿纯白的家里。堂兄希望秋白在北京供职，并在北京政府外交部为他谋得了一份差事，月薪二百元。秋白拒绝了，这使堂兄非常不解。因为他不知道秋白已参加了共产党，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二七”惨案以后，北方工人运动转入低潮，瞿秋白跟随党中央一起迁回上海。

到上海后，很快瞿秋白就参与了党的领导工作，投身到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等工作中去。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受党中央的委托起草党纲等会议文件。“三大”的主要议题是国共合作和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在会议讨论期间，曾发生了尖锐的争论。张国焘怀疑国共合作，陈独秀等人则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但多数代表认为共产党必需坚持在政治上的独立性。

在“三大”会议上，瞿秋白对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及改造国民党等问题上，都表达了自己的正确主张。最后大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有关国共合作的决议，为统一战线的建立作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三大”会议，选出了以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

罗章龙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

一九二三年十月，瞿秋白从上海到广州，实际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被任命为孙中山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参与起草改组的一系列文件。十月六日，苏联代表鲍罗廷抵达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协助国民党改组。鲍罗廷是俄国人，全名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一九〇三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一九二三年五月，被苏联政府派遣来华，任国民党首席政府顾问。二十五日，孙中山主持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鲍罗廷又被聘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为国民党起草组织法、党纲、党章等重要文件。此时，瞿秋白担任了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经常与他在东山春园分馆研究讨论关于国民党改组以及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内容的重新解释等问题。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后就和鲍罗廷一起去同孙中山商谈，他们的许多提议受到孙中山的重视和采纳，坚定了孙中山联合共产党、学习苏联的决心。在鲍罗廷那里，瞿秋白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一起起草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瞿秋白把用俄文写成的宣言草案译成汉语，提交宣言草案小组审定。一九二三年底，李大钊由北京到上海，在会见了陈独秀之后，也来到广州，与谭平山等人组成了一个中共指导小组，专门指导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瞿秋白也是指导小组成员。

置身于革命洪流中的瞿秋白，虽然工作非常繁忙，身体也不好，但在精神上却非常振奋。十二月底，他在给上海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王剑虹的信中附了一首充满革命激

情的诗：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他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感到欢欣鼓舞，对置身其间也感到很自豪。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这天，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张国焘等共产党人出席了大会。大会宣言规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开始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此后，他经常奔波于上海和广州之间处理两党事务。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一日，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辅助孙中山筹划政治方针。孙中山自任主任，瞿秋白成为六个委员之一。八月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四次会议，孙中山、胡汉民、瞿秋白、鲍罗廷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设立统一训练处，将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陆军部讲武堂、西江陆军讲武堂、警卫军学兵营及航运局，统归训练处管理。九月三日和七日，瞿秋白又出席了第七次和第八次会议，讨论了组织北伐等有关问题，会后孙中山亲率北伐部队离开广州，移师韶关。后来，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回师平定了广东商团叛乱，稳定了广东局势。

这一时期，瞿秋白除了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外，还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担任了上海国民党

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和撰稿工作。

瞿秋白对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制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毛泽东在谈到孙中山和国民党“一大”时曾这样说：“……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的‘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就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他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俄国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

瞿秋白在国共合作的政治活动中得到了锻炼，为后来从事更重要的领导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四大”。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一条由天津开往上海的轮船上，瞿秋白身穿长袍，脖子上围一条雪白的围巾，头上戴一顶灰礼帽，从船舱走到甲板上，望着翻滚的海浪，他想此次开会，一定要把以前的工作好好总结一下，瞿秋白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并担任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大会通过政治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决议还指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族革命时代的重要性，批评了党内存在统一战线上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

五人成员、兼中央宣传委员。

## 五、支持毛泽东

一九二七年四月的上海仍然寒凝大地，没有一丝春意。

随着北伐的胜利，蒋介石逐步形成了个人专制独裁，并把共产党当作他的主要敌人，从限制共产党进而发展到要清除共产党。“中山舰事件”及“整理党务案”都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政治阴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变本加厉为投靠中外反动势力，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做准备。四月一日，汪精卫从德国回到上海，当天蒋介石就向他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苏联顾问鲍罗廷，一是分共。四月初，他又在上海召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密谋反共。

对蒋介石在宁、沪的所作所为，在武汉的瞿秋白、吴玉章等共产党员已有察觉。他们找来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紧急商讨如何对付蒋介石的异动，最后决定调北伐主力开往南京，与第二军、第六军会合，加强革命力量，以监视蒋介石的行动。但当时的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希望，不赞成同蒋破裂。总书记陈独秀也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四月五日又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把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说成是谣传，并加以辩护，蒙蔽了革命群众。致使北伐的主力不再东下，驻守南京的第二、第六军也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被调往长江以北。

瞿秋白对蒋介石的反动和党内的右倾，非常忧虑。他对在武汉主编《民国日报》的茅盾说：“此人（指蒋介石）十分阴险，嘴上讲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两样，现在掌握了军权，又有了宁、汉、杭的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将来后患无穷。”

黎明前的夜显得那样长，又是那样的黑暗……

瞿秋白是在一九二七年三月筹划完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后，告别了爱人杨之华，来到武汉的。当时陈独秀、彭述之仍留在上海，在武汉的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组成了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瞿秋白还兼管宣传部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夜晚，在汉口英租界辅义里二十七号的一栋二层小楼上，微弱的灯光下，身穿白布短衣的瞿秋白正伏案工作，桌上摊开着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上面刊有毛泽东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正在为这篇文章赶写序言。

一九二七年的冬天，毛泽东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决定到乡间去作调查研究。从一月四日开始，毛泽东身穿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肩上背着一个小包袱，考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和湘乡，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考察中，农村发生的一些奇人奇事，使他思绪万千。他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催促农民运动要采取新的路线，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道和歌颂了湖南农民的革命运动。但这篇文章只在《向导》第一百九十一期上发表了一部分，就被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执行人，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彭述之拒绝了。瞿秋白在中共“三大”时，虽然和毛泽东见过几次面，但从没有深谈过。到武汉后，读了毛泽东的文章，非常赞赏，认为毛泽东比我们这些书生看问题要深刻的多，应该广泛宣传，它将对中国的革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于是，秋白找到彭述之，要求继续刊登，但又遭到拒绝。他非常气愤，决定要为毛泽东的文章出单行本，并亲自撰写序言。

他写道：



“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

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瞿秋白在序言里还给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从此，毛泽东这位高大的湖南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两人同受“左”倾路线的排挤，逆境中成了好朋友。

当瞿秋白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已是午夜两点。他并没有睡意，走到窗前，遥望着那黑沉沉的夜空。

就在瞿秋白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赶写序言的同时，蒋介石指使杜月笙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骗去杀害了。

在武汉，瞿秋白忙于筹备中共“五大”。当他从杨之华的信中得知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在给爱人杨之华的回信中说：“上海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独立地拿起武器来争取解放，是有利于发展并完成无产阶级在革命的领导权的新方式”。“革命前途光明，但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

正如瞿秋白所预料的那样，一场血腥的反革命大屠杀就要开

始了。

四月八日，蒋介石会见了他的老朋友上海的秘密帮会的头目们。他们又分别与几个外国领事馆的官员们会谈。结果，一卡车一卡车的枪支弹药和金钱，从外国租界运到青红帮的手里。

十二日，蒋介石下达了屠杀令。停泊在高昌庙的军舰首先发出信号，在租界内早已准备好的青红帮流氓打手，臂戴“工”字袖标冒充工人，分头出动，他们袭击了上海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总工会被捣毁，又在闸北、沪西等地屠杀工人。工人们奋起反抗。二十六军马上介入，借口“调解工人内讧”缴去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致使工人们惨遭杀害，牺牲一百二十人，伤一百八十人。

十三日，上海二十多万工人、海员举行大罢工，要求释放被反动军队关押的工友，交还枪支，严惩凶手。下午一时，工人群众再次遭到反动军队的血腥镇压，一百多人死亡，伤者不计其数。当时天下大雨，宝山路上血流成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当天夜里，杨之华接到党的指示，要她马上转移到武汉工作。十三日上午，她在参加完工人群众的抗议示威大会和游行后，乘轮船离开上海，来到武汉。

按照通知杨之华找到瞿秋白的住处，这里既是中宣部的办公楼，也是一些领导人的秘密住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大家感到震惊和愤怒。在楼下，杨之华碰到了李立三和蔡畅。秋白出去开会，杨之华就到房间里等他。中午，杨之华又听到她熟悉的脚步声，门开了，身穿西装的秋白走了进来，见杨之华默默的坐在床边注视着他，就快步上前，紧紧握住了之华的双手，两人心情都很激动，虽然分别只有一个多月，却好像过了一年似的。是呀，这是多么不平静的一个月啊！秋白让之华坐下，他从包里拿

出三个文件对她说：“这是我在武汉和你见面的礼物。”之华一一展开，原来是秋白出版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第一个单行本《湖南农民革命(一)》和秋白自己写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杨之华愉快地收下了这意味深长的礼物。

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昌养病，住在城中心马路旁一幢楼房的三层楼上。不久，他也收到了一份礼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单行本，为此他对瞿秋白十分感激。他感到自己并不孤立，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都会有人支持他的。想到此，毛泽东的病好像好了一半。

瞿秋白为什么如此下力气的支持毛泽东，因为在农民革命问题上他同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早在中共“三大”期间，毛泽东就在会议发言时强调农民革命运动的重要性，瞿秋白也将农运问题写进党纲草案，他指出：“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后来，秋白在党内外作的许多报告中，都特别强调土地革命和武装农民，主张坚决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在这一问题上同陈独秀、彭述之进行了多次斗争，但都为陈独秀所拒绝。陈独秀拒绝瞿秋白和毛泽东的建议，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自己也招来灭顶之灾。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秋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领导农民土地革命成了挽救时局并继续推动革命发展的中心问题。

## 六、做最高领袖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党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的一个标志。政变之后，在北伐战争中被打败或投诚过来的小军阀，一个个地投入到蒋介石的门下。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到一九二七年

一月，归附到国民革命军方面来的军阀将领有五十六人，其中五十一人是拥有土地五百亩以上的大地主，政变以后，他们大都归附了蒋介石。蒋介石的叛变，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四一二”以后，瞿秋白的心情非常沉痛，一次晚饭后，他对好友羊牧之说：“我们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我们对不起上海工人阶级，我们对不起牺牲的同志，血的教训太沉痛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小学礼堂秘密召开，开幕后又迁到汉口黄陂会馆继续开会。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等人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及职工国际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陈独秀致开幕词后，作党的工作报告。会议休息时，绰号“大口”的罗亦农对瞿秋白叹息着说了“糟糕”两字，表示对陈独秀报告的不满。瞿秋白一边抽烟，一边沉思着。

瞿秋白和陈独秀可以说是老相识。早在一九一七年，秋白因生活所迫，从湖北到北京时，就曾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过陈独秀的课，他称陈独秀是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在莫斯科期间又为他担任翻译，一九二三年，瞿秋白结束了三年的考察工作后，又和陈独秀一起同车回国。秋白就是在陈独秀的引荐下直接参加党中央机关工作，使他能迅速接触到中央领导层。

陈独秀非常欣赏瞿秋白的理论才华和政治工作能力，为了表示对他的器重，将自己主持的《新青年》交给瞿秋白筹办和主编，后来另外两份党的机关刊物《前锋》和《向导》也都归瞿秋白主编或编辑。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三大”召开，陈独秀又把起草党纲的任务交给了年仅二十四岁的瞿秋白。这样，从一

九二三年回国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间病倒为止，他一直在陈独秀指导下工作，所以对陈独秀的思想、为人还是了解的。

第二天，在会上散发了瞿秋白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阐述了五大问题，并点了彭述之的名，但矛头是冲着陈独秀的，陈独秀并没有把秋白的意见放在眼里，继续实行他家长式的工作作风。

“合作高于一切”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口号。毛泽东因为农民的“过激”行为受到严重的指责。陈独秀还批评周恩来没有让上海工人自动解除武装，而招来了一系列的大屠杀。

中共“五大”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陈独秀的错误。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继续任总书记。

瞿秋白在武汉期间和茅盾、郭沫若过从甚密。茅盾是《民国日报》总主笔，有事常向瞿秋白请教。瞿秋白和郭沫若两人还一起游过黄鹤楼。面对不断恶化的时局，瞿秋白感到苦闷，一天傍晚，天快要下雨了，瞿秋白同郭沫若来到江边，面对大江东去，吟诵苏东坡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并对郭沫若说：“在这种形势下，大家在未被淘汰去的时候，还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成败且不去计较。”两人谈得很投机。天边的乌云在翻滚，不一会儿雨点便落了下来，二人也不躲避，默默地站立在江边任凭狂风和暴雨的吹打，直到很晚才归。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中央，改组国民党；动员两万名共产党员与五万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的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六月一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竟将这一密电交给了汪精卫，使

汪找到了分共的借口，加速了反革命的步伐。

北伐军占领郑州后，武汉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人于六月十日至十一日举行郑州会议，冯玉祥提出了宁、汉协调一致的主张。之后，又与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决定反苏反共。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的计划，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分裂。以后在武汉地区开始了大屠杀，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大批共产党人、工农群众被杀害，所有革命团体都被关闭。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革命受到严重挫折，由于白色恐怖，使不少不坚定分子纷纷离开革命，在一个短时间内从基层的领导机关到党员群众都处在一种溃散状态中，一些同志悲观失望。

在这期间，瞿秋白经常找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任弼时、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等同志谈话，商讨如何挽救革命。当时主要讨论三件事：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策划湘、鄂、赣、粤四省的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

共产国际七月十二日指示成立五人临时常委会，建议派陈独秀去莫斯科，实际上解除了他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七月十三日，秋白与鲍罗廷上了庐山，名为养病，实际上是进一步商讨有关中国共产党转变政策、发动农民暴动等问题。与此同时，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先后去九江研究起义的准备王作。七月二十日，邓中夏和李立三从九江赶到庐山，向秋白和鲍罗廷报告了南昌起义的计划，秋白完全赞成。

七月二十四日，秋白回到武汉之后；他就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报告了南昌起义的计划，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七月二十七日，鲍罗廷带着满腔的遗憾告别了被鲜血染红了的中国，

经内蒙古返回苏联，在国境线的大沙漠里，他最后望一眼曾寄予无限希望的国家，悲凉地说了一句：“中国完了！”鲍罗廷离华之后，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带着他的德国助手纽曼来到武汉，秋白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与共产国际代表开始筹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八月一日，南昌起义一声枪响，揭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序幕。

一九二七年七八月间，正是我党处于艰难困苦的时期，外部有国民党的镇压与屠杀，内部陈独秀撒手不干，蔡和森突然病重卧床不起，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在南昌组织发动起义，李维汉、张太雷又是新进入党中央的最高领导层。在这一危急关头，瞿秋白感到肩头的担子很重，自己有责任带领同志们去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于是他力挽狂澜。

八月七日，他和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一起召集、主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八七”紧急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会议匆匆忙忙的开了一天，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政治报告，结束了陈独秀时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阐明了新情况下党的任务，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决策方针。会议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这样，年仅二十九岁的瞿秋白便取代了陈独秀总书记的位置，一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达到了他投身革命以来最辉煌的时期。

“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找到毛泽东，向他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于是，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组织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夫妇住在汉口英租界的一座三层楼的公寓里。此时，以秋白为首的党中央，整顿、重建了党的各级组织，组织了全国的秘密交通网，许多被国民党破坏了的秘密组织系统和工作机关也都开始恢复工作。党中央决定暂留在武汉，指导两湖秋收暴动。

在国共合作期间，瞿秋白积累了许多统一战线方面的经验，国民党背叛革命，在新的形势下，瞿秋白却显得经验不足，在国际上，由于受斯大林、罗明纳兹的影响，急于在“短期”内取得“苏维埃”革命的胜利，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秋白给福建省委写信，指示他们应马上开始暴动，对国民党反动派“尽量施行红色恐怖”，没收地主土地，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派。尽情地抒发着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当他得知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利后改变了计划，立即提出批评认为是“临阵脱逃”。

十一月九日至十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革命”，否认革命形势已处低潮，认为“现时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会议增补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中央又与张太雷一起讨论了广州暴动问题，决定了广东总暴动计划。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

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春天，瞿秋白领导制定了一系列总暴动计划，其结果都在反动派的镇压下失败了。一九二七年底，浙江奉化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发动了农民暴动，结果遭到惨败。省委书记卓兰芳在暴动中牺牲。沙文汉同志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见到秋白时，讲了奉化暴动的简况，秋白听后诚恳而痛心地说：“这是典型的盲动主义，是错误的，我要负



责。”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秘密潜入上海，秋白得知后，告诉贺龙不要怕挫折，回到湘西去再干一番。在中央派人掩护下，贺龙回到桑植，果然又干了起来。

武装起义接连失败，使瞿秋白非常痛心。他在不断的苦苦思索和追求，一次他对杨之华说：“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缓，我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小学生，虽然力求这样做，自己知道是难以胜任的……”“八七”会议以后，他经常想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对以前的工作加以回顾和总结。经过多次研究决定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 七、教书和写文章

如前文所述，瞿秋白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七年间，做了几件大事，可以说是他投身革命后的顶峰时期。那么，在这几年里鲁迅又做了些什么呢？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没有瞿秋白那样轰轰烈烈，但也同样发挥着巨大战斗作用。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鲁迅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教书和写文章。他用口传授知识，教育学生；用笔作匕首和投枪同军阀政府、封建势力作斗争。

鲁迅自从一九一二年五月初到北京后，一直在教育部任职。先是任第二科科长，后又任佾事，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工资不高，而且时常欠发。一个人生活还可应付，二弟周作人一家搬进八道湾之后，经济马上紧张起来。原因是弟媳羽太信子挥金如土，雇了若干佣人不说，就连买东西也要上日本商店，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鲁迅和周作人的薪水加到一起约有八百元，但还是月月亏空，搞得鲁迅到处借贷。一天，鲁迅

借到一点钱后，连忙坐黄包车送回家，可在门口却见日本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过去，鲁迅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他感叹道：“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过用汽车带走的呢？”所以，为了维持自己和二弟一家人的生活开销，鲁迅不得不四处兼课。从一九二〇年八月起，直到一九二六年离开北京，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一些中学或专科学校任教。按鲁迅的学问，在大学当教授是不成问题的，其时周作人已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但因鲁迅在教育部有专职，所以只能作兼职讲师，月薪也比较少。

在北大，鲁迅讲的是中国小说史，讲义是自己编的《中国小说史大略》，后来经补充修改定名为《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九二四年六月由新潮社分上、下册出版。这部书，鲁迅倾注了许多心血在里头，他打破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沉闷局面，为小说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由于鲁迅知识丰富，思维敏锐，所以讲课时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根据讲义的论点加以发挥、补充。语言也很风趣，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课，就连不是学文学的学生也跑来旁听，教室里常常是挤满了人，两个人的座位竟坐了三四个人，没有座位的一些同学就坐到窗台上去听课。人虽多，秩序却非常好。有时鲁迅还把课堂搬到社会上去，许广平曾回忆道：

有一天，趁新的讲义还没有印出来，先生正准备讲书时，姑且和他闹一下罢，如果成功，就有得玩了。课室前排的几个人最爱捣乱：“周先生，天气真好哪！”先生不理。“周先生，树枝吐芽哪！”还是不理。“周先生，课堂空气没有外面好哪！”先生笑了笑。“书听不下去哪！”“那么下课！”“不要下课，要去参观。”“还没有到快毕业的时候呢，不可以的。”“提前办理不可以吗？”“到什么

地方去？”“随先生指点罢！”“那你们是不是全体都去？”测验是否少数人捣乱，全体起立，大家都笑了：“先生一致通过。”先生想了想，在黑板上写出“历史博物馆”几个字，又告诉我们在午门——皇宫的一部——聚齐……大家都去了。原来这个博物馆是教育部直辖的，不大能够走进去。那时先生在教育部当事，所以那里的管事人都很客气地招待我们参观各种陈列……平常看不到的东西真不少，胜过我们读多少书，因为有先生随处给我们简明的指示。

鲁迅教学与其他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鲜明对照。

鲁迅除了在高等学校讲课外，每周还到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小说史一次。世界语是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创造的，简单易学。传入中国后，一些有为青年利用世界语进行文学创作和革命活动。鲁迅认为，学习世界语可以促进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因此赞成世界语运动。世界语学校成立后，便接受邀请，担任讲师。他每次都准时去上课，从不缺课，如果病了，也总是事先请假。为了支持这所学校，他多次退还学校发给的薪金，无偿为学生上课。

一九二四年七八月间，鲁迅接受了西北大学和陕西教育厅合办的暑期学校的邀请去西安讲学。七月七日晚十时，乘火车出北京赴西安。同行的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桐龄、南开大学教授陈定谟、东南大学教授吴宓、前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轨、北京政法大学教授柴春霖、《晨报》记者孙伏园、《京报》记者王小隐等。列车上，鲁迅想这次西行，除了向西北传播新文化、新教育外，还可以为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收集一些感性材料，作好创作准备。那时，从北京到西安交通非常不便，需要水陆交替才能到达，往返要用十几天的时间。鲁迅在列车的轰鸣声中渐渐地睡着了。

清晨，鲁迅被一群苍蝇的嗡嗡声吵醒。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随口念道：“‘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于今朝验之矣。”车过洛阳，同行的夏教授去拜访了吴佩孚，回来后向大家讲起会见时的情景：吴佩孚问他在北大教什么课？他说：“担任新物理中电子研究。”吴指着墙壁上挂着的八卦图问道：“此中亦有阴阳变化的奥妙，能为我阐述否？”夏教授怕说不好得罪了他，招来杀身之祸。于是说：“此旧物理，与新物理非一事。”吴却说：“旧有旧的奥妙，新有新的道理。”大家听了大笑不止，鲁迅也笑着对大家说：“这也是苍蝇之声呀？”

七月十四日，鲁迅一行人抵达西安，住在西北大学教员宿舍。休整期间，他游览碑林、孔庙，观赏了荐福寺小雁塔、慈恩寺大雁塔、曲江灞桥和昭陵石刻等名胜古迹。后来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鲁迅从这些古迹中得到了许多历史的启发。他还几次到易俗社观剧，和导演、演员们一起交谈戏剧改革。易俗社是一九一二年创办的，设有一个秦腔剧团和一个戏曲学校。鲁迅因在教育部工作，对该社编演新剧早有所知。这次又特别观看了他们演出的《双锦衣》、《大孝传》和《人月圆》。看后很满意，他想：“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为了支持戏校，他拿出五十元捐给他们。后来，离开西安时又亲笔题写了“古调独弹”四个字，制成匾额，与别人联名赠给剧社作纪念。

从二十一日开始，鲁迅为暑期学校演讲，到二十九日结束，共讲了十一次，计十二小时。题目是《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内容是根据《中国小说史略》浓缩、补充而成的。如关于文艺起源于劳动就是以前没有讲过的内容。鲁迅说：“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并就这一问题作了具

体的分析、阐述。他的文艺理论观点，为后来的文艺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暑期学校演讲结束后，还有几天就要返京了。山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突然托人请鲁迅给讲武堂的学生讲演。本意是想让鲁迅替他歌功颂德，但他知道鲁迅不比别人，一定不肯，于是就提出让鲁迅把演讲的题目换一换，给士兵们打打气。鲁迅当然不会随着军阀的指挥棒转，他回答说：“给士兵讲可以，我还是讲小说史，因为就只会讲小说史。”刘镇华碰了个软钉子，差点就撕下“礼贤下士”的假面具，加害于鲁迅，经人劝阻才没有下手。这件事被西安《新秦日报》的记者透露了出去，立即被停刊好几天。

在西安，鲁迅对西北大学的工友，却非常关切。

演讲期间，鲁迅一直住在西北大学教员宿舍，当他看到工友们整日忙碌，很辛苦，又想到这次赴西安演讲，陕西人费心劳力，备饭花钱，用汽车载，用船装，用骡车拉，把我们请来，所以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于是，他向同来的先生们提议多给工友一些钱。大多数人都对鲁迅的提议表示赞同，但有位先生却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听了很反感，他对同来的朋友说：“我顶不赞成他的‘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八月四日，鲁迅一行人告别了古都西安，早晨乘骡车出城由渭水东行，踏上返京的归程。十二日半夜抵京。至此，为期三十六天的西安之行才算结束。

回到北京后，鲁迅还惦念着几位西北大学的先生。他把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呐喊》各五部寄给他们留念。

鲁迅在教学工作中，不仅学识丰富，而且从不摆先生的架子。

他对学生和藹可亲，以朋友相待。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居住时，经常有学生三五成群地光顾他的“老虎尾巴”。

“老虎尾巴”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因为是在堂屋的后面接出的一间平顶灰棚，拖在三间北房的后面，很像一条尾巴，所以被人称为“老虎尾巴”。鲁迅自嘲地称它为“绿林书屋”，并且说：“这是房子中最便宜的一种。”

鲁迅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有些青年一大早就去拜访，他也不介意，照样热情接待。有的青年是初次见面，显得拘谨，鲁迅就拿出糖果和小花生招待他们，于是气氛马上活跃起来。青年们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鲁迅一一作答，谈得晚了，鲁迅还亲自端着高脚煤油灯送他们出门，直到他们走出胡同口才回房继续工作。

北京的冬天是寒冷的，鲁迅身穿爱国布棉袍坐在“老虎尾巴”里，觉得手脚冰凉，望一眼快要熄灭了的炉火，他走出屋外，顶着刺骨的寒风去砸煤。

购买西三条这处房产时，鲁迅分别向好友许寿裳和齐寿山各借了四百元，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所以经济一直很紧张，物质生活很艰苦，一条裤子，膝盖处已有两个膏药般的补钉，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已是“破帽遮颜”的鲁迅必须亲自动手砸煤，不小心手也碰破了。回到屋后，他往小火炉里添了一些碎煤，不一会儿，火苗蹿了上来，屋里渐渐暖和了。在黑沉沉的夜里，鲁迅望着炉火沉思着。不一会儿，一个“疯子”的形象在眼前浮现。他快步走到三屉桌前坐下，取过“金不换”毛笔，在纸上写下“长明灯”三个字作为标题，然后飞快地写起来，不知不觉写了个通宵。晨光透过窗户射了进来，鲁迅吹熄了灯，把稿子装进一个大信封，封好，准备寄给《民国日报》。此时炉火已经熄了，鲁迅蜷缩着躺在床上睡着了。一九三二年三月五日，《长明

灯》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作品描写吉光屯的一个“疯子”，坚持要吹熄庙里的长明灯，而遭到封建势力的迫害的故事，表现了觉醒者的坚韧的反封建精神，对地主豪绅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给予猛烈的抨击。这篇小说含有深刻的象征意味，它说明旧社会的反动势力是如何残酷暴虐地禁止一切改革。而小说主人公的“我要放火！”的喊声，较之《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呼声也更富有反抗性了，李大钊读后兴奋地说：“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而出来了！”除《长明灯》之外，鲁迅还创作了《离婚》等七篇作品，后来收入小说集《彷徨》。这些作品深刻反映了鲁迅的探索与追求，在艺术上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老虎尾巴”这间小小的斗室里，鲁迅写出了著名的散文诗集《野草》，小说集《彷徨》中的大部分作品，杂文集《华盖集续编》以及《朝花夕拾》、《坟》中的大部分文章，共计二百多篇。

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是鲁迅在北京工作最紧张、斗争最激烈的一段时间。他不仅创作繁忙，而且经历了“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的疾风暴雨，参与并领导了女师大进步师生同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的正义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它的前身是一九〇九年清学部设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校址在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一九一二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一九年改为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被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武装接收，改组为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

鲁迅于一九二三年七月被聘为该校讲师，开设小说史和文艺理论课，直至一九二六年八月离京南行。在鲁迅任教的三年里，正

是北洋政府段祺瑞执政时期，社会政治动荡不安，革命群众运动日益高涨，反动政府对革命人民采取高压手段，对革命活动残酷镇压。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闻名全国的“女师大风潮”。

一九二五年初，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日趋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女师大学生掀起了一场以驱逐推行封建奴化教育的校长杨荫榆为目标的学潮——“驱羊运动”。

杨荫榆自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当上校长之后，对学生实行封建教育，禁止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五月七日，女师大学生要求参加国耻纪念日的游行示威，她也不允许，愤怒的学生要求教育部更换校长。十一月，国文预科二年级学生三人，因江浙战争期间道路被阻，未能按时返校，杨荫榆以违章为由勒令他们退学，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持公道，要求杨荫榆收回成命，被杨厉声责骂，酝酿已久的女师大风潮从此爆发。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北京各界人士在中央公园举行公祭，女师大自治会决定参加，杨跳出来说：“孙中山是共产共妻的，你们学了他没有好处，不准去。”

此波未平，又起波澜。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这天，学校邀请校外知名人士讲演，杨荫榆正襟危坐在主席台上，结果学生们发出一片嘘声，把她轰下台去。杨恼羞成怒，作出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职员的决定。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于五月十一日在校门口张贴“行矣杨荫榆”的启事，写上“杨荫榆先生注意！同人等早已否认先生为校长，请以人格为重，幸勿擅入校门。”

在女师大学生斗争最激烈、最困难的时候，鲁迅挺身而出，以同仇敌忾的精神和学生们共同作战。早在北洋军阀政府武装接收女师大之前，鲁迅就为学生代拟了两篇“呈教育部文”，他历数杨



荫榆“尸位素餐，贻害学子”的行径，要求教育当局迅速撤换其校长职务。当得知杨荫榆无理开除学生后，又同其他教授一起，联名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为学生们申张正义。杨气急败坏，八月一日，她率打手包围学校，截断电话线，停止伙食。但女师大被困学生坚持斗争并得到北京、上海等地学生界的声援，无奈，北洋政府被迫撤去包围女师大的军警，恢复水电，批准杨荫榆辞职，同时又阴险地下达了停办女师大的命令。鲁迅坚决站在学生一边，公然违抗命令，毅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教育总长章士钊利用职权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段祺瑞免去了鲁迅在教育部“佥事”的职务，“以示惩戒”。八月十二日，鲁迅上诉平政院控诉章士钊。因为他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是八月十三日，而章士钊呈请免职是在八月十二日，鲁迅抓住他“倒填日期”的漏洞不放，终于告倒了章士钊，取得了这场诉讼的胜利。女师大被强行解散之后，鲁迅又和学生们在宗帽胡同另觅校舍，坚持复课。他带病前往校务维持会，不仅给女师大学生义务上课，而且主动提出将课时增加一倍。他还不断写文章抨击反动势力，揭露“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的教育界的害群之马。

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各界群众为要求关税自主，而反对段祺瑞政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段祺瑞之流在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中暂时避匿时，鲁迅基于对敌人反动本性的清醒认识，号召革命群众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以免重演“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历史悲剧。十一月三十日，章士钊去职。段祺瑞迫于群众运动的威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发布命令，恢复女师大。教育部也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决定恢复鲁迅“佥事”的职务。至此，历时一年半的女师风潮，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势力获得胜利而告结束。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对中国弱肉强食。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炮击国民军布防的大沽口；国民军被迫自卫还击。十六日，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国民军违反《辛丑条约》，纠集英、美、意、法、荷、比、西等国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北京各界群众为了抗议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于十八日上午十时，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陈毅等同志置身于斗争的最前列。大会由共产党员王一飞主持，会后，群众高呼口号，去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请愿，要求驱逐八国公使出境。在执政府门前竟遭到卫队的枪击，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多人，女师大的刘和珍、杨得群也惨遭杀害，酿成全国为之震惊的“三·一八”惨案。

三月十八日这天下午，鲁迅正坐在“老虎尾巴”里写《无花的蔷薇》。当听到“三·一八”惨案和刘和珍遇害的消息后，他感到“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而必须拍案而起，投入战斗。他悲愤地写道：“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话，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的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并把三月十八日这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的文章痛斥了北洋军阀政府对革命青年的摧残，因此遭到反动政府的忌恨和通缉。

一九二六年八月，北方的环境一天比一天险恶，再加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鲁迅决定南下，去厦门大学任教。临行前，他在女子师范大学发表了告别演讲。他满怀信心地说：“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会永久……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了生活和战斗了十五年之久的北

京南下。

## 八、参加“六大”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秋白的好友蒋光慈与阿英等人一起在上海成立了太阳社，征得秋白的同意出版了《太阳月刊》，秋白虽然是太阳社的成员，但一般的活动他都不参加，而是由蒋光慈同他联系，这是由党的秘密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后来，太阳社和创造社攻击鲁迅，秋白即将赴苏筹备“六大”，特别派郑超麟以党报主编名义帮助调解。这使瞿秋白失去了一次与鲁迅交往的机会。

当时瞿秋白与鲁迅并不认识，对鲁迅的思想、作品都未曾有系统的研究，但他深知统战工作的重要，不希望文艺工作者之间有派别的斗争。所以，在党内工作非常繁忙，白色恐怖又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自己不能亲自解决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的纷争，但也并没有坐视不管，而是派专人前往调解。

一九二八年初，中央临时政治局准备召开中共“六大”，确定瞿秋白、周恩来先后到莫斯科筹备有关事项。瞿秋白和周恩来商定在莫斯科碰头。四月三十日，天气阴沉沉的，马上要下雨了。秋白从上海化妆乘船前往莫斯科，经过两天的航行到达大连，从这里乘南满铁路的火车经中东线从满洲里秘密出境。五月中旬抵达莫斯科，然后坐马车，到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德镇一座号称“银色别墅”的地主庄园。中共“六大”将在这里举行。周恩来因在大连被特务盯梢，只得到长春伯父家逗留了一二天，甩掉尾巴后，才乘火车经哈尔滨从满洲里出境，所以比瞿秋白晚到了几天。到达银色别墅后，瞿秋白、周恩来等被安排住在二层。二层还有一个可容七八十人的大客厅，中共“六大”全体会议将在此召开。

六月九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召见了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人，由王明任翻译。会见时他穿着很随便，穿一身士兵军服，肩膀和帽子上面都没有级别和兵种的标志，脚下穿一双肥大笨重的粗牛皮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现状与任务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知道自己话具有权威性，但在说话时并不那么盛气凌人，语气也是缓和的。斯大林一边吸着烟斗，一边让中共代表发表自己的意见。谈话会上李立三显得很活跃，瞿秋白则沉思着。

斯大林指出：“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高潮。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创建红军”。斯大林的话音刚落，李立三便迫不及待地：“中国革命仍处于高潮，因为现在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

斯大林吸了一口烟斗，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作为对李立三的回答：“海浪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

此时，以马列理论家自居的王明则认为李立三提的问题很可笑，在一旁不时露出讥讽的神态。

斯大林接着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间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二月革命为例加以说明。但是他又说，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是中国党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

斯大林的话对瞿秋白是有启发的，在国内革命斗争的实践，已经使他对自己过去的做法，以及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这次来莫斯科召开“六大”，就是要对以前的工作加以总结，对错误的地方认真加以纠正。

在克里姆林宫的长廊里，瞿秋白一边走一边想。

六月十八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

郊外的银色别墅隆重召开。共有一百四十二名代表出席，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八十四人。秋白为二十一人组成的主席团成员之一，周恩来为秘书长，苏兆征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

瞿秋白在大会开幕词中强调指出，“六大”一定能够纠正一切错误倾向，使党走到正确路线上来，完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任务。

十九日，共产国际的代表布哈林在大会上作《世界革命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他批评“中共中央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联合战线的任务，缺乏正确的了解，在紧要关头，不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因而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他在批评盲动主义时，显得特别激动，而且措词严厉。

二十日，瞿秋白代表五届中央委员向大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长篇政治报告。瞿秋白在报告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同时也对“左”倾盲动主义进行了无情的剖析，并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六月二十八日，瞿秋白作了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在结论中，秋白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深入剖析了盲动主义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进一步认识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在陈独秀的历史功过问题上，瞿秋白主张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陈独秀，秋白一向视为前辈，因为他一度曾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所以对他比较恭敬和尊重。由于陈独秀的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秋白认为不应把全部责任都推到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中央政治局也应分担。后来，陈独秀并没有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堕落为中国的托派首领，分裂和攻击中国共产党，最后被开除了党籍。

“六大”闭幕时选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指定向忠发为总书记，其他人为苏兆征、蔡和森、周恩来、项英、瞿秋白、张国焘。会后，根据布哈林的建议，成立了以瞿秋白为团长、张国焘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常驻莫斯科，指导中国革命斗争。成员有邓中夏、余飞、王若飞和稍后参加的陆定一。

一九二八年秋天，共产国际“六大”闭幕，秋白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然后，又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这时期的工作相当繁忙，他随各国代表前往南俄的各工业区参观。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随团前往的杨之华劝他注意休息，他也听不进去，最终因劳累过度旧病复发，有时夜晚痛苦得从床上掉下来，不得已，只能去巴库疗养。

杨之华在《回忆秋白》中说：“秋白在‘六大’以后，虽然因过劳而发病，不得不到巴库疗养，但心情很愉快，对革命前途满怀信心，并且和过去一样，病再重也不放下工作，努力尽自己的责任。”在这期间，他向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库西方建议撤换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职务，此事被米夫得知后，进一步加深了对秋白的怨恨。

## 九、“顶撞”米夫

米夫一九〇一年出生于俄罗斯赫尔松省的一个小官吏家庭。一九一七年五月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一九二〇年末入专门培养西方革命干部的学校西方大学又名斯维尔德洛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二一年毕业留校，此时兼东方大学的研究员，专门研究远东革命运动问题，开始接触中国革命。中山大学成立后，任副

校长。后来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下台后，米夫任校长。

一九二七年二月，联共中央派米夫率领一个宣传工作者小组访问中国，曾到广州、武汉和上海。小组由中共中央委托宣讲如何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和党的建设，并出席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

瞿秋白与米夫的争论起源于“中大学潮”。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苏联党和政府为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培养革命人才而设立的学校，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开学。学员中既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董必武、叶剑英等人都曾在该校学习。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更名为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中山大学的学潮，起始于一九二七年夏季，学年总结时，发生了拥护代理校长的学生和支持支部局的学生之间的分歧，是为教务派和支部派之争。米夫从中国回来后，支持支部派，压制教务派，当了校长。此时，中山大学的一个学生陈绍禹（王明）支持米夫，但在学生中很孤立。

王明一九〇四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比瞿秋白小五岁。一九二五年，王明在武昌商科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秋白已是中央委员。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王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俄语流利，又会钻营，深得副校长米夫的赏识。

米夫这个人很善于搞阴谋诡计，他之所以信任王明，是有他的企图的。他想利用王明等组成班底，他充当“太上皇”将来控制中国共产党，这在以后他的所作所为中都得到了证实。

米夫经常在学校散布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和不信任的话，推崇王明等人，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领导层。当时虽未得逞，但造成了中国留俄学生中对中共代表团及中央负责人的轻视和不

信任。

米夫、王明一伙为了在学生中搞宗派小集团，制造了一个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的反革命集团案。他们将反对他们的江苏、浙江的同学称之为“江浙同乡会”，王明指使一些人散布谣言，说在同学中（包括列宁学校和军事学校）有一个反党的秘密团体，拉拢江浙籍贯的同乡，搞非法活动，闹得莫斯科及列宁格勒、基辅等地的中国留学生杯弓蛇影，疑虑重重，影响了他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此时张国焘也乘机汇报，说秋白与鲍罗廷过往甚密：秋白常到鲍家串门，鲍罗廷将内部参考的电讯资料每日送秋白一份。他又自告奋勇，愿意到学校“摸底”查明“江浙同乡会”的地下活动。

中大学潮时，张国焘夫妇住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店，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带着女儿独伊和罗亦农烈士（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二十一日，遇害于龙华）的夫人李文宜也离开中国，到达莫斯科和张国焘夫妇住在一起。由于张国焘的为人，在学潮中被同学们冷落，所以有空就去找瞿秋白。

一个周末，瞿秋白正在阅读鲍罗廷主编的《莫斯科新闻》，张国焘走了进来假装关心地对秋白说：“你不听医生劝告，不好好休息，身体会搞垮的，你应该去医院疗养。”

秋白冷冷地说：“我是老毛病，不用住院。”

张国焘自讨没趣，逗了逗瞿秋白七岁的女儿小独伊，悻悻地走了。以后张国焘竟向米夫、王明汇报说：“瞿秋白向东方部长库希宁告了状，说米夫不称职，要以鲍罗廷接替。”米夫听后火冒三丈，于是与王明等搞了一套阴谋方案打击瞿秋白。

王明一伙心中有数，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江浙同乡会”，但必须散布恐怖气氛来箝制学生，才能达到打击瞿秋白的目的。他



们通过苏联当局的情报机构立案侦察。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请来苏联格伯乌(K.P.U)的人员进行调查；请向忠发来校作报告说：“‘江浙同乡会’他们的组织在党内秘密，有中央的组织，亦有各地支部组织”，“他们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所以必须消灭其组织”，还威胁说，“在共产党内搞乡会活动的人，都要枪毙”。

向忠发是湖北汉川县人，生于一八八〇年，做过轮船公司的大副、造币厂工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共，不久做了一个月的中共湖北区委书记。此后国共合作，他曾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北伐时出任武汉总工会委员长。国共分裂后，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大”被选为总书记。三年后被捕叛变，随即被杀。

王明不只在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制造事端，而且把手伸向列宁学院。一个节假日，列宁学院的几个中国同学自己烹调中国菜小酌，热闹一阵，因为他们的方言别人听不懂，工明的耳目就作了汇报，说他们在开会，原先工明想以此事陷害蒋经国，因为蒋经国曾在中国饭馆请同学吃过饭，又公开为托派理论辩护，王明一伙恨之入骨，正想对蒋经国开刀。无奈，蒋经国和屈武同时调入列宁格勒军政学校。王明一时鞭长莫及。事后只得拿留苏的其他学生开刀。米夫、工明一伙借苏联当局之手开除了十二名中国学生的党籍、团籍，并逮捕了其中的四人。

“江浙同乡会”反革命案的事态不断复杂化、尖锐化。事情反映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瞿秋白不相信米夫、王明一伙的谎言，他派中共代表团的邓中夏、余飞深入各校调查后认为几个中国学生在假日里烧煮一次中国饭，解解馋，不应胡乱猜疑是什

么反党集团。校长米夫得知后，恼羞成怒地说：“学校的事由校长负责，中共代表团无权干预。邓中夏、余飞据理力争：学校应认真负责教育事宜，而同学的思想动态，关系到今后回国的工作和任务，代表团有责任考查。两者相持不下，中共代表团经共产国际秘书长同意，前往格伯乌机关查阅材料，遭拒绝。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团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了代表团对苏联当局处理“江浙同乡会”的不同意见。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在一些江浙籍同学中，对某些问题意见一致，并不是罪过，不能说明他们说是有组织的派别活动。一九二八年秋，由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三方组成调查组，调查结果：“江浙同乡会”纯属臆断虚构。最后由周恩来在中大全体师生会上宣布“江浙同乡会”问题解决了。约在这个时候，瞿秋白向库西宁提出撤换米夫东方部副部长的职务。到此为止，米夫、王明一伙移花接木的政治阴谋终于破产了，以后他们便把矛头对准了瞿秋白。

一九二九年夏天，中山大学举行学年总结大会，多数学生反对支部局，瞿秋白公开发表讲演支持多数学生，反对无原则的斗争，对支部局的领导也颇有批评。

联共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以后，米夫、王明一伙认为有了反扑的时机，于是便在中山大学掀起了更大的风浪。布哈林“右倾”的主要罪状是反对全盘集体化，反对消灭富农。瞿秋白在富农问题上，原来和布哈林一致，即强调富农的封建性，但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一九二九年六月间，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认为中国也应同苏联一样，推行反对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瞿秋白反对，两个反复辩论，相持不下。瞿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

衡。中山大学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企图把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起扣到瞿秋白的头上。

一九二九年夏天，中山大学举行全校党员大会。王明等小宗派集团认为打击瞿秋白的机会来了。他们在会上与反对他们的党员摊牌，为此，特别请来了中大所在区的联共区委书记参加，企图利用他来压制多数同学，并提议中共代表团瞿秋白出席，阴谋将他置于公开批判之下。秋白看穿了他们的阴谋，为了维护团结，婉言拒绝出席，让张国焘参加，王明小宗派企图把秋白置于死地的目的又一次落空了。

随后，米夫对中大留学生支部进行大清洗，名义上是清除“托派”，事实上有着不可告人的企图。在清洗运动中，王明小宗派频频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国代表团的攻击，指责秋白是机会主义者和“托派分子”。这次清洗运动在莫斯科持续了很长时间，除了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外，很多人都被扣上“托派”、“右派”等大帽子，被开除党籍、团籍，甚至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折磨。秋白的弟弟景白由于反对他们的做法，被说成是疯子，一气之下，把联共党证退给了联共区党委，当天他就“失踪”了。这件事对秋白刺激很大，不久前还在与亲爱的弟弟一起合编《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现在却不明不白的失踪了。当时有人造谣说景白是跳进莫斯科河里自杀了。谁会相信他们的鬼话，秋白想：“肯定是被捕了，被苏联保安机关枪毙了。”

景白是瞿秋白的三弟，生于一九〇六年。一九二一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二四年就读于上海大学。曾任演说练习会文书，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中，被捕入狱，在法庭上与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出狱后在上海、武汉作党团工作。

随瞿秋白到莫斯科后在中山大学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清党结束后，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受到共产国际的指责。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中国留学生中的清党工作拖延了三个月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瞿秋白遭受着比我还要重的多的打击。在柏金斯基的办公室内（柏系共产国际秘书长——作者），首先由共产国际那位主持中大清党的监察委员，报告中大清党经过，根据他所搜集的材料，认为在中国学生中，长期存在着一个托洛茨基的秘密小组织。中共代表团方面，一直采取放任的态度。他指责瞿秋白曾让刘仁静这个托派领导人物，经土耳其回国。刘在土耳其曾会见托洛茨基，请示机宜，回国后从事托派活动，又指出其他若干托派分子，都是经过瞿秋白的提议，一一派遣回国……。”据刘仁静本人讲，他绕道欧洲回国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与中共代表团无关，米夫、王明一伙硬是为瞿秋白戴上一顶“托派”的帽子。瞿秋白因此被解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

关于这场斗争，当时是中共代表团成员的陆定一曾说：

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

瞿秋白后来在《多余的话》中也曾写道：

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消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

米夫、王明的政治阴谋虽然被揭露，但是通过这次对中国留学生的大清洗，王明当上了中大的党支部书记，从此，米夫控制了中国留学生的党组织。但这不是米夫的最终目的，虽然米夫认为，控制了中国留学生党支部，就等于控制了中国党的中层干部，然而他们最终目的是要控制中国党的中央，由他来领导中国党。后来米夫果然把王明支部转移到中国国内，对秋白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由他的心腹王明等人另组新的中央。

## 十、被排挤出中央

米夫为了控制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寻找忠于自己的代理人。在“中大”他选择了王明，想通过王明来改造中国共产党，但王明毕竟年轻，时年只有二十四岁，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国际强调选拔工人领导，正合米夫之意，于是他选择了向忠发作总书记，取代了瞿秋白在党的领导地位。

水手出身的向忠发，作基层领导还可以，作总书记就显得勉为其难了，回国以后，实际工作能力的差别明显暴露出来，在政治局根本无法独立领导工作。此时，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李立三

看准了时机，牵着向忠发的鼻子走，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

对于向忠发的工作能力，米夫自然心中有数，让他作总书记，只不过是个过渡。所以数月之后，米夫就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派王明回国，希望他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为将来接班作准备。但令米夫失望的是，王明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器重，而是按照历来对回国留学生安排的惯例，派他到上海沪西区委作基层宣传工作。王明自恃才高，认为是大材小用，但又不能不服从分配。十个月以后发生的一件事，使米夫大丢面子。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二日，王明出席上海工联在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召开的一次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工部局的巡捕突然闯了进来，将王明与其他二十多名同志一齐逮捕。王明非常害怕和惊慌，为了能早日获释，不惜暴露党的秘密机关，贿赂巡捕，让他给中宣部送信，王明的信送到李求实（李伟森）手里，信中说：“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李求实看后大吃一惊，其他同志也都哗然，对王明为保命而不惜暴露党的机关的做法不满，为了保证党领导机关的安全，保卫部门采取了紧急措施——全体机关人搬家。由于王明的真实身份尚未暴露，敌人将他暂时关押，米夫得知后，认为非极力营救不可，于是拿出几十块钱，通过关系把王明保释出来。

王明出狱以后，党中央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并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之后，李立三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王明找到李立三，要求重新分配工作。李立三认为王明是第三国际派来的，有米夫撑腰，来头不小，而且此人野心很大，又是反对他的急先锋，因此不便直接给他安排工作。于是他这一差事交给了当时任党的工委书记的罗章龙。罗章龙心中有数，便把王明和博古安排到全总宣传部工作。王明到任后一直不

好好工作。一次，他对罗章龙说：“我们的斗争在东方大学取得了彻底胜利。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的，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还说：“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末尾还要罗章龙支持他，罗很反感，并且当面批评了他。在莫斯科一贯飞扬跋扈的王明，此时又急又气，但也无话可说。于是内心非常苦闷，认为在中国想达到他的目的希望渺茫。后来米夫来华，王明时来运转。但他却把这段时间所受的处分“委屈”，全记到了当时仍在苏联的瞿秋白的头上，王明指责瞿秋白：“当着中共代表团还在国际的时候，秋白同志曾以中大学生反对支部局的派别行动来影响过去的中央政治局。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对于陈绍禹（即王明——作者）等同志所施的压制制度，完全是站在代表团多数的派别观念上做成的错误。”瞿秋白蒙受不白之冤。

瞿秋白被撤消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一九三〇年三月周恩来赴莫。周恩来去莫斯科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大权，落到了李立三的手里。使他有了充分发挥“才智”的机会。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决议标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决议很快送到莫斯科，瞿秋白得知后愤愤地说：“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国际远东局也认为决议是错误的，应立即停止。李立三则骂远东局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斗争情况，瞎指挥。在七月中旬，他又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写信，“决定组织南京士兵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同盟总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保护与支持中国革命，并请共产国际“通知周恩来、瞿秋白诸同

志速归”，参加指挥暴动。

对于李立三的做法，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瞿秋白焦虑万分，他们认为如果形势发展下去，刚刚点燃的革命烈火很有可能被势力强大的反动派所扑灭，就会有更多的精英和革命志士惨遭杀害。周恩来和瞿秋白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制止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最后商议决定和共产国际联合发出停止李立三在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红三军团浴血奋战，一度占领了湖南长沙。李立三革命急性病发作，他兴高采烈，竟做起了在全国武装夺取政权的美梦。他大声疾呼：“全国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到来！”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他不顾共产国际和周恩来、瞿秋白的反对，调兵遣将，分路向武汉进攻，又指令南方局在东山暴动；致电共产国际，要求苏联出兵支持中国革命。还多次给斯大林写信打电报，要求批准他的暴动计划，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急剧发展，共产国际深感指挥不灵，中国革命的形势有可能会急剧恶化。在这种紧急关头，共产国际临时又想起了瞿秋白。

一九三〇年八月，瞿秋白、周恩来就要起程回国了。瞿秋白和杨之华商量把女儿独伊留在苏联，并拜托在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回到苏联的鲍罗廷夫妇照管。瞿秋白一家与鲍罗廷夫妇有着很深的友谊。瞿秋白在苏联工作的两年间，常和杨之华一起带独伊去鲍罗廷夫妇家做客。瞿秋白让独伊喊他们为“爷爷、奶奶”。鲍罗廷夫妇对小独伊也特别喜欢。瞿秋白和杨之华回国前夕，女儿突然发高烧，而他们正忙于交接工作和整理行装，不能照顾女儿。鲍罗廷夫人和小儿子诺尔曼便主动送独伊进医院治疗，瞿秋白直到出发也没能到医院看一眼心爱的女儿。



一九四九年，鲍罗廷被苏联当局逮捕，原因是怀疑他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国特务”，斯特朗被驱逐出境，鲍罗廷被流放。后来苏联为他恢复了名誉，但那是在他逝世以后的事情。

一九五七年一月，周恩来总理访苏，由独伊任翻译。借此机会，独伊又去看望了鲍夫人，鲍夫人拿出珍藏多年的纪念品给她看，那是一张鲍罗廷身穿中国丝绸衬衫的照片。而那件丝绸衬衫正是杨之华托斯特朗带给他的礼物，另外还有一条她亲手绣上“永恒的友谊和纪念”的丝巾。几天以后，周总理会见了鲍夫人，转交了邓颖超同志送给她的一包礼物。告别的时候，周总理握着鲍夫人的双手热情地说：“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我们永远记得鲍罗廷。”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瞿秋白和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作《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李立三在会上作了检讨发言。三中全会切实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和党内一直存在着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这次会议未能彻底纠正，因而错误地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仍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

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政治局有正式委员七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候补委员七人：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罗迈、顾顺章、毛泽东。

王明由于职位较低，没能参加六届三中全会，他听到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传达后，表示同意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以后，党中央决定派他到江西中央苏区参加实际工作，他也表示接受，准备前往。

一九三〇年十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收到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立三错误的通知后，非常不满，指责三中全会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因此，发出《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十月来信”，来信认为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并不只是个别的错误，而是造成了整个错误观点的系统，定下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这时，王明从新近由苏联回国的人员处先于中央政治局知道了“十月来信”的内容，觉得喜从天降，有了反扑的时机，于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给政治局写信，向瞿秋白、周恩来发难。王明和博古要求撤销对他们的处罚，并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对他们的污蔑与造谣。

中央政治局收到“十月来信”后立即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虽然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但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不宜扩大讨论，以免造成党的分裂。在讨论王明等人的信时，瞿秋白批评他们在先于中央知道“十月来信”的内容以后，不向政治局报告，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中央提出立三路线问题和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的问题，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周恩来也指出：“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回国的），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上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的内容是米夫有意透露给王明的，目的是让王明向中央夺权。政治嗅觉十分灵敏的王明，果然心领神会，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按照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精神写了一本小册子，起名为《两条路线》，以后又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然后抄成三份，在几十人中传阅。王明

指责三中全会和瞿秋白，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的态度”，还说“瞿秋白已经不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他们不能执行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策略来解决当前的革命紧急任务”。王明的小册子，成为他抢班夺权的行动纲领。

王明的小册子一出笼，以前一些受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人纷纷起来，跟在王明的后面，攻击瞿秋白和周恩来，罗章龙等人，与王明联名致书共产国际，要求召开像“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改组中央。一时形成了一股反中央的浪潮。

在苏联，米夫把持下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又抛出一份名为《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和李立三错误的报告》。这份报告全面否定三中全会，指责、攻击瞿秋白，诬陷他故意搞“调和路线”和“小团体”活动。说他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工作时就“领导了中共大小团体纠纷，这个小团体是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派合作的，回国后继续搞小团体，‘认为瞿秋白’不是中国党的代表，不过是一个小小团体的首领之一”。

十二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审议和讨论了东方部的报告，会议在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瞿秋白的同时，还为王明等人鸣冤叫屈，说他回国以后得不到重用，完全是瞿秋白搞“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吹捧王明是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很好的同志。很明显，共产国际决意把瞿秋白赶下台，让王明一伙上台，达到改造中国党的目的。

在国内的王明此时春风得意，他不仅不用去江西苏区工作，而且还大有可能坐上中央的头把交椅。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可不放心，虽然对瞿秋白、周恩来已形成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搞不好仍会马失前蹄，所以他亲自来华，助王明一臂之力。

十二月十四日，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后，分

别会见了王明、罗章龙、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人，为他们“输血、打气”。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央政治局撤销了对王明等人的处分。此时，王明的追随者王克全等人仍不过瘾，坚持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开除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贺昌的中央委员职务，立即停止瞿秋白、周恩来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为了顾全大局，瞿秋白和周恩来两人在主动承担调和主义错误的责任后，又提出一起退出中央政治局。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天气阴沉沉的，不多时就下起了小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匆匆忙忙地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有的代表来到会场后还不知道要召开什么会。会议从早七点一直开到晚上十点多。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发言批判“立三路线”和瞿秋白的“调和路线”。因为李立三早已被勒令去莫斯科共产国际作检讨，所以瞿秋白便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共产国际的意见只有服从，秋白顾全大局，对于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他没有辩解，而是按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定的调子委屈地作了自我检讨，并承担了所犯“错误”的责任。

在瞿秋白和周恩来的去留问题上，米夫采取了“留周拒瞿”的办法。会议在米夫的圈定下，原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李立三和李维汉三人落选，向忠发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王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有时连政治局会议也不让通知他参加，向忠发也知道自己的处境，他说自己的位置形同虚设，于是整天吃喝玩乐。这样一来原先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却一步登上了中央政治局的最高领导机构。半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使王明更加“春风得意”。

一九三一年三月或四月间，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特科的

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被武汉警察局逮捕，随即叛变。他供出了两湖的共产党机关和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五个秘密地址，即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中央秘书处、特科机关。在武汉负责“铲共”工作二十五岁的警察局长蔡孟坚，立即发电报给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但这份密电被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钱壮飞冒着生命危险，火速赶往上海，报告了周恩来。中共中央各机关迅速转移，使国民党特务扑了个空。

顾顺章叛变后，被委任为“剿共”特务队队长，此后，他更加疯狂地追捕中共领导人。总书记向忠发成为他追捕的第一个目标。顾顺章对捕获向忠发显得信心十足，他平素和向忠发交往密切，深信他一定会露出蛛丝马迹。他向国民党特务讲述了向忠发的两大特征，一是湖北口音，二是右手食指缺一节。于是一张追捕向忠发的网撒开了。

顾顺章是上海人，曾在南洋烟草公司做工头。一九二四年在罢工斗争中入党。入党后担任南洋工人支部书记，领导过几次南洋工人罢工。后来调任上海区委工作。一九二六年底起他担任训练武装上海工人的工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时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调中央特科工作，“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为政治局委员，“六大”为中央委员，六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中全会后未变。

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通知向忠发搬了家，并决定让他尽快转到中央苏区工作。向忠发因舍不得情妇杨秀贞，迟迟不愿离开上海，就在这时候顾顺章摸到了向忠发的踪迹，他派人跟踪杨秀贞，发现了向忠发新的住址，幸亏向忠发及时发觉，和杨秀贞从后门逃走，才没有被敌人捕住。

事后，向忠发被临时安排在周恩来、邓颖超的住处。周恩来多次警告向忠发千万不要外出，以免发生不测。并且安排地下交通员尽早护送他离开上海，前往苏区。

可是，向忠发不吸取教训，他趁周恩来、邓颖超不在时，私自外出，去和他的情妇杨秀贞幽会，结果落入顾顺章设下的圈套。

据邓颖超回忆：“住了三四天，当恩来同志和我不在时，他就溜出去到一家外国人的旅馆看他的小老婆。我们回家后，见他不在，而且当晚没见他回来，估计会产生问题。次日上午也没见他回来，这天中午，我们就得到内部确切的消息，说他在静安寺路等汽车时被叛徒发现，当即被捕。”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国民党当局发出了向忠发的通缉令以后，一家汽车行的小会计便向淞沪警备司令部报告说，向忠发常来车行叫车，因为以前曾听过向忠发的报告，所以认识他。接到密报，顾顺章便在车行设下埋伏，向忠发在杨秀贞处住了一夜后，第二天清晨去车行叫车，当他刚走进车行，一群穿便衣的人向他围了过来，向忠发见事不妙，奋力反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擒获，押往巡捕房。向忠发自称叫余达强，但特务们一听他那浓重的湖北口音，再看他右手断了食指，便说：“你不是余达强，你是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

向忠发是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被捕的，下午即叛变，二十四日在龙华被处决，处决前敌人先割下他的耳朵，又挖掉他的鼻子，这就是一个可耻叛徒的下场。

向忠发死后，王明因祸得福被推上了最高领导职位。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已经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王明，对瞿秋白仍不放过，对他进行了更为残酷的打击迫害。两次强迫他公开发表声明，承担“调和主义错误”的“罪责”。

在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下，瞿秋白的身心受到了很大摧残，而且肺病更加严重，不得不“请病假”休养治病。事后曾有人问他：“为什么你对那些无中生有的诬蔑不置一词，不为自己辩解呢？”秋白回答说：“我个人的问题算不了什么，这些都是枝节问题，我倒是担心革命的前途啊！”

果然，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的四年时间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 第二章 重返文苑

瞿秋白在遭受王明“左”倾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后，并没有消沉，回到文化阵地继续为党工作。这时，他和鲁迅虽未见面，但已神交已久。

### 一、文化阵地

三十年代初，白色恐怖异常严重。据当时上海的一家报纸报道，仅一九三〇年八月至十月即有十四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国民党反动派在发动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对“左联”和进步文化界进行文化“围剿”。一九二九年以后，国民党陆续制定了一些宣传品的审查条例和出版法令，对革命的或进步的文艺书刊加以查禁，国民党还实行法西斯主义政策，派特务查封、捣毁进步的报馆、书籍，对左翼作家进行血腥屠杀。一九三〇年中秋前一天，南京反动政府在雨花台枪杀了南京晓庄师范学生、南国剧社社员宗晖。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左联”的五位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了。以后洪灵菲、应修人、潘漠华等进步作家又先后惨遭杀害。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国民党反动派也深知“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坐天下”，于是发动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依靠一些党棍、政客、军



官、特务组成“六一社”出版《前鋒周报》和《前鋒月刊》作为他开展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阵地，以此来对抗革命文艺运动，进而消灭革命文学。

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一些知识分子产生了动摇幻灭乃至倒退、堕落，而另一些人则感到非常愤怒，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缺乏冷静的态度，不承认必要的退却，不能用灵活的办法同敌人作斗争，而是采取拚命的办法，使革命文艺队伍受到很大损失。

在这种形势下，瞿秋白回到他曾经深深的眷恋而又阔别已久的文苑。

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以后，和杨之华搬到上海大西路两宜里。由于白色恐怖，秋白很少出门，过着隐居的生活。离开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他好像轻松了许多，有时间把全部的心思都集中在读书和写作上。早年家庭的影响，父母的熏陶，使他对写作有着特殊的感情，一九二一年在苏联考察时就写下了著名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那时他年仅二十三岁。而今重返文园，他把四中全会带给他的烦恼抛到了脑后，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当时，王明小宗派主义者不仅打击秋白，而且也停止了杨之华的工作，她感到委屈和不平。秋白察觉后，耐心地劝解她：“一个人要经得起任何考验，不光是在顺利的情况下要考验得起，特别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更要经得住考验……”在秋白的鼓励帮助下，杨之华和秋白一道开始了文学著作和翻译工作。

由于拚命地读书和写作，再加上营养不良，秋白的肺病更加严重，身体很弱，杨之华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而瞿秋白却毫不在意，照旧每天工作在十几个小时以上。杨之华见他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想为他增加一点营养，于是就托邻居买了一只鸡，想

不到晾衣服时，不小心，晾衣服的竹竿碰翻了锅，杨之华心疼得不得了。是呀，她怎能不心疼呢？瞿秋白离开中央领导机关后，王明留给他的每月生活费只有十六元，还不及当时上海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秋白又要看病、吃药，所以生活一直很清苦。杨之华不知怎样节省，才攒下了这只鸡钱，现在又……杨之华一边收拾一边埋怨秋白没有帮她晾衣服。秋白马上放下手里的书一声不响地收拾起来，见杨之华满脸委屈的样子，他又像哄孩子似地说：“算我已经吃了吧，应该高兴么。不要想它了，该读书和翻译了，把你昨天译好的拿来我改。”杨之华这才放宽了心。

瞿秋白在三月七日和三月十二日两次给苏联汉学家郭质生写信，要求他多寄一些苏联出版的小说、杂志和文论集，以供学习和翻译之用。同时也给郭质生寄了《国语罗马字读本》和《小说月报》四本。他本想多寄一些，但因为没钱，不能办到。解放初期，国内征集革命烈士遗物，郭质生将秋白写给他的信以及照片赠送给我国，并附言说：“瞿秋白是我的知己朋友，是永远不会忘掉的亲人。”

一天下午，秋白正在专心写作，杨之华在一旁看书。忽然楼下传来一阵敲门声，接着便听到房东太太大着嗓门问：“你们找谁呀？”“何先生在家吗？这里有没有姓何的？”房东太太不耐烦地说。杨之华听出是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声音，就一边跑下楼一边大声说：“有姓何的！他们是我的朋友。”房东太太见来人是房客的朋友，也就不再多问，扫了客人一眼，就回屋去了。杨之华连忙关好大门，请茅盾夫妇上楼，进屋后，杨之华悄声地告诉他们：“秋白又改名换姓了，不再姓何，改叫林复了。”瞿秋白热情地握着茅盾的手，寒暄之后，秋白问茅盾在写什么？茅盾说，已写完《路》，现在正在写长篇小说《子夜》。并告诉他已写完了前四章。秋白听后，很

感兴趣，就又问全书的情节。茅盾说那就话长了，过几天我把写完几章的原稿带来，再详谈。秋白还向茅盾打听文艺界的情况，茅盾都一一作了介绍。不知不觉已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茅盾夫妇起身告辞。

两天以后，正好是星期日，茅盾带了《子夜》前几章的原稿和各章的大纲同孔德沚一起又去拜访秋白。秋白的兴致极高，两人现在的话题已和“五卅”时期、大革命时期不同了，那时主要是谈政治，而现在秋白重返文学园地，文艺就成了主要话题。

秋白热情支持茅盾写小说，从事专业写作。因为当时无产阶级文学还处于初创阶段，还没有产生划时代的巨著，秋白亟待茅盾这样的文学高手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秋白与茅盾就《子夜》的具体问题进行切磋。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农民暴动一章，也谈到后来的工人罢工。秋白边看边提意见，他认为写农民暴动的第一章没有提到土地革命，写工人罢工，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起来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茅盾听后频频点头，后来茅盾在小说中删掉了这一节。秋白还向茅盾解释了党的政策以及红军和各苏区的发展情形。不知不觉已到吃晚饭的时间，摆好饭后，杨之华催促说：“吃了饭再谈吧！”不料刚吃完饭，就有人送信来，秋白拆开一看，上面用暗语写道：“你们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去看看吧！”秋白立即明白这是党的机关遭敌人破坏，通知赶快转移的暗号。事后秋白才知道特科的顾顺章叛变了，供出了他的住址。

秋白告诉大家马上转移，由于情况紧急，一时找不到安全的地方，茅盾就请秋白夫妇到自己家暂避。为了不引人注目，大家分头转移。

茅盾夫妇当时住在静安寺路余庆里一号的三层楼上，房子很

窄小，天气又热。茅盾让两个孩子让出床铺，供秋白夫妇休息。秋白和杨之华深感不安，本想住几天就走，可是由于敌人的搜捕，一住便是两个星期。

在茅盾家避难的两个星期里，他们几乎天天谈《子夜》。秋白对小说的情节、结构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人物刻画方面，秋白讲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时，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茅盾觉得有道理，就用了一个生动的细节来表现：当吴荪甫得知八个厂的工人准备“打厂、放火”而束手无策时，精神反常，结果将端燕窝粥进来的佣人王妈奸污了，深刻表现了资本家的虚弱丑恶的本性。在谈小说的结局时，秋白建议将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突出表现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资本家，民族资本家没有出路的社会现实；对小说的细节，秋白也特别留意，原稿写吴荪甫出门坐的是老式福特轿车，秋白认为这和大资本家的身份不相符，应改为坐雪铁龙这样高级轿车。茅盾在写作时都照改不误。

长篇小说《子夜》出版以后，秋白写了《〈子夜〉和国货》一文，对《子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茅盾读后，将秋白的这篇文章剪下，一直珍藏了半个多世纪，在逝世前不久，又让家人将剪报转送给瞿独伊，以便编入新版的《瞿秋白文集》之用。

在和茅盾的交往过程中，担任“左联”领导的茅盾还向秋白介绍了“左联”的一些活动情况。秋白对“左联”出现的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创作等情况，都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秋白还多次问到鲁迅，对这位文坛主将，他早就十分敬仰，此时更萌生了要与鲁迅见面的念头。茅盾答应在适当的时候陪他去

拜访鲁迅。

## 二、建立联系

五月初的一天，在茅盾家瞿秋白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冯雪峰，秋白与鲁迅相识就是由雪峰介绍的。

冯雪峰，浙江省义乌县人。一九〇三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一九年小学毕业并考入浙江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一九二一年因带头参加学潮被开除，到杭州后以优异成绩考入闻名全国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随即投身新文化运动。十九岁的冯雪峰曾与同学潘漠华、汪静之、应修人组成湖畔诗社，出版《湖畔》诗集，被誉为“湖畔诗人”。

冯雪峰一进门，见有一位戴眼镜的生人在座，刚要出口的话又吞了回去，茅盾见他神情诧异，连忙说：“来，我给你介绍个人。”说着把他拉到秋白面前：

这是做党的工作的秋白同志；这是“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同志。雪峰握着秋白的手说：“早就知道你，只是没有见面的机会”。秋白也热情地说：“是呀，我也想和‘左联’的同志见面，了解一些情况，来，咱们坐下谈吧”。雪峰拿出几份刊物交给茅盾说：“这是刚刚出版的《前哨》的第一期，你这位执委书记，快来提提意见吧！”茅盾接过来，却被站在一旁的瞿秋白拿了去。翻开目录见上面有鲁迅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鲁迅的这篇文章是为纪念不久前被国民党杀害的“左联”五位作家而写的。

“写得好，究竟是鲁迅。”瞿秋白放下手里的杂志连声称赞。

雪峰当时任“左联”的党团书记，秋白与他虽然是初次见面，却彼此倾心，十分信任。三人一直谈到很晚才散去。

由于白色恐怖，瞿秋白经常要变换住处。茅盾觉得自己家条件太差，闯来个生人，秋白连躲的地方都没有，这对他的安全不利，于是就找冯雪峰商量，建议秋白搬到鲁迅家去。当时鲁迅住在四川北路的一个公寓里，这里系租界，住的大都是欧洲人或日本人，一般的中国人都不去那里。但秋白与鲁迅从未见过面，贸然而去，是否妥当？冯雪峰说，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他到有个可靠的去处，他有个朋友叫谢旦如，可以帮忙。

谢旦如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身材比一般南方人要高些，面孔清癯，态度谦和，戴一副金丝眼镜，一副儒商的架势。平日很爱作诗，著有诗集《苜蓿花》。加入了“湖畔诗社”，曾经与人合作开办过西门书店，他负责新书推荐工作，编印《出版月刊》宣传革命文学。后来西门书店破产，旦如接管并把书店改名为“公道书店”，意即买卖公道。

谢旦如的父亲原来是大商人，开过钱庄，现在已经过世，家属关系单纯，亲戚也都在商界。当冯雪峰找到旦如，告诉他有个被国民党通缉的领导同志要来他家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将自己的部分住房给秋白夫妇居住。旦如知道瞿秋白的身份和地位，为了安全，特意在报上登了一则余屋招租的广告，以掩人耳目。

旦如的家位于南市紫霞路六十八号，是一所建筑不久的旧式楼房，占地七分多，三开间三进，环境相当僻静。

五月的一天，秋白化名林复，打扮成乡村教师的模样，剪了平头，戴一副黑眼镜，穿上一件浅灰色的长衫，脚上穿的也是布鞋。他和杨之华带着一个小皮包，在冯雪峰的陪同下来到谢家。谢家除了旦如夫妇以外，还有旦如的老母，一个孩子和几个佣工。住

房相当宽敞，秋白夫妇被安排在二楼书房对面的东厢房住下，为了掩护秋白，虽然两家人吃住在一起，但是旦如始终没有将秋白的真实身份告诉别人，对妻子和母亲也严守秘密。秋白也不轻易下楼，整天伏案写作，只是在茶余饭后，才下楼听听收音机，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有空便和旦如谈谈天，或是给旦如的孩子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秋白搬进来之后，旦如便断绝了和文艺界朋友的往来，并将公道书店的业务也收歇了。

当时瞿秋白和外界的联系主要是依靠冯雪峰同志。雪峰每隔三四天，至多一个星期就到秋白住处去一次，向他传递消息，介绍“左联”和文化界的情况。而秋白则让雪峰把他写完的稿子，拿到外面去发表，在他到谢家的头一个月里就写了《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等文章，论述了文学革命的意义和任务。七月份，雪峰帮助丁玲筹办《北斗》月刊，请秋白写稿支持。他立即以董龙的笔名写了《哑巴文学》一文，发表在《北斗》创刊号上，以后又以司马今、史铁儿、VT等笔名为《文艺新闻》、《文学导报》写文章，对民族主义文学《陇海线上》、《国门之战》给予批判。秋白用他那支锋利的笔，直接参加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由于和茅盾、冯雪峰等人的关系，使秋白和“左联”发生密切的联系，最后成为“左联”的重要领导人。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深夜，日军对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发动突然袭击，并用重炮轰击沈阳城。东北军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下，于十九日弃守沈阳，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随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整个东三省。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怒了瞿秋白，他曾不顾生命危险，三次化装和谢旦如一起到上海南市城隍庙，了解民情。城隍庙原是清代“西园”的一部分，咸丰年间开始形成商场。

开有各色店铺，如眼镜、剪刀、卷轴、陶器、赌具、杂货等，应有尽有。这天，秋白换上一件旧灰布长袍，戴一副眼镜，刚要出门，谢旦如见了就问他去哪？秋白说去城隍庙转转。“这几天外面风声很紧，就不要外出了。”旦如劝他道。“总是关在家里，外面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了。”秋白执意要去。旦如心想，秋白一人外出，万一出了事，自己没法向雪峰交待。于是就说：“那好，我陪你一道去。”二人一同出了门。快到中秋了，城隍庙内非常热闹。江湖卖艺的锣鼓喧天，吸引了不少游客，当然也有国民党特务混在其中。秋白一边走一边看，旦如紧随其后，走着走着秋白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艺人领着一个小姑娘边唱“小热昏”，边卖梨膏糖。曲调委婉动听，民间文艺深深打动着他的心。天黑秋白回到家后，便用“小热昏”这类民间小调写下了长歌《东洋人出兵（乱来腔）》。秋白在前言中写道：

“日本出兵满洲，国民党的政府军队的长官却赶紧逃命，叫做什么无抵抗，国民党原本是地主、买办、官僚资本家的党，他们宁可把国家送给日本帝国主义，送给美帝国主义，送给国际联盟的帝国主义，他们决不能救国的。我们千万不能够再让中国放在国民党手里。因此在下编了一首歌，叫做《东洋人出兵》，说说这里面的道理。这首歌的调头是没有什么一定的，大家随口可以唱，所以叫做乱来腔。谁要唱曲子唱得好，请他编上谱子好了，欢迎大家翻印。欢迎大家来唱，欢迎大家来念。一人传百，百人传千。提醒几万万人的精神，齐心起来救国，底下写着上海话和北方话两种歌词，大家请便。”

丁玲读了以后称赞说：“他带头用上海方言写了大众诗《东洋人出兵》，这在中国文学运动史上是创举。在他的影响下，左联的很多同志也大胆尝试……”



丁玲，原姓蒋，名伟，又名冰之。一九〇四年生于湖南临澧。一九二一年到上海入平民女校，一九二三年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听课，结识了在该校任教的瞿秋白，一九二四年到北平，一九二五年四月，她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谈自己的境遇和困惑，鲁迅读了之后，误以为是沈从文写的，所以未作答复。一九二七年，在《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在文坛崭露头角。一九二八年与沈从文、胡也频组织“红黑社”，出版了《红黑》半月刊，一九三一年参加“左联”，主编《北斗》杂志。

“九一八”后的第三天，鲁迅也在《答文艺新闻社问》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屠杀中国人民的目的：“在这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正当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奋起抗敌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却更加疯狂地实行白色恐怖。一九三一年九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国民政府”发出密令悬赏通缉瞿秋白、周恩来、陈绍禹、沈泽民、张闻天、罗登贤、秦邦宪等人。并拟定了悬赏金额：瞿秋白、周恩来各两万元，其他五人各一万元。此时共产党的叛徒、国民党的特务以及一些见利忘义之徒，四下活动，到处追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正是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在谢旦如的掩护下，秋白通过冯雪峰与鲁迅建立了联系。

秋白很敬慕鲁迅，在谢旦如家居住的时候，经常向冯雪峰同志了解鲁迅的情况和对工作的意见。每当冯雪峰来谈工作或是来取秋白要拿到外面去发表的稿子时，瞿秋白就一面吸着纸烟，一

面笑着问：“鲁迅近来可好？又写了些什么文章？”看着秋白那天真、急切的样子，冯雪峰就将鲁迅的生活情况、写作情况讲给秋白听。雪峰讲得很多，也很具体，但秋白还是不满意地问这问那。雪峰的心里一直在盘算着，瞿秋白与鲁迅如果能当面聊一聊，这对工作将会起很大的作用的。但他又不能不替秋白的安全着想，反动派最近通缉得很紧，还是小心些好。

冯雪峰也常到鲁迅那里去把秋白的情况以及他对“左联”工作的意见转达给鲁迅。

鲁迅从冯雪峰那里知道秋白的俄文程度很高，就希望秋白能够翻译一些俄文原著。当时敌人对俄文书籍查禁得很厉害，国内很难找到。于是秋白要翻译什么书，就开好单子托在苏联的朋友曹靖华从列宁格勒经欧洲寄给鲁迅，然后再由鲁迅转给瞿秋白。

曹靖华，原名曹联亚，一八九七年生于河南卢氏县。“五四”运动前后在河南省立二中学习。一九二〇年被河南省学生联合会选为代表，赴上海参加第一届全国学联代表大会。随后被社会主义青年团派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那里结识了瞿秋白。一九二二年回国后，在北平大学旁听过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一九二五年在开封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工作。同年加入未名社。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院、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任教，同时研究俄国文学，向国内读者介绍苏联文学。

这次，曹靖华将秋白要的苏联作家格拉特夫的《新土地》寄给鲁迅。鲁迅收到后，再通过冯雪峰转给了瞿秋白。这部书是反映苏联现实生活的，又是通过鲁迅转来的第一本书，因此秋白非常重视。夜以继日地翻译。一九三一年下半年，书译了出来，秋白写了只有五个字的一篇序言：“并非乌托邦！”译稿送到了商务

印书馆。可惜，《新土地》书稿，后来在“一·二八”事变时，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中。

一九三一年，曹靖华在列宁格勒翻译了苏联作家涅拉菲摩维奇的长篇小说《铁流》，译稿寄给了鲁迅，但书店不敢承印，为了使中国人民早日读到反映苏联人民斗争生活的名著，鲁迅就自己出资，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印行。眼看发稿在即，但涅拉托夫写的序文还没有译出来，鲁迅穿着灰布长衫，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读着译稿，一边校对一边琢磨着：如果等曹靖华译好序文，再从列宁格勒经欧洲转寄过来，又要等上几个月，如果不用序文，全书又不完整，也是一种缺憾。秋白！秋白！鲁迅自然想到了精通俄文的瞿秋白。于是立即找雪峰商量，请秋白来赶译这篇序文。

秋白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近两万字的长序译了出来，署名史铁儿。他在把译稿转送给鲁迅的同时，写了一封信给鲁迅和冯雪峰：

迅、雪：

这篇序是译完了。简直是一篇很好的论普洛创作的论文。其中所引《铁流》原句只有一半光景是照曹译的，其余，不是曹译不在我手边（在下半部），就是作序者自己更动了些字句，我想，可以不必一致，这是“无关宏旨的”。不过，当我引着下面一段中的几句时，我细把《铁流》原文和曹译对过。

鲁迅在收到序文和秋白的信后，给曹靖华写了封信，告诉他序文已找人译出，并说“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了。”鲁迅在《〈铁流〉编校后记》中还赞赏道：

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少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

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读者倘将这和附在卷末的《我怎样写〈铁流〉的？》都仔细的研读几回，则不但对于本书的理解，就是对于创作，批评理论的理解，也都有很大的帮助的。

从这时起，瞿秋白和鲁迅建立了联系，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并肩战斗生活。

瞿秋白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离开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岗位，直到一九三二年四月才能与鲁迅见面，在这段时间里，两人主要是“神交”通过相互尊敬和信赖，建立起浓厚的革命友谊。许广平曾赞叹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为“海内存知己，神交胜比邻。”

### 三、神交已久

鲁迅早就知道秋白的身份，现在又从秋白对“左联”工作的意见和给“左联”各种刊物写的文章中进一步了解秋白。鲁迅很看重瞿秋白意见，也了解他的才华。当时的中国文艺界非常需要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由于秋白精通俄文，能够直接从原文翻译马列著作，鲁迅认识到秋白的重要作用，所以马上就把他当作一支很重要的生力军了。

一次，冯雪峰到紫霞路秋白的住处，碰上秋白正在阅读鲁迅从日文转译的马克思文艺理论著作。于是两人便谈了起来，秋白对鲁迅的译文提出了一些意见，并希望雪峰转告给鲁迅。不久，雪峰去鲁迅那里，就如实地把秋白的意见转告给了鲁迅。鲁迅听后，并没有急于回答和解释，而是怕错过机会似地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鲁迅说话时的神情显得很兴奋。同样，鲁迅在指出秋白

的杂文尖锐、明白的同时，也认为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

三十三岁的瞿秋白勇于向比自己年长，又是“左联”主帅、文学大家的鲁迅的作品提出批评，而鲁迅不仅能虚心接受，而且充分肯定秋白的作用，足以说明两位虽未谋面的伟人的坦诚相待。

此后，鲁迅就经常让冯雪峰送一些稿件让秋白翻译。一来是革命的需要，二来也可以帮助秋白解决一些生计问题。因为在当时除了少数几个职业革命家以外，大多数革命者都需要自己养家糊口。

鲁迅曾经从日文翻译了俄国作家卢那察尔斯基的剧作《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的第一场。并用“隋洛文”的笔名在《北斗》第三期刊载；但当鲁迅和秋白建立联系之后，认为最好让秋白从俄文直接翻译，在《北斗》连载，然后再拟出单行本。于是就让冯雪峰找秋白商量。秋白得知后欣然答应，很快就译了出来，用“易嘉”的笔名在《北斗》第二卷第二、三、四期上连载。还以编者的名义附上一个声明：“找到了一本新的版本，比洛文先生原来译的那一本有些不同，和原本俄文完全吻合，所以由‘易嘉’从头译起。”秋白写这个说明的目的意在说明剧本是直接从俄文翻译的，和鲁迅原来日文译本无关，这样就可避免一旦出了“问题”牵连到鲁迅，因为剧本的主题是：革命只有到达了目的地，才能“脱掉染着血腥的盔甲”，“只有那样的世界里面，真正解放了董·吉诃德，才可以找着和谐和光明。”

一九三一年九月，鲁迅为了反抗国民党对出版物的“严行查禁”，假借“三闲书屋”的名义，自己筹资印刷出版了翻译的苏联法捷耶夫小说《毁灭》，鲁迅是从日文转译的。书刚一出版，就赠给秋白一册。秋白读了之后，十二月初给鲁迅回了一封信，这封

信就是后来被鲁迅收到自己的杂文集《二心集》中的《关于翻译的通信》。秋白在信中对鲁迅以“敬爱的同志”相称，对《毁灭》的出版表示祝贺，对鲁迅热心介绍苏联革命文学给予崇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扬。他在信中写道：

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

当时一些人曾对鲁迅翻译的文章进行攻击和歪曲，瞿秋白在热情支持鲁迅的同时，也直率地指出了《毁灭》译本中的一些问题。为了表明自己诚挚的思想感情和对鲁迅“不见外”，秋白又在信中写道：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

收到了秋白的信以后，鲁迅非常高兴，因为秋白的信不像其他人那样充满恶语中伤，而是同志般的信任和关怀，老朋友般的坦诚和热情。十二月二十八日，鲁迅写回信给瞿秋白，他说：“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

儿子的儿子……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介绍。”对秋白提出的意见表示诚恳地接受，他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译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益处。”“我很感谢你信末所举的两个例子”，“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还自以为这见解是很高明的哩，这是必须对于读者，赶紧声明改正的。”在信中鲁迅对秋白以“敬爱的J·K同志”相称（J·K是秋白来信时的署名），这在鲁迅与友人的信中是极少有的。只是鲁迅在得知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才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为同志”。他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鲁迅认为秋白和自己探讨的文学翻译的问题，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且对于其他译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益处。于是先把瞿秋白的信以《论翻译》为题刊登在《十字街头》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一、二期上，又把自己的回信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导报》创刊号上公开发表。这一来一往的两封书信成为瞿秋白和鲁迅友谊的历史见证。

这时，秋白与鲁迅仍未见面，但他们在同一条战线上，从事着同一方向的战斗，神交已久……

#### 四、安排会面

共产党的负责人要与鲁迅见面，往往是由冯雪峰出面牵线搭桥的。如一九三〇年在上海爵禄饭店同李立三会晤，一九三二年同陈赓将军亲切会见，一九三五年为在狱中的方志敏传递密信和

文稿等，都是在冯雪峰的陪同安排下进行的。

冯雪峰在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中，起着重要的联系作用。

一九二五年春，冯雪峰到北京后，曾去北京大学听鲁迅讲课。此时，这位坐在教室默默听讲的年轻人并未引起鲁迅的注意。一九二六年，冯雪峰把自己翻译的日本短篇小说《花子》送到鲁迅主编的《莽原》上发表，鲁迅对译稿亲自作了校改和润色，以后，冯雪峰的散文《月灾》、诗歌《朋友的信》、译文《新俄文坛的现势漫话解说》等，也先后在《莽原》杂志上发表，开始和鲁迅有了文字之交。

一九二六年八月间，冯雪峰和潘漠华等人，准备创办一个新的刊物。为此，由北新书局引荐，专门拜访鲁迅，希望得到鲁迅的帮助指导。不巧，当时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请，任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正准备离开北京南下，时间仓促，甚至连冯雪峰的名字也没有问，就分手了。在鲁迅的日记里曾留有：“晚冯君来，不知其名”的记录。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冯雪峰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环境中，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为党的事业奔走。一九二八年，冯雪峰为了逃避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通缉，流亡上海，暂住在同学柔石的家里。

柔石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一九二三年浙江第一师范毕业，任慈溪县小学教师并从事文学创作。一九二五年到北京大学旁听，与冯雪峰一同听过鲁迅的课。一九二六年回浙江任镇海中学教员。一九二七年回故乡宁海，曾担任过宁海教育局局长。一九二八年，因宁海旁亭暴动被牵连，逃到上海后与鲁迅结识。

冯雪峰在和柔石的交谈中，得知柔石与鲁迅的关系很好，就想通过他结识鲁迅，但又怕遭到拒绝。因为鲁迅对冯雪峰曾有过



一点小误会。当时，鲁迅正受到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的攻击，冯雪峰写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在《无轨列车》杂志上发表，鲁迅看到后，很反感，曾对柔石说：“这个人，大抵也是创造社一派。”冯雪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柔石后，柔石听了之后笑了起来，他说：“不会的，鲁迅虽然创作和编辑工作都很忙，但他总是热心帮助来求助于他的青年，并愿意与他们交朋友。”怕雪峰不信，还举了一个例子说：“青年诗人殷夫因组织罢工被捕获释后，来找鲁迅，鲁迅见他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得以买一件夹衫”，后来还托我把裴多菲的两本集子送给他。冯雪峰听了很高兴，希望柔石尽快帮忙与鲁迅进行联系。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九日夜晩，柔石就带冯雪峰去见鲁迅。鲁迅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冯雪峰向鲁迅请教了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所遇到的难题，鲁迅毫无保留地作了解答。这时鲁迅还不知道雪峰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热情、诚实和坦率待人的态度，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很快赢得了鲁迅的理解和信任，两人坦诚相见，推心置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冯雪峰抵沪后，一时没有和党的负责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接上关系，通过这次会见，他知道党已通过互济会，派秘密党员与鲁迅取得了联系。

大约在一九二九年二月，柔石替冯雪峰找到了与鲁迅为邻的住房。两人开门即见，雪峰从晒台上就能望见鲁迅的客厅，见客厅里没有客人，就去找鲁迅谈天。冯雪峰回忆说：“那种时候，总是我一去，他让我坐下，就愉快地说起他译了什么作品或看了什么书，而后紧接着说，‘实在得益匪浅’！于是就谈下去。”

鲁迅与冯雪峰在共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结下了战斗的情谊。

一九三〇年春，鲁迅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出面租借了一处住所——拉摩斯公寓（今北川公寓）二千零九十三号三楼四室，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二日，鲁迅同广平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海婴从景云里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拉摩斯公寓，因由英人拉摩斯所建而得名。北四川路一百九拾四号三楼四室，是鲁迅寓所的总门。靠北一大间是会客室兼藏书室，中间过道两侧为两间卧室，南向两间为天井，中间是餐室，也是过道，连接着厨房和浴室。厨房东侧，通后门扶梯，直至楼下后弄堂，遇有紧急情况可直接从后门转移出去。后来瞿秋白夫妇被通缉，曾两次在这里避居。

一九三一年九月，冯雪峰也从景云里搬到拉摩斯公寓底楼，与鲁迅上下为邻，他们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为了安全起见，冯雪峰经常是等夜深人静才到鲁迅那里去。他们在一起编辑《文艺导报》、《十字街头》等刊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及“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主义政策。冯雪峰告诉他已经有那些文章，还缺乏怎样的文章和需要多少字数，鲁迅马上回答说：“我来凑一点。”或者从案头拿出已经写好的文章，说有多少字，那么，还少多少字，也由他再写一点。这样就算编好一期了，于是拿出饼干之类的点心来，和冯雪峰在暗暗的台灯下轻声地谈起来。

冯雪峰是职业革命家，除了革命工作外，还要自己谋生。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艰苦。这时鲁迅就给予经济方面的接济，多是以稿酬、校对费的方式资助的。冯雪峰婉言谢绝，鲁迅总是以“顽固”的态度令其收下。冯雪峰也尽量帮助鲁迅做些事情。他看到鲁迅每天晚上伏案工作，总是把房间中央的一盏悬吊着的电灯靠电线滑动拉到靠近写字台的上方。第二天天亮再把灯移回到原来

的地方，很不方便。于是就到电料行买了一盏带绿色玻璃罩的台灯，送给鲁迅。这盏灯，鲁迅一直用到去世。

由于冯雪峰和鲁迅的友谊深厚，他又是瞿秋白与鲁迅的联系人，所以由他来安排瞿秋白与鲁迅的会面，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突然进攻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为了躲避战祸，瞿秋白与杨之华随谢家一起由紫霞路六十八号移居到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毕兴坊十号。住了三个月，战争结束后，又随谢家搬回原处，改住在三楼正中的房间里。

瞿秋白一边拼命地写作，一面从事革命活动。三月的一天，在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间雅座，丁玲、叶以群、田汉、刘风斯等一群年轻人围坐在一起，似乎是在饮酒作乐，实际上是在等一个人。不一会，一位穿长衫、戴眼镜教师模样的人走了进来，大家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没想到来人竟是瞿秋白。秋白是代表中宣部来出席他们的入党仪式的。文委负责人潘梓年主持了仪式，丁玲等人叙述了个人入党的志愿，瞿秋白最后讲了话。

回到谢家后，躺在床上，瞿秋白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想起白天参加出席的入党仪式，他就感到无比振奋。在白色恐怖的海，又有那么多的文艺青年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他们在文艺阵地中会发挥出巨大的战斗作用的。由此，他又想到了鲁迅先生。他虽不是党员，但却以一个党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为党的事业，民族的解放斗争，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的战斗作用，不是一般党员能够代替的。到上海已一年多了，虽然和鲁迅已接上了关系，但还没有亲自和他谈一谈，自己太忙了。

一阵咳嗽声吵醒了睡在一旁的杨之华。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瞿秋白已换上单衫。一天早饭后，冯雪峰来找瞿秋白，秋白像是早有准备，穿戴整齐，雪峰一进门就同他一道出门了。因为今天，他们要去拜访鲁迅先生了。

鲁迅的寓所离虹口公园不远，因为四周住的都是外国人，所以还比较寂静。来到鲁迅家的楼下，冯雪峰机警地朝四周望了一下，见没有人跟踪，才带秋白上了三楼。冯雪峰敲了敲门，开门的正是鲁迅，他把二人让进客厅。冯雪峰把秋白向鲁迅作了介绍。鲁迅热情地握住秋白的手说：“早就想见面，但你过的是地下生活，我过的是地上生活，所以见面难啊！”

“我们不是早就见面了吗？”瞿秋白说。

鲁迅很吃惊，不记得在哪里见过，冯雪峰也不解地望着秋白，见他们吃惊的样子，秋白就补充说：“读了你的文章，就如同见到你本人一样，文如其人么。”听了秋白的话，三人一齐大笑起来。

落座后，两人就像久别重逢老朋友一样说起来，从日常生活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总之有说不完的话题。鲁迅与瞿秋白是第一次见面，而许广平在女师大读书的时候，曾听过瞿秋白的演讲。那时秋白刚从苏联考察回国，由陈独秀介绍在北京工作，女师大请他介绍苏联的情况，瞿秋白留着长发，英姿勃勃，演讲起来非常有鼓动性，讲话时头发掉下来，就往上一扬的神气给许广平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这次来访鲁迅时已剃了头，圆面孔，沉着稳重，显得深思熟虑，让许广平几乎认不出来了。

谈到文学时，鲁迅对秋白说：“对俄国文学，我有极大的兴味。我之所以写小说，原因之一也是由俄国文学家为劳苦大众呼号战斗所给予我的影响。”对于俄国秋白是熟悉的，因为他曾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去俄国考察2年。他对鲁迅的话非常赞同：俄国的国情，很像中国。俄国革命掀天动地，使全世界都受它的影响，

俄国进步文学家的笔，是为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而写作的。

两人正谈的热闹，许广平带着刚学会走路的周海婴来到客厅，小海婴口齿清楚地叫了两声：“叔叔！”秋白将走到身旁的小海婴抱了起来遗憾地说：“乖孩子，叔叔什么礼物都没有带，下次一定给你带好吃的东西。”鲁迅叫许广平取来绍兴黄酒，秋白虽然身体不好，也破例小饮了起来。

对于瞿秋白与鲁迅见面，后来许广平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总之，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子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的吗？那情形就仿佛相似……”

“为了庆贺这一次会见，虽然秋白同志身体欠佳，也破例小饮些酒，下午彼此也放弃了午睡。还有许多说不完要倾心交谈哩，但是夜幕催人，没奈何只得分别了。”

瞿秋白回到家后，兴奋地向杨之华讲了与鲁迅初次见面的经过，并告诉她已邀请鲁迅全家来玩，鲁迅也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 五、回访秋白

一九三二年的夏天，对于一个繁忙的革命者来说是短暂的，很快就到了初秋时节。九月一日，天还未亮，就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的秋雨带走了夏天的炎热，给人一种凉爽的感觉。鲁迅和许广平带着小海婴，冒雨来到紫霞路的谢家回访瞿秋白。秋白正伏案写作，见鲁迅夫妇来访，就从书桌前站起身来，表示欢迎。他让鲁迅和许广平在书桌旁坐下，秋白那堆满文件和书籍的书桌引

起了鲁迅的注意，于是就上下打量起来。这是一张特制的西式木桌，上面是书架，下有抽斗，把上面的软帘式的木板拉下来，就可以像盒子一样，连抽斗也锁起来。这样，如果临时走开，写不完的文件只要拉下木板就不会被别人翻乱了。后来瞿秋白去苏区工作，就将这张书桌寄存鲁迅大陆新村的寓所，现在仍完好地按原貌陈列在上海鲁迅故居的西墙边。秋白边介绍边从桌子里拿出他写的关于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原稿，就语言文字改革和文字发音问题和鲁迅夫妇讨论。因为许广平是广东人，秋白还特别找出几个字来，请她用方言来读，以此验证自己的观点。原来瞿秋白除了文学翻译之外，还做文字研究工作。

两家人坐在一起谈得很热烈，小海婴也像懂得大人的心思似的并不哭闹。不知不觉已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平日，秋白夫妇和谢家一起吃包饭，今天为了招待鲁迅一家，杨之华特意到饭馆叫了几个菜，但等菜送来的时候，大家一嚼，菜却是凉的，而且味道也很差，杨之华心里感到抱歉和不安，见鲁迅毫不在意，仍旧谈笑风生，和蔼可亲的样子，心里安慰了许多。

许广平和杨之华是初次见面，两人又都是女性自然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比杨之华大两岁。一八九八年出生于广州高第街一个“仕宦之家”。祖父曾任浙江省巡抚，父亲庶出。母亲是一个澳门华侨的女儿，懂医道，善诗词。小的时候就敢于向旧礼教挑战，反对裹脚，反抗包办婚姻。许广平刚生下来，因在母亲的肚子上撒了一泡尿，父迷信，说她命硬，会克父母，从此把她寄养在贫穷的亲属家，而父亲则在她生下来的第三天，就与朋友喝酒碰杯，将她许给姓马的一家人。当她十五岁时，说马家来人，以为是对方的父亲，就自己出来，行了一个鞠躬礼说：

“我父亲同你碰杯订亲，但我自己不同意。”父亲大怒，骂着：“出去！出去！”许广平就又行了一个礼，退了出去，事后才知道那人只是马家的一个亲戚。一九一七年十九岁时，她冲出封建家庭，随二哥到北京后又投奔在天津的姑妈。她用出售家藏古画分到的二百元作学费，考入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升入本科，在那里她结识了邓颖超。“五四”运动中主编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九二二年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深造。鲁迅先生是在第二年来到高师兼课的。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女师大风潮成为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许广平置身于学生运动最前列，被校长杨荫榆借女师大评议会名义开除。鲁迅写信鼓励她积极投身革命运动。许广平在六月十二日致鲁迅的信中说女师大风潮风波未平，“五卅”运动的大波又起，对于当前的复杂的斗争，“深感应付无方，日来逢人发脾气……长此以往，将成狂人。”鲁迅在复信中，凭着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告诫许广平：在复杂的斗争中，“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在鲁迅的激励下，许广平又投入到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中去。鲁迅与许广平书信频繁，他们的感情也在日益升华……

鲁迅早年的家庭生活是不幸的，婚事是母亲瞒着儿子私下作主聘定的。妻子朱安比他大三岁，是绍兴城内丁家巷一个富裕之家的女儿，平常里人都叫她“阿安”、“安姑”，是鲁迅叔祖母玉田夫人蓝太太的同族。

朱安是个只知三从四德的旧式女性，她没有上过学，不识字，黑黑狭长的脸，裹着一双尖尖的小脚。一九〇六年，家乡谣传鲁迅在日本娶了日本女人，而且已有了孩子。这在当时十分封建保守的中国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因而母亲假托自己有病拍电报让鲁

迅回家探望，七月，鲁迅接到电报信以为真，急火火地返回家乡。回到了家乡，这时，家里一切都准备妥当，大门口张灯结彩，墙上贴着大红喜字，房子也被粉刷一新，只等婚礼了。鲁迅是孝子，望着母亲的孤苦的面容，想到十年来母亲接连遭到丧夫、失子的痛苦和自己出洋留学给母亲带来的忧伤，他不忍心以自己的婚事再让母亲受到刺激，鲁迅只得忍着内心的极大痛苦，同意完婚。当时鲁迅一夜未睡，眼泪把蓝花被面都打湿了。第二天鲁迅就搬到母亲的房里，睡在母亲床旁的铺床上。这一年鲁迅二十五岁。婚后第四天，就和二弟周作人一起返回了日本。在日本期间，鲁迅没有给朱安写过一封信，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文学活动中去。三年以后，才回到祖国。母亲希望鲁迅能和三年来一直独守空房的妻子朱安团聚。但鲁迅并不想和自己不爱的人一起生活下去。他曾对好友说过：“婚姻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因而，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任教时，虽然节假日也偶尔回绍兴，但每次回家，总是先探望一下母亲，然后就默默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一九一二年五月二日，鲁迅孤单、寂寞和压抑，于是抄校古书、古碑，成了他精神的避难所。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鲁迅把老母亲和朱安一起接到北京，与周作人、周建人一家合居在八道湾。鲁迅与朱安相敬如宾，但在感情上却有着不可跃过的鸿沟。鲁迅单处一宅，一年四季除了两三句话外，和朱安没有什么语言交往，每天早晨，朱安总是照例到他窗前喊：“起床了！”“哼……”里面也照例地答应一声。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她喊声：“吃饭了！”他自己又是一声：“哼……”晚上鲁迅睡觉迟，她睡觉早，她总要问院门关不关，鲁迅则简单回答“关”或“不关”。

鲁迅和朱安，虽然没有任何感情的交流，但她还是尊重和



感谢的。当朱安为他送上一碗热牛奶时，鲁迅就恭恭敬敬地站起身来，站在椅子旁边，等朱安把牛奶放到桌上，鲁迅便欠身点头，连说两声谢谢。鲁迅买回点心来，也是先到母亲房里，让她老人家挑选最喜欢的，然后到朱安屋里，由她挑选中意的，然后才拿剩下的回自己的房里去。

鲁迅和朱安没有感情，有的只是相互关心和尊敬。一九二三年，鲁迅与周作人决裂，准备迁到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去住，临行前征求朱安的意见，问她是否打算留在八道湾，还是随自己到新居，或者回绍兴老家？如果回绍兴，将按月寄钱给她维持生活。朱安是这样回答鲁迅的：

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搬出去，娘娘（太师母）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有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于是鲁迅和朱安一起搬了出去。

这种无爱的婚姻，鲁迅和朱安一直维守着。后来，鲁迅与许广平相恋到同居，他没有和朱安真正离异。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战场”上是斗士，在感情世界里，他也是一位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七尺男子汉。他曾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一个勇士，边战斗，边休息，边饮食，自然边性交。”但是，在四十二岁以前，他仍摆脱不了无爱的恶果，仍在忍受着“没有爱的悲哀”。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一九二三年，一位年轻、活泼、性格开朗的姑娘闯进了他的生活，她就是——许广平。但当时，鲁迅与许广平仅仅是师生关系。直到一九二五年经过女师大风潮的洗礼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才有所突破。

然而，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曾有过一段小小的插曲。

当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消息传出后，青年作家高长虹自以为先于鲁迅与许广平建立了恋爱关系，因此对鲁迅发起了人身攻击，他在《狂飙》杂志上发表了一首题为《给——》的诗来讽刺鲁迅：

人在天涯行走，  
夜做了我的门徒，  
月儿我交给你了，  
我交给夜去消受。

夜是阴冷黑暗，  
月儿逃出在白天，  
只剩下今日的形骸，  
失去了当年的风光。

我在天涯行走，  
太阳是我的朋友，  
月儿我交给他了，  
带地向夜归去。

夜是阴冷黑暗，  
他嫉妒那太阳，  
太阳丢开他走了，  
从此再未相见。

高长虹在诗里以太阳自比，以月亮比许广平，把鲁迅比作黑夜，谴责鲁迅占据了她的恋人许广平。

高长虹是山西孟县人，一九二四年从山西到北京，与友人合办《狂飙》杂志，提倡狂飙运动。后经《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介绍与鲁迅相识，鲁迅对这位颇有才气的青年印象不错。不久鲁迅在北京成立莽原社，主编《莽原》杂志，便邀请高长虹参加编辑和撰稿。一九二五年初，高长虹出版了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许广平曾写信给高长虹，并附了邮票要求购买这本诗集，彼此间还通了八九次信，谁曾想，高长虹却因此以为许广平对他有恋情。于是整天想入非非。当得知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事后，醋意大发，但又无可奈何，于是便写了上面那首诗来咒骂鲁迅。

鲁迅在读了高长虹的诗后，并没有因为他的攻击而退缩，反更加坚定地意识到自己有爱的权利。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了，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

鲁迅虽然勇敢，坚定地回击了高长虹的挑衅和攻击，但他又不能不替许广平着想，自己毕竟有妻室，年龄已近半百，而许广平正值青春妙龄，他不愿她为自己“牺牲”。当许广平察觉到鲁迅的顾虑与痛苦后，就写了一封信来劝解他：

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痛苦的遗产（指朱安——编者）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我们也是

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去做就是了。

关于她自己是不是成为“牺牲”的问题，许广平也明确作了答复：

你“一向常常想到的思想”，实在谬误，“将人当作牺牲”一语，万分不通。牺牲者，谓我们以牛羊作祭品，在牛羊本身，是并非自愿的，故由他们一面来看，实为不合。而“人”则不如此，天下断没有人而肯任人宰割者。倘非宰割，则一面出之维护，一面出之自主，即有所失，亦无牺牲之可言。

听许广平如是说，鲁迅的心里就踏实了。他在给许广平的回信中说：

“我有时自己惭愧，怕不配爱那一个；但看看他们的言行思想，便觉得我也并不算坏人，我可以爱。”

这样，两颗火热、赤诚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许广平在女师大毕业后，南下广州，从事教育和妇女工作。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和鲁迅组织了家庭，一九二九年生下唯一的爱子周海婴。

杨之华也是一位敢说敢作的新女性。她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县坎山街三岔路的一户殷实人家，自幼聪敏好学，而且生性倔强。在家乡，人家的女孩缠足，她却不肯，连外婆也拗不过她，也只得作罢。为了反抗旧礼教，她剃光头、下河游泳、骑自行车。她的这些举动轰动了整个萧山城。“五四”时期，杨之华在杭州浙江女子师范读书，二十一岁时与当时萧山城的名士沈玄庐之子沈剑龙结婚。杨沈两家是世交，幼年时父母就为他们定了亲。

杨之华和沈剑龙结婚的头两年，夫妻感情还好，而且生了一个女儿，取名晓光。但不久，沈剑龙却耐不住小县城的单调的生活，经常出入杭州、上海的舞厅酒吧，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这使杨之华感到非常痛苦和伤心。被誉为“文明的士坤”的沈玄庐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曾主编《星期评论》，他对儿子的行为非常不满。杨之华也规劝丈夫回心转意，那知沈剑龙把杨之华的话当作了耳旁风，仍旧我行我素。杨之华悲愤之下，为女儿改名“独伊”，意即只生这一个，表明对沈剑龙的怨恨与决裂。

一九二三年，杨之华在沈玄庐的支持下，考取了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创办于一九二二年秋。由于师资缺乏，虽然以“提倡新文化”相号召，学生并不满意，于是驱逐了原校长，改请于右任出任校长，时值国共合作，于右任请李大钊商讨办学。于是一大批共产党人进入学校，上大成了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基地。也许是缘分，中共“三大”之后不久，瞿秋白受党的委托担任社会学系主任，主讲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同时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杨之华成了他的学生。一天，瞿秋白第一次给杨之华和班里的同学上课，讲授《苏联新经济政策》，大家对这门课都非常感兴趣，教室里挤满了人，甚至连门口和窗外都站满了人。除了本系的学生外，还有中文系、英文系的学生，肖楚女、恽代英等老师也来听课。瞿秋白讲课时从容不迫，面带微笑。讲的明白透彻，对问题分析得入情入理细致入微，博得了大家的赞誉。对瞿秋白的博学和才华，杨之华从心里佩服。杨之华不仅学习刻苦，而且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很快就成为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同时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协助向警予工作，革命工作使她有机会接触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等领导同志。

一次，鲍罗廷夫妇到上海了解妇女运动情况。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向警予有事不在上海，青年团支部就指派杨之华去向鲍罗廷汇报，而任翻译的竟是瞿秋白。开始汇报时，杨之华显得紧张，瞿秋白发现后，就耐心教她如何回答问题，并启发她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杨之华像是有了依靠，心里平静下来。在秋白的帮助下，她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这以后，杨之华和瞿秋白的接触多了起来。瞿秋白见她工作积极热情，思想进步，就经常找她谈话，鼓励她多为革命事业出力。杨之华有了入党要求以后，瞿秋白就请向警予同志对她进行具体培养。不久，杨之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瞿秋白亲自做她的入党介绍人。

一九二四年七月，瞿秋白结婚仅半年的妻子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病而去世了。当杨之华发现瞿秋白对她爱慕之情时，内心十分矛盾，她虽然和沈剑龙感情破裂，但毕竟还没有脱离关系。于是他一个人悄然回到萧山家里，希望能够妥善解决自己的婚姻关系，没想到瞿秋白竟勇敢地追到萧山。杨之华的哥哥很同情妹妹的难处，于是就出面去找沈剑龙。沈剑龙约杨之华和瞿秋白到家里详谈。两天以后，秋白又把杨之华、沈剑龙接到常州自己家中，三个人又谈了一天，终于达成离婚协议。他们分别时，态度是友好的，彼此都很客气。瞿秋白和杨之华回到上海后，按照协定，在《民国日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三天内刊登了三个启事：一是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关系。”一则是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另一则是瞿秋白、沈剑龙启示：“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这三则启示在当时的上海成为一大新闻，一时传为美谈。后来沈剑龙还照了一张剃着光头、身穿袈裟、

手捧鲜花的六寸半照，赠给杨之华，旁边题有“鲜花献佛”四个字，表达了他诚心成全她与瞿秋白的结合。

杨之华与秋白结合后，觉得很幸福，他们互相爱慕，志同道合，杨之华性情活泼开朗，富于生活情趣；瞿秋白温文尔雅，多才多艺。瞿秋白对杨之华体贴入微，当杨之华念女儿时，他就安慰她，想办法让她去探望孩子，并鼓励她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相同，旧的社会制度窒息了多少人们的心灵呵！但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你的幸福，你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孩子，也一定能够和你的孩子一起生活。”秋白擅长篆刻，他刻了枚“秋之白华”的印章，巧妙将两人的名字连在一起，送给杨之华。

一九二五年春天，瞿秋白陪杨之华去萧山看望女儿。那天到沈家时，天已经黑了。杨之华向已脱离共产党的公公沈玄庐说明来意，他阴沉着脸，冷冷地说：“我不能让你见她。”说完，拂袖而去。还是沈玄庐的大姨太，见杨之华很伤心，平常和她关系也比较好，于是就带她去孩子的房间探望。可是天真的孩子已经不认识她了。杨之华上前一步，搂住孩子：“独伊，我的好女儿，我是你的妈妈。”

“不！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你，一个在上海死掉了。”孩子固执地说。杨之华伤心地掉了眼泪。

回到上海后，杨之华终日惶惶不安，孩子的身影，总在眼前晃动，她决心要让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来。瞿秋白很尊重她的感情。于是陪同她再次去萧山，想办法把孩子从萧山“偷”出来。那天半夜，杨之华和瞿秋白站在路边的一座小山坡上，焦急地等待着，杨之华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她拉着瞿秋白的手，向前眺望。终于

大姨太和保姆带孩子出现在山间的小路上。杨之华飞奔过去，紧紧抱住孩子。他们刚要离开，从沈家追来的两个大汉又把孩子夺了回去。杨之华悲痛不已，秋白也难过的掉下了眼泪。后来，还是杨之华的母亲设法将孩子接到家里玩，才把孩子秘密送到上海，使母女得以团圆。一九二八年，瞿秋白去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杨之华又把独伊带到苏联。休会期间，瞿秋白和杨之华常带独伊到野外去玩，为她采集各种各样的花，拿回来夹在书里做标本，冬天下雪的时候，秋白就带孩子去滑雪，有时为了逗孩子玩就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住脸“哭”起来，这时独伊便叫喊起来：“妈妈，我跌一跤都不哭，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秋白听了，突然放开手大笑起来，一家人沉浸在欢乐之中。

杨之华与许广平怕打扰鲁迅和瞿秋白小声交谈着，谈到深处，两人的眼圈都发红了……

这边瞿秋白和鲁迅一边吸着香烟，一边谈文学。每当瞿秋白说完一段话停顿的时候，鲁迅就微笑着点点头，表示赞同。

从这以后，两家人来往更为密切。过了半个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又到北四川路访问鲁迅。鲁迅留他们吃了午饭才散去。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杨之华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送给海婴金铃子一合，叫呱呱一合，包子一筐。

一天，杨之华将自己的习作短篇小说《豆腐阿姐》，拿给瞿秋白看，瞿秋白高兴地说：“想不到我的爱妻也能写小说了，拿去给大先生看看吧。”因为鲁迅在兄弟中居长。所以，瞿秋白和杨之华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大先生”，听了瞿秋白的话，杨之华感到不好意思，一则是习作，二则是怕打扰鲁迅。她有些惶恐地对秋白说：“这样的东西能拿给大先生看吗？”秋白看出了她的心思，就安慰她说：“不要紧，大先生很乐于帮助人的，特别是初学写作的青年。”



于是杨之华就把习作拿给鲁迅先生看了。

很快鲁迅就把改好的稿子送了回来。杨之华迫不及待地打开用绳子扎的整整齐齐的稿子，鲁迅改得很认真，并且把写错了的字，分别用楷体和草体写在旁边。这件事使杨之华深受感动。

不久，良友公司准备出版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小说集共收十篇作品，其中有两篇是杨之华翻译的绥拉苏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书稿刚刚寄出，还没有得到稿酬，鲁迅便从所得版税中拿出六十元钱交给杨之华，补贴家用。瞿秋白一家生活一直很清苦，鲁迅在和瞿家交往中，总是将稿费之类的钱尽快交到瞿秋白手里，以此缓解瞿家的经济困难。

## 第三章 领导“左联”

茅盾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病中，写了一首《赠丁景唐》诗，其中一句云：“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左联”成立前后的领导干部后来调走的调走，牺牲的牺牲，瞿秋白自觉地担负起领导“左联”的历史重任。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但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尊敬有余，服从不足……

### 一、大论争

一九二七年九月底的广州，天气已不那么炎热。已辞去中山大学教职的鲁迅和陪伴在身边的许广平商量寻求新的生活道路。广州是不能住下去了，中大的恶势力也使他无法容忍。在广州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去北京？“三·一八”时，鲁迅就上了反动军阀的黑名单，到那里很难驻足。而且对许广平来说也不合适，因无爱的婚姻仍然羁绊着鲁迅。

“先到上海暂住吧，看情形再作长远打算。”二人商量决定后，便开始收拾行装。鲁迅生活一向简朴，行李非常简单，最让鲁迅费心的是他的藏书，足足装了十大箱。好在有许广平帮忙，不多日也就收拾好了。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天快要下雨了，鲁迅和许广平乘太古轮船公司“山东”号海轮从广州出发，前往上海。夜半，船抵香港。在香港海面时，鲁迅遭到殖民当局的侮辱。他放在统舱里的书箱，房舱里的提包、提篮等物乃至身上的皮夹，床上的铺盖被身穿绿色制服的警属同胞无理搜查，弄得一塌糊涂，最后还被敲诈了十元。一路上有许广平精心照顾，鲁迅在精神上感到安慰和愉快，望着波浪翻滚的海面和即将开始的新生活，鲁迅几个月以来的郁闷心情终于得到了排遣。经过五天的航行，上海就像一艘永远不沉的巨轮，摇摇晃晃地浮现在眼前。

十月三日，鲁迅与许广平抵达上海。住进了离太古码头较近的共和旅馆。安排好住宿后，鲁迅顾不上海上生活的辛劳，当天就去访北新书局的李小峰夫妇。晚上，孙伏园、林语堂等人来访，一直谈到很晚才散去。

得知鲁迅来到上海，文化界的新老朋友，很快聚集在鲁迅的周围。常去看望他的有：郁达夫、王映霞、潘梓年、孙伏园、许钦文等人。陈望道、叶圣陶、丰子恺、楼适夷、胡愈之等人也和鲁迅交往频繁。在共和旅馆期间的鲁迅，忙于安居相互拜访交际。这些活动，使鲁迅很快了解了上海文化教育界的斗争形势和整个文学界的形势。有许广平的陪伴和众多朋友的热烈欢迎，使鲁迅感到欢欣鼓舞。

十月八日，鲁迅与许广平搬进了横滨路景云里二十三号。从此以后，许广平便以学生、伴侣、战友和助手的身份，伴随鲁迅走过一生中的最后十年。

上海的冬天，很快就来临了。正当鲁迅以极大的热情开始新的生活并准备投入战斗的时候，一场来自革命文学内部的风暴向鲁迅袭来。

十月下旬的时候，创造社的元老郭沫若，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随军到潮汕，失败后经香港回到上海从事文学活动，为了筹划、恢复《创造周报》，找到郑伯奇等人，希望创造社能够联合鲁迅一道工作。

十一月初，郑伯奇、蒋光慈等人拜访鲁迅，把郭沫若的意见转告给鲁迅，鲁迅听了很高兴，当即表示愿意与创造社合作。

创造社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一个文学社团。它的成员以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为核心，包括田汉、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王独清等人，还有一些当时被称作创造社的“小伙计”的黄药眠、潘汉年、周全平、叶灵风等人。出版过《创造季刊》、《创造月刊》、《创造周报》等刊物。创造社在当时是一个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巴金、秦邦宪、陆定一等人都曾为其撰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各地的反动势力大兴党狱，疯狂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他们不畏强暴，毅然决然参加革命队伍，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艰苦的土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同时，许多进步作家和革命的知识青年，从各地汇集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蒋光慈、段可情、黄白薇等也先后来到上海。创造社成了大家活动和临时安身的所在。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创造社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创造周报》复刊的广告。由成仿吾、王独清、郑伯奇、段可情组成编委会，鲁迅、麦克昂（郭沫若）、蒋光慈、冯乃超、张治平等三十多人任特约撰述员。

鲁迅在广州期间，就想和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结成联合战线，从事革命的文艺活动。他曾多次访问开设在昌兴街四十二号的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创造社分部也曾把他们出版的书刊赠给鲁迅。但当时郭沫若随军北伐，成仿吾在黄埔军校任政治

教官。因此，鲁迅原打算和创造社结成联合战线的意图未能实现。但当瞿秋白领导指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暴动失败之后，鲁迅在广州曾和成仿吾等发表过一个重要政治宣言，对军阀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罪行，表示了严重的抗议。这个宣言就是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创造社《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三十期上的《中国文学家对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这篇宣言成为中国革命文学家联合发表的最早的国际性宣言之一。一九四一年，周恩来在十一月十六日《新华日报》上曾撰文说鲁迅和郭沫若“他们在北伐期间，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

正当鲁迅满怀热情、准备投入战斗的时候，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原来，郭沫若制定计划，让郑伯奇等人找鲁迅商谈合作的时候，成仿吾已先期到达日本东京，找到冯乃超、李初梨等人商谈创造社的活动方针。大革命失败以后，在日本的一些留学生，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非常仇恨，对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具有强烈的复仇情绪和对光明的渴望。由于他们受国内第一次“左”倾冒险主义和日本“福本主义”的影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没有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产生了革命急性病的思想情绪，所以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铁生等人从日本回国后，坚决反对恢复《创造周报》，认为《周报》的使命已经过去，应出版战斗性的新型周刊。为了避免创造社的分裂，郭沫若只好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并没有向鲁迅说明，而且把鲁迅看成是“落伍者”来加以批判。

一九二八年一月，创造社在上海出版了一个新的理论刊物《文化批判》，鲜明地提出提倡辩证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文

学的口号，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他们勇敢地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时，没有及时同反革命文学作斗争，而是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挑起了论争，使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历史走了一段短暂的弯路。

太阳社同创造社也有论争，但在“批判”鲁迅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在鲁迅这方面，由于不同意他们的一些片面的观点和小宗派情绪，因此很自然和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展开论争。在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在提倡文学的同时，由于理论上的幼稚和对当时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缺乏真正的理解，因而对鲁迅的战斗作用和工作不重视，抱着怀疑以至于讥笑的态度。

在一九二八年《文化批判》第一期上，冯乃超写了《艺术与社会生活》，文章把鲁迅写成一个时代的“落伍者”，批评他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遁主义”者。接着成仿吾、李初梨等人接连发表文章，错误地指责鲁迅是“以趣味为中心”的“趣味文学家”，并且质问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太阳社的钱杏邨也写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刊载在《太阳月刊》第三期上，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而且颓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颓废文学”，并且宣称要“把阿Q的形骸精神一同埋葬”。

鲁迅读了这些文章以后，感到非常愤慨和痛心。他对好友冯雪峰说：“突然攻击起我来了。”鲁迅一边猛烈地吸烟一边沉思着，如果“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然而，自己并不是“罪孽深重”的人。对

他们的攻击，应该有个交待。于是鲁迅开始反击了，他借用冯乃超所写的“醉眼”一词，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一文，用嘲笑的口吻批评了对方脱离社会实际的空谈习气。后来，李初梨、彭康、钱杏邨、成仿吾等人也都写文章批评乃至谩骂鲁迅。

四月十六日，鲁迅在《语丝》周刊四卷十六期上发表了《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批评创造社、太阳社倡导革命文学的人是“挂了招牌”，“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批评他们的所谓“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以后鲁迅又在《语丝》上以《随想录》的形式，对创造社、太阳社的攻击，给以回击，批评他们是生在“客店里”、“洋人家里”、“书铺子里”、“咖啡馆里”、“空空洞洞”地争论无产阶级文学。并且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中明确告诉读者，他“自信对于创造社，还不至于用了他们的籍贯、家族、年纪，来作奚落的资料”，至于将革命文学的“论战”变成“态度战”，“气量战”，“年龄战”，是由创造社造成的。

五月十五日，所谓的革命艺术家叶灵风，在创造社的另一个刊物《戈壁》第2期上画了一幅漫画，讽刺鲁迅，还在旁边的说明中写道：“鲁迅先生，阴阳的老人，挂着以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装’，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八月份鲁迅也作了一幅喝着咖啡、高谈阔论的图画，形象地批判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人远离革命实践和脱离工农群众。以后，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发生了论争，茅盾、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等也都遭到了不恰当的指责和批评。

鲁迅与太阳社、创造社的这场大论争，造成了革命文学运动内部的严重隔阂与对立。为此，中共中央不得不直接干预要求停

止论争，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一九二八年七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当时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曾指示党中央派去说服创造社、太阳社改变与鲁迅关系的同志：要同鲁迅团结，搞好团结，像小孩子成长，不摔跤是不可能的，一下子希望成熟是不可能的。一次周恩来找到创造社元老郭沫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应该批判新月，不要把矛头指向鲁迅。”郭沫若听了点了点头，深感自己对创造社没有尽到责任。上海党的领导人，对创造社、太阳社的同志指出了攻击鲁迅的错误，李富春也找文艺界的党员谈话，批评了冯乃超他们对鲁迅的错误态度。冯雪峰受党的派遣去向鲁迅做了许多联系与疏通工作。最终促成了鲁迅与太阳社、创造社的联合，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一九二九年上半年，郭沫若、成仿吾都已出国；蒋光慈到日本游历，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唇枪舌剑的论争渐渐的平息下来。到下半年，创造社的冯乃超、彭康、朱镜我对鲁迅的态度开始转变，并开始尊重鲁迅。鲁迅虽然对他们的做法不满意，但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以后和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人也都结成了比较友好的关系。一九三〇年底，由于国民党文化“围剿”封锁书店，使他们生活困难。鲁迅得知冯乃超经济拮据就让雪峰带一些日文养羊一类的小册子，让冯乃超翻译，换取稿费，以摆脱困境。鲁迅还送给冯乃超一本苏联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版画等。对于鲁迅的用心，冯乃超非常感激，每当回忆起这种交情时就有一种幸福感。在那场大论争中，鲁迅对成仿吾的批评是很激烈的，但这里没有丝毫的个人恩怨在内的，也没有影响两人后来成为好朋友。正是在鲁迅的帮助下，成仿吾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与党接上了关系。



一九三一年，成仿吾回国后，党派他到鄂豫皖苏区工作，任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是茅盾的弟弟沈泽民。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张国焘带着四部电台撤到四川去了。苏区与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失掉了联系，为了尽快和中央联系上，一九三三年，沈泽民决定派成仿吾去上海找党中央，报告苏区坚持斗争的情况。十一月初，沈泽民吐血不止，他把成仿吾找来，把给党中央的信用药水写在一件衬衫上，让成仿吾穿在身上，嘱咐他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党中央。成仿吾从红安县出发，组织上派了一个四百多人的护卫团，外加一个四十人的便衣队护送他。沿途在黄陂、孝感一带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才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部队把成仿吾送到京汉铁路附近的一个农民家里以后就返回了。老乡为他买了火车票，又送他上车。到武汉后乘船到上海，他住进四马路的一家小旅馆，当时连病带累，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整天为找党中央接线而奔走。由于白区的工作遭到敌人的破坏，党中央已迁往江西，原来的接头地点已经不能再用了，因为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定，如果接头地点半年不用，就表明发生问题，就自动取消。在上海成仿吾又不能随便去找人，于是就在上海街头上徘徊，遇到熟人就打听一些消息；后来他在报纸上看到国民党在骂鲁迅是“准共产党”，因此就想通过鲁迅帮助和党接上关系。于是他就去内山书店找鲁迅，内山完造见到他，吓了一跳，因为国民党的报上几次谣传他已经死了。成仿吾也不便于告诉他实情，就说在湖南家乡住了几年，最近病得厉害，是到上海来看病的，聊了一阵子，才把话转到正题上来，他问能不能和鲁迅见面？内山说当然能。第二天，成仿吾又来到内山书店，内山完造告诉他，鲁迅约他在某日下午于白俄咖啡馆见面。

到了约定的时间，成仿吾穿着一件旧棉袍子，打扮成一个乡下小学教师的样子，走进咖啡店，见鲁迅先生已坐在那里喝咖啡了，在座的还有茅盾和郑伯奇。郑伯奇与成仿吾是老熟人。茅盾之所以也一同前来，大概是想打听一下弟弟沈泽民的消息吧！四人见面非常高兴。成仿吾问鲁迅：“你能否给我找几个共产党朋友？”鲁迅低声说：“你来得正好，过几天就没有了。”于是成仿吾就把住址和接头的暗号对鲁迅讲了一遍。鲁迅马上就记了下来。鲁迅又问成仿吾还有没有别的事情，成仿吾说没有了，鲁迅没有喝完咖啡就走了。

会见之后，鲁迅对茅盾说：“秋白几天以后就要去江西了，所以我对他说过几天就不好办了。”茅盾表示可由他的夫人去通知杨之华转告瞿秋白，鲁迅自己就不必亲自去了。第二天，上海临时中央内部交通主任高文华就找到成仿吾，对上接头暗号后，成仿吾就把沈泽民用药水写在内衣上的介绍信交给了高文华。高文华按照组织的决定，让他搬到法租界的一个亭子间和一个党内专跑印刷所的交通住在一起，成仿吾和党的关系就这样通过鲁迅接上了。

十二月底，中央向上海中央分局发了电报，通知成仿吾到瑞金报到。于是他便从上海经过汕头到瑞金去了。

## 二、成立“左联”

一九二九年初，创造社、太阳社的刊物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了，许多人被通缉，形势相当紧张，活动十分困难。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已成为比较迫切的问题。

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纵横驰骋，建立了

卓著的功勋。他的崇高威望和赫赫战绩，都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有着重要关系。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间，吴黎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向中宣部干事（中宣部部长是李立三）兼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潘汉年谈了对于革命文学运动的三点意见：一是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革命文化工作者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要闹这个派那个派，争个不休；二是我们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团体，统一和加强党对革命文化运动各方面的领导。潘汉年找到正在帮助鲁迅筹办《萌芽月刊》的冯雪峰，向他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这三方面的人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并说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让雪峰去同鲁迅商谈，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冯雪峰放下手里的工作，马上去找鲁迅。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特别注意尊重、团结和依赖鲁迅，鲁迅在经历了长期的苦闷、探索之后，迅速转变，逐步走向成熟。通过长期的观察和思索之后，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对党非常敬重、信任、拥护和服从。因此，当冯雪峰找到他时，他完全同意建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并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比较明确，旗帜可鲜明一些。潘汉年也去找创造社的冯乃超，太阳社的阿英谈话，交待任务，部署工作。一九三〇年初，潘汉年和吴黎平一起到内山书店与鲁迅会面。见到鲁迅后，潘汉年首先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承认曾经写过对鲁迅不尊敬、不理解的文章，鲁迅听后，连忙阻止他讲下去，并说：“今天你是代表党来找我商量重大问题的，不谈过去你我私人之间的

一切问题。”潘汉年则请鲁迅在组织进步文化界同志的工作上多出力，多指导。最后鲁迅表示对攻击过他的同志谅解，认为他们是好心，只是态度不对，并同意用“左翼作家联盟”作为组织的名字。潘汉年和吴黎平提议开一个会，专门把成立“左联”的事情讲一讲，邀请鲁迅出席讲话。鲁迅十分高兴地表示接受。

一九三〇年二月间，人们可以看到一些穿戴不同的年轻人，经常在下午时，三三两两地走进位于上海北四川路的公菲咖啡馆，坐在那里一边喝咖啡，一边低声地交谈，看起来就像一般的朋友聚会。十几年以后，人们才得知，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联合的左翼作家团体——“左联”就是由那些年轻人秘密发起筹划的。参加筹划的人有创造社的郑伯奇、冯乃超、彭康、沈起予（一说为吴黎平）；太阳社的蒋光慈、阿英、洪灵菲、夏衍；鲁迅方面有鲁迅、柔石和画室（冯雪峰）。

公菲咖啡馆是一家由日本人开设的，只有一开间门面的小咖啡馆，反动当局不太注意，便于革命者活动，所以被选作秘密集合的地点。

到了一九三〇年二月十六日，参加筹划成立“左联”的那一些年轻人，又在公菲咖啡馆碰头了。不同的是，这次来的人比较齐，十二位发起人都到了，其中有一位蓄着短胡须头发像刺猬的中年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后来的“左联”主帅鲁迅。在会上，大家推举冯乃超起草了“左联”的《理论纲领》。鲁迅一改以往的幽默，态度严肃起来，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为推进我国的革命文化而奋斗。

春天来了，上海花花世界的红男绿女们很快由冬装换上了春装，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左联”成立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北四川路赛乐安中

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召开了，到会的有三十多人。

中华艺术大学是共产党办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为了公开合法，由陈望道担任校长。学生是一些大革命失败后聚集在上海的进步青年。这所学校没有宿舍，一般学生都走读。“左联”成立这天，正好是星期天，学生们都不在学校，所以特别找来一些学生在操场上踢足球，以掩护大会的召开。大会首先推定鲁迅、沈端先、钱杏邨为主席团，然后由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说明，接着由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潘漠华致祝词。会上通过了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在理论纲领中明确指出：“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斗争。”会上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当时鲁迅并没有拿稿子，文章是事后冯雪峰根据记忆整理的，请鲁迅看过后发表在“左联”刊物《萌芽月刊》一卷四期上。

“左联”成立大会是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秘密召开的，由于时间限制，还有几位预定发言的人没有来得及讲话，到晚七点钟只得宣布散会。

由于一些人和鲁迅在思想上并未达成谅解，就在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的当天，到会的人中就有不重视和抵触的现象，他们认为鲁迅仍然“没有改变讲的话也是‘老生常谈’不足重视。”以对鲁迅尊敬有余，而服从不足。后来瞿秋白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一文，正确分析评价鲁迅，使一些人对鲁迅抵触的态度得到了转变。

### 三、鲁迅与左翼文化运动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

翼剧作家联盟等革命文化艺术团体也相继成立。鲁迅对美术和戏剧事业都给予过关心和支持。特别是对美术界则投入了更多的心血。因为鲁迅本身就是一位美术爱好者和收藏者。但他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个人兴趣，主要还是为了宣传革命的需要。早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他就写道：“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一九三一年六月，一个被称作“一八艺社”的美术团体在上海每日新闻社内举办展览会，展出了包括油画、木刻、雕塑、图案等作品在内的一百八十余种作品，特别是木刻，则首次在中国的艺术展中露面，因此参观者极为踊跃，这个展览会引起哄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小说家鲁迅为之写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小引》，对展览表示支持和赞誉。文章指出，当时中国美术界已出现两种对立的美术，即压迫者美术和被压迫者的美术，而被压迫者的美术正“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日见生长的新芽”。鲁迅的文章却触怒了西湖艺专当局，为了报复鲁迅，他们说鲁迅是浙江省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的“学匪”，强令展览会将文章从展览会的目录上撕下。鲁迅没有为反动当局的淫威吓倒，反而和“一八艺社”的关系更为密切。

“一八艺社”原本是杭州“国立西湖美术专科学校”的一个学生美术团体，成立于一九二九年，即民国十八年，所以称“一八艺社”。这个社团的一些学生在中共地下党员耶林的带动下经常在一起谈论“普罗”艺术问题，发泄对现实不满的情绪，举办作品观摩会等等。一九三〇年“一八艺社”分裂为“西湖一八艺社”和“一八艺社”两个团体，前者成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团体”，同年八月“一八艺社”的胡一川、姚馥、刘梦莹等到上海参加“左联”办的暑期讲习会并参加美联，成为“普罗”美术团体，

响应鲁迅的号召，开始从事木刻创作活动。这些活动引起了浙江省国民党反动派和艺专训导处豢养的鹰犬们的注意，他们认为是共党分子在背后起作用，所以就以此为借口来逮捕和开除学生。耶林被浙江警方逮捕，出狱后到上海参加“左联”，以后一些被开除的学生来到上海与黄定山、周熙（江丰）等人一起成立了“一八艺社”。由于社址在虹口公园附近，离鲁迅的家较近，所以时间一长，就和鲁迅熟了起来。木刻部的学生们经常能聆听鲁迅先生的教导。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以后，“一八艺社”成为它的公开活动的美术团体。当时冯雪峰代表中国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领导“美联”，经常到“一八艺社”去。鲁迅通过冯雪峰了解了“一八艺社”的情况后，就托冯雪峰送给“一八艺社”一些外文绘画书，表示对艺社的关心与支持。

一九三一年八月的一天，冯雪峰为艺社的人们带来一个好消息，说鲁迅请到了一位日本木刻教师，决定为中国学习木刻的青年办个木刻讲习会，以提高木刻水平。并嘱咐参加的人不宜太多，也不要声张出去，以避免鹰犬们的耳目。由“一八艺社”负责组织工作，召集学员最后选定了来自上海美专、上海艺专、白鹅画会的学生共计十三人。鲁迅亲自出面向郑伯奇租借了一间日语学校的教室，作为上课的地点。在讲习会期间，鲁迅又送给“一八艺社”八册关于版画的书籍，还向内山书店建议寄售日本木刻刀，供学生们木刻用。

木刻讲习会以后，刻木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中国新兴的木刻也由此得到社会进步人士的承认和支持。

后来，“一八艺社”被“一·二八”的战火打散。田汉代表“文总”召集“美联”盟员，其中大半是原“一八艺社”的社员，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店开会，讨论重建“一八艺社”。大家兴致极

高，但一谈到经费问题，就都沉默下来。因为在场的几个“美联”成员都是没有职业收入的穷光蛋，连吃饭、住宿都成问题，哪有钱来办画会。田汉见大家有为难之处，就主动提出由他从稿费中每月拿出二十元作画会的经费。这样一来，经费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于是，一群年轻人便开始筹备画会的工作。他们先向几个经济比较宽裕的艺友凑了一笔钱，在法租界西门路丰裕里四号租下一间房屋，请诗人艾青为画会取名为“春地画会研究所”，这样以“春地画会”名义出现的“一八艺社”又恢复了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春地画会”一些简陋的印刷机器为上海的反日团体，印过多期画报。鲁迅先生曾托冯雪峰向“春地画会”要了一些画报，由于鲁迅的收藏，使这些革命文物得以保存至今。

不久，画会又发生经济困难，冯雪峰得知后，转告鲁迅，鲁迅自愿代替田汉付钱给“春地画会”。

“春地画会”为了配合党发起的“红五月”宣传活动，决定在上海、杭州两地征集木刻和绘画作品，举办展览会。鲁迅提议将自己与德国人合办的德国版画展的作品以及自己珍藏的珂勒惠支的《农民战争》一起展出。展品大多是反映人民大众的苦难、挣扎、呼号和战斗的情景。展览会开幕的当天下午，鲁迅和许广平带着孩子一同来参观。鲁迅站在周熙的木刻《码头工人》前停下来，他的眼前浮现出黄浦江畔码头工人艰苦劳动的情景，接着又看了胡一川的《到前线去》和郑野夫的《五一节》，这些普罗美术作品使鲁迅看到了中国木刻的前途和希望。鲁迅看完展览后，掏出五元钱压在意见簿的下面作为捐款。他对工作人员微笑着说：“总算打出去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是对当时从事革命美术工作的青年们的最大鼓励，也透露出作为哺育青年美术爱好者的鲁迅的辛苦与愉悦交织在一起的心情。展览会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热



情拥护。因此，“春地画会”遭到了敌人的迫害。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三日的一天晚上，“春地画会”的会员和与画会有来往的一些人，正在房间里听世界语教员肖仲云讲课，突然大批中西捕探闯了进来，抓走了包括江丰、艾青在内的十一人。其中一人是敌人早派到画会伪装起来的暗探。经过法院“审理”释放了与此案无关的二人，其余都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刑坐牢。到了年底，江丰、艾青在狱中给鲁迅写信，告诉他，在狱中大家的精神状态和对敌斗争的意志都很好。鲁迅后来谈及此事感慨地说：“说起‘木刻’有时即等于‘革命’或‘反动’，立刻招人疑忌。”被关在巡捕房里的人们，受尽酷刑，美联的主要人吴于海，在地下党帮助下越狱。未出狱的被转移到苏州监狱。

“春地画会”被敌人破坏以后，鲁迅又支持美联筹办“野风画会”。

“野风画会”的地址，在虹口公园斜对面公园坊中，这屋子是当时新建的洋房，租金很贵，但美联为了避免外界的注意，也就租了一幢，房金由研究员平均分担，生活有困难的免收。画会是一九三二年九月成立的，鲁迅拿出数十元作为开办费。为了便于掩护，鲁迅特别请蔡元培写“野风画会”四个字，作为招牌，挂在门口。并对美联的同志说：“你们年轻人真不懂，以后要作掩护工作。”鲁迅自己已经受到敌人的注意，他不顾个人安危，经常提醒青年人，免遭敌人的毒手。

一九三三年，法国《VU》周刊记者绮达·谭丽德女士来华，与史沫特莱、斯诺、宋庆龄交往密切。她同情中国革命，爱好中国进步美术，希望能在欧洲举办一次中国左翼美术作品的展览会。因此，她专门拜访了鲁迅先生，请他无论如何替她搜集一批进步的艺术作品带到法国、苏联展览。鲁迅答应了她，于是委托陈烟

桥等人，分头搜集，并再三嘱咐“要注意保密，防遭破坏”。陈烟桥找到张望和张晋之，对他们说：“我们‘美联’必须全力以赴来完成这项任务，要揭发中国的黑暗社会……”当时陈烟桥就带走了张望的两幅作品——《中国的统治人物》和《贪病之中》。而《中国的统治人物》这幅作品是在鲁迅的亲自关心指导下创作完成的。一九三三年十月的一天，张望带着作品的草图到内山书店去向鲁迅请教。鲁迅坐在藤椅上，一边吸烟一边看着草图。那上面画的是：中国反动头子戴礼帽，披头篷，双手抱着一堆杀人武装，脚下踩着死尸骷髅。看完以后，鲁迅笑着说：“意思还好，但一经发表，便要遭殃，还是含蓄些，不要太漫画了……”他弹了一下手中的烟灰，随手从书架上取下日本左翼画家柳赖正梦的漫画集，一边翻一边说：“写实的木刻不要随便使用漫画方法，哪能过分夸张呢？”后来，作者按照鲁迅的意见对作品进行了修改。这幅作品至今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中保存。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个被命名为“革命的中国新艺术展览会”在巴黎的皮尔·活姆斯画廊举行，受到了法国人民的赞扬。后来，展览会的作品又被送到苏联展出，实现了鲁迅的“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的战斗策略。参展的作品在欧洲转了一圈以后，又回到了鲁迅手中，这些历史的见证，现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

#### 四、遵命文学

鲁迅先生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主要是在党领导的，以“左联”为主的革命文学运动中结成的。

一次，鲁迅对冯雪峰说：“弄政治宣传我不行；但写点杂文，

我比较顺手。”他把自己的文章称为“遵命文学”——“不是遵别的命，是遵革命的命。”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上海的战争。上海各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斗争。鲁迅与茅盾、胡愈之、周起应（周扬）、沈端先（夏衍）、李易水（冯乃超）等四十三人联名签署发表了《告世界书》，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地屠杀中国人民，并且反对压迫中国民众反日反帝。这一时期，写下了《“友邦惊诧”论》、《航空救国三愿》、《逃的辩护》、《观计》、《战略关系》等杂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国求荣的反动政策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淞沪战争期间，鲁迅住的房子被日军的子弹击中过，家里也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搜查。为了暂避炮火，鲁迅搬到了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家。

内山完造是与鲁迅联系最为密切的国际友人之一。

一九一七年，三十二岁的内山完造和刚结婚一年多的井上喜美子一起来到中国。在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开办了一个小书店——内山书店。十年以后，鲁迅在这里结识了内山完造。

一九二七年十月的一天，内山书店里一个顾客也没有，内山完造不在店里，内山夫人正和伙计王宝良闲坐。这时从外面走进一位穿竹布长衫、留着小胡子的客人。他先顺着书架一声不响地大致浏览一周，然后又返回来选书。书选得很细，从装帧、书序到目录，以至连内容也大致看了一下，一连选了十几本。他的举动，引起了内山夫人和伙计的注意：从打扮上看，不像有钱人。但又选了这么多书，算起来有五十多元，超过了内山书店一天的营业额。伙计把他选好的书包扎好。那人付了钱，一声不响地走了。

内山夫人用着好奇的目光送客人走出店外。

过了五六天，那位买书的又来到店里。这天，内山完造没有出门，内山夫人就将上次的事情告诉了内山先生。内山先生立即上去用日语与那人交谈，一问才知道那人就是鲁迅先生。经过几次交往以后，鲁迅与内山完造交上了朋友。书店搬到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以后，鲁迅每天都要到书店来一趟，每次都是在下午两三点钟光景。时间一长，鲁迅与内山先生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朋友送了礼品，或者母亲从北京寄来一些食品，鲁迅总要分一些给内山夫妇。内山完造也是一样，如果鲁迅几天不来书店，他就去鲁迅家探望。内山夫人得知鲁迅母亲病了，也赠上绒被一床，两家人亲如一家。

鲁迅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战斗，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全靠内山先生作掩护。鲁迅去书店时，总是坐在外面的一张椅子上，面朝里坐。这样，外面进来的人，只能看到鲁迅的背影，一旦有生人进来，内山完造就及时通知鲁迅避开。鲁迅写好的文章，就由书店代为送出去，朋友的文稿、信件送来时，再由书店转交鲁迅。鲁迅要会见客人，地点也往往选在内山书店或在内山先生的家里。后来，因为白色恐怖，鲁迅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的特约撰述员的职务也被撤销了。这样，他的文章就很难公开发表。内山完造就劝鲁迅去日本小住，以避锋头。鲁迅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还特别写了一封回信：

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上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没有好处……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那地方。

鲁迅在日本侵略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本质看得非常清楚。他不愿意为生活而卖文，更不愿意从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跑到另一个“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去。于是他谢绝了内山完造的好意，决定留在中国，继续战斗。一年以后，日本一位敢于讲真话的作家小林多喜二，在东京被日本特高警察捕获毒打至死。

小林多喜二，是日本共产党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书记。他的文学作品《蟹工船》在中国早有译本。“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他的秘密活动不仅广布于日本劳苦大众之间，而且深入到日本海陆军。因此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畏忌，必欲杀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当日本密探侦得小林多喜二的藏身之所在，警察立即将他逮捕，在押往警视厅的路上，被严刑拷打致死。消息传到中国后，鲁迅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战友们，向日本政府发出了《小林同志事件抗议书》，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杀害小林多喜二的法西斯暴行。由小林多喜二，鲁迅又想到了三年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柔石烈士和那首在花园庄客栈所写的小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是啊！在法西斯掌权，人民不能当家做主的时代，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鲁迅怀着悲痛的心情，以个人名义向小林多喜二的亲属发了唁电。对小林多喜二作了很高的评价。歌颂了中日劳动人民之间的友谊，谴责了日本军国主义

的法西斯暴行。当得知小林多喜二故后，亲属生活艰难，鲁迅又联合文化界的名人陈望道、郁达夫、茅盾、洪深、田汉、叶绍钧（圣陶）、于伶等人发起了募捐慰恤小林君家属的活动。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出版“左联”刊物《文学杂志》上刊登了《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

鲁迅在“左联”工作期间，完全清楚“左联”是中国共产党所倡议和直接领导的，而且也明白党是把“左联”当作直接的对敌斗争的政治团体看待。他虽不是党员，无论在思想和精神上还是行动上都同党保持一致，并且与瞿秋白一起共同承担起对“左联”的领导工作。

## 五、文台两领导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茅盾在病中写了一首《赠丁景唐》诗，其中一句云：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高度概括了瞿秋白和鲁迅在“左联”中的地位与作用。

瞿秋白回到文艺阵地以后，当时党组织并没有交给他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任务，他参与“左联”的领导和决策工作，是出于一种对革命文艺运动的热情和为党的革命事业继续工作的愿望。由于他的建议和正确引导，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化界实行了策略上的转变，即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以便打破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三十年代初期，正是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抬头的时候，因此，作为党直接领导下的“左联”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与中央一致的“左”的错误，他们不顾环境险恶和文化运动自身的特点，经常在节假日、纪念日举行无准备的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张

贴标语，以至组织罢工、罢课等不适当的活动。每逢节假日，在上海、北平等城市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青年人，他们怀里揣着事先写好的传单，在听到一声鞭炮响之后，便将传单撒向天空，巡警吹着哨子跑来，他们就逃走了，来不及逃走的被抓进牢房。这些活动使“左联”盟员受到很大损失，活动和处境更加困难。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瞿秋白与鲁迅都主张用合法的形式，展开斗争，扩大左翼文化阵地。

当瞿秋白从“左联”行政书记茅盾处了解到“左联”存在的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创作等问题时，就提出了要求改进工作的意见。他建议“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要坚持办下去，另外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登创作。茅盾把瞿秋白的意见转告给鲁迅和冯雪峰，他们都非常赞同。后来《前哨》被查禁，就改名为《文学导报》继续出版，瞿秋白、茅盾、鲁迅以《文学导报》为主要阵地先后发表文章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主义文学”作斗争。“左联”还创办了公开的大型月刊《北斗》，由丁玲任主编，刊物克服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号召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作家都来参加。在创刊号上不但有“左联”作家的作品，一些不是“左联”成员的作家如冰心、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等人的作品也在上面发表。瞿秋白更是积极为《北斗》撰稿，对“普罗”文艺运动加以归纳总结。《北斗》共出版了七期，对国民党的官办文艺震动很大。从一九三一年八月起，“左联”盟员的作品都尽可能在商业性的刊物上发表。

对于敌人的白色恐怖，鲁迅十分警惕。他一生有大量藏书。“在上海，月必大量添购书籍”。据统计，鲁迅在上海不到十年的时间就购书五千多册。其中有不少马列著作。为了不使敌人发觉，鲁迅向内山书店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藏书室，存放马列著作和其

它书籍。在藏书室里，沿四周墙壁全是用粗糙厚木板钉成的书架，这些书架很特别，打开是书架，叠起来便是一只只书箱，外面有活门，可加锁，便于搬运。藏书室平时无人居住，门窗紧闭，光线很暗，冬天特别的冷，鲁迅也是在需用书时才到那里去取，阅毕再放回。柔石被捕以后，国民党大搜捕，风声很紧，鲁迅一家到虹口公园附近的花园庄避难，内山完造为防万一，就在鲁迅藏书室的门口钉上一块写着“镰田诚一”的木牌，鲁迅返回后，才将木牌拆下。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鲁迅因去藏书室取书着了凉，回来就病倒了，从此一直不见好转，直到十月逝世。

鲁迅除了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外，对“左”倾路线也非常不满，并且自觉地加以抵制。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为了推行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在爵禄饭店约见了鲁迅。

一九三〇年五月七日这天，上海西藏中路汉口路附近的爵禄饭店里，住进了一位神秘的客人，他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自从进入旅馆的房间，他就没有出过门，人们只能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在窗前走动。已到了夜晚，他觉得有些疲劳，于是就半躺半坐地靠在床上，两手抱在胸前，不一会就陷入沉思：陈独秀太软弱了，大革命就是葬送在他的手里，对于蒋介石就是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在军事上先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然后在全国夺取政权。李立三的眼前出现了红旗和欢呼的人群。

李立三，湖南醴陵人，一九一九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此人性格爽快，办事认真，是个说干就干的人，在湖南读书时就同毛泽东认识，但比毛泽东的岁数小得多。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曾同毛泽东一起去安源搞过工人运动，领导了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记。一九二八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后主持中央工作。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李立三正在编织着的宏伟蓝图。他看了看手表，约定的时间已到。他马上站起身来，打开房门，鲁迅在冯雪峰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李立三为了推行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专门在爵禄饭店约见鲁迅先生。李立三说话不绕圈子，直接了当地提议鲁迅像法国作家巴比塞那公开发表一个宣言，拥护他的政治主张。鲁迅则认为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必须“韧战”、持久战。他向李立三表示不赞成赤膊打仗，应该多采用“壕沟战”、“散兵战”、“袭击战”等战术。李立三见鲁迅不同意发表宣言，就又说：“你是教育界、文化界很有名望的人，写文章，痛骂一下国民党反动派是会起很大的作用的。”

鲁迅深知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应怎样坚决斗争，才能对发展革命力量，对革命的前途有利。他坚决反对“左”的行动。鲁迅吸了一口烟后说：“写一篇文章是很容易的，但是，我在这与反革命斗争的要地，就站不住了。”李立三固执地劝鲁迅：“黄浦江里有外国船，你就上船到外国去嘛”！

“叫我离开这个地方，到外国去，我就写不出文章了，也就无法参加这场战斗了！”鲁迅有些生气地说。李立三见鲁迅不愿写文章，就说：“那就随你的便吧”！会见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后来，鲁迅对胡愈之曾提起过同李立三会见的事。他说李立三告诉他党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请他带队；还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鲁迅回答说：“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的人。”据胡愈之讲，这是鲁迅把当时会见时的谈话内容漫画化了。但是却从侧面表现出鲁迅对“左”倾路线的不满和抵制。

鲁迅在当时清楚地认识到“旧社会的根底是非常坚固的，新的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但鲁迅反对盲目地空喊冲锋杀杀，他在一封信中说：“战斗当前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他主张战斗“费去了许多牺牲，那是无可免的，但白热愈少愈好，我的一向主张‘壕堑战’，就为此！”

一九三〇年二月间，“中国自由大同盟”成立。上海的党中央希望鲁迅做发起人。冯雪峰找鲁迅征求意见，当时鲁迅不大同意这种方式，认为成立就会马上被解散。可他依然立刻答应参加并为发起人之一。二月十三日，“中国自由大同盟”在法租界一个法国教堂里秘密召开了成立大会，通知参加会的人事先都不知道开会的地点，都是单线联系，对了暗号以后，由人带着来到会场的。鲁迅来到会场上，坐在厅堂右手一排大椅子上吸着水烟袋。曾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和话剧泰斗田汉都发了言，感情真挚，言词激愤。而鲁迅则一边一个纸捻又一个纸捻地点着水烟袋，一边认真听着他们的讨论。最后宣布发起人签名时，鲁迅在郁达夫之后签了名。

“中国自由大同盟”成立后，很快就遭到迫害，国民党反动政府声言要捕杀它的发起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发起了澄清南京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为此鲁迅不得不离家到外面暂避几天，但他照样每天译书，写文章，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九日，天气已经热了起来。“左联”为了组织盟员参加第二天纪念“五卅”举行的示威游行，召开了“左联”全体大会。

会议是在银行工会俱乐部里的茶房休息室召开的。开会时的空气很自由，大家分桌坐着，一边喝冷饮、咖啡，一边听大会报

告人讲话，当时“左联”的领导人，忽视作家创作的重要性，认为作家应走上街头去参加示威游行等革命活动。大会通过了全体盟员一致参加“五卅”示威游行，并作了具体安排，把人员编成了几个小队。鲁迅听完大会的决议和安排后，露出一丝苦笑。他放下手中的纸烟，对大家说：“国民党报纸对‘左联’的攻击，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主要是‘左联’的每个成员思想上要坚定。”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鲁迅的话为“左联”敲了警钟，后来正如鲁迅所料，一些投机分子果然经受不住时代的考验，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从“左”边滑下了右边，走向了反面。鲁迅在会上还鼓励大家勇敢地写作，用笔同敌人作斗争。

一九三一年二月初，“左联”五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鲁迅怀着极大的义愤，带领“左联”盟员同反动派作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人主持召开了上海东方饭店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讨论全国的工作，坚持党的六大路线，反对王明集团破坏党的纪律及破坏党的民主，反对四中全会。参加会议的有全总、铁总、上海、江苏及苏区等各方面的代表。当时负责文化工作的李求实在征得罗章龙的同意后邀请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等人一同出席会议。当会开到一半时，工部局的特务化妆成茶房，谎称修理电灯，见里面有共产党就发出信号，于是工部局的巡捕冲了进来，逮捕了所有参加会议的人。

罗章龙本来要在会上作报告，因临时有一个外省的同志找他谈话，未能到会，因此幸免遇难。反动派还同时在其它几个地方进行大搜捕。当时被捕的有党、团、工会、文化小组、外省市及

苏区等七八个组织系统的三十五位同志。后来有人怀疑是王明、康生等人为了排除异己而告的密。因为事先特科的同志曾告知王明，敌人有行动，而王明却借口来不及通知转移而作罢。

事件发生以后，党专门成立了营救委员会，和济难会的同志一起开展营救活动。他们让家属给被捕的同志送东西，在送去的食品中藏着给他们的信。上海国民党反动当局很快探知被捕的人中有李求实、林育南等一批共产党“要犯”，所以南京政府也派要员会同审理此案。十九日上午，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东方饭店一案，当法官宣读了被告姓名和罪状后，龙华警备司令部派来的人就提出要求，强迫法庭将所有案犯引渡到龙华去。主持正义的张横海律师依法提出抗议：凡在租界内发生案件应由地方法院审讯处理，不得任意引渡。因为此案关系重大，别的律师都不敢出庭辩护，张横海一人孤掌难鸣，法官迫于警备司令的淫威，接受了无理要求。被告二十三人在高呼反对无理引渡的口号中，一个个被送上囚车，押往龙华监狱。龙华是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的魔窟，一旦进去就很难出来。

柔石被押往龙华监狱以后，非常关心鲁迅的安危。因为他在被捕时身上带有鲁迅前一天晚上抄写的给明日书店的“合同”，被敌人发现以后，以此借口盘查鲁迅。柔石为了鲁迅的安全，通过他的同乡好友在沙逊大厦慎昌钟表行做事的王育和转给鲁迅一封信，信是用铅笔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的记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的地址，但我哪里知道。诸望勿念。

祝好！

赵少雄 一月二十四日

柔石写这封信的目的，一则是表示自己绝不会牵连鲁迅，二则是让鲁迅提高警惕。在信的背面，柔石还写了向鲁迅索要的东西：“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转交赵少雄。”

二月五日柔石又通过王育和转来一封信：

清溪兄：

在狱已半月，身上满身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堂清肿，使我每见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们设法：大先生能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须赎款，可与家兄商量。总之。望设法早日使我俩早日脱离苦海。下星期三再来看我们一次。借钱给我们。丹麦小说请给先生卖给商务。祝你们好！

雄 5日

信中的“清溪”即王育和；“大先生”指鲁迅；“蔡先生”指在国民党任职的蔡元培。鲁迅收到柔石的信后，一面设法筹款营救，一面牵挂着洋铁饭碗是否收到？天气寒冷，柔石等人有没有被褥……

从龙华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越来越坏。

由于这次被捕的人中间有各界的重要人物，一些“中央要人”便通过关系向蒋介石说情保释。蒋介石恼羞成怒，手谕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立即将全部案犯活埋。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夜晚，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数重铁门被打开，看守长带着大批武装士兵，冲进牢房，将柔石等人押解出看守所的弄堂，来到一个预先挖好的深坑旁，柔石等二十三人被集体枪杀于龙华司令部内荒地

上，尸体就地掩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据司令部附近的居民说，从监狱里传出“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震四邻，直至枪声响过才停止。那悲壮的呼喊声，使人们久久不能入睡。

消息传出后，鲁迅先生怀着对国民党反动的仇恨和对烈士的怀念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左联”立刻发出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和《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同时，出版机关杂志，把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大屠杀的真相昭告全国和全世界。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左联”准备出版机关杂志，并把这第一期定为“纪念战死者专号”。当时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要出版这样一本刊物是相当困难的，一般印刷厂都不敢承印，因为一旦暴露，立刻会招来杀身之祸，雪峰托好友谢旦如找到一家小印刷所，请几个进步工友帮助秘密排版，排好后不打纸型，不浇版，就用铅版在脚踏印刷机上印刷，用道林纸印的。“左联”五烈士和宗暉烈士的遗像是楼适夷同志一幅一幅地贴上去的。鲁迅亲笔写下了刊名“前哨”两个大字。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鲁迅、瞿秋白等人根据新的形势，在十一月组织召开“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决议是由冯雪峰起草的，瞿秋白参与讨论修改，花了不少心血。这个决议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明确了新任务和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指出在文学领域内，必须加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政权的斗争”。决议还一反过去忽视创作的倾向，强调创作问题的重要性。茅盾评价这个决议说：“这个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它标志着一个旧的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左联”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进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

中国的左翼电影事业也是在瞿秋白的关心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我国一九三二年以前的电影公司向来为资产阶级所独霸，充塞银幕的尽是一些神怪武侠、凶杀色情的片子。“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战争以后，民族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广大群众对脱离时代要求的影片非常不满，影院里的观众日益减少。一九三二年春夏之交，上海明星公司老板周剑运迫于形势的压力，想找几位有名气的左翼作家做他们公司的剧本顾问。当时在要不要去的问题上，一些同志有顾虑，大家的意见不统一，情况反映到瞿秋白那里。瞿秋白建议派人进入电影界，利用电影这种拥有广大群众的艺术形式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他在会上对大家说：“我们自己应该有电影场，可是现在还有困难。将来一定会有”。对于明星公司的邀请，瞿秋白笑着对阿英说：“既然请上门来，我们为什么不去？利用一切条件开展工作，打基础”。这样，夏衍、阿英、郑伯奇三人接受了明星公司的邀请，做了该公司的编剧，当年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由夏衍负责。

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下，电影小组非常重视电影剧本的创作，相继为“明星”、“艺华”、“联华”等影业公司写出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剧本，如夏衍的《狂流》、田汉的《三个摩登女性》、《民族生存》、阳翰笙的《中国的怒潮》等。这些影片以新的题材、新的内容和新的艺术形式反映社会生活的时代面貌，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民族革命斗争。

瞿秋白嘱咐党派到那里去的同志说：“去那里，认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不要急于求成。”根据瞿秋白指示，

夏衍加强了各个影片公司的创作力量，同时进行了输送干部的工作，把以“左翼剧联”盟员为主的许多新文艺工作者，陆续介绍到各个影片公司中去，如沈西苓、王莹、胡萍、周伯勋、郑君里、舒绣文、魏鹤龄、司徒慧敏等人，都是在这时分别参加到“明星”、“联华”和“艺华”公司中去的。国歌的作曲者聂耳也是这一年进入电影圈的。一九三三年，聂耳由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赵铭彝、田汉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仪式也是在联华影业公司的一间摄影棚里举行的。由夏衍负责监督。宣誓时找不到党旗，就在纸上画了一面来代替。聂耳入党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创作出数十首划时代的音乐作品，开创了我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音乐时代。

瞿秋白还特别重视指导左翼电影理论工作的开展，支持石凌鹤去《中华》做《电影副刊》的编辑，王无尘去《晨报》做《每时电影》的编辑。一九三二年七月又创办了左翼电影工作者自己的理论批评刊物《电影艺术》杂志，在地下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对帝国主义妄图垄断中国电影事业和种种不好的影片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中国左翼电影界所取得的光辉业绩都是和瞿秋白的关心指导分不开的。

鲁迅这一头，也是在争分夺秒的工作着。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中旬，鲁迅的母亲病了，他为探母病，在北平住了半个月。这次北平之行，虽是探亲，但对北方左翼文艺运动却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反动文人也是一次巨大的震动，在他们之间引起轩然大波。

十三日，鲁迅来到北平，仍旧住在西三条的“老虎尾巴”。当鲁迅返平的消息传出去以后，北平的反动报纸就用大号标题刊登“鲁迅卷土重来”的消息。这种诬蔑性的标题对鲁迅的安全很不利，



但他却很坦然，一次在吃午饭时，他对来看望他的人说：“我来了，他们怕我敲破他们的饭碗，其实我只敲了敲他们的碗沿(边)。”他一边说一边用筷子敲了敲自己的饭碗，然后又接着说：“卷土重来”，总还要“卷土重去的”。鲁迅的一席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鲁迅来到北平，使反动文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反动派的鹰犬们也害怕得要命，他们到处封锁，禁止鲁迅进行革命活动。尽管如此，鲁迅还是在党领导下的北平“左联”、“教联”中国文化总同盟北方分盟的安排下，作了五次公开讲演，即著名的“北平五讲”。

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一点钟，鲁迅和当时在北大兼课的辅仁大学文学院长沈兼士的陪同下，来到位于沙滩路北的北大红楼。鲁迅身穿藏青色布棉袍，脚上穿着黑色帆布劳动鞋，缓步进入礼堂。礼堂的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当鲁迅与北大中文系主任马裕藻走上讲台时，台下立即爆发出春雷一般的掌声。马裕藻简单地作了介绍之后，鲁迅便开始讲演。

他声音不大，但沉着有力，既严肃，也很风趣。他操着沉重的浙江口音说：“今天来的人很多，不过，不一定是来听我讲演的，恐怕有些人是为看我的脸来的”。台下的学生们都会心地笑了起来。的确，对同学们来说鲁迅的讲演一方面是想从中得到教诲，另一方面也是想一睹鲁迅的风采。

因为听众中大数是中文系的，所以鲁迅也就以文学为题，发表演说。他指出，中国文学可分为两大类：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廊庙文学包括了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因为作者在朝，当主子忙的时候，他就大写诏令、宣言之类的“仅谓皇皇大文”；主子闲下来的时候，他就“谈谈女人，谈谈酒”，给主子解闷。“所以帮闲文学就是帮忙文学”。山林文学的作者则是“下野”的官僚或隐士，

暂时虽然无忙可帮，也无闲可帮，但他们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一旦被主子想起来，就被征聘出山，仍然是高踞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鲁迅用比喻的方法勾画出封建文人的嘴脸，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作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接着，鲁迅结合自己亲身遭受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鹰犬们的迫害，对于帮闲和帮忙文学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帮闲，在忙的时候就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就是帮凶。但他们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

在讲演中，鲁迅还着重提到“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指出他们在“五四”运动时代是革命的，而现在他们不但不敢对社会上的不合理提出批评和抗议，反而压制新文学的发生；所以他们也就变成帮忙兼帮闲，鲁迅巧妙的比喻，尖锐的批评，赢得了同学们的热烈的掌声，几十分钟的讲演就这样过去了。鲁迅在热烈掌声中走下讲台。虽然讲演时间很长，但鲁迅仍然精神饱满，丝毫没有疲乏的样子。送行的人很多，鲁迅顾不上同大家打招呼就同马裕藻一同上了汽车，事后大家才知道，鲁迅又赶到辅仁大学去作另外一个讲演了。

二十四日上午，鲁迅婉言谢绝了朱自清邀请去清华讲演，下午同范文澜往女子文理学院讲演，约四十分钟，题目是《革命文学与命文学》。

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师大参加“左联”的几个同学想见鲁迅，但谁也不知道鲁迅的住处。于是王志之同学就去问系主任钱玄同。钱玄同一改以往和蔼可亲的态度，脸一下沉了下来，怒气冲冲地说：“我不知道一个什么姓鲁的。”王志之同学赶紧退了出来，他向等候在门口的同学们低声说：“走！另想办法去。”后来，他们终于打听出，鲁迅的住处，当他们来到鲁迅住所门口时，一

位身穿毛衣、面容慈祥消瘦的老人，手里拿着纸烟，从屋里走了出来，他向同学们连声说：“快进来，外面很冷。”同学们一个一个地被请进那间狭窄的“老虎尾巴”，当他们作完自我介绍后，鲁迅就拿出美丽牌纸烟来招待他们，就好像接待自己的弟子一样，亲切而又毫无拘束。学生们向鲁迅汇报了北方的左翼文艺运动、抗日运动的情况，并就一些学术问题向他请教。鲁迅也认真作了解答，并告诉同学们说如有可能，打算明年到北平住两年，编一部文学史。

告辞的时候，同学们邀请鲁迅到学校讲演，时间定在二十七日上午十点。鲁迅愉快地答应了同学们的请求。二十六日，在北师大“左联”的学生们，就在琉璃厂本校及石驸马大街文学院贴出了通知。

北方冬季是寒冷的，二十六日晚，起风了，鲁迅特意穿上一件厚厚的藏青色棉袍到西皇城根七十九号参加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欢迎会。出席欢迎会的共有二十余人，不仅有左翼各文化团体的代表，而且还包括互济会的代表。在会上，大家对鲁迅的到来，感到欢欣鼓舞，鲁迅依旧用他那亲切沉稳的语调详细介绍了上海文艺界的斗争情况。最后，他还要求北平“左联”纠正关门主义、团结好要求进步的老作家，注意发现和培养新生力量。这些观点和瞿秋白思想完全一致，对北平的左翼文化运动给予了及时的指导。

二十七日上午，呼啸了一夜的大风，仍没有停下来，王志之就和同学们商量，租了一部汽车去接鲁迅。到达时，鲁迅刚吃过早饭，见同学们来了，就穿上一件灰色长袍，见天气不好，就又戴上一顶很旧的呢博士帽，跟着同学们出门了。到学校以后，学生们本来准备让鲁迅先到教员室休息一会，没料到休息室、准备室、办公室、教室都上了锁。同学们发出一阵怒骂，王志之等人

把鲁迅领到学生自治会，很快鲁迅就被学生们包围了，他们欣喜若狂，不住向鲁迅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有人问：“阿Q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有人问：“怎样才能写好文章？”其中有一个学生调皮地问：“周先生，你那顶帽子戴了多少年了？”鲁迅笑着把手中拿着的帽子举起来，对着窗口上伸进来的脑袋说：“这顶帽子么？总和你的年龄差不多吧？”在活泼的青年人中间，鲁迅也显得年轻了。

已到了演讲的时间，但教室的门都锁了，同学们就商量，请鲁迅到风雨操场去。于是鲁迅就顶着北风，在同学们的簇拥下来到操场，人们抬来一张方桌，作讲台，同学们围在四周，鲁迅就站在方桌上，在没有扩音设备的情况下，为同学们作了《再论“第三种人”》的报告。

最后讲演完了，人们还不愿离开，鲁迅走到哪里，学生们就拥到哪里。人们跟着鲁迅在师大校园里慢慢走着，当走到东南楼花圃西侧时，鲁迅望见“三·一八”惨案纪念碑时，又想起了被反动军阀政府杀害的刘和珍烈士。走近音乐堂门前时，鲁迅很自然侧身向西望一望西北楼，那里是他在“高师”中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略》的老地方，自然也引起了她许多往事的回忆。到了大门口，为了安全起见，王志之不得不租汽车将鲁迅送回。途中鲁迅又到信远斋果脯店买了几样果脯准备带回上海去，分送亲友。

鲁迅回到家后，未名社的台静农已替鲁迅买好了回上海的火车票。在和同学们告别时，鲁迅说：“我这次刚到就听有人说：鲁迅又卷土重来了；现在，他们可以放心了，我又卷土重去了。”

“左联”在瞿秋白、鲁迅等的领导下，冲破了“左”的桎梏，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茅盾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当然，鲁迅是

‘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多数对他尊敬有余，服从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与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统治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鲁迅在北平时，远在上海的瞿秋白因为发生“警报”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在环境险恶的情况下，第一次去鲁迅家避难。

## 第四章 避难生活

瞿秋白经常被反动派追捕，当发生“警报”时，他与杨之华曾三次到鲁迅家避难。鲁迅在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秋白一家。瞿秋白与鲁迅朝夕相见，倾心交谈，结成同甘共苦的生死之交。

### 一、第一次避难

一九三二年的冬天，白色恐怖的阴云依旧笼罩着上海。自从顾顺章被捕叛变以后，中共“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同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周恩来亲自部署安排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搬家转移，割断了与顾顺章的所有联系。并派出精干的特工小组对叛徒作了必要的惩罚。

阴险狡猾的叛徒顾顺章没有抓到瞿秋白和周恩来，被特务头子徐恩曾臭骂了一顿后，更加卖力地搜捕党中央的领导人，他搜罗了一些被捕叛党分子布满街头，甚至在电车上、菜场里，也经常有叛徒盯梢。因为顾顺章熟悉从事地下斗争同志们的行动、服装等，所以他又布置走狗去当旅馆、轮船上的茶房，侦察来客，见到重要的随即逮捕，不重要的就盯梢。党的领导同志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中共特科的一名联络员，用秘密的联络方法，向瞿秋白发出“警报”：“有危险！速转移。”

得到“警报”后，瞿秋白并不慌乱。他把未完成的稿件放到一只小提箱里，以便转移到新的地点后继续工作。一些党的绝密文件，不便带在身上，就焚毁掉，以免落到敌人手中，给革命带来损失。瞿秋白一边收拾一边同杨之华商量转移到哪里比较合适。转移到其他领导同志的家中去，万一自己暴露，会牵连别人，显然不能去，住到旅馆去既不安全也无法工作。虽然鲁迅也受到反动派的通缉，但由于鲁迅在文化界的威望，敌人还不敢对他下手。再说一些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决策问题还要同鲁迅商量。“到鲁迅家去”。瞿秋白经过一番思索后，果断地说。杨之华对秋白的意见也非常赞同，商量好以后，瞿秋白和杨之华分头出门，约定好在鲁迅家再碰头。

瞿秋白在街上兜了个圈子，确定没有特务盯梢后，很快就来到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鲁迅家。开门的是许广平，见瞿秋白突然来访，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机警地把他让到屋里。落座以后，许广平告诉瞿秋白，鲁迅不在家，到北京去探望母亲去了。又问杨之华为什么没有一回来。瞿秋白说叛徒认识杨之华，有特务盯梢不好摆脱，所以分头走。许广平为瞿秋白端来一杯热茶，让他暖和一下。瞿秋白喝着茶对许广平说：“恐怕要住一段时间。”许广平说她会安排好的，而且鲁迅也快要回来了。

两人说了一会话，许广平看了看表已经很晚了仍不见杨之华到来，就有些焦急地问秋白：“会不会是出事了？”瞿秋白虽然也为杨之华担心，但不宜在许广平面前表露出来，不愿给许广平造成心理负担。他说：“不要紧，之华在对付反动派方面是有经验的。”

十一月三十日鲁迅从北平回到上海后，仍不见杨之华，就派

人到街上去找，终于在马路上碰到了。因为是白天，杨之华仍不放心，怕把“尾巴”带到鲁迅家，就对那人说：“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到。”等那人走了以后，杨之华又在街上转了很久，直到天黑，确信没有“尾巴”了，才到了鲁迅家。

晚上，大家聚在一起，都为杨之华的平安归来感到高兴。晚饭的时候，鲁迅拿出绍兴的黄酒请大家干一杯，并对大家说，他在北平时也险遭不幸，反动当局已写好了通缉令，因为是星期天没法盖公章。他买好了火车票，及时离开了险境。当时还有人传，鲁迅在济南被捕。

“现在好了，大家都平安归来，我和秋白在一起就有好戏要唱了。”鲁迅笑着对大家说。

瞿秋白夫妇同鲁迅一家相处的很好，杨之华有空就与海婴及女佣一起说笑，许广平觉得就像一家人一样，瞿秋白与鲁迅聚在一起也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后来，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曾写道：

在这期间，他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简单的家平添了一股振奋人心的革命鼓舞力量，是非常之幸运的。加之以秋白同志的博学、广游、谈助之资实在不少。这时，看到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像电影胶卷似的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更加之以鲁迅对党的关怀，对马列主义的从理论到实际的体会，平时从书本上看到的，现时可以尽量倾泻于秋白同志之前而无须保留了，这是极其难得的机会。一旦给予鲁迅以满足的心情，其感动快慰可知！对文化界复杂斗争形势，对国民党反动派势力的打击，对帝国主义的横暴和“九·一八”东北沦之的哀愁，这时也都在朝夕相见中相互交谈，精心策划。两个人是以旧社会士大夫阶级中背叛过来的



“逆子贰臣”，在尖锐的对敌斗争中，完全成了为党尽其忠诚，同甘苦共患难的知己了。

鲁迅对瞿秋白的生活也非常关心，他特意把自己的写作兼卧室让出来，供秋白夫妇居住和工作。十二月七日这天，瞿秋白坐在鲁迅的写字桌前，望着窗外的冬景，忽然想起了十几年前在北京时写的那首旧作来：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他展开宣纸，用毛笔把它工工整整地写了下来。回想起当年的苦闷与彷徨，现在来看也许是太消极了。于是他又在旁边加上了一行带有批判性的话：“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犹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署名魏凝。写好后送给了鲁迅。瞿秋白在鲁迅面前敢于解剖自己，足以见得两人的推心置腹。

在鲁迅家居住的时候，每当看到鲁迅儿子小海婴那天真可爱的样子的时候，瞿秋白就想到将来革命胜利后，必然会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下一代必须从小就教给他们一些技术知识。有时他也曾想到万一自己遭到不幸，应该给孩子留下点纪念品。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杨之华，两人商量托人到一家大公司买了一盒玩具送给周海婴。

玩具是用铁料制成的，可以组合成各种造型，鲁迅称之为“积铁成象”。秋白见盒内玩具的零件很多，容易散失，就用清丽的笔迹，详细开列了一张全部零件的清单，按顺序写明零件的名

称，各有多少件，连螺丝、螺母的数目也写的一清二楚，附于盒内。

由于这种玩具是舶来品，所以售价极高，当鲁迅收到玩具时，想到秋白夫妇生活不宽裕，心里很不安。

“留个纪念吧，让孩子长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瞿秋白深情地说。鲁迅体会到瞿秋白馈赠的用意，便在不安中收下了这件礼物。

后来由于战乱，鲁迅几次搬家，玩具的盒盖已经遗失，但一些零件仍保存于上海的鲁迅纪念馆。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快要过新年了，党组织考虑到鲁迅一家的安全，就派人到鲁迅家把秋白夫妇接出去。

十二月下旬的一个雨夜，已经十一点多钟了，街上的行人极少，一辆黄包车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行驶着。车上坐着一位头戴铜盆帽、身穿西装大衣的人。帽子压得很低，大衣的领子也被竖了起来，盖住两颊。从外面丝毫也看不出这人的模样来，他就是化名史平、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同志。由于是雨夜，车夫的脚步很快，当车来到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时，史平让车停下，付了车钱后，他机警地向四周环顾了一下，见没有人盯梢，就朝一座三层楼的住宅走去，他沿着楼梯上了三楼，在鲁迅家门口停下，轻轻敲了两下，许广平开了房门，得知是来找瞿秋白的，就客气地将他请到屋里。

由于瞿秋白事先已得到通知，所以东西都收拾好了。两个小包袱放在脚边，一个包袱里装的是几篇稿子和几本书，另一个则装着几件他和杨之华换洗的衣服。

史平问：“还有别的东西吗？”

“没有了。”瞿秋白回答。

“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史平好奇地问。

瞿秋白说：“我一生的财产尽在于此了。”

见瞿秋白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收拾，就要去叫黄包车。这时细心的鲁迅考虑到来人的安全，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车。”于是鲁迅就招呼许广平去叫车了。此时，瞿秋白就把史平介绍给鲁迅。

虽然是雨夜，但鲁迅仍然为瞿秋白夫妇的安全担心，恐怕他们在路上被侦探追捕抓住。

“深夜路上方便吗？”鲁迅问史平，史平看出了鲁迅的担心，就用安慰的口气说：“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来，路上不妨事的。”

一会，许广平回来说车已停在门口。史平就说：“走吧！”于是就帮助杨之华提起一个包袱，先下楼去。走到门口时瞿秋白向鲁迅告别。时间紧迫，瞿秋白顾不上和鲁迅说些客气话，他们二人之间已亲密到了无需客气的地步。瞿秋白只是对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以后就交给××带给我。或是再请史平到你这里拿一下。”鲁迅点点头对秋白说：“今晚上你们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默默地答应了一声，杨之华也和许广平话别。

当他们下了一半楼梯后，回头望望，鲁迅与许广平仍旧站在门口目送着他们，直到下到二层楼梯口时，才听到鲁迅关门的声音。

回到紫霞路以后，瞿秋白就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还托人为鲁迅带去火腿爪一枚。鲁迅十二月二十五日收到后也马上回赠了文旦馅二盒，这一来一往，证明两家人都平安无事，也充分体现了他们相互关心照顾的革命情谊。

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瞿秋白从《申报·自由谈》栏看到当时的资产阶级文人鼓吹所谓“真正快乐的情死，都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等文章后，觉得应该讽刺它一下，于是就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一首打油诗和鲁迅交流，诗是这样写的：

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

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

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资产阶级文人的奇谈怪论作了讽刺。

鲁迅在十二月二十八日收到瞿秋白的信和诗的第二天，也写了两首《教授杂咏》讽刺当时的“京派”钱玄同教授和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

其一云：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曾是斗士，发表过“人过四十，便该枪毙”的激烈言论，后来“功成，名遂，身退”，走上了倒退的路，据说他在北京大学公开表示：“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鲁迅写这首诗对他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其二云：

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

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赵景深由于粗心大意，在翻译文章时将 Milky way 译成“牛奶路”，将 Zentaur 译成“半人半牛怪”，受到鲁迅的讽刺批评。

鲁迅与瞿秋白文笔相似，配合默契，都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好的现象提出批评。

一九三二年的最后几天很快就过去了。新的一年来临了，瞿秋白与鲁迅虽然没有见面，但却书信频繁，在这一年里他们的友谊也随着对敌斗争的不断深入而更加深厚。

不久，由于敌人的破坏，瞿秋白与鲁迅又聚到了一起，他们要作的事情也就更多了。

## 二、第二次避难

一九三三年，瞿秋白三十五岁，鲁迅五十三岁。

年初，日本侵略军进攻山海关，进逼华北，平津告急。蒋介石非但不抵抗，反而加紧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连败孙连仲、吴奇伟等军，取得了黄狮渡大捷，并三面包围抚州。蒋介石一面赴赣布置七省的军事“围剿”，一面加紧在上海搜捕中共领导人。

二月上旬的一天，中国共产党上海中央局得到秘密情报，国民党特务要在当晚破坏紫霞路的一处机关。经过分析，认为有可能是瞿秋白夫妇的住处。大家深感问题的严重，当即决定由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即黄玠然）通知秋白夫妇迅速转移。傍晚，黄文容来到紫霞路，向瞿秋白汇报了险情，告诉他，组织决定他们立即转移到别处去。想来想去，没有合适的地方既可以避难又不耽误工作，黄文容有些着急。这时，秋白果断地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鲁迅那里！”黄文容有些犹豫。瞿秋白充满信心地对他说：“到鲁迅先生那里去，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时间紧迫，不容再作考虑，一时也没有合适的地方。于是黄文容便代表党组织决定，同意瞿秋白立即转移到鲁迅家去。

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雇了几辆黄包车，来到北四川路底的

鲁迅寓所。黄文容快步上前按响了门铃。不一会，门打开了，鲁迅见是一位陌生人，显得有些惊奇，这时瞿秋白走到鲁迅的面前，对鲁迅低声说了几句，鲁迅连忙把大家迎进大门。

一到鲁迅家，瞿秋白与鲁迅就像久别重逢，迫不及待地交谈起来，站在一旁的许广平马上会心地关上房门走开了。

在鲁迅家安顿下来之后，瞿秋白就拚命地工作、写文章。他与鲁迅详细研究了当时的斗争情况和“左联”的工作，交谈时，如果有什么新的想法，需要写出来发表就讲出来同鲁迅商量。后来许广平在追述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时的情景时，曾写道：“他在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来，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由于过于疲劳，秋白在鲁迅家时经常咳血。鲁迅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笑着说：“这是老毛病了，没有关系。”说完就又去工作了。在病中，他编译了《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期间，发生了一件轰动上海乃至全国的大事。二月十六日，英国作家萧伯纳周游世界，在上海作短暂停留。

十六日下午，萧伯纳和夫人乘英国皇后号游轮来到中国。宋庆龄与杨杏佛乘一只海关的小火轮前往吴淞口迎接萧伯纳上岸。上岸后，宋庆龄在家设宴招待萧伯纳，作陪的有伊罗生、史沫特莱、杨杏佛、林语堂、蔡元培和鲁迅。吃完饭大家在一起照了相。然后萧伯纳乘宋子文的汽车，前往福开森路世界学院参加各界名流为他举办的欢迎会。萧伯纳来到会场后，负责接待工作的洪深让大家围成一个圈子，让萧伯纳坐在中间，然后把来宾向萧伯纳

作了介绍。当介绍到梅兰芳时，萧伯纳很有兴趣地问他：“我有一件事，不很明白。我是一个写剧本的人，知道舞台上做戏的时候，观众是需要静听的，为什么中国的剧场反喜欢把大锣大鼓大打大擂起来，难道中国的观众是喜欢在热闹中听戏吗？若是叫英国的小孩子听了，一定会必惊疯的。”面孔长得如女子一般的梅兰芳和婉地回答道：“中国戏也有静的，譬如昆剧，从头到底是不用锣鼓的。”接着大家纷纷提问，萧伯纳也都作了回答。最后，他用演说者应有的声调说了一套表示他不愿意也不预备在上海作什么演讲。他说：“我到这里来，好像是动物园的一件陈列品，你们既已经看见了，我想也不须再多说话了。”萧伯纳很幽默，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鲁迅静默在一旁听着他们的谈话。他想：应该将有关萧伯纳来上海的评论编成一本书，好的、坏的都编进去，让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他。最后，大家向萧伯纳赠送了北平土产和优伶脸谱作为纪念。

欢迎会后，萧伯纳又回到宋庆龄家，此时一大群记者已等在门口，充任翻译的洪深、林语堂对大家说：“请新闻记者公举代表六人进去。”萧伯纳不想让大家失望，在征得女主人的同意后，把所有中外新闻记者都请到院内的草地上去。院里有许多宋庆龄饲养的小白鸽，萧伯纳来到鸽棚前，想去抚摸一下那可爱的小鸽子，小鸽子扑的一声飞走了。接着记者们便提出许多严肃的问题，请萧伯纳回答，要他发表有关远东、中国等时局的看法。萧伯纳照旧用他幽默的语言发表了一大篇谈话，当一位外报记者，听他赞扬苏俄革命的成功，就和他争论起来。宋庆龄站在草地中的石阶前，闭紧着将要笑出来的嘴唇，很有兴趣地听着萧伯纳巧妙的议论，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鲁迅与戴眼镜穿马褂的蔡元培静穆地站在草地一旁，仰头望着天空中的云。

傍晚鲁迅才回家来，他把下午欢迎萧伯纳的情景向瞿秋白作了介绍，并建议与他一起编一本有关萧伯纳在上海的书。

虽然萧伯纳在上海只停留了半天，当晚就去了北京，却轰动了上海的整个舆论界。一夜之间，上海各报刊出现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捧与骂、热与冷，样样都有。如果把这些评论编辑起来出版，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同时，也可帮助秋白夫妇解决一下生活上的困难，对于鲁迅的建议，秋白欣然同意。于是，说于就干，由于杨之华不便外出，就由许广平到街上搜罗“当天出版的各种报刊”。她急火火地跑到北四川路一带，把大小报摊都细细的搜罗一番。很快就买回了一大堆报纸。鲁迅和瞿秋白一边看一边圈定篇目，选好了的就由许广平和杨之华负责剪贴，然后由鲁迅和秋白连夜编辑。鲁迅和瞿秋白分别写了序言和引言。鲁迅在《序言》中说，这本书“是重要的文献”，它“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色各样的面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并对这些人的假仁假意和奴颜婢膝给予讽刺，说他们不过“原是洋大人的跟丁”。关于萧伯纳，瞿秋白写道：“萧伯纳是个激进的文学家，戏剧家。他从资产阶级社会里出来，而揭穿这个社会的内幕。他真正为着光明奋斗。中国的民众并不当他是什么‘革命的领袖’、‘完全的社会主义作家’，更不会当他是偶像。他们认识他现在是世界的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在谈编辑这本书的目的时，秋白说：“我们只不过是要把萧的真话，和欢迎真正的萧或者欢迎西洋唐伯虎的萧，以及借重或者歪曲这个‘萧伯虎’和种种文件，收罗一些在这里，当做一面平面的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

书编好后，署名乐雯。“乐雯”原本是鲁迅的笔名之一，是由“隋洛文”衍生而出的。这里瞿秋白与鲁迅同用一个笔名，可见他



们的友谊之深，《萧伯纳在上海》一书是他们战斗友谊的见证，三月，鲁迅把书稿交由野草书屋出版，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月下旬，瞿秋白摘译了上海二月二十一日出版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上的一篇文章。定题为《〈字林西报〉之北京通信伪造监狱通信并未证实的事件严刑拷打说毫无根据》，揭露胡适为国民党反动法制辩护的谎言。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由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它的宗旨是争取解放国内的政治犯，向他们提供法律辩护及其援助。调查监狱状况，公布国内剥夺公民权的事实，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上海分盟成立。选出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铨、邹韬奋、林语堂、伊罗生、陈彬和胡愈之九人为执行委员。一月三十日北平分盟成立，胡适当选为分盟执行主席。成立大会时，同盟总干事杨铨到北平主持组盟。第二天上午，与胡适一起参观了国民党陆军监狱。回到上海后，杨铨揭露了监狱的黑暗状况。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政治犯也曾集体致函中国民权同盟，控诉在监狱中备受酷刑的非人生活。同盟的负责人宋庆龄将事实向全世界公布。而胡适却竭力为国民党反动法制辩护，四处发表文章，配合国民党在同盟内部进行破坏。他在对《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中完全否认监狱有施用酷刑的事实，指责来信为伪造，瞿秋白看到以后，马上把文章译了出来。

鲁迅也在密切注视着胡适的言行，他及时致函给北平，委托台静农代寻胡适的反动言论。在洞察了胡适的反动言论之后，瞿秋白与鲁迅就给予有力的反击。

二月十六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中发表了《电的利

弊》。文章从过去中外反动统治者施用酷刑谈起，揭露国民党利用电刑逼供，比历代反动派更为残酷。他说：“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人权同盟每次会议，鲁迅都按时参加，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一起热烈讨论反对白色恐怖。当得知又有人被抓了，被枪毙了，他们就向国民党提抗议，发表宣言。宣言在国内不能发表，他们就请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外国进步记者，用电报在国外发表。鲁迅还参考与营救牛兰、赴德国领事馆抗议法西斯暴行等活动。

一天，瞿秋白与鲁迅闲谈，忽然提起了鲁迅笔下的阿Q，于是就信手在纸上用十个Q的字母组成了一幅阿Q图，还在旁边写上了阿Q经常得意地唱起的那句唱词：“我手持钢鞭将你打！”这幅《阿Q手执钢鞭图》几十年之后才发现，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二月底，党中央在外面为瞿秋白找好了房子，于是黄文容又来到鲁迅家，接秋白了。这样，瞿秋白夫妇依旧提着个小包，在黄文容的护送下，转移到上海临时中央内部交通主任高文华家住去了。

在短短的时间里，瞿秋白就搬了好几家，每一次搬家，情况都非常紧急，鲁迅送给他的许多书籍都因搬家时来不及带走而散失了，就连许广平送给杨之华的一件棉旗袍在一次仓促出走时丢掉了。

情况越来越紧急，瞿秋白走后，鲁迅仍十分惦念他：总是这样搬来搬去的，这怎么行呢？一定得为秋白找一个外人不能打扰的安身之处。于是，鲁迅托内山夫人为秋白夫妇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今山阴路）东照里十二号，租了日本人住家的一个亭子间。

东照里建于一九二〇年。当时建房子的人考虑到房客大多是

日本人，为适合他们的生活习惯，采用仿日式的三层楼建筑，并取名“日照里”后改名为“东照里”。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这天天气晴好，鲁迅和内山夫人一起到东照里去为瞿秋白夫妇看房子。当即选定了二楼朝南的一间二十平米的亭子间。三日，内山夫人为鲁迅送来一盆鲜花，下午鲁迅又去东照里看屋，觉得没有什么差错，这才通知瞿秋白夫妇搬家。大约在四日或五日，瞿秋白搬进新居以后，鲁迅这才松了一口气。

### 三、第三次避难

瞿秋白与杨之华迁进了新居。房子虽小，但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

三月六日，鲁迅便来祝贺新居，细心的鲁迅还把内山夫人送的一盆鲜花作为礼物转送给了杨之华，为狭小的亭子间增添了几分春意。望着室内简单的家具和书桌上堆得满满的书籍、文稿，鲁迅看到了一位职业革命家的艰辛，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由于有了比较安全的生活写作环境，瞿秋白在短时间内就写出了一些战斗性很强的杂文。从三月五日到四月二十四日就写出了以下十一篇文章：

三月五日《王道诗话》

三月七日《申冤》

三月九日《曲的解放》

三月十四日《迎头经》

三月二十二日《出卖灵魂的秘诀》

三月三十日《最艺术的国家》

四月十一日《关于女人》

四月十一日《真假董·吉诃德》

四月十一日《内外》

四月十一日《透底》

四月二十四日《大观园的人才》

由于白色恐怖，瞿秋白不便于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文章，就用鲁迅的名义发表。以上这十一篇文章就是在与鲁迅商讨后，以鲁迅的名义发表的。这些文章同鲁迅的文章一样，像匕首和投枪击中了卖国贼、汉奸、蒋介石、汪精卫、胡适等人的要害。文章不仅战斗性强，而且也显示了瞿秋白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高度的理论水平。

由于文章的观点和鲁迅的观点是一致的，语言和写作手法都同鲁迅相似，所以，别人也都认为是鲁迅的手笔。后来，这些文章也都被收入到鲁迅全集中。

在这期间，秋白与鲁迅还合作选编了第一本介绍苏联版画《引玉集》。其中收录木刻五十九幅，是苏联十一位艺术家的代表作。这些画是从作者板样上印制的，由作者通过曹靖华转寄给鲁迅。鲁迅请瞿秋白翻译了切戈达耶夫的《苏联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面版画》一文，作为《引玉集》的代序。

三月二十一日，鲁迅准备迁居大陆新村。于是托内山完造用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租下了大陆新村九号的一幢房子，并付了房钱四十五两。四月十一日，鲁迅与许广平由拉摩公寓迁入大陆新村九号，这是鲁迅晚年的最后住所。

大陆新村在虹口公园东南方向的山阴路，是由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于一九三一年建造的，共六排，六十一幢。鲁迅住的九号在第一条弄的最后，共有三层，一层房间是会客室，中间摆着黑漆长方西式餐桌，周围是五把靠背椅子，西墙放着书橱和一

架留声机，书橱的上边挂着青年油画家王钧初送给鲁迅的油画《谈（呐喊）图》，南墙靠窗口处放着许广平为鲁迅缝补衣服用的缝纫机。东墙边堆放着海婴的玩具橱、小桌椅等物品。穿过花玻璃的屏风门，是餐室。中间放着八仙桌，四周放着四只圆坐椅。靠西墙角放着双层碗橱和四只圆凳，靠墙放着衣帽架等杂物。鲁迅生活十分简朴，平常的用膳，“不过两三种饭菜，半杯薄酒而已”。

二楼前间是鲁迅的工作室。南窗下放着书桌，书桌边有一把旧藤躺椅，鲁迅经常躺在上面打腹稿，或一边休息，一边阅读报刊。晚上，夜深人静，就到书桌上去写作。鲁迅最后三年半时间在这间工作室里写下了二百八十多篇杂文和翻译了《死魂灵》、《俄罗斯的童话》等外国文学作品。

三楼分前厢房和后房两间，前厢房是海婴的卧室，后房放着简单的卧具、桌椅和书橱，不久，瞿秋白就在这里避难。

由于东照里与大陆新村很近，只隔一条马路，所以，瞿秋白与鲁迅来往更为密切。杨之华在《回忆秋白》一书中对与鲁迅的交往作了生动的描述：

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鲁迅几乎每天到东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我们见到他，像在海阔天空中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温暖的阳光一样。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即改变了不爱说话的心情。两人边谈边笑，有时哈哈大笑，驱走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的不自由的闷人气氛，我们舍不得鲁迅走。但他走了以后，他的笑声、愉快的温暖还保留在我们的亭子间里。

有的时候，瞿秋白也到大陆新村去看望鲁迅。许广平曾回忆说：“有时晚间秋白同志也来便谈一番，老实说，我们感觉少不了这样的朋友。这样具有王义感、具有真理的光芒照射着人们的人，

我们时刻也不愿离开!”

大陆新村附近有一家面包店，晚上，鲁迅和许广平如果想去看望瞿秋白，就买上几个刚出炉的面包，趁热送去，借此机会和瞿秋白夫妇热闹一番。两家人坐在一起，一边吃着热面包一边聊天。鲁迅和许广平见到他们平安无事，心里才安慰，晚上睡觉也觉得香甜了。

鲁迅时刻都在关心着瞿秋白的安危，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鲁迅自己也随时都处在危险之中，特别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以后，由于他经常直接参加对敌斗争，敌人把他视为眼中钉，他的名字已经列在特务的黑名单上，成了被暗杀的对象，只是鉴于鲁迅的声望，敌人一时还未敢下手。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晨，蒋介石指使蓝衣社的特务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下了毒手。在上海法租界亚尔路特务们的罪恶子弹射向了杨铨乘坐的汽车。枪响以后，他用身体掩护同座的儿子，结果儿子幸免于难，杨铨和司机均被打死。鲁迅得到消息后，立即乘汽车飞奔到同盟会本部去了解情况。许广平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着，很晚了也不见鲁迅回来，于是就到内山书店去等候。鲁迅平安地回来了，但心情非常沉痛，许广平和内山完造都对他的安全表示忧虑，鲁迅悲愤地说：“管他呢，就是被杀死，又有什么要紧呢？”“今天的国民党当局，只要是爱国者就都是共产党，就都要加以消灭！”杨铨被杀以后，恐吓的气氛笼罩着鲁迅，然而他从容以对，决定既不搬家，也不外出避居。当时，反动派还传出风声，说要在杨铨入殓这一天暗杀鲁迅和同盟会中其他领导人。当时许多人考虑到鲁迅的安全，都劝鲁迅不要去。而鲁迅还是毫不犹豫地对来访的好友许寿裳说：“实在应该去送殓的。”于是便和许寿裳一起去参加杨铨的入殓仪式，出门时将随身带的家

门钥匙交给了许广平，以示牺牲的决心。

杨铨在鲁迅的朋友中，是交往时间短而友谊深厚的一位。自一九三三年初至杨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仅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们共同为争取人生的权利，同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统治作了坚决的斗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从入殓仪式回来心情非常悲痛，挥笔写下了《悼杨铨》七绝一首：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六月初的时候，冯雪峰由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通讯社，调往江苏省委宣传部，任宣传部长。中央局决定调瞿秋白负责通讯社的工作，主要是审查和修正通讯稿件。在此期间，瞿秋白除了完成日常工作外，还在继续为党报撰写文章。为了工作上的方便，瞿秋白就由东照里十二号搬到了冯雪峰的住处。当时冯雪峰住在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江苏省委机关也设在那里。为了保密，只有一个党内交通员知瞿秋白的住处。住了一个来月，大约在七月八、九日的一天晚上，冯雪峰得到消息。省委机关被敌人发现，牵连到他们的住所，必须马上转移出去。瞿秋白与冯雪峰商定，雪峰先到外面找一个地方避一避，然后再找房子住。瞿秋白夫妇还是去鲁迅家暂避。于是在半小时之内，瞿秋白与杨之华各带一点行李，冒着大雨乘黄包车赶往鲁迅家。

当天晚上，冯雪峰找好住处后，放心不下秋白夫妇，就到鲁迅家去探消息。当他赶到大陆新村鲁迅寓所时，看见瞿秋白与鲁迅正谈得起劲呢，这才放下心来。

这次，瞿秋白只在鲁迅家住了一个很短的时间。由于杨之华调到上海中央局组织部做秘书工作，中央决定仍由黄文容护送瞿

秋白夫妇，转移到上海临时中央机关内部交通主任高文华家里去住。高文华的家是党的负责同志看文件的地方，地点在成都南路的一个小弄堂里。大约在八月底或九月初的一天深夜，又传来“警报”，高文华的家已处在危险之中，瞿秋白夫妇必须连夜撤离。当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瞿秋白和杨之华仍决定到鲁迅那里去。他们各叫了一辆黄包车，由于已是半夜，恐怕途中有人盘问，高文华连忙把睡梦中的女儿叫醒，陪同杨之华一道去鲁迅家。

夜晚，黄包车走得很快，不多时来到大陆新村。为了不引人注意，瞿秋白和杨之华事先商量好分别从鲁迅家的前、后门进去。一阵敲门声惊醒了已经睡下的鲁迅与许广平，听到那不平常的敲门声，鲁迅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要去开门，许广平拦住了鲁迅，她以为如果是特务来抓人，自己可以抵挡一下。她穿衣下床来到门口，当听出是瞿秋白的声音后，才打开房门。瞿秋白挟着一个小包袱，闪身进了鲁迅家。他刚进屋，后门就响起了急迫的敲门声，鲁迅和许广平想：“莫非是敌人跟踪来了？”许广平顾不得多问，就急忙下楼去打听消息。不一会，许广平便带着杨之华和高文华的女儿高平一同上楼来。由于是半夜，敲门声传得很远，东邻住的日本人和西邻住的白俄巡捕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打开窗户向外张望，见平安无事才回去睡觉。一场虚惊过去之后，瞿秋白夫妇都为惊扰了鲁迅全家而感到不安，但鲁迅和许广平像以往一样，热情接待他们，鲁迅还让许广平为瞿秋白夫妇准备了夜餐，都忙完以后，天已快亮了。鲁迅与秋白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战斗生活。

在鲁迅家住了几天之后，高文华找到了别的住处。于是瞿秋白与杨之华就告别了鲁迅住到机关里去了。

一九三三年初，以博古为首的党的临时中央，在白区工作遭



到敌人严重破坏，被迫从上海迁入江西革命根据地后，便进一步在根据地推行他们的“左”倾错误政策。王明“左”倾小宗派主义者，早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就将毛泽东排挤出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第五次反“围剿”前夕，王明控制的上海中央局又一次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起因是由于瞿秋白以杜康的签名在江西瑞金出版的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连续发表了《国民党最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十八篇时评短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瞿秋白的文章是“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员群众的武装”、“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并在《红旗周报》第六十一期上发表社论《白区党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强调批判瞿秋白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作为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社论》还引用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瞿秋白再次受到来自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高压下，瞿秋白被迫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在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之后，瞿秋白仍然保持着乐观主义的革命情怀。他一面工作，一面与鲁迅保持密切的联系，基层的同志谁都看不出他受到的巨大的压力。

一九三三年的冬天来了，瞿秋白不断的有书信和文稿寄给鲁迅。

鲁迅也不断催促出版社尽快出版瞿秋白的译著：《现实主义文学论》、《高尔基论文集》。并于十一月五日给姚克写信，告诉他，秋白所译的《解放了的董·吉河德》一书，不管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何等利害，下月出书。

## 第五章 并肩战斗

当鲁迅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时，有些同志不了解鲁迅，有的甚至以错误的态度对待鲁迅，这使鲁迅感到难过。瞿秋白则了解鲁迅、尊敬鲁迅，把党的正确政策和战友的热情融合为一，热情支持鲁迅。

### 一、短兵相接

“左联”刚刚成立，国民党官方要人纠集上海警备司令部的范争波、侦缉队队长朱应鹏、反动军官黄震遐等一批恶棍、特务、流氓挑出“民族主义”的黑旗，鼓吹“民族主义文学”来抵制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瞿秋白与鲁迅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利用短兵相接的杂文，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揭露反动文人的丑恶面目。他们并肩战斗，展开了同“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和“第三种人”的激烈斗争。

“新月派”即新月社，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胡适是其领袖。主要干将是徐志摩、陈源（西滢）、梁实秋等人。成立之初，它没有自己的刊物，往往是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早在一九二四年，新月社就同新文化运动做过较量，当时

徐志摩翻译了法国颓废派诗人波德莱尔的《死尸》一诗，发表在那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语丝》第三期上，鲁迅看了以后，立即写了《“音乐”？》一文发表在同月的《语丝》第五期上，对徐志摩的谬论进行了批判。照鲁迅的话，这是他“和后来的‘新月派’积仇的第一步”。一九二八年三月，新月派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杂志，在政治上是依附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文化奴才，充当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在文学上否认文学的阶级性，鼓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天才论，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在《新月》创刊号上，诗人徐志摩发表了《〈新月〉的态度》，首先对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发动进攻。他咒骂文坛上尽是一些“功利派”、“攻击派”、“偏激派”、“狂热派”、“稗贩派”、“标语派”和“主义派”，提出了“不妨害健康”和“不折辱尊严”两个口号，用来维护资产阶级文学。当时尽管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正与鲁迅进行内部的论争，在文章中也捎带点了鲁迅的名。但当新月派向无产阶级文学发出了攻击的炮弹时，鲁迅全然没有个人恩怨，毅然挥笔上阵和彭康、冯乃超等革命文学青年一起冲锋陷阵。

彭康在《什么是“健康”与“尊严”》一文中指出他们所谓的“健康”是为统治阶级“挽既倒的狂澜”，他们所谓的“尊严”是在维护资产阶级文人的地位，目的是要铲除发展着的无产阶级文艺，为资产阶级文艺继续存在下去制造舆论。

接着，梁实秋又抛出了《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文章，指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把阶级强加在文学上面。他在《文学与革命》一文中鼓吹“文学家并不表现什么时代精神，而时代确是反映着文学家的精神。”“文学家没有任何使命，除了他自己内心对于真善美的要求的使命”，

“文学家对于民众也不负什么责任与义务”。主张文学应脱离政治。他还认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又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说:“资本家与劳动者人性没有两样,他们都有经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针对“新月派”的理论,鲁迅先后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三篇文章,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批判。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中,鲁迅指出:“新月派”向蒋介石献计,请他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只不过是“刽子手和奴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鲁迅首先揭露梁实秋反对所谓“硬译”,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然后鲁迅又抓住梁实秋所谓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人性并没有两样”的理论进行解剖和批判。鲁迅用了很通俗浅显的例子,揭露了这种共同人性的荒谬。“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阐明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并指出了人性论的虚伪性。当梁实秋读了创造社的冯乃超在《拓荒者》上骂他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文章后,立即着急和伤心起来,他说:“《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狗……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几份杂志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呢”,装出一副受冤枉的样子。鲁迅看了梁实秋的文章后,对冯雪峰愉快地说:“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了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乃

超这人真是忠厚……我来写它一点”。于是鲁迅很快就写了一篇题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杂文交给冯雪峰编进《萌芽月刊》。鲁迅还笑着对雪峰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在文章中鲁迅笔锋犀利泼辣地指出：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实秋的辩白成了他作为“资本家的狗”的自供状，招来鲁迅辛辣的讽刺与批驳。

梁实秋在《“资本家的狗”》一文里还曾辩解说：“我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了……我的职业是教书，劳心，同时劳力，每天要跑几十里路，每天站立在讲台上四小时，每天要把嘴唇讲干，每天要写字使得手酸这大概也算是劳动的一种吧？我不是不想要资产，但事实确没有资产，一无房，二无地，那么，照理说我当然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了……”。

对于梁实秋的辩解，鲁迅讽刺为无人豢养的野狗一类。鲁迅写道：“为确当计，还得添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鲁迅又说，“这名目还有缺点”，“从‘文艺批评’方面来看，就得在‘走狗’之上，加一个形容字：‘乏’”。

当梁实秋的理论被鲁迅批得体无完肤以后，在《答鲁迅先

生》这篇文章里，有意点明鲁迅是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之一，公开为反动派出谋划策，迎合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需要。

一九二九年，胡适也积极配合梁实秋，在《新月》二卷四期上，抛出了《“知难，行亦不易”》的文章。

“知难行易”原是孙中山提倡过的一种学说。后来，蒋介石等人也经常利用这一学说，作为他们反革命的哲学基础。胡适在《新月》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里对于“知难行易”学说加以“批评”，提出了所谓“专家政治”的主张，希望能够参加蒋介石政府。后来，蒋介石果然“召见”胡适，共谋反共反人民的策略，当上海《申报》刊出胡适“谒蒋”电讯后，鲁迅又写了《知难行难》一文，为胡适公开投靠蒋介石画像。

当鲁迅同新月派“短兵相接”的时候，擅长写杂文的瞿秋白当然不会做袖手旁观的看客。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日，他写了《鬼门关以外的战争》，指出“新月派”的文学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绅商文学。这是他领导“左联”和文学革命后写的第一篇文章。以后又写了《非政治主义》、《猫样的温文》等文章批驳“新月派”的谬论。《新月》杂志在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打击下，只出到四卷七期就奄奄一息，寿终正寝了。

瞿秋白、鲁迅率领无产阶级文艺战士打跨了“新月派”，取得了反文化“围剿”第一回合的胜利。

“新月派”败下阵以后，国民党当局的一批御用文人、党棍、特务、军官还在一九三〇年六月一日组成了一个反动的文艺派别“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发表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主要干将有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朱应鹏，上海党部常务委员、淞沪警备司令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范争波，CC特务头目、

上海市政府委员、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反动文人王平陵、傅彦长等。他们的后台老板则是CC特务头子陈立夫、陈果夫。出版物有《前锋月刊》、《前锋周报》、《文艺月报》、《现代文学评论》等。国民党反动派在查禁书报，逮捕进步作家等高压手段不能“剿杀”革命文学的时候，而妄想借用文学的武器来“剿灭”革命文学，因此而组成了这个反动的文艺派别。

国民党反动派在重赏之下，请人起草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宣言叫嚣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将导致我们的新文艺运动永无发挥之日，而陷入必然的倾灭”，攻击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使中国文艺界陷入了“畸型的病态的发展进程中”。因此提出“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的谬论，要把文艺统一于国民党的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封建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中心意识”之中，最终达到“剿灭”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作为国民党官办的法西斯文学团体，“民族主义文学”派是以国民党反动派代言人的姿态出现的。他们公开叫嚷：“民族主义文艺”的“使命”，则是“排除”普罗文艺运动。他们还要“领导整个中国文坛”，“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潮”。但是在这批酒囊饭袋中，却找不出一个像样的作家来。于是少校军官黄震遐披挂上阵了。他以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为题材写成了战争小说《陇海线上》，在《前锋月刊》第五号上发表。瞿秋白和鲁迅看到以后，立即给予回击。针对黄震遐的小说，瞿秋白写了《屠夫文学》和《青年的九月》两篇文章来打击“民族主义文学”的进攻。在《陇海线上》有这样一段描写：“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样样都使人想到法国的‘客军’在非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斗争流血的生活”。瞿秋白在《屠夫文学》中引用了这段话，他指出：“这真是神来之笔！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

扎在陇海线上，居然和法国殖民国家的‘客军’驻扎在非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调。这是不打自招的供状。他们自己认为是‘客军’，而把民众当做野蛮的阿拉伯人看待。这是的确的事实。他们要杀的正是这些‘阿拉伯人’。他们之所以和冯玉祥阎锡山打仗的缘故，也在于争这一口气：‘究竟是你们来杀，还是我们来杀’。因此，打胜了冯阎之后，这支民族主义的军队立刻就去打猎了，打什么猎呢？就是把在战场附近的小老百姓当做野兽，而去打他们了。”

瞿秋白还针对万国安所写“首先出现剿杀‘苏联红匪’”的小说《国门之战》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在文章中指出：

现在，帝国主义的列强和中国各地各派各系的绅商需要战争，需要势力范围，也就是争夺民众膏血的剧烈斗争。现在，中国的红白战争一天天的剧烈，所谓剿匪更是中国天字第一号的要紧事情。而剿杀世界的匪头——尤其是中国绅商的太上皇的意旨。这就更需要杀人放火，更需要战争……因此，中国绅商就定做一批鼓吹战争的小说，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叫做“民族主义的文学”。“自然，民族主义文学更加注重的是：鼓吹屠杀民众的剿匪战争了。首先出现的是剿杀‘苏联红匪’的小说。叫做什么《国门之战》”。

在同“民族主义文学”斗争的那段日子里，瞿秋白的身体很虚弱，有时咳得透不过气来，但一写起文章来就什么都不顾了。夜深了，他房间里的灯依旧亮着，杨之华就端上一杯咖啡或茶，劝他早点休息。瞿秋白爱抚地说：“你先去睡吧，《文学导报》还等着要稿呢”。于是杨之华就坐在秋白的身边，为他打扇子。

鲁迅也是一样，一拿起笔就停不下来。一次，天已经很晚了，



鲁迅仍在聚精会神地写作，许广平悄悄地走到鲁迅身边，将手放在他的肩上，劝他休息一下，鲁迅放下了笔，却满脸不高兴，许广平委屈地走开了。事情过后，鲁迅安慰许广平，耐心地向她解释说：“写开东西的时候，什么旁的事情是顾不到的，这时最好不理他，甚至吃饭也是多余的事。”鲁迅就是这样，用他的笔不懈同敌人斗争着。

很快鲁迅也在《文学导报》上发表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一文，对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进行了剖析。

小说描写到国民党军阀战争中屠杀人民的时候，说他们有一种安南的客军在非洲杀害阿拉伯人的感觉。安南就是越南，越南有一些雇佣军，到非洲去杀阿拉伯人。黄震遐是写中国的军阀之间的战争，可是表现他们杀害中国人民，就像是外国的客军杀阿拉伯人，杀外族人一样。鲁迅指出作品根本是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的，由此也就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文学”的真正货色。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刊物上，也发表了一些表示要抗日的诗歌，如：“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像这样的反法西斯主义文学，鲁迅深刻地指出，“九·一八”以后，他们这种表面上要抗日的大叫大嚷，实际上是要掩盖他们的投降主义。鲁迅还打比方说，好像送葬的时候的军乐队一样。军乐队吹吹打打，是要掩盖死人，使大家接着就忘掉。鲁迅的意思是说这些叫叫嚷嚷要抗日的诗歌，是为了掩盖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的。

黄震遐在《陇海线上》之后，又写了一部诗剧《黄人之血》。编造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统帅黄色人种西去征服“鞑罗斯”。“鞑罗斯”和俄罗斯音相似，也就是说黄色人种要在拔都的统帅下进攻俄罗斯。那么，今天的拔都又是谁呢？鲁迅指出，今天只是

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充当这样的角色，黄震遐的作品，是要中国人民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然后跟着日本帝国主义去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这完全是一种民族投降主义。

鲁迅还揭露黄震遐虽然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无产阶级的苏俄制造舆论，却也掩饰不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的罪行。鲁迅说：“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鲁迅还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对“民族主义文学”的作者们给予嘲讽，他说：“他们的善于‘解放’的名誉，都比‘创作’要大得多。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只令人觉得非常诧异。”这些民族败类，在鲁迅的揭露下，显露出了他们的原形，只不过是一群为蒋介石独裁统治服务的杀人工具而已。

针对“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反苏反共立场，瞿秋白在《青年的九月》中辛辣地写道：“中国的肥头胖脑的绅士，大肚皮的豪商，沐猴而冠的穿着西洋大礼服，戴着西洋白手套的资本家，本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为着保存自己的狗命，为着保持榨取血汗的地主制度资本剥削，为着保卫帝国主义的宝座，现在拚命的在打中国劳动民众的红军，在打中国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民族主义的文艺家对于这种‘神圣战争’，又不知道要怎样的歌颂”。“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蒋介石非但不抵抗，反而调集了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民族主义文学家也为之摇旗呐喊，瞿秋白的文章，有力地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在反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斗争中，瞿秋白还写了《非洲鬼话》、《民族的灵魂》、《流氓尼德》、《狗道主义》等杂文。鲁

迅则写了《沉滓的泛起》、《对于战争的祈祷》等文章。给予那批“拿着屠刀的”所谓的文学家以有力的回击。

“民族主义文学”这股反革命逆流在瞿秋白、鲁迅、茅盾等左翼文化战士的揭露和批判下落荒而逃。

三十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一些作家却提出阶级文学观念是对文学这个纯洁处女的玷污，宣称“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攻击无产阶级文学“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他们挂起了“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招牌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普罗文艺。其主要人物是胡秋原和苏汶。

“第三种人”、“自由人”，与前面两种人不同，他们一不是资产阶级绅士政客、学者教授，二不是上海滩上飘荡的流尸，而是同“左联”有过交往，甚至参加过“左联”的人。他们也曾翻译苏联的文艺著作，并自称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在无产阶级文学迅猛向前发展的时候，这些人，从无产阶级文艺阵营中分化出来，走向了反面。瞿秋白与鲁迅对这些人也进行了严正的批判。

瞿秋白在同胡秋原、苏汶的斗争中，通过冯雪峰同鲁迅交换了意见，分头写了批判文章。秋白写了《自由的文化运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非政治主义》、《红萝卜》等文章，批判了胡秋原的所谓“文艺自由论”的观点，指出：“而事实上，中国的，以及东洋西洋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或者资产阶级，都在用文艺的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你的叫喊，事实上，说客气些，客观上是帮助统治阶级用‘大家不准侵略文艺’的假面具，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秋白在文章中还揭露了胡秋原企图以“自由人”的“知识阶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领

导权的野心。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爆发后，瞿秋白夫妇同谢旦如一家一起搬到法租界毕勋路毕兴坊十号，谢家住在二楼，秋白与杨之华住在三楼，当时，旦如的母亲故世不久，一楼还设有灵堂，杨之华就像亲人一样帮助谢家料理丧事，谢家的亲戚和杨之华的关系很好，对瞿秋白从事秘密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一九三二年二月，瞿秋白发表了《红萝卜》一文。在文章里把“自由人”比做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揭穿了胡秋原假唯物史观。

当“左联”作家批判胡秋原时，曾是“左联”成员的苏汶，自动跳出来在《现代》杂志上发表文章，为“自由人”辩护，自称为“第三种人”。名为第三种人不偏不倚，实则是站在胡秋原一边，对“左联”的理论和活动进行攻击。苏汶的文章，把革命同文学看作是势不两立的，说你要搞文学就得脱离革命，你要革命就得放弃文学。他给“左联”扣上一顶帽子叫“目前主义”，诬蔑左翼文坛只顾目前政治不要文学。他还反对“左联”的大众化主张，认为这会降低文学，把文学变成连环画和唱本，认为你搞大众化就产生不了托尔斯泰和福楼拜了。苏汶的理论是有一定的迷惑性的，因为在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心里，确实存在一种偏见，认为文艺不应该跟政治发生关系。苏汶利用这一思想挑动一些中间作家，向“左联”要创作自由，起到了很坏的影响，所以“左联”有必要同胡秋原、苏汶作斗争。瞿秋白认为“第三种人”言论的实质是彻底否认左翼艺术的艺术价值，从而彻底否认左翼文学的存在。他在文章中指出，“总之，苏汶先生还嫌胡秋原的自由主义不彻底，他主张把一切群众的新兴阶级的文艺运动，一概归到‘非文学’之中去，让文学脱离新兴阶级和群众而自由”。

鲁迅看了瞿秋白的文章后，高兴地告诉冯雪峰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出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就连胡秋原本人也对瞿秋白的批评文章表示佩服。

在同瞿秋白的并肩战斗中，鲁迅写了《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两篇文章。他指出“第三种人”是做不成的：

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

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

鲁迅还揭露了苏汶他们的虚伪性。他在杂文中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接着，鲁迅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这揭露了他们虚伪地提出要脱离现实，以此来掩盖自己阶级的资产阶级面目的人。鲁迅在当时也没有把“第三种人”完全看死，主张对他们要进行分析。后来实践证明，

有的人能够跟随革命前进，有的人则走向反面跑到反动派的怀抱里去。

“左联”成立前后，瞿秋白、鲁迅领导左翼文化战士取得了第三次反文化“围剿”斗争的胜利，在斗争中，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也更加深厚。

当鲁迅看到瞿秋白身体病弱，经济拮据的时候，就送些外文书籍让他翻译，并为他联系提前支付酬金，用来接济他的生活。为了让他们著作得到出版，鲁迅坚决要求合众书店将秋白的译稿《坟》、《莫尔多姑娘》、《笑话》、《不平常的故事》等买下，不然，他的著作《二心集》就不卖给他们。

## 二、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一九三二年九月间，瞿秋白用笔名向茹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了苏联诗人别德讷依嘲骂托洛茨基的诗《没功夫唾骂》。诗的头几句是这样写的：

现在要我来讲托洛茨基，  
那仿佛是要我嚼一双死老鼠：  
这家伙可不是什么有味的东西，  
简直是糟糕透了。  
可是不行哪，尽把老鼠往你嘴里塞，  
一刻儿安静功夫也不给你。

谁曾想这首诗竟招惹出一些是非来，引得“左联”中的一些人，又一次对鲁迅发起攻击。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叫邱九如的同志读了以后，模仿秋白的译诗，创作了一首长诗《汉奸的供状》，

用芸生的笔名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上。诗的本意是讽刺胡秋原和苏汶的，可诗中却充满了“丢那妈”、“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子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等辱骂和恐吓的词句。十一月十五日杂志出版后，冯雪峰拿着刊物找到瞿秋白。瞿秋白认为这是“左”的思想的表现，应该给予纠正。当时秋白正在鲁迅家，就同鲁迅商量，鲁迅也颇有同感，认为这种恶劣的文风应当纠正。于是十二月十日亲自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这就是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上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鲁迅在信中指出在芸生的诗中“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对作者芸生作了中肯的批评，并且耐心教育文学青年应当怎样写文章、怎样用合法的形式同敌人作斗争。

他指出：“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鲁迅给周扬的信，用意是很深的。因为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造谣污蔑共产党和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以此来迷惑人民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战士在用作品同敌人作斗争时，如果再用恐吓、辱骂，就会给敌人以攻击的“口实”，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文章里，鲁迅提出了一个无产阶级战斗的原则：“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

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

在如何从事战斗上，鲁迅常是从实际出发，公开自觉地抵制“左”倾错误，用“合法”的斗争形式同敌人斗争。

由于鲁迅发起和参加“中国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等集会，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党部于一九三〇年三月批准向全国发布了所谓“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通缉令。鲁迅的作品很难发表，于是鲁迅就经常变换笔名，如隋洛文、洛文、乐文、乐雯等等。一九三三年夏天，初学写作的青年唐弢，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几篇杂文，其风格有点像鲁迅的，于是国民党御用文人立即以为是鲁迅的一个化名，就对鲁迅发起了攻击。到了年底，“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请撰稿人吃饭。鲁迅见到了唐弢，互通姓名之后，鲁迅笑着说：“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挨骂哩！”唐弢不好意思地笑了。见唐弢有些发窘，就宽慰说：“那不相干！横竖要骂的，骂鲁迅是‘公事’，不骂就失业了，让他们骂好了”。并告诉唐弢，他曾用过“唐俟”的笔名，所以这回敌人又把唐当成鲁迅了。

尽管鲁迅经常使用新的笔名，敌人发现后，对他文章审查得很厉害。他的作品不断被删改，就连对于求神释佛略有不敬之语，都被删除，一篇描写里弄女工生活的小文《阿金》竟被全篇抽去。对于敌人的文化“围剿”，鲁迅也是有办法对付的。

为了容易通过检查官的审查，鲁迅对作品“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结集出版时，再将原意补上去”。

二十年代时，鲁迅就采用这种方法同敌人作斗争。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在北京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政府门前，进行爱国示威游行和请愿的学生们，遭到军阀政府的屠杀，女



子师范大学的学生领袖刘和珍、杨德群惨遭杀害，学生一共死伤一百五十多人。“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为了掩盖罪行，当日下令通缉所谓的“暴徒首领”五人，接着又传出有四十八人的第二批通缉名单，鲁迅的名字也在其中。四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直鲁联军张宗昌、李景林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联合进攻之下，退出北平。奉系军阀进入北京后，就以取缔宣传“赤化”为名，对进步的文化界人士进行更残酷的迫害。他们封闭了《京报》，逮捕了《京报》经理兼总编辑邵飘萍，并于二十六日将邵枪决。教育界、文化界人士被白色恐怖所笼罩，有的离京避难，有的住进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鲁迅一方面写文章揭露反动当局的暴行，一方面利用“壕堑战术”同敌人战斗。鲁迅先生在《民国新报副刊》上发表了《空谈》一文，痛斥了段祺瑞政府的“阴毒与凶残”，抨击陈源等人的险恶，告诫青年们要从“三·一八”惨案中汲取教训，停止请愿，改变斗争策略。他说：“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这是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因此，继续战斗者应使用“别种方法”。

一九二七年初，鲁迅到了广东，不久就碰上国民党清党。一天清晨，许广平的老家人“阿斗”跑到鲁迅住的白云楼来，报信说：“不好了，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涉到鲁迅的，叫老周快逃走吧！”许广平急忙走到楼下，看到有许多军队正在集合调动，她就叫醒了鲁迅，告诉了他情况。下午，鲁迅冒着雨到中大主持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的学生。这时学校一些负责人，这回却大骂起共产党来，叫嚷应服从国民党的决定，鲁迅据理力争，

没有得到响应，于是他愤然辞职，回到白云楼后气得连晚饭也没有吃，鲁迅的急进倾向是众所周知的，这时便有不少人为探他的“虚实”而去拜访他。鲁迅知道他们来者不善，为了麻痹他们，就滔滔不绝地讲起安特列夫论、陀斯妥耶夫斯基论来，使得那些人如坠云里雾里一般，根本搞不清鲁迅的真正思想动机。后来，有一所由反动当局作后台老板的大学请他去讲演，鲁迅也不拒绝，而是洋洋洒洒地讲了一通魏晋文学的状况之类的问题，这使那些想要从鲁迅口里探明他的态度的人，大失所望。他们没有抓到鲁迅的把柄，也就不好对他下毒手了。

在当时复杂恶劣的环境中，鲁迅深知，要战斗，就必须学会保存自己。所以，他经常告诫青年们，与恶势力斗争，在环境对自己不利时，尤其是恶势力操着生杀大权时，不应该“赤膊上阵”，要学会打“壕堑战”。

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在《文学月报》上发表时，编者还加了按语，肯定了鲁迅的意见，认为“这是尊贵的指示，我们应该很深刻地来理解”。“左联”的许多同志读了以后，都热情支持鲁迅。但当时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左联”中人祝秀侠竟化名首甲，与方萌、郭冰若、丘东平联名，在一九三三年二月《现代文化》第一卷第二期发表《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错误地指责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色彩”，说鲁迅的意见是“文化运动中的和平主义”，“戴白手套的革命论”。鲁迅读后，非常气愤，也很痛心。后来曾在给萧军的信中说：“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我提出质问，结果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

瞿秋白理解鲁迅，热情支持鲁迅。他在一九三二年底和一九三三年初，分别写了《鬼脸的辩护——对于首甲等的批评》和

《慈善家的妈妈》等文，批评芸生、首甲等人的错误倾向，教育他们要认识恐吓和辱骂是不能战胜错误理论的，这等于放弃思想战线的斗争，降低了普洛文艺运动的任务。瞿秋白经过分析论述以后指出：“说‘恐吓决不是战斗’的鲁迅决没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而自己愿意戴上鬼脸的首甲等却的确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鲁迅那封‘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的信倒的确是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的”。

瞿秋白支持鲁迅对当时“左联”中的“左”的偏向给予了纠正。

鲁迅在遭到一些同志的错误的指责时，并没有计较个人得失，一想到有秋白的理解与支持，心里就坦然多了。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同敌人战斗的同时，还非常关心红军和苏区的情况。

当时，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突围去四川，陈赓将军在战斗中负伤，秘密来到上海养伤。他曾给中共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讲了红军反“围剿”时的战斗故事。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送给鲁迅看。鲁迅看后很兴奋，很想以此为题材，写一部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小说。他几次同冯雪峰讲，希望能约陈赓到家里面谈。于是冯雪峰把此事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党也希望鲁迅能把苏区的斗争情况，通过文学的形式反映出来，所以同意陈赓与鲁迅会见。

一天，陈赓在冯雪峰陪同下，来到四川北路鲁迅的家。见到陈赓，鲁迅兴致极高，特别请许广平准备了一些酒菜。陈赓回忆说：“鲁迅先生讲话很少，只是注意的听我谈，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我和他谈到我们反击国民党四次‘围剿’的战斗，谈到苏区人民的生活、文化建设。我记得鲁迅先生当时最关心的就是苏区群众生活，他提了许多问题，例如苏区的土地改革。鲁迅先生是很熟

悉农民的，他听到过去那些屈辱的、受压迫最深重的人们都伸直腰站起来战斗了，他是很兴奋的。他也问到地主怎样进行反抗，人民支援红军的情况。我告诉他：人民怎样亲自送子弟参加红军，那些热烈的参军大会，都使鲁迅先生感到特别新鲜”。鲁迅还特别注意到陈赓介绍苏区人民生活时说，苏区房屋四面都开了窗户，他立即想到这是因为人民生活好了，已经知道注意居住的卫生条件，这是一个进步。

陈赓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当时在上海白色恐怖统治那样残酷的环境里，鲁迅先生不顾危险，一定要找我这样一个被国民党到处追捕的人去他家，也证明了他对红军的关心。”

不知不觉两人已谈了一整天，就是到了吃饭时间两人也是在许广平再次催促下，才去吃的。由于时间已晚，鲁迅就约陈赓改天再来深谈。

楼适夷后来回忆，一九三二年秋有一天，冯雪峰通知他：因鲁迅先生有意写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约一位从苏区来沪养病的负责同志谈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的宣传部决定派他去陪同。并告诉他第二天下午由朱镜我陪那位负责同志到楼适夷家，然后再由楼适夷陪同那位负责同志到鲁迅家去。

当时楼适夷并不知道那位负责同志就是陈赓。到了约定的时间，朱镜我把陈赓交给楼适夷后，交待了几句就告别先走了。按照地下工作的要求，组织上没有交待的问题是不能随便问的。于是楼适夷就把那位身穿灰色呢长袍的负责同志带到了鲁迅家。

两人走进鲁迅的书房兼卧室，也是会客室的房间，鲁迅请陈赓在书桌边坐下，鲁迅自己坐在书桌横头的藤躺椅上，楼适夷则坐到了对面。许广平没有出来接待，鲁迅为他们倒茶。于是谈话马上开始了。当谈到红军以劣势装备战胜强大敌人时，陈赓形容

了红军战士大声呐喊，勇敢投入刺杀的情景，鲁迅高兴得笑了起来，他问道：“是这样的么？”然后点了点头说：“先声夺人嘛”！陈赓还向鲁迅讲了一位老大娘掩护伤员的故事，谈到红军司令员坐在田头和农民一起抽着黄烟谈家常的情况，都引起了鲁迅很大的兴趣。

当谈到鄂豫皖的军事形势时，鲁迅请陈赓在桌上画了一张草图。他一边画一边讲解，鲁迅则探着身子仔细观看。整整一个下午，他一直坐在躺椅上，连身子也没有躺下过一次，始终有兴味地听着，问着，默默地点着头。

屋子里的光线渐渐地暗了下来。傍晚，许广平请大家到厨房旁边的一间小屋吃晚饭，鲁迅亲自打开一瓶保藏已久的三星斧头牌白兰地，大家稍微喝了几杯酒，饭后又闲谈了一回，陈赓和楼适夷才向鲁迅告别。楼适夷和陈赓来到楼下，见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于是就分头返回了。楼适夷顺利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护送任务，但他仍不知道护送的人是谁，直到解放后，他参观鲁迅博物馆，在陈列品中发现了那张鄂豫皖形势图，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护送的那位负责同志就是陈赓将军。

### 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一九三〇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结束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争。但是在当时党内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与鲁迅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时不仅敌人想方设法攻击污蔑鲁迅的作品，而且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对鲁迅认识不够，特别是对于他的杂文，都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尽管都很尊敬他，但并不完全理解他。瞿秋白在和鲁迅相识以后，深深地体会到在白色

恐怖的条件下，要壮大我们党的力量，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开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在这场斗争中也必须有一个带头人，因此秋白选择了鲁迅。他以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高度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从党的政策和革命利益出发，第一次认识了鲁迅的价值，正确评价了他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提出了“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的号召和要求，这在当时对鲁迅和左翼文艺运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瞿秋白三次在鲁迅家避难时，系统地阅读了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以来各个时期所写的杂文和论文，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针对革命文艺阵营内部有些人对鲁迅认识不足的现象，瞿秋白认为有必要为鲁迅辨明是非，给鲁迅一个正确的评价，以促进革命文艺队伍的团结。

瞿秋白与杨之华搬到东照里住下来不久，瞿秋白在征得鲁迅的同意后，决定将鲁迅发表的杂感编成一个集子，系统介绍给读者。他一边选文，一边研究，由于与鲁迅家很近，能经常与他见面，因此，交谈起来很方便。两人在一起时总觉得夜是那样的短暂，鲁迅一面抽烟一面讲他的作品，讲他的人生经历，从“五四”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到且介亭杂文，他那短小精悍的文章，就像匕首和投枪，在向敌人冲锋陷阵时，充分发挥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战斗风格，所以“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来”。在幽默与讽刺中闪耀着鲁迅的智慧与理论的光辉。但他自己却谦虚地说他攻击时弊的文章，没有同时弊一同灭亡，这是他的悲哀。他希望中国进步因而希望自己的杂文“速朽”。

鲁迅的话深深地打动着瞿秋白的心。他在纸上飞快地写着。鲁迅又点燃一只烟，想起几十年来，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走过

的漫长、曲折、艰苦的道路。在历史的风暴中，他奋力搏击，有过胜利的喜悦，也曾有过苦闷和彷徨。经过求索和斗争，终于成了一名具有坚定理想的斗士。特别是近十年来，他觉得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支持着他，这力量的源泉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实际斗争中，他越来越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希望。所以他像党员一样，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在广州时，由于他在文艺界和思想界的重要地位，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的争夺对象，他一到，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就把中共广东区学委副书记徐文雅和中共中大总支书记毕磊找来，要他们做好帮助、团结鲁迅的工作。并说：“当鲁迅对局势有所了解以后，他是自己能够决定何去何从的”。为了迎接鲁迅，陈延年主持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区委、团委、学委的负责人穆青、恽代英、李求实、毕磊、徐文雅等人，在会上陈延年对大家说：“自五四以来，特别是经过‘三·一八’斗争以后，鲁迅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前进的。对国内的军阀统治，是十分不满的，就是所谓国民革命，也早已被他看穿，认为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一回事。国际帝国主义，除在我们身上打主意以外，都不会有好心肠的，他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旗帜，是不断追求真理的，而且最喜欢接近青年，根据这一判断，我们不但应该争取，而且完全可以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的。”表现了党对鲁迅的关怀和信任。

中山大学的朱家骅代表国民党右派企图拉拢鲁迅。他们认为如果鲁迅能“为我所用”，当然要比吴稚晖和陈西滢这样的人有号召力。一月二十五日下午，鲁迅在毕磊等陪同下出席了左派学生组织的欢迎会。朱家骅以国民党中山大学特别党部委员的身份强

行主持了欢迎会，假惺惺地说鲁迅为“战士”、“革命家”、思想先驱、“反封建不妥协者”等等，而三个月以后，他们的凶相就暴露无遗了。鲁迅听了朱家骅的欢迎词后，非常反感，而且马上引起了他的戒备，鲁迅说：“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当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由于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引起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恐慌，一场政治阴谋正在酝酿之中，革命阵营面临着新的分化的考验。在中国革命两种势力的斗争中，鲁迅的立场是鲜明的、坚定的。所以当毕磊这个瘦小而精干的湖南青年，代表党同鲁迅联系时，鲁迅对他说：“在现在，青年们有声音的，应该喊出来了，因为现在已再不是退让的时代。因为说话总比睡觉好，有新思想的喊出来，有旧思想的也喊出来，可以表示他们自己（旧思想）之快将灭亡。”毕磊很快就为鲁迅送来了党的刊物《做什么》和《少年先锋》。

一天，徐文雅来找鲁迅，鲁迅便向他问起陈延年的情况，希望能和他见一面，并亲切称陈延年为“老仁侄”，因为陈延年是陈独秀的儿子，而鲁迅和陈独秀同辈，在“五四”运动时和他又是战友，所以鲁迅这样称呼陈延年。不久毕磊就安排鲁迅同陈延年在广东区委机关秘密会面了。这是鲁迅与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非私人关系的会见，会见之后，陈延年在去上海转汉口参加中共“五大”之前，向徐文雅谈到鲁迅，认为鲁迅思想发展很好，已经是我们的人了。这显然是在和鲁迅会面之后得出的结论。

鲁迅回忆到，一九一八年在北京编《新青年》杂志时，就与李达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后来毛泽东等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李达负责北方区委工作，领导了“五卅”、“三一八”等革命



斗争，鲁迅都积极配合，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以后，鲁迅被反动当局通缉离开北京南下，仍然关心李大钊的安危。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当鲁迅从报上看到李大钊不幸被捕的消息后，忧心如焚，寝食不安。李大钊在就义前，慷慨地公开宣告：“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取得光荣的胜利。”当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牺牲的噩耗传到厦门时，鲁迅悲痛万分。他的眼前总是浮现出那椭圆形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其间还隐约的看见绞首台。后来党发起公祭李大钊的募捐活动时，鲁迅当即捐出五十元大洋，表示对李大钊的怀念和敬仰之情。

在鲁迅的一生中和许多共产党人都有过交往和联系。一九二〇年，陈望道参加创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任《新青年》的编辑，他翻译了中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之后，立即赠给鲁迅一本，得到了鲁迅的好评。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陈望道在上海大学任教务长，鲁迅从北京到厦门途经上海时与陈望道首次相识。一九二七年，鲁迅定居上海后，应陈望道的邀请，曾到复旦大学和江湾实验中学演讲。一九二八年夏天，鲁迅为陈望道等人创办的《大江月刊》撰稿，翻译了法国腓立普的小说《捕狮》和日本片上伸的《北欧文学的原理》，写了一篇杂文《关于粗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间，陈望道在大江书铺任编辑时，又约请鲁迅翻译了卢那卡尔斯基的美学论著《艺术论》。后来陈望道又在鲁迅的支持下创办了《太白》杂志，鲁迅为其撰写了二十多篇文章。在《鲁迅日记》中，有和陈望道有关的记载就有七十余处，足以证明鲁迅与陈望道联系的密切。

鲁迅正是在与这些共产党员的交往中，不断加深对党的了解，

并从中汲取力量。现在瞿秋白又是这样与他朝夕相处肝胆相照，热情理解他，支持他。回首往事，鲁迅感慨万千。和瞿秋白交谈了一整天，烟也吸掉了一包。

晚上，瞿秋白回到家里已经很晚，见杨之华还没有睡，就对她说：“我和鲁迅谈了不少。反复研究了他的作品，可以算是了解鲁迅了。我有心要选编他的杂感，不但因为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且也为着现实的战斗。要知道，形势虽然会大不相同，而那种吸血的苍蝇蚊子，却总是那么多！”瞿秋白既要和鲁迅一起反击敌人对鲁迅的攻击，也要引导革命文化阵营内部的同志和朋友正确认识 and 对待鲁迅和他创作的杂文。

一切准备工作作好以后，瞿秋白就开始编辑工作。他从鲁迅一九一八——一九三二年间发表的杂感中精选了七十五篇编成了《鲁迅杂感选集》。编好后，他就着手为它写一篇序言。但是瞿秋白在东照里的房东，是位泼辣好事的中年寡妇，广东人，住在上海好多年了。在她的房客中有中国和日本的商人，也有一些日本浪人。房东和日本浪人，闲来无事就到瞿秋白家串门，东拉西扯，使秋白无法静下心来写作。于是瞿秋白和杨之华就商量了一个闭门谢客的好办法来。白天，秋白就装病半躺在床上看书，杨之华就在房门口的炉子上一边放哨一边熬汤药，药味充满了整所房子，房东以为秋白真的病了，也就不来打搅了。而那些熬过的药，秋白当然不用喝，杨之华都偷偷地倒掉了。秋白白天专心研究鲁迅的著作，夜深人静时，就伏在一张小方桌上写作，花了四夜功夫，写成了长达一万七千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瞿秋白的这篇序言对鲁迅的杂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概括了鲁迅杂文产生的原因、文学价值、文体特点和战斗意义。他说：“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

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这样的评论无论是在思想界还是文学界都是第一次。以前敌人出于反动立场，不断诋毁、贬低鲁迅的杂文，在左翼作家中，也有不少人对于鲁迅的杂文认识不足。瞿秋白的评论、分析，有力地回击了敌人的污蔑，纠正了同志的误解，对于提高认识鲁迅在思想斗争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在介绍鲁迅本人时，瞿秋白说他“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家都不免要想做青年的新的导师；而诚实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的，却是鲁迅。他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没有自己造一座宝塔，把自己高高供在里面，他却砌了一座‘坟’，埋葬他的过去，热烈的希望着这可诅咒的时代——这过渡的时代也快些过去。他这种为着将来和大众而牺牲的精神，贯穿着他的各个时期，一直到现在，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如此”。对鲁迅的思想品德作了高度的评价。并对几十年来鲁迅的思想发展的历程作了深刻的概括：“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 and 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对鲁迅思想发展历程作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最后，瞿秋白还指出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的主要精神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不仅给鲁迅以正确评价，使人们认识他的伟大，而且有助

于克服左翼作家中存在的缺点，促进左翼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因此，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无论在现代文学史还是思想史上都是第一篇重要文献。

鲁迅虽然有许多党内、党外的朋友，但能够真正理解他、支持他，正确的评价他的，瞿秋白是第一人。他对鲁迅作品以及对鲁迅的精辟的论断，成为人们研究鲁迅的宝贵资料，至今仍有指导作用。

瞿秋白写完这篇长长的序言之后，心里坦然了许多，不然，他总觉得对于鲁迅有什么事情没有作完似的。是啊，几次到他那里避难，鲁迅一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在生活上照顾他。鲁迅送的书都在搬家时失掉了，也该为他的书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瞿秋白在文稿上署上了自己的笔名“何凝”。当他把厚厚的一摞文稿在小方桌上堆放整齐的时候，天空中已露出鱼肚白色，上海的早晨来临了。

就在瞿秋白写完《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后不久的一天下午，秋白和之华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朝他们的房间奔来，接着又是一阵呼呼的敲门声，他俩都大吃一惊，以为是反动派来搜捕，于是急忙把桌上的书藏了起来。秋白用眼色示意之华去开门。门开了，站在门口的是鲁迅先生。见杨之华吃惊的样子，鲁迅就笑呵呵地说：“你不是听惯了我的脚步声吗？这次你听出来了没有？”鲁迅亲切而且喜露着童心的逗趣，使瞿秋白和杨之华紧张的心情马上松弛了下来。家里充满了愉快的气氛。

鲁迅走进房间，在椅子上坐下来，抽着香烟。瞿秋白从桌子的下面取出写好的“序言”来，让鲁迅审看。鲁迅认真地一边看一边沉思着。秋白和杨之华坐在一旁，静静地注视着鲁迅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很久，鲁迅的脸上显露出了感动和满意的神情，香

烟快要烧到手指头，也没有感觉到。鲁迅看完后，秋白就问他有什么意见。鲁迅回答说：“写得太好了，应该坏的地方也提一些。”鲁迅把这篇“序言”不光是看作秋白个人同自己的战斗挚情的体现，而且相信那是代表了党的精神，是党在给他以支持和帮助。许广平在《秋白同志和鲁迅相处的时候》一文中也说过：“党了解鲁迅，秋白同志了解鲁迅。作为旧知识分子不断分析解剖自己严于别人的鲁迅，是党所需要的。秋白代表了党的精神，对鲁迅分析、批评、鼓励写成《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精辟论断，以告世人。”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也说：“鲁迅对这篇《序言》是很看重和赞赏的，表示分析是对的，以前就没有这样批评过，鲁迅说话时候的态度是愉快的严肃的，而且是流露着深刻的感激的情意。”

《鲁迅杂感选集》编好后，由鲁迅交北新书局主持人李小峰以上海青光书局的名义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付印，七月就出版发行了。为了迷惑敌人，秋白在写作地点处，写上“北平”两字。时间是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

那天，鲁迅与瞿秋白谈了很久。鲁迅愤愤地说他恨透了对他们造谣诬蔑的文化特务，厌恶甘当帮闲的苍蝇蚊子，他说：“骂就骂吧，我就是硬骨头，骂不倒我！我就是要用杂文同他们战斗！”瞿秋白见鲁迅身体单薄，敌人通缉鲁迅的风声又紧，就关切地劝他说：“你不是想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吧？那么，就去苏联养养病，做做编写工作吧。”的确，鲁迅早在北京时期就想编一部《中国文学史》，一直忙于战斗，无空来完成这项工作，听了秋白的话，鲁迅满不在乎地说：“要杀就杀吧，我就是不走！况且真要走，那么多的书也无法搬走。”接着他又感慨地说：“你的写作环境比我坏得多，你更应该去苏联养病和写作。”后来，瞿秋白与鲁迅谁都没有离开祖国，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夜已经很深了，鲁迅告别秋白，踏着星光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的心很不平静，秋白在“序言”里的话，还在耳边回响着。回到家里，他坐在写字桌前沉思许久，然后取出纸笔，写道：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这发自肺腑的十六个字抒发了他对瞿秋白一往深情。鲁迅之所以把秋白视为“知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理想、信仰和情怀。他把共产主义者视为知己，也体现了对党的无限敬重的思想感情。不久他把这副对联赠给了秋白。秋白高兴地把它挂在东照里的亭子间里，经常欣赏、沉思。瞿秋白也深知鲁迅与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密切关系，所以对他也倍加敬重和信任，体现了党对鲁迅的关怀与爱护。

瞿秋白在东照里十二号居住期间，仍旧不断受到猎犬搜索、追逐。他到处避难，有时一天迁三四个地方。有时被迫追逐得不得已时，就跳上野鸡的汽车，兜几个圈子，到半路再下来走，到最危险的时候，就去鲁迅家避难。

鲁迅也时时处在危险之中，所以每当和许广平一起上街时，就让她走到马路的对面上去，怕敌人加害于他时和自己一同牺牲。

四月十三日，鲁迅为了瞿秋白生活着想，就写信给北新书局的李小峰，向他谈了给秋白预支稿费的事，鲁迅在信中写道：

《杂文选集》已寄来，约有十四五万字，序文一万三四千字，以每页十二行，每行三十六字版印之，已是很厚的一本，此书一出，单行本必当受若干影响也。

编者似颇用心，故我拟送他三百元。其办法可仿《两地书》，每发行一千，由兄给我百元，由我转寄。此一千本，北

新专在收账确实处发售，于经济当不生影响，如此办法，以三次为度。但此三千本，我只收版税百分之二十。

序文因尚须在刊物上发表一次，正在托人另抄，本文我也须略看一回，并标明格式，星期六不及交出了，妥后即函告。

到了四月二十一日，鲁迅拿到了预支的稿费，立马给秋白送去一百元。

鲁迅不但关心瞿秋白夫妇，就是其他文学青年和革命同志遇到危难时，鲁迅也是尽全力去关心与支持。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失踪。鲁迅得到消息后，立即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蔡元培、杨铨等人多方营救。一个多月过去了仍没有消息。鲁迅知道营救工作是无望的。因为三年前已有柔石的例子可以证明。六月二十六日，鲁迅在给王志之的信上说：“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当局哪里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死还不详。其实，在上海，失踪的人是常有的，因为无名，所以无人提起，杨杏佛也是热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杀，我想，这事也必以模糊了之的，什么明令缉凶之类，都是骗人的勾当，听说要用同样的办法处置的还有十四个”。

由于长时间得不到丁玲的消息，鲁迅认为她是被敌人杀害了。于是悲痛之中就作了一首七绝《悼丁君》，发表在一九三三年九月的《涛声》上：

如磐夜气压重楼，  
剪柳春风导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  
可怜无女耀高丘。

当丁玲的母亲和孩子生活发生困难时，鲁迅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来出版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并亲自安排寄稿费给丁母，直到一年以后，鲁迅才知道丁玲没有死，而是被国民党秘密软禁在南京监狱中。后来丁玲又在鲁迅的帮助下脱离虎口，去了延安。

鲁迅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到黄埔军校演讲时，曾与“湖畔诗人”应修人只有一面之交，但这位性格刚烈的年轻人，却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应修人是“湖畔诗社”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诗集《湖畔》就是由他出资自印的。“五卅”运动后，应修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赴苏留学，一九三〇年回国后，加入“左联”，曾在上海中共中央中事委员会、中央组织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过，并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他与另一同志到了玲寓所联系工作，潜伏在那里的特务突然冲了上来，应修人与特务英勇搏斗，为了不让敌人逮住，他毅然从四楼的窗口跳下，壮烈牺牲。

应修人牺牲后，鲁迅与“左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战友，向国内外发出宣言，抗议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后来伊罗生邀请鲁迅编小说集，在国外出版，鲁迅又将应修人反映苏区生活的《金宝塔银宝塔》一文收入其中。并在《序言》中指出：“新的小说的生存，却总在不断的战斗中……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鲁迅的文章成为对应修人最好的怀念。



## 第六章 告别鲁迅

一九三三年底，瞿秋白奉命调赴苏区，一九三四年一月，一个白雪纷纷的夜晚，瞿秋白和鲁迅、茅盾告别。

### 一、接到命令

瞿秋白离开中央的领导岗位已有三年了。一九三三年底，他接到临时中央来电要他到中央苏区去的命令。

这次调他去苏区主要是负责教育工作。对于这一行，他还是熟悉的，二十年代初在苏联期间，就曾在“东大”做过助教工作，对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比较了解。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又参与党的第一所干部学校上海大学的领导工作，并亲自为学生们开设了社会学等课程。另外他在以前所从事的文学革命工作以及一些有关教育的理想在苏区也能够实现。用自己的所长来为苏区的革命事业作贡献，这也是他的愿望。想到这些，他就感到很振奋。由于烟雾的作用，他使劲地咳了起来。他把手里的香烟熄灭，心头沉了下来，这使他想到自己的病，苏区的医疗条件很差，自己身患重病，怕难以承受紧张的工作。看到在一旁的杨之华，他想最好是让她与自己同行，这倒不是和之华不能分开，主要是如果自己病倒，由之华来照料会感到方便些，也省去了其他同志们

的辛苦，这总不能算是非分之想吧。想到这，他向组织提出让一直照料他生活的杨之华同行。第二天，他的请求被拒绝了，原因是杨之华的工作要有人来接替……

瞿秋白服从组织的决定，尽快起程赶赴江西瑞金。

这天，杨之华帮助瞿秋白准备行装。瞿秋白把近三年来的著作和译作分别整理，不能带走的就存放到鲁迅那里去。他一边整理一边叹息着对杨之华说：“可惜《茨冈》没有译完，看来是没有时间完成了。”他爱惜地把译稿放了下来。过了一会瞿秋白又说，那篇驳斥叛徒叶青的稿子，被张闻天搞丢了，真是可惜。以后不可能有时间从事著述，未能发表的东西，只能等革命成功后，再与读者见面了。杨之华一直沉默着，她把秋白随身用的东西一件一件整理好，放到一只衣箱里，又把箱子放到屋子的角落里。秋白从之华的脸上看出了她情绪的变化。他想，这些年来确实是很对不起她，为了党的事业，他跟着自己东奔西跑，没有过上一天安定的日子，为了支持他工作，之华担起了全部的家务，买菜、烧饭、洗衣，天不亮就起来倒马桶，为了给自己治病，她一个铜板一个铜板计算，把省下来的钱为自己买药，想方设法为自己弄一点好吃的东西补养身体。写作时，需要的书籍、资料，也是杨之华千方百计地从各处寻找来的。有的时候，自己工作很劳累，但是一听到之华那诙谐风趣的话语，全身的疲劳也就被赶跑了。记得有一次，庄晓东和潘家辰来探望，寒暄了几句之后，自己又伏在桌上写作了。这时，之华就笑着对他们说：“有个人连脸都懒得洗，洗手也只洗手心，连手背都不洗，这个人更不喜欢搞卫生，房子里有气味，他就洒点香水，你们猜这个人是谁？”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秋白也只好放下笔，同大家谈笑，稍事休息后，才去工作。如果是写文章写到深夜，之华就准备一些自己喜欢吃的

茴香豆、豆腐干一类的小食品，放在桌上，供他饿的时候充饥。他在政治上遭受打击之后，能够有愉快的心情和充沛的精力工作，这和之华在感情上的安慰与生活上的精心照料是分不开的。很快就要分别了，自己的心里也不好受。但又不能在她面前过多的流露出来，如果自己不坚强些，那么孤身一人留在白区的之华在感情上会更加难过。想到这儿，他拉着杨之华的手在床边坐下，温情安慰说：“不要难过，分别只是暂时的，早点休息吧，明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杨之华的眼里浸着泪水，叹了口气说：“我不是担心别的，就是放心不下你的病。”

“没关系的，到那边以后，还有同志们呢，他们会照料我的，再说那边的医生的医术，也是很高明的。你就放心吧！”瞿秋白一边抚摸着杨之华的手一边说。

瞿秋白在上海工作的三年里，为了能使在白区的人民了解苏区和红军，他写了一些通俗作品，如《苏维埃是什么？红军是什么？》，同国民党反动统治相对照，宣传了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在《“匪徒”》一文中，热情歌颂苏区和红军，愤怒驳斥敌人的诬蔑，彻底揭露敌人卖国“围剿”的罪恶勾当，并且预言了中国革命必胜。他说：“只有他们这些所谓‘匪徒’能够打败帝国主义，能够解放中国，能够创造真正几万万民众自己的中国！”瞿秋白为了了解苏区的情况，还系统地研究了在瑞金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并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发表在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五十期上。从报纸的内容到文字编排都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党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以后，为了强行贯彻其各项“左”倾政策，开展了所谓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当时王明虽远在共产国际，但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使他能够直接向国

内下达共产国际的指令。在他遥控指挥下，“左”倾教条主义继续发展。

一九三三年二月，他们在福建开展了批判“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他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苏区的巩固地区，按中央“创立一百万铁的红军”分配下达的扩大主力红军任务难以实现，应首先抓紧扩大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以打破敌人的“围剿”。他的主张立即就被指责为“对革命出现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而且对他进行了停职处分，接着又在江西开展了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等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这种“左”倾机会主义在白区的表现，则是对瞿秋白的批判。

说来话长，瞿秋白在重返文园以后，除了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之外，还为中央的一些理论刊物撰稿。如在《红旗周报》《布尔塞维克》、《中国与世界》上发表《恭请列国联军》、《流氓政策和立宪政策》、《三民主义的清算》、《有国大家卖》、《当前的重要问题》等，在《斗争》上发表的有《临死的呼号》、《庐山会议的大阴谋》、《国际反帝大会反对国民党外债政策》等。而秋白在《斗争》上发表这几篇文章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前夕。秋白的文章揭露了敌人在战略策略上的新的变化和企图，其用意也在于提醒党中央及时注意敌人的动向。当然在他的文章中也不时有些“左”的成份，就是这样的文章也触怒了“左”倾教条主义者们，于是便在党内开展了对瞿秋白的第二次斗争。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秋白的公

开批判；“决定”不顾事实，用“莫须有”和扣帽子、打棍子的手法，指责秋白在《斗争》上发表的许多文章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庐山会议的大阴谋》一文，是“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员群众的武装”，“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因而秋白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决定”还号召全党“应在组织中开展无情斗争，来教育同志，并检查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坚决的打击一切机会主义的调和倾向，以保证彻底执行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十月底，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提出了“反对目前最危险的罗明路线和狄康同志的观点”，是“顺利的执行冲破五次‘围剿’的一切战斗任务的前提”。尽管秋白已公开作了“检讨”，承认了所谓的错误，但对他的批判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社论”还引用了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

瞿秋白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疾病带来的痛苦写了《儿时》一文，他在文中写道：“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深化在大众里面，假使他天天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么，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革命家的宽广的胸怀，这也就是瞿秋白异于常人的所在。

冬天渐渐地来临了，上海街道两旁的树叶纷纷落了下来。十一月，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全文转载了《红旗周报》的社论，批判瞿秋白的斗争由白区扩大到了苏区。

就在这时，瞿秋白接到了调往苏区的命令，一场新的战斗又要开始了。

## 二、惜别之情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瞿秋白就要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了。几天以来，一种复杂的感情始终围绕在心头，一方面是一种渴望，一种到苏区去投入新的生活的愿望，到那里去施展才学和抱负的渴望。而另一方面，是一种对亲人对战友惜别之情和对文学园地的眷恋之情。三年来虽然是生活艰苦，危险频频。但是离开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使他有时间和时间，用他所擅长的方式，用他的笔同敌人展开战斗，用笔为祖国的文学事业耕耘，他感到很轻松自如，虽然最近“左”倾机会主义者又对他发难，但比起前几年六届四中全会时所受的打击来说，已算不得什么了，何况再过几天，就要去苏区了，将来事情总会有个公断。

他又想起和他并肩战斗了三年的鲁迅先生来。自己和之华每当遇到危难时，鲁迅就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他，如果没有鲁迅拚死相救，也许自己早就被敌人捕去了。他觉得自己无论在生活经历还是思想感情，文化气质上都与鲁迅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这也许就是他们之所以能够从相识、相知到结成生死之交的原因吧。鲁迅不是党员，这就使他在统一战线这个大圈子里，在对敌斗争中，比自己更能发挥其战斗作用。自己走后，鲁迅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险狡诈，反动文人的来自笔端的围攻与来自革命文艺阵营内部一些人的不理解，这都将对鲁迅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他的身体也不好，自己在走之前一定要去看看他，否则自己会终生不安的，还有茅盾，自己初到上海时，在

许多方面都得到过他的关照，也要去话别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夜晚，瞿秋白一夜都没有睡好，鲁迅和茅盾的身影总在他眼前晃动，第二天他很早就起床，见没有什么可收拾的，就对杨之华说：“再过几天就要去苏区了，我无论如何要去和鲁迅、茅盾告别，跟他们好好谈一谈。”近几天来外面风声很紧，反动派搜捕得特别厉害，不时传来有同志被捕的消息，外出是很危险的。但是杨之华理解瞿秋白此刻的心情，就关心地对他说：“白天外出太危险了，等到晚上再去吧。”杨之华知道秋白一见到鲁迅就有说不完的话，于是就又叮嘱他路上要小心，晚上就不要回来了，第二天晚上再回来吧。听了杨之华的话，秋白高兴极了，他把之华拉到身边说：“你总是这样的理解我，你真是我的好妻子”。

杨之华何尝不愿意秋白呆在家里，结婚十年了，一直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究竟搬了多少次家，自己也数不清了。再过几天就要分别，也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但她一想到鲁迅和秋白的情分，又不能阻止秋白去和鲁迅告别，这也是做妻子和战友的责任，想到这，她又说了一些叮嘱的话，就松开秋白的手，又默默地去干活了。等到晚上，秋白就去与鲁迅话别。

关于这次瞿秋白与鲁迅告别的谈话内容，史料中没有记载。许广平只是在《鲁迅回忆录》中说：“一九三四年一月初，秋白同志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临行前曾到鲁迅寓所辞别。这一次，鲁迅特别表示惜别之情，主动向我提出要让床铺给秋白同志安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虽然记载简略，但我们不难想象出瞿秋白与鲁迅二人告别时依依惜别的感情。之后，瞿秋白把自己不能带走的文稿和那张特制的书桌托鲁迅保管，鲁迅把文稿放到了狄

思威路的藏书室，把秋白的书桌放到客厅的西墙边。至今瞿秋白的那台设计特殊的西式拉盖书桌仍然照原样保存在鲁迅大陆新村九号的寓所中。

从鲁迅家出来，瞿秋白又去了茅盾那里。两人见面后，当谈到沈泽民时，秋白感到很怆然。

沈泽民是茅盾的胞弟，一九三二年党派他到鄂豫皖根据地任省委书记。鄂豫皖根据地处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的大别山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积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块根据地。

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开始时盲目轻敌，调动红军同敌人死拼硬打，后见敌重兵压境，便惊惶失措，擅自带着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使根据地的革命斗争陷于严重困难的境地。当时，敌人以十五个师外加两个旅约二十万的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清乡”，敌人所到之处，尸骨遍野，火光冲天。在金家寨附近的柳树湾、红安县的闵家河，六安县的上楼房等地，敌人一次就屠杀群众上千人以上。大批的妇女被蹂躏或贩卖，在敌人的疯狂进攻和摧残下，鄂豫皖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被敌人占领。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鄂豫皖省委在沈泽民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将留在根据地的原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的两个团和二十七师的三个团重新编成红二十五军，由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下分七十四师和七十五师，师长分别由徐海东和姚家芳担任，全军约七千人，同时省委还整顿了各地的游击队，不断给敌人以有力打击，这样便招致敌人更为残酷的“围剿”。蒋介石下令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底以前，将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彻底肃清”。

在艰苦的斗争生活中，沈泽民得了重病。由于张国焘向西逃



跑时，带走了红四方面军的全部电台，使根据地同中央的联系中断。沈泽民为了向中央揭发张国焘的罪行，同时要求中央派军事干部加强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工作。他派遣成仿吾同志，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去和党中央联系，当成仿吾在鲁迅的帮助下，同党联系上以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黄玠然派上海局组织部交通主任老刘（即何叔衡同志的女婿陈刚同志），护送成仿吾，经过十天的艰苦历程由上海到达中央苏区。

到瑞金那天，正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召开的第二天，当成仿吾脱下旧棉袍，重新穿上红军军装出现在会场时，周恩来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对大家说：“鄂豫皖的代表成仿吾同志来了。”

五中全会以后，根据成仿吾对鄂豫皖根据地情况的报告，中央决定调军事干部去鄂豫皖参加军事领导工作。当程子华同志带着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离开瑞金，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省委书记沈泽民已经病逝了。

瞿秋白得到沈泽民病逝的消息，非常悲痛。他对茅盾说：“沈泽民在去鄂豫皖时，曾与他有一次长谈。并相约在革命胜利后，在上海相会，谁料到那一夕谈话竟成了永诀。”当时秋白把一只苏联制的怀表送给了泽民，并对他说：“这块表是苏联同志送给我的，你在苏区天天要打仗，这只表对你有用，你就留作纪念吧”。后来，红二十五军组建时，沈泽民又把表送给了任七十四师师长的徐海东。抗日战争时，徐海东又将它送给了彭德怀。全国解放后，彭老总又将这怀表还给了杨之华。现在这块怀表保存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

瞿秋白在第二天晚上才辞别茅盾回家。

自从秋白出门以后，杨之华一直为他的安全担忧，她一个人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着，直到听到秋白走进大门的脚步声，她心里

的石头才算落了地。秋白一进门就笑容满面地对她说：“要见的都见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茅盾身体都好，海婴也没有病”。停了一下，他带着抱歉的口气说：“昨天夜里，大先生一定要把他的床铺让给我睡，他们夫妇睡了一夜地板。就要去苏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相见。”

快要去苏区了，瞿秋白仍然争分夺秒地工作。他把鲁迅写给苏联木刻家希仁斯基等人的信译成俄文。直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夜，他仍伏在书桌上辛勤地工作着，杨之华先睡下了，但在睡梦中又不断醒来，当她惊醒的时候，见秋白绕着她的床踱来踱去。

杨之华后来在《回忆秋白》一书中写道：

在静悄悄的夜里，他弯着腰低着头伏在桌上工作着，这已成了他多年来的习惯。但那一夜却不同，当我醒来的时候，总看见他还在整理着什么，或者轻轻地踱着步，或者坐着抽烟沉思。快要天亮的时候，他见我醒了，就悄悄地走过来，拿着我买给他的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这是他最爱用的），把它们分成两半，对我说：“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开以后不能通信，就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重见时交换着看”。他又指着桌上的一叠书说：“这是你要的书，我给你整理好了。我给你订了个半年的读书计划”……这次不能把这些书带走，就不胜遗憾地说：“我爱读的这许多书不知能保存到什么时候，希望你快来，如有可能，书也带来。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相见……”我看出他为我担心……我就对他说：“不要紧的，过去我们离开过六次，不是都重见了么？这次当然也会一样的”……他突然紧握我的手说：“之华，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被捕牺牲是意料中事。我们活要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周文雍、陈铁军夫妇

一同英勇上刑场的照片吗？即使我们不能共享胜利的喜悦，那样牺牲也是无尚幸福的。”我说：“嗯，万一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

瞿秋白紧紧地拥抱着之华，他坚定地说：“我一旦被捕，受到审判的时候，就这样回答他们：‘你们不配审判我，我要审判你们’。”后来当他被敌人杀害时，果然从容不迫走向刑场。

瞿秋白与杨之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许久，许久……

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晚上，在一起工作的同志来为瞿秋白送行。杨之华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

那天晚上，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各出一元钱，叫了一个菊花火锅，买了些苹果，准备了一顿比较丰盛的晚餐给秋白饯行。到深夜十一点，秋白离开寓所，到轮船码头去，我送他到门外。这夜刮着寒风，下着大雪，秋白只穿了单薄的寒衣，负着病弱的身体，迎着风雪向前走着。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在白雪纷飞中显得昏黄暗淡的路灯下凝视着我，缓慢地说：“之华，我走了！”我激动也回答他：“再见，我们一定能再见的！”他走了，我情不自禁地往前走着，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大街尽头……

后来，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不断被敌人破坏，去苏区的交通线也断绝了。杨之华终于没有能去苏区。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第七次分别竟成为永诀。

瞿秋白走后，鲁迅对他非常思念，来到秋白在他家避难时住的房间，看到他用过的铅笔、毛笔、墨盒等物品，睹物思人，心头感到特别沉重。

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曹靖华来到上海后去拜访鲁迅。吃过

晚饭后，鲁迅把他带到二楼靠楼梯的一个房间。屋里的陈设很简单，靠窗有一张条桌，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桌上放着削好了的铅笔以及毛笔、墨盒、信封等物。鲁迅站定之后，对曹靖华从容低沉地说：“这是秋白逃难住的房间，一切布置照旧，你就住在这里吧……。”鲁迅的眼前又浮现出秋白在这里避难时的情景，那熟悉的脚步声，那幽默的话语，都把他带入深深的回忆之中。回到楼下，鲁迅让曹靖华坐在桌子一头的藤躺椅上，自己坐到桌前的转椅上，然后用低沉的语调说：“他等你等了好久，没有等着，你来了，他走了，到那边去了……。”鲁迅不停地重复着说：“你来了，他走了……。”

### 三、在中央苏区

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夜十一时，瞿秋白告别了亲人和战友，顶着风雪踏上了去中央苏区的征途。

瞿秋白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从上海乘船出吴淞口，向南到香港，再乘船到汕头改乘车到潮州。然后换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大埔、多宝坑，下船后步行，从永定铁坑、丰稔、白沙、南阳、长汀、杏城等地转赴瑞金。这是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以后建立起来的一条非常秘密的交通路线。一九三〇年归中央特科交通局直接领导。以前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大体上是经过这条交通线，被护送到中央苏区去的。中央苏区所需要的药品、无线电器材等物资，也是经过这条路线送去的。像这样的秘密交通线，以前还有两条，后来都被敌人破坏掉了，现在只剩下这一条了。

瞿秋白化装成医生，紧紧地跟在地下交通员的身后，他们白

天在可靠的群众家里休息，夜晚避开敌人的警戒线，行进在乡间的小路上。秋白尽量不开口说话，因为他的口音与当地的不同，容易引起麻烦。护送的同志也很少同他搭话，只是尽自己的职责，带着他赶路，接连闯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最危险的时候是到达赤白交界的地区以后，因为离敌人的警戒区非常近，不仅可以看到灯光，有时连敌人说话的声音也能听到。负责护送的同志很有经验，知道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需要停下来等待时机，有时要为了赶到可靠的投宿地点，一天要走上百里路，秋白拖着病体，一直紧跟在后面。他们在赤白地区连续走了几夜，到达闽西根据地边沿，才松了一口气。投宿时，瞿秋白顾不得疲劳，分别给鲁迅和杨之华写信，报告平安。又过了半个多月，瞿秋白才辗转来到被称做红都的瑞金。

瞿秋白到苏区以后，被安置在一间狭小的平房里。房间里有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桌子和几条长板凳，靠墙边还有一只用长木板钉成的简易书架，这就是瞿秋白的卧室兼工作室。房间虽狭小、简陋，但也非常整洁。秋白稍加安顿后，就去看望同志们。当他身穿灰色中式棉袄，满面风尘地走进一间简陋的办公室时，立即被聚集在那里的人包围起来，人们惊喜、欢呼：“秋白……秋白……”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石联星等人问长问短，留苏的同志则用俄语同秋白交谈起来。秋白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立即有一种到家的感觉，激动得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中央苏区是在红军三次反“围剿”取得辉煌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一九二九年一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挺进赣南，先后占领了兴国、宁都、瑞金、于都、广昌等县。以后红四军曾三次进入闽西，占领了长汀、上杭、连城、永

定、龙岩等县城。一九三〇年六月，红四军与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八月底，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成立了红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

一九三〇年十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势如破竹，攻占了吉安，解放了赣西南的广大地区，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在鄂豫皖地区，从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三〇年春天的两年半中，边区的党组织领导人民在黄安、麻城、商城、六安、霍山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建立了三块革命根据地。当时这三个地区还是分散的，没有联成一片。后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统一的鄂豫皖边区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一九三〇年六月，又召开了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形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湘鄂西地区的红军也开始重整旗鼓。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恐慌。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是在蒋、冯、阎中原大战的混乱中发展壮大。当中原大战一结束，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就立即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在南昌、汉口设立了海陆空总司令行营，分别向赣西南和鄂豫皖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国民党南昌行营调集了十万兵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以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开始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他们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战术，分成八个纵队，三个作战区，从江西吉安至福建建宁一线，由北向南推进，形成了吉安、泰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的一个包围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一网打尽，进而扑灭江西的革命烈火。

红一方面军建成以后即由湖南回师江西。在江西立足未稳，面临敌人的重兵围困，毛泽东、朱德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认为不能与敌人硬拼。毛泽东提出了“撒开手，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把敌人诱至地形和群众基础对我有利的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之。十一月底，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四万余人相继转移到赣西南中部，在宁都县黄陂、小布一带的山中隐蔽起来，等待敌人上钩。十二月十九日以后，敌军主力部队，先后进入了红军集结地。二十九日，张辉瓒部孤军深入，由东固向龙冈前进。三十日，进入红军的伏击圈。毛泽东、朱德一声令下，红军三面出击，将张辉瓒部九千余人全歼，连张辉瓒本人也成了红军的俘虏。之后，红军又乘胜追击谭道源师，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当谭道源师逃到东韶时，遭到红军的突袭，又被歼灭一半，其余的敌人望风而逃。红一方面军在五天之内连打了两个大胜仗，歼敌一个半师，光是俘虏就有一万多人，缴枪一万三千余支，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广大军民的士气，使红军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南宁都县成立，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等人任中央局委员。同时还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并决定两个机构负责筹备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

一九三一年四月，蒋介石又调集了二十万大军，以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为总司令，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何应钦坐镇南昌，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长达七百里的战线向红军压了过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四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召开

扩大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如何打破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朱德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决定将红军主力集结到龙冈、东固一带待命。并选择不善于山地战，对地形不熟悉的敌人第五路军王金钰部为首战对象。五月十五日，战机终于来了，敌人第五路军的左、中、右三路逼近东固。十六日，红军乘敌右路军由富田向东固前进时，突然对敌人发起奇袭，并分兵围击留守富田的敌军，截断了后路，歼灭了右路尤秉藩师大半。接着又向东吃掉了敌中路郭华宗师和左路郝梦麟师。敌二十六路军高树勋部闻讯投援，红军又日夜兼程，直奔中村，与敌人激战两昼夜，歼敌一个旅。二十七日，红军乘胜攻克广昌，歼敌一个团，敌人师长胡祖玉被击毙。接着红军又挥师福建建宁，歼敌一个团。红军在五月的半个月之内，横扫七百里，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之后，党中央决定将闽赣根据地划入中央苏区的范围。并把打通赣西南和闽赣两块根据地的联系作为红军的重要任务，为中央苏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调集了三十万大军，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行营，准备对红军发动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德、日、美、英军事顾问出谋划策，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南、闽西两根据地发动了猖狂的进攻。红军仍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朱德将红军主力调回兴国一带等待战机，而以少数红军向西突击，引诱敌人。与此同时，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也火速从广西左右江转移到兴国，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八月六日夜晚，红军一部借着夜幕的掩护，从兴国插进敌后，在莲塘一举歼灭了



敌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接着又在良村歼灭了郝梦麟的五十四师。八月十一日，又包围了宁都黄陂之敌，歼灭了毛炳文的四个团五千余人。敌军主力急忙调头东进黄陂，企图与红军主力决战。红军运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回师兴国休整，以逸待劳。到了九月初，形势发生了变化，粤桂地区军阀企图与国民党争夺湖南，迫使蒋介石进行军事调防。红军得到情报，乘敌调防之机，在高兴圩设伏截击，又歼敌六千余人。九月十五日又在方石岭全歼韩德勤的一个师，俘虏敌军五千余人。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共歼敌三万余人，缴获枪支两万余支。

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乘胜向闽、赣的边界地区发动进攻，消灭了地方上的反动武装，收复了被敌人占领的大部分县城，这样就使赣南和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被选为副主席。瞿秋白被选为教育人民委员，但此时，瞿秋白还在白区，过着艰苦的地下斗争生活，所以，秋白的职务只能由徐特立代理。瞿秋白到苏区已是第四次反“围剿”以后的事了。

瞿秋白一到苏区，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由于负责教育工作，终日需要伏案写作，原来习惯于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写作，现在不行了，在他的小小卧室兼办公室里，经常挤满了一批批来请示的人，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请他答复解决。所以他的习惯和作风也得改变。只得挤时间来完成文字工作。为了工作方便和提高办事效率，瞿秋白还学会了骑马，并且亲自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工作。有时，还骑马到很远的地方去看望患病的同志。一次，他去

看望正在养病的王稼祥和另外的几个同志，被看望的同志们见秋白来了，感动地说：“你带病来看病人，我们病好后一定去望你。”秋白听后，只是淡淡一笑，接着就去谈别的事情了。

国民党反动派在四次“围剿”红军失败以后，对中央苏区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因此，苏区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粮食按人分配，米自十四两到一斤四两不等。所以每一位党员和群众都自动节省粮食。瞿秋白主持的教育部门，曾因节省过火而遭到节省委员会的批评。至于盐就更是缺乏，平均每人一日只能吃上一钱的盐，秋白平时吃菜很少放盐。一次，徐特立到教育委员会去办事，秋白留他吃饭，特意把别人送给他的盐巴，为徐老做了一个有盐的菜。

由于紧张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环境，瞿秋白经常发高烧，根据地的名医傅连暲就来为他看病，开药打针，并劝他注意休息。秋白照旧坚持工作，有时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卧床，但躺在床上也还是不断的看文件和处理日常事务。一些秋白的老战友看到他身体虚弱，带病坚持工作，就叮嘱秋白的秘书庄晓东同志，注意照顾秋白的生活，庄晓东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是由于敌人的包围封锁，很难为秋白弄到一点营养的东西。一次，庄晓东跑到几里以外的圩场上好不容易才买到一条鱼和几个鸡蛋，当煮好送到他眼前时，他先是问东西从哪里来的，旁人有没有吃，推来让去才吃下一点点，身体稍好一点，就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

他与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一起，在不足三个月的时间里就为苏区制定了二十四个教育法规，内容相当全面，不仅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而且社会教育的内容也包括在其中。瞿秋白针对苏区教育的实际情况，在制定教育方针和编写教材时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时苏区的小学校被称为列宁小学，课程的设置有国语、算

术、社会与科学常识等课程。在《小学课程教则大纲》中，对所授课程内容作了明确规定。例如国语课的教学内容包含：“政治（最浅易的叙说革命常识、乡土地理、革命历史等）及自然（浅易的叙述理化及生物、生理卫生常识），同时必须在初级小学的三学年中教授儿童最简易的叙述文的作法。使初级毕业时，学生能自动的写作简单语句的短文”。“高级小学的国语。仍应包含政治及自然的教材，增加议论和批评的成份，同时必须在高级小学二年级中教授儿童以初步的议论文作法，使高级毕业时，学生能自动的写最浅易的短篇文字，尤其是应用文（如信函、路条、短篇议论文等）。”从这些要求中，人们不难看出，所含内容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未免过于混杂，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是非常实际的，由于苏区师资缺乏，斗争残酷，一名教师往往要教授多种课程，所以把理化、生物也放在国语课上一同教学，就非常适应当时紧张的斗争环境。尤其是对应用文的要求，我们想象在当时一定会起到不小的作用的。

为了扭转苏区师资缺乏的状况，在瞿秋白的主持下，苏区建立了不同修业期的师范学校，有的一年，有的半年，有的只有三个月。在寒暑假期间还开办小学教员培训班，男人们扛枪打击敌人，教育后代的任务就落到了妇女们的身上。许多学校的教员乃至教委主任、校长都是由妇女来担任的。

为了培养高级干部，苏区还成立了苏维埃大学。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苏维埃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以及苏区党团中央局、红军大学的代表出席了典礼。瞿秋白、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讲了话。秋白在讲话时教育学生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禁止一切地方观念以及开小差的行为，为中

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苏维埃大学单独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四个月以后就并入中共中央党校，就是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秋白做了大量的工作。徐特立曾回忆说：“他对教育工作十分负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心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题目他都加以原则指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生活环境，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他都忘却了，精神上表现着十分愉快。”

周恩来夫妇与秋白是老战友、老朋友。邓颖超知道瞿秋白身体不好，有时专门跑几里路来看他，来时还亲手煎几张糖饼送给他吃。有时还给他送去点面粉和白糖。这在苏区也就是最好的营养品了。瞿秋白也时常想起和周恩来在一起工作时的情景。

瞿秋白在苏区时除了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还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兼主编。

《红色中华》报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江西瑞金创刊的，原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机关报，每周出版一期。一九三三年二月，改为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联合机关报，以后又改为三日刊、双日刊。它是我党在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中央级的铅印大报。发行量多达四万多份。创刊时，毛泽东派周以栗为主笔。周病倒后，项英、王观澜、李一氓、沙可夫等人相继任主编。后来沙可夫因病去苏联疗养，秋白便接替了他的工作。这样，秋白白天去教育部上班，晚上就为报纸写稿和做编辑审稿工作。瞿秋白在担任社长和主编的时候，正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点的时期，虽然王明远在苏联，但他的思想却仍然影响着中共领导层。王明小宗派主义者对于不执行他们“左”倾政策的党员往往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秋白接二连三地遭到迫害，在党内没有发言权，处于被排挤的地位。但

他仍默默地为党工作，他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纪念“五一”与声援华北工人斗争》、《中国能否抗日？》等文章，为苏区的革命斗争服务。

毛泽东与瞿秋白同样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将他排挤出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瞿秋白与毛泽东同受排挤。当时许多人在公开场合都不便于同他们交谈，以免遭到迫害。据《红色中华》报编委韩进回忆，连当时中央党报委员会的陆定一都有意避免与秋白见面，以免引起嫌疑，受到迫害。由于相同的政见，使瞿秋白与毛泽东成了好朋友。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两人坐在树荫下或草地上吟诗作答，以此来曲折地表达他们对“左”倾路线的不满和抗议。他们在一起时也谈生活。一次，毛泽东半开玩笑地问瞿秋白想不想念在白区工作的杨之华。一句话勾起了秋白对杨之华的思念之情。

秋白怎能不想念她呢？到苏区以来，秋白一直穿着杨之华为他亲手缝制的深米色棉布中山装，一直戴着杨之华为他编织的绒线帽，而且不止一次地在同志们面前叨念过：“之华要来了！”“之华快来了！”然而，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战略大转移，使杨之华一直没有来苏区。每当他遇到挫折时，一想到在白区工作的杨之华，心里就觉得安慰了许多。由她又想到鲁迅先生一家人，他们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自己。眼前这点挫折又算得上什么？虽然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来都没有在同志们面前流露出过不满情绪，只是默默地工作着。

由于瞿秋白个性气质和对革命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使他对苏区的文艺工作也非常关心和支持。苏区的艺术局隶属于教育部，这使秋白能够直接指导苏区的艺术工作。当中央苏区的第一所戏剧

学校创办时，瞿秋白就提议学校名称应以高尔基的名字来命名。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他推荐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和戏剧《下层》来作为戏剧学校的教材，鼓励学生们阅读。他说：“那真正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小说和戏剧。”当时创办学校困难重重，没有教员，没有教材，更没有供学生们实习的剧场，秋白就用鲁迅的话来鼓励大家：“路是人走出来的。”在他的带动下，学生们在瑞金附近找到一所破庙，略加修整，建成了一个室内剧场，瞿秋白高兴地对大家说：“革命的戏剧学校在苏区还是初生的婴孩，慢慢抚育吧！不要性急”。

当时苏区的文化水平很低，戏校的学生也大都是参加过土地改革，来自农村的男女青年，没有多少文化知识，更谈不上戏剧的专门知识了，于是经过党和瞿秋白的批准，戏剧学校从被俘的军官中挑选一些具有导演、舞美等知识的人来为学生们上课，学生们对被俘军官很反感，借口听不懂他们的广东话，不欢迎他们上课。瞿秋白就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他说：“广东话不懂可以慢慢听。目前你们需要美术知识，舞台装置的知识。他们有这种专门知识，你们没有，要虚心跟他们学习。他们过去是白军军官，缴枪过来了，替红军做事了，仍然讨厌他们，瞧不起他们，这是不对的。你们不要他们教，你们就没有教员，没有教员的学校只好散伙，散伙就只好请你们收拾包袱回家，学校关门……你们天天唱工农剧社的社歌：‘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我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艺术这个武器你们究竟拿到手没有？”学生们当然回答说：“没有！”这样，在瞿秋白的说服教育下，学生们又很好地上课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学生们很快就能演戏了。他们排演了一出反映群众支持红军的剧目如《无论如何要胜利》，剧中

表现的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儿童团员和他双目失明的姐姐用生命来保守革命秘密，誓死不说出红军的行动的故事。演出效果很好，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扬。瞿秋白立即召开剧作者、导演和演员会议，称赞这出剧的成功，同时也指出剧中有些台词过于生硬，听起来不入耳。他对大家说：“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节目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让群众闭上眼睛，也能听出是什么人在什么环境下讲话。”秋白的话使大家很受启发。他还动员大家把这出剧带到边区去演，以此鼓励群众同白军作斗争。

瞿秋白还鼓励大家搜集民歌来填词。他自己在上海时就曾用民间曲调写过反映抗日救国的歌子。到苏区后，常听到江西的老百姓唱《竹片歌》、《砍柴歌》、《十骂反革命》等曲子。他笑着对戏剧学校的同志们说：“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

戏剧学校后来搬到了梅村，离瞿秋白上班的教育部只有二三里路，秋白还去学校为教职员讲政治课，解答一些时事问题，由于他深入浅出的讲解，大家都爱听他的课，下课后，还舍不得他走。秋白离开时总是说：“隔两天我再来听‘哎哟来’（刘秀章的别名，她是兴国县最好的青年农妇歌手）的兴国山歌。”而学校的两位年龄最小的演员每次都依依不舍地把他送到教育部才返回学校。

瞿秋白在苏区的工作是紧张而愉快的。但是，这时间并不长，由于王明教条主义者在中央的统治，使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走上了伟大而又艰难困苦的长征。

## 第七章 转移被俘

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身患重病的秋白被迫留在江西。蒋介石十万大军，对苏区进行“全面清剿”，情况危急，中央分局决定送秋白去上海就医，转移途中被敌人俘获。

### 一、战略大转移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日寇纠合日伪军十万人，分兵三路进攻热河。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根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放弃省会承德。国民党驻热河的二十万军队不战而退，热河省全部沦丧。国难当头，蒋介石非但不抵抗，反而在前四次“围剿”红军失败之后，变本加厉地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政治上他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任命臭名昭著的亲日派黄郛出任国民党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与日寇阴谋妥协；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把冀东、察北和绥东划为非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和热河的占领。对人民实行独裁统治，推行保甲、连坐，组建民团、进行清乡，在经济上，蒋介石对外大量借款，国民党政府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出面，与美国签订了五十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对内大



量发行纸币和公债，以筹划军费。国民党中央打出“航空救国”的旗号，发行航空奖券，强行募捐，借以搜刮民脂，扩充反革命军事“围剿”实力，鲁迅曾作《航空救国三愿》予以揭露。在军事上，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直接组织和指挥“围剿”。他还大量招募新兵，举办军官训练团，进行法西斯军政训练。蒋介石还派遣宋子文不远万里到意大利求见墨索里尼，学习法西斯统治术，宋子文得意非常地说：“中国最重视贵国之经验”。敌北路军司令陈诚宣称，要从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消灭红军和苏区。

一九三三年秋天，蒋介石集结了一百万兵力，进攻苏区，以五十万兵力专门对付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鉴于前几次的失败，蒋介石改变了以往长驱直入的战术，而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尽管形势对我不利，但是如果党内不犯机会主义错误，还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的。

中央苏区在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之后，有了较大的发展。根据地面积横跨湘赣闽粤四省，人口发展到三百万，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已有八万余人。根据地内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军事上也积累了许多战胜敌人的宝贵经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反蒋抗日运动也不断高涨；而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重重。但是遗憾的是王明教条主义者，在这次反“围剿”中却采取了完全错误的军事方针和政策。

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洛甫等人先后到达瑞金。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于一九三三年九月来到苏区。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青年时期参加过德国中部的工人起义，后来被捕。一九二八年越狱逃到苏联，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一九三二年春

毕业后便被派到中国上海，这次又被派往苏区。博古、李德等人的到来，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苏区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

一九三三年九月，敌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三十三个师零三个旅和一个税警总团从北面主攻中央根据地。二十五日，敌北路军第八纵队长向驻守黎川的红军发动进攻，二十八日，敌人占领了黎川。“左”倾冒险主义者没有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针，而是完全听从李德的错误主张，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认为黎川是中央苏区北边的门户，决不能丢失，命令红军北上追敌。这时，我红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吴奇伟的第六师十旅的三个团打了一个遭遇战。我军主动出击，冲垮了敌人的阵地，紧接着又追击敌人，消灭了敌人两个团，还缴获敌高级军官到前方视察乘坐的小汽车，这一仗虽然是我军胜利了，但在强敌压境的总形势下，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可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却夸大了它的实际作用，强令红军主力进攻白区敌重兵扼守的硝石、资溪桥等据点，结果遭到了失败。十一月中旬又令红军向浒湾、八角亭的敌人发动进攻，结果遭到重大伤亡。二师师长胡向林、四团团团长肖桃明都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最后只能被迫撤退。红军在一个多月内，疲于转战在黎川周围的敌人堡垒之间，陷入被动地位。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起让蒋介石非常震惊的大事。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领导下，联合李济深等人，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决裂。“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大为震惊，迅速从“围剿”苏区调集五路大军入闽，蒋介石亲自任“讨逆军”总司令。敌人营垒内部分化，正是红军粉碎蒋介石“围剿”的大好时机。而“左”倾领导没有联

合十九路军反蒋，认为“这一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还不是革命的”。当时，福建人民政府曾派陈公培为代表到苏区谈判。陈公培是黄埔二期毕业生，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第三党。这次是李济深专门派他来与红军谈判的，结果被“左”倾冒险者骂了一顿，打发了回去。

这时“左”倾领导者不仅未能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援助，反而下令红军主力调往西线永丰地区，这就使蒋介石得以集中兵力，将十九路军镇压下去，使红军丧失了打破敌人“围剿”的有利时机。

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蒋介石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毛泽东等人提出了以红军主力突破封锁线，进入苏浙皖赣地区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机作战的战略方针。但这一正确主张被“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排斥了。他们不肯实行积极防御方针，而是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一变而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军事顾问李德强调要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的战术，也就是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等敌人跟我碉堡很近的时候，采用短促突击去消灭敌人。这一战术一运用，就暴露出它的弱点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下旬，宋子文的两个美械装备的税警团和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进攻永丰南面的丁毛山红军阵地，红一师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红军由东北面向南进入敌人的碉堡群，争夺十分激烈。有的得而复失，有的失而复得。这时敌人调来了从德国买的普伏式山炮和一〇二口径的重迫击炮，对红军的阵地猛烈轰击，战场上硝烟弥漫。红军伤亡很大，三团九个连，连级以上的干部就阵亡了十三人。当时三团的一个排长的瑞金老表发牢骚说：“不知捣啥鬼呵！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

比堡垒，搞什么鬼呵！”

由于红军实行了防御的保守主义，使红军在许多战役中失利。

一九三四年四月，敌人集中了十一个师的兵力，沿甘竹河分左右两路对广昌地区大举进攻。“左”倾领导者提出要“把广昌变成马德里！”在“不让敌人侵占寸土”的口号下，大打阵地战，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硬拚，这种战术虽然使敌人的进攻速度缓慢，但红军损失严重，广昌、建宁相继失守。

广昌战役以后，敌人分六路进犯苏区中心，“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命令实行“六路分兵”，“全面抵御”，结果也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四月以来，红军接连在一系列的防御中继续受到损失。红军高级将领聂荣臻看到红军的失利，心情非常沉痛，他带领红一军团抵制“左”倾路线，采用运动战打了几个胜仗，如温坊战斗，歼敌四千多人，打死打伤两千多人，俘虏两千四百多人。敌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只身逃回，被蒋介石枪毙掉了。但是个别战斗的胜利，并不能补救整个反“围剿”在战略指导方针上的错误。

在红一军团的林彪对军事顾问李德的那一套却非常积极和热心。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旬，李德在红一军团的干部大会上，大讲阵地战，干部们都听不懂。林彪却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他还写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支持李德，在政治上表了态。

八月以后，红军在西线与南线节节败退，中央苏区越打越小，十月敌人占领兴国、宁都一线，“左”倾冒险主义者采取的单纯防御的方针遭到彻底破产。这时，毛泽东以他的胆识和军事才能，建议进军湖南中部，调动敌人，寻机歼敌。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再次被“左”倾领导否定了。结果历时一年的反“围剿”战争失败了，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了，走

向长征的道路。

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央根据地，而是带有全局的，一九三四年七月，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决定将寻淮洲、粟裕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北上抗日。

七月七日，先遣队在军团长寻淮洲和粟裕的率领下，自瑞金出发，取道闽中、闽东、闽北、浙西向皖南挺进。一路上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红军战士英勇奋战，先后经长汀、连城、永安，攻克大田，渡过闽江，占领水口。这时，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攻打福州，结果攻城一昼夜，未能取胜。福州一仗暴露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军事实力，结果遭到敌人疯狂的围追堵截。八月中旬，先遣队攻克罗源县城，二十八日，又克庆元。九月初，进入了闽北革命根据地。接着北上浙西，经江山县的二十八都、仙霞岭、石门，攻占清湖镇，消灭了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后经招贤、上方镇继续北上。红军转战浙江时，因为要按照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所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和里程行动，行军速度缓慢，处境很被动，十月中旬，中央命令先遣队转移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进行休整。当到达根据地时，部队已由出发时的六千多人减少到三十多人。

十一月初，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成立了红十军团，继续向皖南挺进。这时，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分成多路对红十军团前后堵截。红十军团决定在黄山东麓的谭家桥一带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战斗中由于红军指挥员刘畴西等指挥失策，将战斗力最强的红十九师置于乌泥关以南的悬崖陡壁间，兵力无法展开，而且过早地暴露了红军的火力。当敌人集中力量攻击战斗力较弱的红二十、二十一师时，十九师来不及增

援，结果阵地被敌人突破，乌泥关制高点也失守，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在率部夺取乌泥关制高点时，不幸中弹负重伤，后在转移途中牺牲，红十军团的处境十分险恶，方志敏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率部向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转移。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二日，方志敏、粟裕等率领先头部队八百余人，由浙江开化的杨林进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当刘畴西等率主力部队两千余人到达杨林宿营时，敌追兵赶到，陷入重围。这时，方志敏让粟裕率领先头部队突围，自己留下来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敌人以七倍于我的兵力，将红军围困在方圆十五里左右的怀玉山区。

当时北风怒吼，雨雪纷飞，红军被困在山间，弹尽粮绝，以树皮、野果充饥，但仍然顽强奋战，伤员人数不断增加，最后除一小部分战士突围外，部队大部分伤亡散失，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在陇首封锁线附近的山里，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敌人俘获。

方志敏在狱中仍坚持同敌人斗争，并将在极度困难下写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清贫》、《死》、《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文稿通过鲁迅秘密转交给了党中央。

粟裕等人率余部突围回到闽浙赣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一九三四年八月，任弼时、肖克、王震等人奉中央的命令率领红六军团，从湘赣、湘鄂赣根据地向西突围，目的是为中央红军侦察开辟西进的道路。

突围之前，中革军委曾指示红六军团将所有的东西都要带走。因此，红六军团将医院、兵工厂设备、石印机、电台发动机等笨重的东西都带上了。这样，突围时受到了牵累，后来，红六军团的干部们从斗争的实际出发，沿途将沉重的东西扔掉，轻装前进，才得以摆脱敌人的追击。于八月十一日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达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

九月初，红六军团在广西北部的文市，击溃湘、桂敌军八个团。九月四日，顺利渡过了湘江，乘胜西进，占领了西延城（今资源）。十月初，红六军团从猴场向东北方向转移，次日到达石阡，由于对敌情了解不确，前卫部队放松警惕，致使红军在甘溪遭到敌十九师的突然袭击，战斗失利，红六军团的主力被敌人截为三段，陷入湘、桂、黔三省敌人的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危险。红军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的指挥下，采取了灵活的游击战术，转战在石阡、余庆、施秉之间，奋力突围，于十月下旬在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吴焕先领导下，冲破敌人的围攻，西征到达陕南，开创了鄂豫陕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立即出发长征，进行战略转移。十月九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作战，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等工作的指令》。十月十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发布了总司令及其直属部队长途行军及战斗的命令。各红军的首长根据命令，开始长途行军的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

早在六月份，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开会决定红军的战略转移工作，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负责筹备。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的数目，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他们来确定。然而，在他们确定的高级干部的名单中却没有瞿秋白的名字。

瞿秋白得知自己被留了下来，心情非常沉重，他曾找张闻天要求跟随大部队一起走。张闻天很同情秋白，就去找博古，但是遭到了拒绝。吴黎平听说中央局不让瞿秋白跟红军走，心里很难受，于是就找到毛泽东，对他说：“这怎么成？秋白同志这样一个

有名的老同志难道能够不管，要他听任命运摆布？”他请求毛泽东给中央局说说情，同意秋白跟着走。毛泽东也很同情秋白，但他的话不顶事，其实在红军高级干部转移的名单中，开始时也没有毛泽东的名字。

红军战略转移前夕，林彪、聂荣臻从福建回到瑞金，军委向他们传达了有关战备的秘密任务。接到任务后，他们抽空去看望在红一军团任过前书记和政治委员的毛泽东。

毛泽东见到林彪和聂荣臻，非常高兴，本想好好谈一谈，了解一些部队的情况，但怕他们受到牵连，所以只是拉了拉家常，而很少涉及军事问题。但聂荣臻已从毛泽东的眼神和谈吐中感觉到毛泽东对红军的忧虑。当时不但他不知道毛泽东被留了下来，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不知道自己被留下来。直到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去领转移所需物资时，才发现随军长征的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对毛泽东没有被列入长征名单而忧虑，他们向博古提出：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在党和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如果不让他参加，对转移是不利的。

博古等“左”倾领导者见有那么多人提出异议，只好同意毛泽东随军长征。这样，毛泽东同他的警卫班、马夫、挑夫、担架队员等才被编入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纵队。

当时任李德顾问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如果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为另一个样子了。”

瞿秋白的情况就不同了，他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重点打击、排挤的对象，无论别人怎样说情，也不会得到批准参加长征。



为了安慰秋白，吴黎平就把他请到家里吃饭，秋白情绪特别激动，酒喝得特别多。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的摆布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伍修权在《往事沧桑》中写道：“这次战略大转移，只是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在进行这样大的战略转移之前，不仅没有作群众性的思想动员。连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相反作了严格保密。项英、陈毅等同志，当时就不知道这一重大战备意图。有些‘左’倾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根据地打游击，如瞿秋白同志，他的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环境，结果不幸被俘牺牲；何叔衡、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时牺牲的。”

一九四〇年，苏进到延安杨家岭去看望毛泽东，当提到瞿秋白被留下这件事时，毛泽东说：“长征出发的时候，像瞿秋白、刘伯坚，还有我的爱弟毛泽覃等人都应该带来的。教条主义才搞宗派，把他们留在苏区，给敌人杀掉了。”

后来，冯雪峰向别人谈及毛泽东与瞿秋白的友谊时也说过：“那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两个人都是王明路线的排挤对象，有许多共同语言。后来瞿秋白死了，毛主席认为这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毛主席曾气愤地说：‘将来要跟他们算账，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中去’。”

参加长征的红军就要起程了，瞿秋白为了和一些战友话别，就邀请了李富春、蔡畅、刘少文、傅连暲等人一起吃饭。在饭桌上，秋白举起一只酒杯对大家说：“这酒杯是之华在上海给我的纪念

品，让我们一起为革命胜利干杯！”

红军长征的队伍就要出发了，徐特立仓促地赶到瞿秋白的住地向他告别。由于时间紧迫，两人顾不上多谈，瞿秋白让自己身边身体强壮的马夫跟徐特立走，两人挥手告别。

落日余晖，红军长征的队伍从瑞金出发了。望着那弯弯曲曲逐渐消失了的人影，秋白的心里升起了无限的依恋之情。

第二天，一个偶然的机，留在医院养伤的陈毅见到了瞿秋白。陈毅还不知道中央让秋白留下的决定，就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焦急地问他为什么还没有走，并将自己的马送给秋白，劝他赶紧追上队伍。秋白告诉陈毅自己被留了下来，他只能服从中央的决定。

红军长征以后，留守苏区的党的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分局，政府机关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军事上则成立了留守部队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是项英和陈毅等人。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到医院去看陈毅，共同商讨如何坚持苏区斗争。陈毅主张迅速转变斗争方式，将部队散开开展游击战争。陈毅对项英说：“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等有病，又都是高级干部，最好让他们穿便衣去打埋伏，反正有的是钱。还有不能走动的妇女和一些‘知名人士’，最好让他们到白区去，打游击他们跑不动。”项英没有接受陈毅的正确意见，仍认为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所定的在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之间的“三角地区”坚持斗争的方针。

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担任了中央分局的宣传部长，同时继续主编《红色中华》报。为了不暴露红军已转移的迹象，报纸仍标明是中共中央和工农民主政府机关报，报社的地址、机器设备也留在原来的地方，报道的内容仍以反映战讯为主，但不涉及红

军行动的情况，为红军的转移打了掩护。由于教育部已撤销，秋白不再担任教育人民委员了，他就和另外两名编辑一起承担了编辑任务，并且搬到报社去住。这份报纸一直坚持到中央分局正式决定突围才停止。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长汀、瑞金、于都、会昌相继被敌人占领，形势越来越严峻。

尽管环境险恶，瞿秋白照旧有条不紊地工作。一九三五年元宵前夕，他把自己主管的“星火”、“战号”、“红旗”三个剧团，调到中央分局驻地井塘村，举行文艺会演，鼓舞群众和战士的士气。

会演的那天晚上，村里的群众差不多都来了，还有一些是从十几里以外的地方赶来的。中央分局的领导项英、陈毅、何叔衡、毛泽覃、刘伯坚等人也来了。由于没有座位，大家就站在那里看戏。演出时，突然下起了雨，人们仍没有离去，演员们也越演越带劲。群众和战士们为自己喜欢的节目鼓掌、欢呼。节目演完时，天已快亮了。

第二天，秋白专门为演出评了奖。他还主张把山歌、民歌想办法带到上海去出版。还为要出版的戏剧集提名为《号炮集》。

解放以后，曾主管过苏区工农剧社和艺术局的赵品三曾写过一首诗对当时演出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东边唱罢西边和，前幕收场后又开。披蓑张盖通宵立，三度闻鸡不肯回。元宵结彩赣江春，壮舞高歌洗战尘。夜雨绵绵弦韵急，红灯冉冉掌声频。”

## 二、突 围

中央主力红军撤离苏区以后，蒋介石派十万大军对苏区进行

“全面清剿”。到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央苏区被敌人分割成几小块，瞿秋白跟随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从宽田地区转移到黄龙的井塘村。斗争环境十分艰苦，秋白的肺病也越来越重。他拖着病体，每天都要自己动手烧饭，由于柴草很湿，不容易燃烧，满屋都是烟，秋白被呛得不住地咳嗽着……

形势越来越严峻，中央分局在井塘村召开会议研究对策。陈毅在会上再次提出，应迅速转变战略思想，分散部队，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讲话时，陈毅的表情严肃而激动，因为这是关系到中央分局的安危和革命前途的大事，必须坚持原则。由于形势严峻，项英只得接受陈毅的意见，讨论突围的问题。陈毅发言时，秋白一边听一边思考着。会议结束时，主持会议的陈潭秋问瞿秋白有没有意见，秋白表示没有意见。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项英给中央发电报，请中央指示行动方针和突围方向。五日，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万分火急”电报，指示如下：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它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是不适合的。

.....

中央分局接到中央的电报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突围，决定将中央分局、办事处人员，都疏散到各地去打游击。会上还决定将一些有病、体弱的同志转移到白区去。瞿秋白被安排去上海治病，同去的还有何叔衡、周月林和张亮。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中央分局从井塘村转移至于都南部

禾丰地区。转移之前，项英、陈毅安排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和项英的妻子张亮、苏区人民政府司法人民委员梁伯台的妻子周月林一起化装成商人，由一个警卫排护送，离开井塘村，经瑞金武阳往福建长汀转移。中央分局在作出让他们几人撤离苏区的决定后，又命周月林先行护送一担中央政府办事处的铅皮公文箱到武阳山区埋藏，办完后就在那里等候瞿秋白一行。当时武阳还没有被敌人占领，瞿秋白他们赶到的时候，山下已被敌人包围，负责警卫的战士，摸掉了敌人的岗哨，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才得以和周月林会合。

会合以后，瞿秋白对周月林谈了突围转移的计划和打算。他说：“我们不管是到了香港，还是上海，都要尽快找到党组织。”周月林对瞿秋白说：“你是病人，要抓紧时间治病。”说到治病，秋白又关照周月林说：“我当真住了院，你不要把我的地址告诉张亮，连你的住址也不要叫她知道。她口快容易暴露。”

说完秋白好像在思考着什么，过了一会他又说：“这次要是到了上海，一定要去找鲁迅，自从离开上海后心里老是惦念他，要是能见到他就好了。”

二月十七日夜晚，他们来到武阳附近的下洲坝，渡过了绵江河。过河时，衣服都湿了，于是就到黄田的一家祠堂里，烧了一堆火，一边烤衣服，一边烧饭吃。吃完饭，天就亮了。瞿秋白一行继续往白竹寨走。到了老虎、碰上了武阳的游击队。就在这时候敌人也追到老虎，于是游击队与敌人打了起来，听到枪声，周月林吓得走不动路，警卫队人员只得用担架抬着她走。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在游击队的掩护下，安全到达白竹寨，接着又继续向长汀转移，一两天后，他们到达福建长汀县四都区小金村。由于连日来不停的奔跑，大家都非常疲劳。秋白脸色很不好，而且

不停地咳嗽，有时还吐血。何叔衡年事已高，体力不支，张亮怀有身孕又是小脚。不仅行动迟缓，而且还有许多琐事。好在小金村是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他们可以作短暂的休整。随后，福建省委政治保卫局派特务队护送瞿秋白一行向上杭、永定方向转移。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他们到达福建军区所在地琉璃乡汤屋。汤屋形势险恶，省委书记万永诚与瞿秋白等人商讨突围计划。万永诚说：“现在敌人很猖狂，封锁很紧，为了能安全突围，准备将你们和外地买伐木的商人混在一起送出去。先把那些商人抓来，你们也化装成商人的样子，和他们关押在一起，你们设法和这些商人搞好关系。由战士‘押送’到交界线时，你们和商人一起逃跑，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护送战士朝天开枪，掩护你们”。听了万永诚的计划后，瞿秋白认为不妥，他对万永诚说：“如果战士放枪，必然会惊动敌人，危险性很大，而且同商人在一起也难保不暴露身份。”第一个方案没有通过。几天以后万永诚又提出第二个方案：你们几个人乔装成被红军抓来的“俘虏”，每个人都戴上各种颜色的面罩，由战士们“押送”，这样，即使遇上密探，也认不出是谁。

时间紧迫，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大家就同意了  
这个突围方案。

汤屋一带地形险要，敌人盘查得很紧。福建军区在冲锋连里选出几十人和省保卫局特务大队共同组成一支一百余人的武装护送队，继续向上杭、永定转移。他们白天在可靠的群众家里或在密林中隐蔽起来，天黑下来再赶路，二月的闽西，夜晚是寒冷的，休息时既不敢点火取暖也不敢大声讲话，只能倚坐在路边的冰冷的石头上休息。秋白有时咳嗽厉害，怕被敌人发觉，就用手帕捂住嘴，捂得透不过气来。张亮烟瘾很大，走累了就要吸烟，夜间行军稍有火光就很容易被敌人发现，而她却偏偏不听劝告，闹着

要吸烟。何叔衡则坐在一边喘着粗气。二月二十二日晚，瞿秋白一行人在夜幕的掩护下，顺利渡过了汀江。

二月二十四日清晨，下起了小雨，大家走了一夜，又饿又累，当到达水口乡的小迳村时，队伍就停下来休息吃饭，准备下午再走，这时不幸被地主武装“义勇队”发现了。

水口附近是由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和保安第十四团负担共同防务的地区。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下六七千人在闽西赣南边境地带进行游击活动。蒋介石命汤恩伯负责“清剿”，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红军化整为零，坚持斗争，其中三四千人通过瑞金、长汀之间向北挺进，进入浙皖交界处，后来成立了新四军，其余一千多人向东转移。敌人三十六师在水口附近堵截，激战之后，大部分被敌人俘虏，剩下三四百人向上杭方向突围，又被敌保安十四团所截获。

这几天，敌保安十四团团团长钟绍葵有事到长汀去了，水口镇暂由该团二营驻守。这天清晨，地主武装“义勇队”队长范连升报告说：“小迳村附近发现小股红军。”二营长李玉喜出望外，认为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亲自带领队伍直奔小迳村。

负责护送瞿秋白一行的护送队队长丁头牌麻痹大意，警戒松懈，以至于被敌人围困。

同敌人接火以后，丁头牌开溜，护送队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被敌人打散了。邓子恢同志打过游击，于是立即组织大家突围，由于敌人知道红军人数不多，又没有重武器，所以都拚命往上围，邓子恢他们边打边往山上撤，敌人越追越近，情况十分紧急。这时，何叔衡见敌人围了上来就对离他不远的邓子恢喊道：“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说完举起手中的短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邓子恢听罢急忙说：“你不能这样！”边说边冒着敌人的枪弹，朝他这

边跑过去。可是已经晚了，何叔衡的枪响了，接着人便从山崖上滚了下去，邓子恢的心碎了，他用枪拚命向敌人扫射……

瞿秋白开始时还跟在护送队员的身后，不停的奔跑，可后来就跟不上了。他气喘嘘嘘地对邓子恢说：“我病到这个样子，实在走不动了，你快点走吧！”邓子恢急了，三番五次催他快走，秋白怕连累大家，就是不肯走。于是邓子恢就硬拉他走，秋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对他说：“你快点走吧，我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无奈，邓子恢集合起剩下的几名战士，奋力突出重围，向闽西方向走去。

枪声渐渐地稀疏下来，秋白想，邓子恢他们大概已冲出去了。他松了一口气，心里也慢慢平静下来，他见四周没有敌人，就站起身来，慢慢朝前走去，不一会他碰到了周月林。两人走了一段路又碰到了张亮，他们三人在一间没有屋顶的破屋子里休息了一会，怕敌人搜查，就向山里的密林深处走去。

枪声已完全停止了，敌人开始搜山。这时敌人发现了滚下山崖的何叔衡，当时虽然他身中数弹，但是还没有断气。敌人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从他身上搜出了五百元港币，这笔钱是瞿秋白一行从瑞金出发时，中央分局发给的交通费，是由何叔衡保管的。敌人得到这笔钱后，为了灭口，便将何叔衡杀害了。

敌人地主武装“义勇队”在树丛中搜索着。秋白和周月林、张亮在草丛中隐蔽起来。

周月林在《我和瞿秋白何叔衡一起突围、被俘的前前后后》中写道：“过了一会，张亮来了。后来瞿秋白也来了。他说：‘我也到你这里来，说后就跳了下来，他的身子碰着了树身，树枝摇动了，被山上敌人发觉了，只见敌人向我们这边搜索过来，还相互说：没有风，别的树都没有动，为什么那棵树会动，可能有人。敌



人来到草丛前一时不敢进来，对着草丛喊叫：里面有人没有？我们没有响，敌人又一连喊了三次，然后向草丛中搜来，就这样我们三个被敌俘了……”

### 三、被俘之后

匪兵们押着瞿秋白、周月林、张亮等人朝山下走去。瞿秋白满身泥水，拖着病体一摇一晃地在泥泞的路上艰难地走着。匪兵不时地催促他快走，并威吓说：“不走就地枪毙！”瞿秋白并没有被吓住，照旧慢慢地走着，他知道敌人是不会轻易枪毙他们的，他们还要回去拿他们领赏报功呢。

当他们被押到水口镇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敌人来不及审讯，就将瞿秋白和周月林、张亮关押起来。夜晚，黑暗的牢房里不时传来匪徒们划拳行令喝酒取乐的吆喝声。瞿秋白坐在角落里想，明天敌人一定会严刑逼供，在敌人未查明身份之前，一定要想好一套对付敌人的办法。于是他便和周月林、张亮悄悄地商量起来，他们认为白天红军把他们当作俘虏“押送”，明天正好利用“俘虏”这一假身份来欺骗敌人。商量好之后，他们正要休息，突然传来匪兵的脚步声，接着门被打开了，两个喝得醉醺醺的匪兵闯了进来，架起周月林就往外走。她一看苗头不对，不像传讯，知道敌人一定不怀好意，于是就大声叫骂起来。躺在里边的瞿秋白猛地坐起来，怒视着敌人，接着就站起身来要和敌人拼命。两个强壮的匪兵被秋白的愤怒震住了，放下周月林，用力把瞿秋白推倒在地，出去了。秋白看着坐在地上发呆的周月林，深有感触地说：“阿梅啊，今天我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们妇女比我们男子还要多一层痛苦。”

第二天，敌人对瞿秋白严刑逼供，强迫他说出红军的行动路线和其它机密。瞿秋白受尽折磨，但始终咬紧牙关，一口咬定自己叫林琪祥，现年三十六岁，是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来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以后又在医校学习半年。一九三二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红军攻打漳州时被俘，并押往瑞金，任卫生总部的医生、医助等职。一九三五年一月携款逃离瑞金，但走到上杭露潭地区又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当夜由保卫人员看押，准备第二天再走，被国民党军发现后被俘。

周月林和张亮也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哄骗敌人。周月林说自己叫陈秀英，是红军的护士。张亮供称叫周莲玉，是香菇客商的老婆，是被红军“绑票勒索者”。

审讯的敌人被蒙骗了过去，第一关算是闯了过来。敌保安十四团团团长钟绍葵自长汀回到水口镇之后，二营营长李玉马上向他邀功请赏。当得知被俘的人携带有港钞和黄金，而且护送的人多数带有驳壳枪，这一情况引起了他的警觉，老奸巨猾的钟绍葵想，这些人决不是等闲之辈，一定是共产党的“要人”，否则就不会那样兴师动众了。当天晚上，他亲自审讯瞿秋白，瞿秋白镇定自若，回答的仍然是那一套：名叫林琪祥，三十六岁，江苏人……

刑讯没有结果，但敌人仍不甘心。于是二月二十五日钟绍葵、李玉亲自带队，乘船将瞿秋白押往上杭监狱关押。

在上杭监狱，钟绍葵一心想从秋白嘴里挖出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来，敌人连续数天酷刑逼供，瞿秋白仍未暴露身份。敌人只好让他录一份“笔供”。为了欺骗敌人，以求脱身，瞿秋白在“笔供”中说自己是“北京大学医学系毕业，民国二十四年赴漳访友，后不幸被匪虏去”，“文书胜任，足敢自负，担任医学上士，绝不至于尸位。”参加刑讯的李玉看到秋白的“笔供”后说，如果所述

属实，可取保释放，要秋白写信给朋友索取证明或在当地觅铺保，以证明自己确与共产党无关系。

周月林和张亮因为是女的较瞿秋白更容易蒙混过关，胡编几句敌人也就相信了。

二月底，李玉看女护士陈秀英（即周月林）有几分姿色，就以其妻即将分娩，要她到家中服侍为由，把她接到家中当“保姆”。张亮怀孕在身，不久也由上杭县城一家糖果店的老板林鸿昌保出，纳为姨太太。

三月中旬，瞿秋白在未暴露身份的时候，用林琪祥的化名，写信给鲁迅和周建人，要他们在上海寻找铺保，设法保释。他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

我在北平和你有一面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不是共产党，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瞿秋白知道自己的信，敌人是一定要检查的，所以他决不能暴露和鲁迅的真实关系，但又要鲁迅知道自己的处境，和自己是如何蒙骗敌人的。所以信中的话等于是向鲁迅交个底，鲁迅才好设法营救。就在瞿秋白请鲁迅帮忙保释的信发出不久，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故，使敌人掌握了瞿秋白被俘的线索。

四月十日，福建军区的三百多名指战员，在长汀的腊口被国民党汤恩伯部第八师包围，军区司令员万永诚突围时壮烈牺牲，其

妻被敌人俘获，供出了在濯田地区被捕者中有瞿秋白。第八师师长陶峙岳立即向福建省绥靖主任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发电：“据王永诚妻供称瞿秋白、何叔衡及项英之妻在濯田已被我军俘获。”敌人掌握了瞿秋白已被俘的线索后，加紧在被俘的红军中，严密清查秋白的下落。此时瞿秋白还不知道敌人正在暗中追查他的下落，但深知如果再继续拖延下去，难免不暴露身份。于是他在四月十五日，又向伪保安十四团团团长钟绍葵写了一份“呈文”，文中叙了以前“笔供”中的情况，要求钟绍葵开释出狱，或资遣回江苏原籍，或就在本地当教员、文书等，决不私自遁走，保证随传随到，继续欺骗敌人，以求早日脱离险境。

四月下旬，在医院养伤的敌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接到蒋介石从南京发来的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子瞿秋白在俘虏群中，要严密清查。”宋希濂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加紧盘查，把情况向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做了报告。由于上杭地区国民党没有驻扎正规军，蒋鼎文就给在当地防务的伪保安十四团发报，严密清查瞿秋白的下落。保安十四团在接到蒋鼎文的电令后，感到责任重大，并且知道如果瞿秋白查出，一定会得到上司的重赏，所以非常卖力气清查。

几天以后，敌人保安十四团发报给三十六师，报告说俘虏中有一个可疑人，自称叫林琪祥，江苏口音，面容消瘦，职业医生。宋希濂立即派师参谋长向贤矩亲自前往上杭，将此人解往长汀师部审问。

为了追查瞿秋白的下落，保安十四团又将保释的周月林、张亮重新收押，解送第二绥靖司令部驻地龙岩。

钟绍葵在给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的电文上说：

职部在水口俘获男匪林琪祥一名，经派传达二名由船解

汀，到否乞电示，近查该匪有云系瞿秋白，乞严讯，女犯周莲玉已供系项英之妻，陈秀英据俘匪称是梁柏台之妻，该仍在审查中。该二犯拟于鱼日连同俘获枪械派员解送龙岩区司令部讯办。

钟绍葵邀功心切，又给第二绥靖军司令李默庵呈文：

查职团长汀水口之役，俘获男匪一名，女匪周莲玉、陈秀英二名，一再审查，林琪祥似系瞿秋白化名，奉宋师长电令，既限日解送长汀讯办，周莲玉经俘虏指认系项英之妻。该匪亦已供认不讳，陈秀英言语狡黠，据俘虏兵云，似是梁柏台之妻，兹仅将该女匪周莲玉、陈秀英二名连同口供解送钧部。

后来，国民党国民政府行政院果然给钟绍葵的保安第十四团发了重赏。据说有十万银元。但等发到钟部只剩下三万元，大部分都被福建省政府扣留了。

#### 四、狱中斗争

瞿秋白被叛徒出卖后，被钉上镣铐，由伪保安十四团和三十六师的大批匪兵押送着，乘船沿汀江溯流而上，到了河田又走了几十里陆路，五月九日才到长汀，被关押在三十六师师部。

第二天，敌人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先启等人经过研究策划，决定组织特种军事法庭来审理瞿秋白一案。吴淞涛被指定为审判长，参谋处第二课长张翼扬、副官处少校副官陈定任审判官。“走！长官要问话。”身穿灰色夹长袍的瞿秋白被两名匪兵押到“审判”室。

吴淞涛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板着脸问：

“你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

瞿秋白站在庭中，态度从容不迫，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声音平淡地回答：

“林琪祥，三十六岁，上海人，医生”

吴淞涛见瞿秋白不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并没有发怒，反而露出一丝冷笑：

“民国十六年我在武汉见过你，你不是什么林琪祥，而是共党头子瞿秋白。”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瞿秋白！”瞿秋白镇定自若地回答。

“好！我会叫你心服口服的。带证人！”吴淞涛挥了挥手。

一个圆脸、身材矮胖、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被带了进来。这人就是叛徒郑大鹏。他原来是瑞金工农民主政府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勤杂工。吴淞涛假装正经地问了叛徒的姓名、年龄、籍贯。郑大鹏都一一作答。然后指着叛徒问瞿秋白：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瞿秋白回答。

吴淞涛又问叛徒：“你认识他吗？”

叛徒不敢正视瞿秋白，只是低低地说：

“他是瞿秋白。工农民主政府教育文化委员。”

“他的话你听到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吴淞涛得意地对瞿秋白说。

“事已至此。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以前的‘供状’就只当是一篇小说罢。”

此时，坐在一旁的张翼扬插问：

“你们闯入水口镇干什么？”

瞿秋白回答说：“我有肺病，想经水口镇突围到漳州转上海就医。不料经过封锁线，寡众不敌被俘。”

以后无论敌人再问什么，瞿秋白都闭口不答。

“审判”就这样结束了。瞿秋白又被押回那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去。敌人这次“审判”的目的并不是想从瞿秋白那里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他们深知要想从瞿秋白的口里问出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来，比登天还难，这也不是他们这几人力所能及的，能够进一步证实瞿秋白的身份就算大功告成。于是，参谋长立即将审讯的情况报告给刚从医院返回三十六师长汀师部的师长宋希濂。

宋希濂，是湖南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同年被派到日本步兵学校学习军事。一九三〇年春天，蒋、冯、阎中原大战时，被蒋介石召回，东征西讨，为蒋平息大小军阀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得到重用，由一名小参谋而晋升为团长、旅长、副师长。一九三三年三十六师成立，又被任命为师长，军衔由少将升为中将，时年只有二十七岁。开始时三十六师负责警卫南京，后来“福建事变”发生，蒋介石调三十六师前往平息，事后又被蒋介石调往苏区参加第五次“围剿”。

一九三四年九月，国民党第三师八旅在朋口被红军突袭，遭到惨败。旅长许永相被蒋介石枪毙，师长李玉堂也被降职。为了打通闽西通道，蒋介石命主力三十六师在朋口与红军决战。

通道被敌人打开了，为此三十六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宋希濂本人也在战斗中负伤。宋希濂住院养伤时，三十六师进驻长汀。在医院里，宋希濂得到报告说瞿秋白被押到师部，于是急急忙忙赶了回去。

参谋长向贤矩报告说瞿秋白已承认自己是瞿秋白之后，宋希

濂并没有立即作出安排，而是说改天再说。向贤矩走了以后，宋希濂进入深思。

在长沙郡中学读书时，他在老师那里曾阅读过瞿秋白写的访苏的文章。进入黄埔军校以后，还亲耳听过瞿秋白的报告，对他的才学很钦佩，因此也就有一种崇敬之情。现在这位共产党领袖成了自己的阶下囚，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上的中将领章，一种复杂的感情油然而生。宋希濂一夜未眠。他认为对待瞿秋白这样的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硬来是不行的。一要“软化”，二要有耐心。天一亮，他就写了一道手令：“优裕待遇，另辟间室。”

在宋希濂的“关照”下，瞿秋白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换了一间稍大一点的房间，离宋希濂的住处很近。室内有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二三条板凳和一个洗脸架，伙食是和师部的工作人员一样，有时还加几两酒。由于瞿秋白病得很厉害，一旦出现问题不好交待，于是宋希濂找了一位姓陈的军医为他看病。对于这些瞿秋白并无所求。除下了镣铐而且有了纸墨笔砚，又能工作和与敌人斗争了，这倒让他觉得开心。

瞿秋白当然知道敌人这种“优待”背后隐藏的是什麼。他有自己的主张和原则：一不叛党，二不出卖同志。你客客气气，我也不卑不亢。于是每天读诗写字，陈军医经常来为瞿秋白看病，非常钦佩他的才学，得知秋白擅长书法篆刻后，就为他搞了一套篆刻工具和一些章料。自此以后师部的官兵常向他讨印章，瞿秋白有求必应，并且借机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到了晚上，瞿秋白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在狱中他写了一篇长达四千余字的“供词”，热情歌颂了中央苏区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批驳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他在文中写道：



苏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个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

苏区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还是相当安定和充足的，不过盐贵些，布缺些，这是国民党封锁的关系。我看见一般农民当时的饭菜，问他们比革命以前怎样，他们都说好些，因为分了田。到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很多很多的围紧起来，占领了一切城市和圩场，乡村中的生活就一天一天苦起来……

当时，苏区曾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些干部和群众无辜被杀。敌人利用这一些进行反共宣传。瞿秋白在供词里对敌人的阴谋也进行了揭露和驳斥。他说：

自然，革命和战争难免杀人，这种肃反的工作做得“过火”或是错误，就会引起一种民众的恐慌和反感。可是，在我到苏区的这一年中，早已没有这种现象……正是共产党中央迅速纠正了他们……在中央的决定之中，决没有以残杀为原则。“越杀越革命”、“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几岁的孩子都要杀”的事情。据我所知道的，就是“消灭地主阶级”的口号，也绝对不是杀尽地主的意思。

瞿秋白曾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内心非常痛苦，但在敌人面前是不能流露出来的，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党内有不团结的现象。他在谈在苏区的感受时说：“到了苏区，使我更加感觉到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全党，同以前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如李立三)领导的时候比较起来，大不

同，工人干部多了，工作方法也是新的了。政治分析的能力也强多了。”

瞿秋白为了掩护留守红军转移，在“供词”中有意迷惑敌人，虚构了一个假情况，他说：

在二月初有一次会议，决定了三条路线：第一条是闽北和清流、宁化一带；第二条是由江口渡江向西行动；第三条是于都、兴国方面。项英、陈毅、梁柏台、何自立等就是在决定的几条路线去活动了。至于何人担任何路线都不明白了。

实际上留守红军活动的路线分为九条。项英、陈毅早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就到达赣粤界的油山与李乐天的部队会合了。至于项英、陈毅的名字，早已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瞿秋白在“供词”的最后写道：

最后我只要说：我所写的是我心上真实的感觉。我所见、所闻、所作、所想的。我不会随声附和写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

当然，由于瞿秋白的文人气质和他的工作生活经历所决定，在文中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某些消沉的情绪来。但从总体上看，秋白的“供词”确实击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痛处，以至于国民党始终不敢公开发表秋白的“供词”。

宋希濂坐在师部的办公室里，一边喝茶，一边看着瞿秋白的“供词”：“这个人是一位敢讲真话的人，这样的人最难对付。”他阅完“供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实行“软化”策略已有好几天了。

几天以来，他一直在想如何去同瞿秋白摊牌。对共产党人他还是了解的，黄埔军校的周恩来主任，还有陈赓同学，这些人都是具有崇高的信念的。不是什么人，三言五语就能说服的。现在瞿秋白虽然成了阶下囚，但也不会俯首贴耳的。他想和瞿秋白会面，但又不敢与他会面。想的是蒋介石交待的任务必须完成，设法将瞿秋白争取过来，为党国服务，怕的是谈不好，自己丢面子不说，以后的工作就更难开展，但拖下去也不是办法。想到这儿，他吩咐副官将瞿秋白带来见他，副官打个敬礼刚要去执行。宋希濂又说：“算了，还是我去他那里。”

副官见师座要亲自见犯人，觉得不妥，就劝道：“您何必亲自去，我去把他叫来就行了。”

“我为什么不能亲自去，他虽说是囚犯，但在共产党里，他比我们职位要高得多。再说我亲自去见他更有利于软化工作，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懂。”

宋希濂的几句话，让副官觉得还是师座高明。于是跟在宋希濂身后走出房门。

瞿秋白被关在大门左边的一间房里。宋希濂进来的时候，秋白正在伏在靠近窗户的桌子上写诗。

“瞿先生，宋师长来看你！”因为事前，宋希濂曾作过规定，自师长以下对瞿秋白都要以“先生”相称，所以副官也这样称呼。

瞿秋白并未起身，只是放下手中的笔，点了点头。宋希濂，走到瞿秋白跟前，扫了一眼桌上的诗稿，在瞿秋白旁边的椅子上坐下说：写的什么诗，可否让我拜读一下。

“可以！”瞿秋白说着便把诗稿递了过去。上面写的是一首《卜算子》词，其中最后四句写道：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

故。

“写得好，一看便知是大家手笔。”宋希濂称赞说。

听宋希濂的话，瞿秋白只是淡淡的一笑，然后直接了当地说：“宋师长，此次来到这小小的囚室，恐怕不是来谈诗的吧？”

“没有旁的事，只是来看看你。”宋希濂很自然则而随和地说。接着又问了一些瞿秋白的生活和身体情况，然后才转入正题。

宋希濂仍以谈心的语调说：“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的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在农村里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有五百亩以上的地主，在每一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都是祖先几代人辛勤劳动积蓄起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成为小地主，他们的生活水平如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向这样的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宋希濂滔滔不绝讲了一大套，也想借孙中山的理论来压一压瞿秋白，看他如何解释。

宋希濂说完后，腰板挺直地端坐在那里，用一种期待的目光望着瞿秋白。

瞿秋白漫不经心地用手中的黑笔在纸上随便地涂画着，然后慢慢地说：“一九二四年，我曾帮助孙中山先生起草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孙先生本人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这是他的伟大贡献。但是孙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长在大都市里，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尤其是农村的情

况，不大了解。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只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或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

停了一停，瞿秋白又说：“至于你一路上看到有些地方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的情形，并不是我们共产党搞阶级斗争造成的，而是你们军事‘围剿’，经济封锁造成的。你们来了，老百姓跑了，土地无人耕种，所以显得荒凉，我想主要是这个原因。有关苏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我在‘供词’中都写了，想必你也看过。”

宋希濂见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辩过瞿秋白，就又换了一个话题：

“最近，我看到一份江西省政府调查报告，说自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在南昌暴动起，随后在农村搞分田运动，一直到共军退出江西根据地，仅七年时间，江西人口减少了八百万，我过去读过历史，说黄巢杀人八百万，感到寒栗，今天你们搞阶级斗争，更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实在是太可怕！”说着说着，宋希濂语调变了，还真有点动情。

瞿秋白毫不退让，他站起身来严肃地说：“你们有意夸大数字，只想以此来污蔑共产党。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过程中人员的死亡和人口的减少，是免不了的，但是国民党先后调集了几百万以上的军队来围攻我们，这是铁的事实。”

宋希濂知道再与瞿秋白争论下去，也是不会有结果的。于是就话题一转说：“总之，我们是不允许共产主义在中国存在的。红军已奄奄一息。不久就会被连根拔去，瞿先生，你要明白你现在的处境，还是及早回头，才有出路。”

“对于我的处境，我当然明白，蒋介石是不会放过我的，你们给我的出路我是永远都不会走的。”瞿秋白一字一句地说。

“不要急于下结论，还是好好想一想再说，你的身体不好，就不打扰了。”说完站起身走了出去。

自从碰壁之后，宋希濂就再也没有同瞿秋白当面交谈过，但依然好食好饭地招待，继续他的“软化”工作。

被俘以来，瞿秋白常感到孤独和压抑。秋白这个人是个有话憋不住的人。以前，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瑞金，他心里有话，或是对工作有什么意见，总是要找同志或朋友聊聊，说出来，心里就觉得畅快。特别是在和鲁迅相处的日子里，更是有说不完的话。而现在却不能，他面对的是敌人。有时他常想，那怕是敌人，让他痛骂一顿也比闷在心里好受。和宋希濂的交锋，虽然让他感到痛快，但马上又陷入了孤寂的深渊。此刻他又想起了远方的亲人，战友，想到了杨之华、鲁迅、冯雪峰、茅盾……他很想给杨之华和鲁迅先生写封信，但考虑到他们的安危，信如果落到敌人手里是会给他们带来不测的。所以好多的话只有留在心里，让他浮出来又沉下去。前几天，听给他看病的陈军医说郭沫若已去了日本，对！给他写封信，敌人鞭长莫及，一旦信出了问题敌人拿他也没办法。给郭沫若写信既是对战友的关心，也是一种感情上的宣泄。所以信很快就写好了，望着桌上的书信，他又开始犯难了：以自己现在的处境，这信又如何能送出去呢？他想到了上校军医陈炎冰。

自从宋希濂安排陈炎冰为他看病后，陈军医就常到他这里来，有时还主动帮忙，为找些唐诗、小说之类的刊物供他消磨时光。瞿秋白也曾为他刻过两枚图章，作为回报。天长日久，两人有了点小交情。秋白也乘机试探地向他讲一些苏区的事件。陈炎冰也未感到反感，而且还向瞿秋白透露，早年曾毕业于广州中山医学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北伐。大革命失败后，留学日

本。后经三十六师总医务处长邱定邦介绍，作了军医。瞿秋白想来想去觉得此人是唯一可以帮忙的人了。

这天，陈军医又来为他看病，陈军医让瞿秋白解开衣服扣，熟练地用听诊器在他的肺部听了听说：“你的病虽没有发展，但还需注意才是。”

“我的病到是无所谓，反正无论怎样都是要去死。现在到是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瞿秋白用眼睛盯住他说。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一定会帮的。”陈炎冰有些惊异地说。

“我有一封信想托你帮忙寄给郭沫若。”

“这点忙还是容易帮的。”陈炎冰见秋白的嘱托并不至于使他掉脑袋，也就爽快地答应下来。瞿秋白把信递给陈炎冰说：“你先读一读吧！”

“不妥吧？”陈军医把信推了回去。

“没关系，我要信不住你，也就不找你了。”

陈炎冰把信接了过来，只见上面用清秀的小楷写着：

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这在国内阶级战争中当然是意料之中可能的事。从此，我的武装完全被解除，我自身被拉出了队伍，我停止了一切种种斗争，在这等着“生命的结束”。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使我惭愧的倒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远在被俘以前——离现在足足有四年半了——当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后，虽然是因为“积劳成疾”病得动不得，然而我自己的心境就已有了很大的变动。我在那时，就感觉到精力的衰退甚至于渐灭，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尽力。偶然写些关于文艺问题的小文章，也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话。我早就“猜到了”我自己毕竟不是一个“战士”，无论在那一战线上。

这期间看到了你的甲骨文字研究的一些著作，《创造十年》的上半部。我想下半部一定更加有趣：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而后来就像触了电流似的分解了，时代的电流使创造社起了化学的定性分析，它因此解体，风化。这段历史写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也终于禁不起了。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量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

只有读着你和许多朋友翻译欧美文学名著，心上觉着有说不出的遗憾。我自己知道虽然一知半解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只有俄国文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译过一部好的文学书（社会科学的论著现在已经不用我操心了）。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的了。

还记得在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当年的豪兴，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做温暖的回忆罢。愿你勇猛精进！

瞿秋白 一九三五，五，廿八，汀州狱中，

陈炎冰仔细地读了一遍，信的内容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一些话，直到三十多年以后，他还记得。

瞿秋白叮嘱他将信隐藏好。并说我作了一些诗，将其中的三首抄送给你留下纪念吧。这三首诗是《卜算子》、《浣沙》、《梦回》。陈炎冰把秋白的信和赠诗一并收起后说：“瞿先生，我也有一事相求，你刚押来时，师部让我为你照了相，我私自留了一张。



想请你在照片上签个名，作一个永久性纪念。”看见陈军医那恳切的目光，瞿秋白就接过相片，略微沉思了一会便在上面题了一道诗：“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末尾还写下一个短语：“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秋白一九三五年摄于汀州狱中。”然后又在诗眉首写上“炎冰先生惠存。”陈炎冰非常珍惜地把照片收了起来。

陈炎冰走后，瞿秋白感到浑身轻松了许多。他想这封信也许到不了郭沫若手里，就会被国民党查获，但不管怎样，自己要说的话，总算说了出去。

后来，一九三五年六月瞿秋白英勇就义，陈炎冰脱离三十六师要去澳门探亲，便将瞿秋白的信和所赠诗稿及照片，交给了他的同事军医王廷俊保存。王廷俊为稳妥起见，就邮给了在美国的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柳无垢又转给了她的父亲柳亚子。于是，瞿秋白给郭沫若的信，于一九三六年在美国纽约中文周刊《先锋世间》发表了。秋白的三首狱中诗后来也在上海出版的《人世间》杂志上发表了。解放以后，陈炎冰回到故乡盐城医院任内科主任，后任卫校教务主任，并当了广东温泉医疗研究所副主任，一九八四年冬天又参加中国共产党。

在瞿秋白囚室的外面，有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两棵金桂树，天热的时候便可以出来乘凉，但瞿秋白却很少出来，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蒋介石决不会让他这样白白地活下去。因此，他必须抓紧时间把要说的话说完，他必须写一点东西留给后人，让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这样在九泉之下才能安心。

于是，他整天在囚室里想着写着……

回首自己投身革命以来，一直在奋力拼搏，也曾一度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在别人眼里，自己是领袖人物。但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领导，犯过许多错误，做领袖是不合格的……写着写着他又想起在上海同鲁迅、茅盾在一起时的一件往事来。记得，有一次鲁迅、茅盾见他“犬耕”的笔名发表文章，都不解其意，于是就问他“犬耕”二字作何解？他回答说：“我弄政治就好比使犬耕田，力不从心。”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是对的。他对自己所犯的盲动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深感内疚，觉得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他在纸上痛心地说道：

我自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他又想到自己将告别人世，许多熟悉的朋友、同志、亲人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他怀着惜别的心情写道：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跟上你们了。

虽然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但对他为之奋斗的美好未来仍然充满信心：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宏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了。

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瞿秋白的心头思绪万千。他提笔写道：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几天以后，一篇二万余字的自我剖析的文章写了出来，这就是后来争议颇多的《多余的话》。“文革”中“四人帮”曾以此作为把瞿秋白定为叛徒的证据。好在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证的。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中作了公证的结论：

《多余的话》一向传说是瞿秋白同志在狱中写的自述，最先刊登在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上。一九五四年以来，经反复查找，迄今国内外从未发现《多余的话》手稿。

瞿秋白刚刚写完《多余的话》，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派遣的两名高级特务王杰夫、陈建中就到了长汀。宋希濂在师部会见了二人，简单介绍了前一段诱降工作的情况。并说：“让瞿秋白反对共产党恐怕是不可能的。”王杰夫则吹虚说：“我们以前做过中共一些大叛徒的劝降工作，而且有顾顺章的例子。如果工作得当，瞿秋白一定能回心转意。”宋知道二人是陈立夫的手下，不便多言，心想：“试试就知道了。”

王杰夫，吉林人，燕京大学毕业，在中统训练科任科长，专门负责领导“中共自首人员招待所”和中统“社会调查人员训练班”，是陈立夫的得力干将。

陈建中，陕西人，他原来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一九三三年被捕后叛变，曾帮助中统特务机关破获了中共在西安及陕西的地下组织。因表现突出被陈立夫调到中统任行动科干事。

二人从南京出来之前，老板陈立夫曾交待：“如能说降瞿秋白，那么国际上的号召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并责令他们通过瞿秋白查

明共产党在香港、上海的地下组织及潜伏计划。为此，中统根据瞿秋白的身份、地位、学识、爱好等情况制定了几套“说服方案”，就连诱降时采用的谈话方式及使用的语言也都作了专门研究。在为王杰夫、陈建中送行时，陈立夫一再叮咛：“此行成功与否，关系我局前途至大，在委座前信用至大，切不可掉以轻心。”最后板着脸说：“工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谈话”在三十六师的一间会议室里进行。早晨八点钟瞿秋白由两名匪兵押着，在师参谋长向贤矩的带领下到“谈话室”，瞿秋白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先启等人围坐在长条桌子旁，在桌子的上方坐着两位以前从未见过面的人。秋白想：“这大概就是今天谈话的对手。”果然，秋白被向贤矩安排在他们的对面坐下，并指着胖子王杰夫说：“这位是王专员。”王杰夫朝秋白点了点头。向贤矩又指着瘦子陈建中说：“这是陈秘书，他以前也是共产党，现在为党国工作。”瞿秋白鄙视地朝叛徒扫了一眼，陈建中尴尬地朝瞿秋白笑了一笑。

介绍完毕后，王杰夫先和瞿秋白寒暄了一番，然后皮笑肉不笑地对秋白说：“你的事，我们早就听说过，你是当代名人在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而且俄文在国人中也是数一数二的。蒋委员长非常爱惜人才，特意派我们来，你要回心转意，是很有前途的。”

“那是不可能的！”瞿秋白斩钉截铁地说。

“那又何苦呢？目前共产党已经是穷途末路，你再跟着跑，能有什么发展。”王杰夫扶了扶架在鼻子上的金边眼镜，慢条斯理地说。

“我之所以跟共产党走，是因为共产党要比国民党强上百倍，虽然目前遭受挫折，但一定会转危为安，将来也一定会战胜你们

的。”瞿秋白声音不高，但态度十分坚定。

王杰夫见正面攻不下，就退了一步说：“其实我们也不需要你去做什么反共的大事。只要你回心转意，可以让你到南京去主持编译室，负责翻译托洛茨基的书刊。”

“我只能解译高尔基的作品，至于托洛茨基，我一不认识，二不感兴趣，到那时你们就会大失所望，所以我还是不去的好。”

王杰夫被气得眼泡都鼓了起来，他压着火说：“瞿秋白！你要知道你的罪恶，共产党几次大的暴动都有你的份。要不是陈立夫部长保你，委员长早就把你枪毙了，你再也不认罪，我们就没办法了。”

“我知道，你们是不会无代价地让我活着，‘优待’也好，枪毙也好，对我来说都一样。”

坐在一旁的陈建中，怕僵持下去不好收场，就连忙插话说：“瞿先生累了，还是休息休息，下午再谈吧。”说完，朝向贤矩使了个眼色，向贤矩连声附和说：“是的，瞿先生累了，吃了饭再谈吧。”

瞿秋白被卫兵押了下去。

下午，敌人变换了谈话的方式，决定用亲情来打动他，唤起瞿秋白的求生欲望。他们在瞿秋白坐位的桌子上摆了四碟瓜子、花生、莲心、糖果和香烟。谈话一开始，陈建中就说：“自从瞿先生被捕以后，许多亲友都为瞿先生的安全担心，他们还托人向中央呈意见书，要求保释你。你要好好考虑，不要错过机会。”

瞿秋白听到敌人提到亲友后，心头一沉，他不由得又想起了杨之华、鲁迅等亲友。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营救的，特别是鲁迅先生，他的社会关系广博和在国民党里做事的蔡元培很熟，定会设法相救。

善于察颜观色的陈建中见瞿秋白低头不语，以为被亲情所动，就进一步说：“你的才学是世人所公认的，你死了，不仅亲友们觉得可惜，国家也会因失去你这样的人才而惋惜的，你是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没有生命你的理想抱负又何从实现。”

瞿秋白猛地昂起头愤愤地说：“不错，我是有理想、抱负的人，但我的理想与抱负则与你是完全不同的。我的抱负是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为此，就是失去生命也虽死犹生。而你为了升官发财可以出卖同志，苟且偷生。我就是死一千次，也不愿像你这样活着。”

陈建中的脸被秋白说得一阵红一阵白，“谈话”又一将陷入僵局。

王杰夫一见苗头不对，马上把话接了过来：“中央爱惜你的才学，派我们不远千里来挽救你，你可以不顾，难道亲友的规劝你也不顾吗？”

“我相信，真正关心爱护我的亲友，特别是杨之华，他是不会同意我丧失人性而生存的，如果我因为叛党而生，会使她感到耻辱和痛苦的。”王杰夫的话被瞿秋白顶了回去。

这次“谈话”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王杰夫和陈建中回到住处，互相埋怨起来。王杰夫官大压人，怪陈建中没有把握分寸，急于求成，陈建中则说王没有配合好。他们最后商定，最后再找他谈一次，还是先来软的，对外界的情况也透露一点，让他认清“时局”，如若不成，也只得放弃。

夜晚，囚室里，瞿秋白也在想，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人世，对于死，从被敌人俘获那天起就已作好了死的准备。但他一想到还有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就觉得遗憾。从上海出来时，留在鲁迅那里的一些稿件，恐怕是无法完成了。他又提醒自己和敌人“谈话”时，

一定要注意决不能暴露自己同鲁迅的关系……

第二天，瞿秋白又被敌人押去“谈话”。时间是在上午。这次敌人还准备了酒菜和茶点。待瞿秋白坐定以后，王杰夫说：“瞿先生身体可好？今天我们不谈政治，随便聊聊天，来让我们共同干一杯。”

“酒可以干一杯，但我要事先警告你们，除了喝酒之外，你们的目的是不会达到的。”秋白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几天来，虽然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但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王杰夫说。

“国民党与共产党曾经是朋友，但‘四一二’以后就不是朋友了。几年来，你们不去搞抗日，而派大军‘围剿’红军，到处屠杀人民。但是，在白色恐怖面前，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屈服的。”瞿秋白慷慨激昂地说。

“难道你真的不想活了吗？”王杰夫说。

“如果一个人丧失了灵魂，只剩下一个躯壳，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听了瞿秋白的回答，王杰夫惊愕地望着瞿秋白，停了一会儿，他放下手中的酒杯，凶狠地说：“老实告诉你，这次中共西窜，许多委员都被我们捕获，地位比你高的，都转变了过来，你不要顽固不化！”

“对待生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我是决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的。”瞿秋白坚决地说。

“瞿先生，我们明天就要回南京了，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希望你认真考虑。”

“该说的已经说了，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

“好吧，那就在上面签字吧！”王杰夫将“谈话”记录推到瞿

秋白面前。

瞿秋白连看都不看一眼，就在上面按了手指印。然后给亲友们写了一封短信：“感谢关怀，身体尚好，今后勿以我为念……”

当天晚上，宋希濂为王杰夫、陈建中等人饯行。王杰夫说：“我们失败了，有关工作情况，我回去后会向陈老板交待的。”宋希濂感慨地说：“瞿秋白虽然是‘敌党’，但确实是一位极有信念的人，几个月来，他的言行始终如一，而且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们党国就需要这样意志坚强的人。”王杰夫虽然觉得宋师长的话很刺耳，但一想说的也确是实情，因此也就没有追究。

宋希濂接着说：“王专员此次虽说服未成，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们已尽力了，让我们举杯，祝你一路平安。”

第二天上午，王杰夫、陈建中离开长汀，垂头丧气返回南京向陈立夫复命。

瞿秋白在狱中，除了与特务的斗争外，还曾接待过《闽西日报》的一位记者李克长。当他问起鲁迅与共产党的关系时，瞿秋白立即警觉起来。他淡淡地说：“鲁迅原非党员，伊发表作品，完全出于其个人意志，只能算为同路人。”巧妙地保护了鲁迅。



## 第八章 不朽的丰碑

自从秋白离开上海去瑞金以后，鲁迅怀念秋白的心情越来越深切。收到秋白化名林琪祥的信后，焦急万分，立即设法营救。得知秋白遇害，精神受到很大创伤，从此身体越来越坏，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病逝，终年五十六岁。

### 一、奔走相救

一九三五年四月的一天，鲁迅木然地坐在寓所的藤躺椅上，手里依然紧握着瞿秋白从福建长汀监狱托人转来的信，信封背面盖有1个蓝色长方形的印章，说明已经过监狱的检查，信中署名林琪祥。

“‘瞿’字上面是双目，目木同音，双木为林，瞿秋白被捕了。整天惦念他，可他还是遭到不幸。”鲁迅心中沉吟着。他站起身来缓缓地走到一张书桌前，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这张书桌是瞿秋白离开上海去瑞金时寄存在这里的。睹物思人，鲁迅的脑海里不时地浮现出瞿秋白的身影。沉思中听到有人敲门，不一会弟弟建人走了进来，他对鲁迅说：“今天在商务印书馆上班时，茶房送来一封信，看来秋白是被捕了，他说狱中衣被单薄，很冷，需要一些衣服或钱。”

“没错，是他，看来敌人还没有认出他来，现在设法营救，还有可能，一旦敌人识破了他的‘庐山真面目’，就无望了。”鲁迅低声说。

“他要找铺保，太难了！有哪一家店铺敢保一个狱中的囚犯！马上开个店铺也不容易，除了钱以外，还要找一个能出面的经理，到国民党当局去登记，要求核准。”建人发愁地说。

“找铺保的事我来想想办法，你赶快通知他的太太。”鲁迅焦急地说。

“杨之华能联系上，我马上通知她。”建人说完急急地走了。

瞿秋白去瑞金以后，杨之华为了掩护身份，也为了生活，党组织安排她到英商班达蛋厂做工。她每天的工作是把鸡蛋敲开，放在镂空的器具上，让蛋白流下去，蛋黄搁在上面，使蛋白和蛋黄分开。每天都要干十二小时的活，工作相当辛苦，这天她刚下班就收到了周建人差人送来的纸条子，上面写着：有紧急事找你，赶快来取信。第二天，杨之华让一位熟悉的青年工人去商务印书馆找周先生，将信取了回来，望着“长汀监狱”几个大字，杨之华呆住了。虽然她也曾想到过秋白有可能被捕或牺牲，但当残酷的事实摆在面前时，她还是有些经受不住。她感到天旋地转，一整夜都不能安睡。白天，昏昏沉沉地来到工厂上班，手里做着机械的动作，脑子里依然想着如何救秋白的事，一只鸡蛋打开了，蛋清却流到地上。工头走过来大声地责骂着……

好不容易下班了，杨之华急忙找到以前一起工作过的杜延庆同志。两人商量了许久，还是没有想出一个合适的办法来，杨之华忽然想到利用机关以前存下的一架旧印刷机办一个印刷所，作为铺保去保释秋白。

“钱呢？办印刷所是要一大笔钱的！机关都散了，阔佬们谁

又肯帮咱。再说也不能暴露。”杜延庆说。

“我去找鲁迅先生！”杨之华立即想到鲁迅。

当鲁迅得知杨之华有办法找到铺保，心里安定了许多。并托人转告杨之华，钱的事不用担心。鲁迅还让人给杨之华送去五十元钱。有了钱，还需要找人来办印刷所，最后通过一个同志的关系，找到了以牧师身份掩护工作的秦化人同志，由他介绍了一个旅馆老板，写好铺保证明。

找到了铺保以后，杨之华的心里升起了一线希望，晚上，下班回家，她顾不得疲劳连夜亲手为秋白缝了两条裤子。第二天她把缝好的裤子连同鲁迅给的五十元钱通过邮局寄了出去。

鲁迅这一头也在抓紧时间想办法作营救工作。

正当鲁迅、杨之华等人千方百计想办法营救的时候，秋白的身份暴露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三行大字标题刊载秋白被捕的消息：

匪首瞿秋白就逮

化名林琪祥与项英妻同时被逮

经指认确实已由长汀解往龙岩

看到这则消息后，鲁迅的头上就像泼了一盆冷水，他深知蒋介石是决不会放过秋白的，而以秋白的性格也决不会投降敌人，这样就只有一死。五月十四日，鲁迅曾给曹靖华写了一封信，谈及秋白被捕的事。信中写道：“闻它兄大病，且甚确，恐怕很难医好的了；闻它嫂却尚健。”秋白的身份暴露了，取保释放是不可能的了。只有采取公开“合法”的方法，争取保留秋白的生命，这虽然也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但也要去试一试。鲁迅找到陈望道，商

量联合文化界人士，发起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营救活动给国民党施加压力，也许有些作用。一九三四年的时候，鲁迅曾帮陈望道正在办《太白》杂志，在杂志遭敌人压迫时，鲁迅全力支持，在《太白》杂志的两卷二百二十四期就有鲁迅的二十二篇文章。其中《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论人言可畏》等名篇就是在《太白》杂志上发表的。陈望道很感激鲁迅对《太白》的关心与支持。当鲁迅找到他商量秋白的事时，陈望道说：“一九二三年，党创办上海大学时就同瞿秋白认识，那时我是教务长，秋白是系主任，他刚从苏联回国，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我还去听过课呢！没想到……我会尽全力想办法的。”

夜已深了，鲁迅躺在床上还是放不下瞿秋白的事，总想找人聊聊，于是披衣下床，取出笔墨，再次给曹靖华写信：

十八日信收到。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许君已南来，详情或当托其面谈。

弟豫上五月二十二日夜

曹靖华一九三三年秋从苏联回国，先后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东北大学、中国大学任教，曹靖华是鲁迅的密友，鲁迅日记有三百多处提到他。鲁迅为编校、出版他的译作付出了太量心血，曾自己出资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印行曹靖华翻译的苏联小说《铁流》，还请瞿秋白翻译《铁流》序言。秋白入狱，鲁迅首先想到把消息告诉曹靖华，虽然他知道曹靖华帮不上忙，但找老友聊聊心里话也觉得安然一些。鲁迅在信中提到的“许君”是指挚友许寿裳，当时是蔡元培的秘书。

不久，许寿裳南来上海与鲁迅见面。老友相见不必多礼。鲁

迅急切将瞿秋白的事告诉他，并请他转蔡元培设法保留瞿秋白的生命，许寿裳知道事关重大，答应回去后一定转告蔡先生，成与不成都会对鲁迅有个交待。

六月初，国民党南京政府一间豪华的会议室里，正在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围坐在一张长条桌子的周围。在桌子尽头的上方挂着全副武装的蒋介石像，两侧是党旗和国旗，参加会的人个个表情严肃，一反以往怠惰松散的常态，因为今天要有一件重大的事件要讨论决定。主持会的人清了清嗓子对大家说：“诸位，自匪首瞿秋白就逮以来，我中统军统进行了多次劝降工作，都失败了。今天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请大家谈一谈对该匪的处置意见，请诸位发表意见。”主持人的话音刚落，坐在前排上首的戴季陶就恶狠狠地说：杀！像这样顽固不化的人不杀于党国何益！戴季陶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时，曾接受过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他也曾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变节退出。他虽然也知道秋白是个人才，但想到国共合作时期，瞿秋白对自己的批判就觉得两眼冒火。

那还是一九二五年的事。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一届三中全会上，戴季陶提出了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主张，鼓吹“单纯的国民党运动”。秋白在当时分管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戴季陶的理论刚一出笼，秋白就敏锐地洞察了它的反动性和阴谋，认为必须给以反击。于是他立即找到一些有关的同志了解对戴季陶主义的反映，收集国民党右派的活动材料，很快就写成了驳斥戴季陶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系统彻底地驳斥了戴季陶的反动理论。在瞿秋白的带动下，革命派纷纷起来反对戴季陶，维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保卫了统一战线，保卫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使国民党的右派受到打击，密切了国民党左派同我党的关系。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戴季陶受到了训斥。大会在决议中指出：“戴季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为反动分子利用成为破坏本党之工具……应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以后，戴季陶同共产党分道扬镳，共产党转入地下，戴季陶一直为抓不到瞿秋白而恼火，这次瞿秋白被俘，每当想起此事就对瞿秋白恨之入骨。国民党开会研究处置瞿秋白，戴季陶得意非常，在会上大放厥词。

听了戴季陶的发言，蔡元培站起身来对大家说：“瞿秋白才华横溢，像这样有天才的人，在中国不可多得，以不杀为宜……”蔡元培的话还未讲完，戴季陶就跳起来说：“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蒋介石当然是赞成戴季陶的主张，决定对瞿秋白下毒手。后来，许寿裳将会议的情况透露给鲁迅，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

杨之华也知道秋白生还的可能性很小，但她仍幻想能和秋白团聚。为了使秋白出狱后能有个秘密居住的地方，她还特意通过一位工友代租了一所房子，房子收拾好后，就搬了进去，她在那里期待着秋白的归来，甚至在梦里经常梦见与秋白在一起时的情景。

一天，杨之华下班回到家里，听到有人敲门，心里一阵紧张，心想：“是不是有叛徒跟踪而来。”她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没有什么机密的东西在外也就问：

“谁呀！”

“我，是小妹。”

杨之华听出是妹妹的声音，心里更觉得诧异，平常妹妹是不到这里来的，今天突然来访，一定是出了大事。于是她连忙打开房门，妹妹进屋后，她又朝外张望了一会，见没有“尾巴”这才关闭了房门。

妹妹喘吁吁地对她说：“有一个人到母亲家来找你，说是姐夫的同狱，先出来了，还带来姐夫在狱中写给你和哥的两封信。”

杨之华急切地问：“信呢？”

“那人说要亲自交给你！”

“你不要领她来，那人一定是敌人派来‘钓鱼’的坏蛋。”停了停，杨之华又说：“你回去以后要想办法，把信搞到手。”

吃了饭后，杨之华就送妹妹回去了，并嘱咐她路上要小心，千万不要把来人带到这里来。妹妹答应着，快步走了。

杨之华焦急地等待着秋白写给她的信。几天以后，妹妹又来了，但只带来一封写给哥的信。杨之华问：“另外一封信呢？”

“那人说一定要亲自交给你。”

听了妹妹如是说，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那人必是敌人的探子。

妹妹走后，杨之华展开秋白的信，只见上面写着：“想来你们已经在报上看到我的事。我要和你们永别了。之华是我生平的知己，我要留最后一封信与她永别。可能她也已被捕，你们不知道她的下落。那么，就请你们把信投寄给叶圣陶先生作为写小说的材料吧。”杨之华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杨之华虽然非常想得到秋白的信，甚至想亲自去会会来人，取回秋白的信，但又一想明知是圈套怎能去往火坑里跳呢？那非但

取不回信，自己也会被捕的。决不能上敌人的圈套。想到这儿，她只得放弃这封宝贵的遗书了。

自从报上公布瞿秋白被捕的消息后，几乎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杨之华也想象鲁迅那样，想些公开营救的法子。于是她写了一封信给宋庆龄、鲁迅、茅盾、柳亚子、陈望道、郑振铎和周建人，请他们出面设法营救。很快，柳亚子给杨之华回了一封信，信上说：“怅然。孙夫人被监视，我亦一样，心有余，力不足，事与愿违。千万保重。”郑振铎为了营救瞿秋白到处奔走，但一切的努力都是徒然的。蒋介石是不会放过瞿秋白的。

十四年以后，柳亚子受毛泽东的邀请由香港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火车上遇到杨之华时还为当年未能救瞿秋白出狱而伤痛。他随即写了一首诗，赠给杨之华：

太息王丞相，无由救伯仁。  
遗书问真贗，执泪总酸辛。  
犹见僧亡史，相怜后死身。  
愚私何以报？尽瘁为斯民。

## 二、饮弹洒血

王杰夫、陈建中在长汀劝降不成返回南京后，立即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统负责人陈立夫作了汇报。陈立夫除了摇头叹息外，也无计可施。于是连夜谒见蒋介石。

蒋介石穿着便服，坐在沙发上看报，秘书报告说陈立夫来见。蒋介石头也没抬，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陈立夫毕恭毕敬地走了进来。蒋介石放下手里的报纸操着浓



重的浙江口音问道：“有什么要紧的事呢？这么晚了还来见我。”

“报告委座，是瞿秋白的事。”陈立夫低声说。

“劝降失败了？”

“是的，瞿匪顽固不化，至死不降，恕我无能。”

“算了，不用检讨了，我早就说过，你们是白费力气。如果他肯投降的话，他就不是瞿秋白了，瞿秋白毕竟不是顾顺章，也不是向忠发，如果听我的话早就没事了，你们这些人对付共产党还年轻。”

陈立夫连声说：“委座英明。”

“好了，给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和第二绥靖区司令李默庵发电报，让他们通知三十六师立即执行。”蒋介石不耐烦地说。

“是！我这就去办。”

“好了，我要休息了，事情办完后再来见我。”蒋介石说完，就站起身来向卧室走去，陈立夫也悄声退出。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接到蒋鼎文的“限即刻到”的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当天晚上，宋希濂召集参谋长向贤矩、政训处长蒋先启、特务连长余冰研究了执行这一命令的具体措施。最后商定六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在中山公园执行枪决。

本来，蒋介石在六月初就从武昌行营发电报给蒋鼎文：

龙溪绥署蒋主任：寒已法电悉。成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正。冬行息字印。

只因陈立夫向蒋介石提出派人<sup>0</sup>对瞿秋白劝降，所以才拖延了行刑的时间。劝降失败，蒋介石、蒋鼎文、李默庵三道电令催促宋希濂处决瞿秋白。

夜已深了，秋白仍在囚室里看书。这时房门被打开了，向贤矩走了进来。

秋白见向贤矩深夜来访。知道事情有了变化，大概是要为自己送行了。

“怎么，要送我上路了？”瞿秋白神态自若地问。

“是的，几个月来，我们好吃好喝地厚待你，为了你的事费尽心机，一直希望你能回心转意，可是你一点悔改的表现都没有，我们不能白白地养着你。”

“自从我被捕那一天起，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死在蒋介石屠刀下的又不只我瞿秋白一人。‘四·一二’以来我们共产党人的鲜血流成了河，早晚人民会跟你们算这笔账的。”瞿秋白愤怒地说。

向贤矩见瞿秋白如此说，就从口袋里取出蒋介石处决的密令，对秋白说：“明天上午就是你人生的尽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说完还偷偷地观察着秋白，希望这位共产党员在生死关头能有回心转意的表示。

秋白面色没有一点变化，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只是淡淡地说：“我几个月来的一些遗墨，我死以后请寄给我在武汉的一位朋友，这是我的唯一要求。”“这点事我想还能办到，宋师长也一定能照准，你就放心吧。”说完就走了出去。

第二天，瞿秋白像往常一样，起得很早，起床后换上新洗的黑色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洗漱完毕后就坐在窗前披阅唐诗。一本旧唐诗几个月来已被他翻得连角都磨损了。其中韦应物、郎士元、杜甫等人的诗都已烂熟于心。所以也无需细读，只是随手翻阅。忽然他放下手里的书，像是有所感悟，沉思了一会，提起笔来写下一首绝笔诗《偶成》：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梦行小径中，夕阳明天，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天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天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秋白手中的笔还没有放下，向贤矩就来到囚室催促起程。秋白镇静地说：“人生有大休息和小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说完又飞快地在纸上写道：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尽过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讖，乃狱中言志耳。

#### 秋白绝笔

书毕，将笔丢在桌上，站起身来又整了整衣服，见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这才在卫兵的押送下，来到作为临时法庭师部正屋。只见宋希濂和师部的一百多名军官分立在两旁，中间留有一条狭长的通道。瞿秋白用轻视的目光朝这些人扫了一眼，然后沿着通道走到军法处长吴淞涛面前。当敌人下达了起程的命令之后，瞿秋白昂首挺胸，缓步走出三十六师的大门。站在两旁的军官们都被瞿秋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惊呆了。

从师部到中山公园的路上，敌特务连进行了戒严，禁止老百姓观看。在押送队伍的前面有一列号兵开道，瞿秋白走在中间，“监斩官”陈定骑着白马走在最后，来到中山公园后，在一亭前敌人为秋白照了相。照毕，来到亭中，秋白见已有“酒菜四碟，美

酒一瓮，于是便独自坐下来，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

餐毕，瞿秋白点燃一支香烟，在上了刺刀的匪兵的环护下走出中山公园，缓步走向刑场。刑场设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的一片草坪上，距中山公园约有两华里多。瞿秋白身患重病，所以走得很慢。秋白一边走一边用俄语唱着国际歌。这支歌他最熟悉，因为正是他将这首歌翻译成中文的。

那还是一九二三年初的事，瞿秋白结束了在苏联的考察，回到祖国，任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并协助编辑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当时他住在北京东城大羊宜宾胡同的堂兄瞿纯白的家里。工作之余，他时常想起在苏联时听当地人常唱的一首歌——《国际歌》。那慷慨高昂的歌声，一直鼓舞着他，使他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不息。

“我要把它译出来，让中国受压迫的老百姓，也像苏联人民一样，唱着这支歌，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秋白经常这样想。正好堂兄家有一台旧风琴，于是就着手译了起来。他把歌页上的词曲排成三行，第一行先将五线谱译成简谱，第二行是中文译词，第三行是法文歌词的原文。他一小节一小节的翻译，并且一边弹琴一边唱，直到词曲吻合了才定下来，然后再译下一节。当翻译“国际”一词时，因为汉语只有两个音节，而法语却很长，为了使词曲配合，秋白没有意译，而是直接将原文写到谱子上。这样不仅词曲能和谐地融合为一体，而且使中国受压迫的老百姓，也能和世界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国际歌》就这样第一次被译了出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

瞿秋白高声唱了起来，歌声在山间回荡。

来到罗汉岭下的草坪上，秋白说：“此地很好！”并对执行者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我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不能打我的头。说完盘膝而坐，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下午，宋希濂将执行情况向李默庵作了报告：

青密。瞿匪秋白已于本日上午十时遵令执行枪决。除将该匪照片及处理经过各情形另外呈报外，先谨电闻。职宋希濂叩。午即。

之后，宋希濂让人买了一口棺材装殓秋白，并葬于罗汉岭盘龙岗。

### 三、“捏着一团火”

瞿秋白不幸遇难以后，鲁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了。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日，鲁迅尚未得到秋白遇害的消息时，就估计到他很难生还。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中国事其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就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像。但我认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却又悠悠然。”

鲁迅默默地在寓所里翻检着瞿秋白生前留在他那里的文稿，其中有一篇还未译完的高尔基的作品《四十年》，望着那熟悉的字体，鲁迅的心里一阵伤痛。此刻他想起秋白翻译的另外两部稿子：《高尔基论文选集》和《现实主义文学论》。这两部稿子一直压在现代书局，应该把它赎回来，与其它的文稿一起编辑起来出版，作

为对战友的纪念。于是他又紧张地工作起来。

为了赎回秋白的译稿，鲁迅曾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三十日，八月九日、九月八日、于六日写信给《译文》的编辑黄源，商量刊登瞿秋白译的《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用稿费去赎压在现代书局的译稿。后来，还是鲁迅自己付出二百元才将秋白的遗稿赎回。

瞿秋白遇害以后，他的几个生前好友在郑振铎家里商量集资为秋白出书的事。但鲁迅不赞成先出文稿，认为涉及秋白的思想，有许多思想性、政治性的文字，要等待党来审查决定。所以暂定只出翻译以为纪念。

鲁迅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开始编校亡友遗稿的工作。并将书名定为《海上述林》，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他逝世。当时白色恐怖严重，鲁迅的健康也恶化了，经常咳嗽和低烧，饭吃得很少，体重只有三十几公斤。但他仍是硬撑着病体，编辑、校对，就连封面设计、安排选择插图、选择纸张一类的事也都亲自负责。他在病中经常向许广平谈起《海上述林》的编辑工作。朋友们见他身体不好都劝他去国外疗养。史沫特莱当时认为：鲁迅如不及时出国休养，则能否再活多少年，很成问题，但如果出国休养，则一二十年的寿命有把握。因此他提议鲁迅到苏联高加索去休养，苏联也通过党向鲁迅发出邀请。为此胡愈之还专门找过鲁迅，并把去莫斯科的交通路线也说了。可鲁迅却说：“很感谢苏联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去。苏联朋友关心我无非为了我需要养病；另外国民党想搞我，处境有危险，到苏联安全。但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五十多岁了，人总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病也没那么危险。我在上海住惯了，离开有困难。另外，我在这儿还要斗争，还有任务，去苏联就完不成我的任务。”是呀！战友的文集还未编完，他

怎能就这样离开呢？

一九三六年的春天，鲁迅的肺病更加严重了，发烧往往到三十七点九度三十八点二度。冯雪峰也来劝他去国外或什么地方疗养。鲁迅仍旧说：“我觉得，那么躺着过日子，是会无聊得使自己不像活着的……我总是这样想，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都一样，多几年也是白白的。”到了一九三六年五月，实在支持不住了才去看医生，有时，喘得透不过气来，还要打强心针，就是这样他仍然不肯放下《海上述林》的编辑工作。在鲁迅的日记里曾有这样的记录：

三月二日 下午骤患气喘……

四月十七日 夜编《述林》下卷

四月二十二日 夜校《海上述林》上卷讫，共六百八十一页。

五月十三日 校《述林》下卷起

五月二十二日 下午以《述林》上卷托内山君寄东京付印……

夜九时热三十七度九分。

五月二十九日 下午藤先生来注射并用强心针一针。

五月三十一日 下午史君引邓医生来诊，言甚危，明甫译语。

五月二十二日这天下午，鲁迅的病又发作了。但当他得知开明书店的美成印刷厂将《述林》上卷的纸型打好，就执意要亲自送往内山书店，托内山先生寄往东京印刷。许广平见他病得厉害，就要求代劳，鲁迅说：“还有许多细节要面谈。”说完就硬撑着赶往内山书店，晚上回来后就发起高烧。

一九三六年六月以后，鲁迅的病日趋严重，已经病得不能起床了。他非常焦急，看着桌上亡友的遗著，心里就像捏着一团火。八月十一日，他写信给承接出版的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焦急地催问：“……翻译的人老早就死了，著作家高尔基也于最近去世了，

编者的我，如今也要死了。虽然如此，但书却还没有校完，原来你们是在等候着读者的死亡吗？”病情稍有好转，他又支撑着病体，继续校对《海上述林》的下卷，九月底才校完。

一九三六年十月，《海上述林》的上卷由日本寄回了。鲁迅在病榻上看着编辑精良、装帧优美的《述林》，宽慰地对许广平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样讲究的出过，虽然是纪念‘何苦’（秋白笔名），其实也是纪念我。”许广平听后，似乎觉得有点不祥之兆，就问鲁迅：“为什么？”鲁迅见她神情不大对头，就立刻解释说：“一面给逝者纪念，同时也纪念我的许多精神用在这里。”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为了能使《海上述林》能够顺利送到读者的手里，鲁迅是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的。一来使国民党反动派不知编者是谁，二来也表达了华夏人民都怀念秋白的深刻含义。就连作者的署名也用了三个英文字母“STR”，这是瞿秋白所使用的笔名“史铁儿”英文拼音的三个字头。

《海上述林》的印装非常考究，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中国没有像这样讲究的书出过。”书分为精装和平装两个版本，全部用重磅道林纸精印，并配有玻璃版的插图。精装本用麻布面、皮脊、金顶金字，形式典雅；平装本也是天鹅绒做的封面，蓝顶，金字。鲁迅似乎觉得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在九泉之下瞿秋白的亡灵。他曾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

上卷出版以后，鲁迅亲自用大号毛笔写好一份广告，张贴在内山书店的门旁，同时又亲自拟了一份书面广告在《译文》等刊物上刊登。广告是这样写的：

“《介绍〈海上述林〉上卷》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系大作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



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全书六百七十余页，玻璃板插图九幅。仅印五百部，佳纸精装，内一百部皮脊麻布面，金顶，每本实价两元五角，函购加邮费两角三分。好书易尽，欲购从速。下卷亦已付印，将于本年内出版。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代售。”

鲁迅还亲笔写过一份赠书名单，把书分赠给为出版《海上述林》出过力的人。他在名单的第一位写上：“内地绒三”，“内地”是指中国共产党，“绒三”是指绒面的三本。几天以后，冯雪峰来看鲁迅，鲁迅就拿了两本对他说：“皮脊送给M（毛泽东），蓝绒面的送给周恩来。”

十月七日下午《译文》的主编黄源来看他。鲁迅便把一本精装的《海上述林》送给他。当发现底页上有一个皱折，就让许广平换了一本，并微笑着对黄源说：“总算出版了。这书不能多送，有熟人托你买，可打个八折。”停了一停，鲁迅又问黄源能否在《译文》上“揩油”登个广告？黄源说：“当然可以。”说完两人都笑了起来。分手时，鲁迅还告诉黄源，下卷也已校好，年内可出版。就在与黄源会面的十天以后，鲁迅就与世长辞了。未能看到《海上述林》下卷的出版，成为鲁迅离开人世前的最大遗憾。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天。关于这一天，许广平曾作过详细的记述。

十七日上午，鲁迅还在续写《因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的中段。午后他出去散步。回来天已不早了。傍晚，周建人来看他，鲁迅的精神很好，两人一直谈到十一点钟。到了十二点，许广平想整理卧具，催促说：“时候不早了。”鲁迅靠在躺椅上说：“我再吸一支烟，你先睡吧。”等他上床时，已是午夜一时了，二时，鲁迅起来小解一回，人还好好的。再睡下，三时半，

鲁迅气喘发作，咳嗽困难，便坐起来，许广平见他坐了起来，也坐起来，仔细观察他呼吸有异常，但时值深夜，请医生不方便，就把家里的“忽苏尔”气喘药拿出来，给鲁迅服了一包。以后又每隔一二小时就给他服一包，三包药服下，病态仍不见减轻，连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终夜屈曲着身子，双手抱腿而坐。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他坐到桌前，支撑着身子，勉强提笔给内山先生写了一张便条。许广平接过便条，匆匆地走了。待内山先生打电话通知须藤医生后就返回家中。

不久，内山先生来了，亲手为鲁迅服药，并且替他按摩背脊。鲁迅告诉他说苦得很。许广平和内山先生听了心里都非常难受，须藤医生也赶来了。急忙为他注射，这时，鲁迅双足冰冷，医生说赶快用热水袋暖脚，再包裹起来。鲁迅两手的指甲也都发紫了。病情十分危急。

十八日早晨八点多钟，日报到了，鲁迅问许广平：“报上有什么事情？”许广平告诉他有《译文》的广告，他翻译的《死魂灵》登在头一篇。并且以为这回他该安心休息了，可鲁迅却说：“把报纸给我，眼镜拿来！”许广平把登有广告的报纸和眼镜递给他。鲁迅坐到躺椅上，一面喘一面仔细看《译文》广告。见《海上述林》的广告登了出来，又看了好久才放下。

鲁迅就是这样，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关心着瞿秋白的文字。许广平见鲁迅在躺椅上不能靠下来，就拿了一张小桌子垫起枕头，鲁迅仍就喘息着，医生又来为他注射，但病状并不减轻，只好又躺到床上去。

中午，鲁迅只喝了大半杯牛奶。

六点左右，看护来了，注射，并为鲁迅输了氧气。

七点半，鲁迅勉强喝了小半杯牛奶，就再也喝不下了。晚饭

后，内山先生向许广平建议，让周建人快来。

许广平坐在鲁迅的身边，不停地为他揩汗，发现他腿以下已经冰冷了。医生每隔两小时，就为他注射一次强心针。后来鲁迅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忽然他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握住许广平的手。她怕刺激他，轻轻地松开他的手，并为他盖好棉被。后来许广平回忆说：“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也紧握他的手，甚至紧紧的拥抱住他。在死神的手里把我敬爱的人夺回来。如今是迟了！死神奏凯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后悔呀。”

十九日凌晨，五点以后，鲁迅进入弥留状态。头朝里，呼吸也微弱了。连打几针强心针，也不见效。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五时二十五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鲁迅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

鲁迅逝世的消息很快传到苏联，远在莫斯科的杨之华万分震惊，她总是不信这消息是真的。直到十一月间，收到国内寄来的杂志，消息确实了，她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

瞿秋白牺牲后不久，党组织安排杨之华于同年八月去了苏联。行前，杨之华给鲁迅写了一封告别信。鲁迅在八月十九日日记中写道：“上午得文尹（杨之华笔名）信。”

杨之华走后，鲁迅十分挂念，三个月过去了仍不见消息，于是就给在苏联工作的好友曹靖华写信，托萧三打听她的下落，在信中说：

“史兄病故后，史嫂由其母家接去，云当旅行。三月无消息。兄如与三兄通信，乞便中一问，究竟已到那边否？”

不久，鲁迅收到了杨之华托人从法国寄出的一封信，鲁迅这才放心。并把这消息转告了也在挂念中的茅盾夫妇：

顷已接到密斯杨由那边(法国寄出)的来信,内云:“曾发两信,收到否?也许此信比那两封可快一些。”

又过了几天,鲁迅才收到其中的一封,另一封肯定是被扣留了。

远在异国他乡的杨之华同样也挂念着鲁迅。她独自一人默默地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街上过往的行人和街道两旁商店橱窗里五颜六色的商品阵列,都没有引起她的丝毫兴趣。她在鲁迅家避难时,知道鲁迅平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吸烟,一是木刻,并且晚年竭力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大量搜集苏联和外国版画作品。于是就走进一家书店买了苏联木刻家亚历克舍夫和密德罗辛的木刻集各一本。然后又来到一家百货商店精心挑选了两个石雕的烟灰缸,连同一封信一并寄给了鲁迅。

在病中的鲁迅收到杨之华的礼物后,于七月十七日回了信。但由于路途遥远和国民党的封锁,直到七月杨之华才收到。

后来,她回忆说:

在一九三六年九月我接到先生两封信,在第二封信的最后一段说到他不能多写字,没有力气读德文书,因为热度还未退……久望先生的消息,一旦来到了消息,我应该快乐,然而消息是这样使人担心的消息,他的一切常在我的惊梦中……

但还不到两个月,就得到鲁迅逝世的消息,这怎能不使她惊愕、悲哀呢。年前她失去了秋白,现在鲁迅先生又溘然长逝,一想起和秋白、鲁迅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要痛哭一场。几天来,她吃不下睡不着,只能读“先生著作以自慰”。在悲痛中,她挥泪写下一篇《回忆敬爱的导师——鲁迅先生》的悼念文章,发表在一

九三七年二月十日的巴黎《救国时报》上。在文章的末尾，她满怀深情地写道：

敬爱的导师鲁迅永生存，永生存在我们被压迫阶级的心里。

#### 四、不朽的丰碑

瞿秋白与鲁迅两位肝胆相照的朋友，生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死后，也都受到了党和人民的敬仰，并对他们光辉的一生，给予了崇高的评价。

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草草埋葬了。当时，党中央和红军尚在长征途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所以不可能对他进行悼念活动和全面的评价。直到一九四五年，瞿秋白就义十年以后，才对他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

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着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寻找瞿秋白烈士的坟墓遗骸。一九五〇年，谢觉哉同志亲自到瞿秋白就义的地点调查了解情况后指示：“要找到秋白同志的遗骨，要为秋白同志建墓立碑。”一九五一年六月，当时任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指示长汀县人民政府寻找秋白的坟墓遗骸。长汀县人民政府立即组织有关人员着手调查。经过多方调查，找到了埋

葬瞿秋白的四个人中唯一健在人——张永福。并由他带有关人员到长汀城西郊罗汉岭墓地现场察看。事后，西门街政府召集附近群众开会询问，其中有三名群众证明张永福所讲的地点正确。最后又找到葬地正中之上两程姓坟主询问，都说不是自家的族坟，而该处当时是私山，按照习俗平常人非经山主许可不能埋葬，据此确定该葬地为瞿秋白烈士坟墓。一九五一年七月，长汀县人民政府委托西门街政府请工起坟，起出时，瞿秋白的棺木已腐烂，肋骨、胸骨均已碎成一寸左右的细骨。同时还发现五个白纽扣。遗骨起出后，经火烘干，装入金斗，暂时安放在八角亭内保存。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就瞿秋白遗骸在长汀寻获向中央办公厅作了报告。中央及时作出指示，福建省委也作出关于瞿秋白烈士的公祭及护送遗骨赴京的指示。

长汀县为瞿秋白的遗骸定制了红漆棺木，棺内以棉絮填实，白绸裹骨，并举行了为期一天的隆重的公祭。第二天，又组织干部群众哀送烈士灵柩，并派专车和一个武装班护送到龙岩，与此同时，龙岩组织了五千多人参加的迎灵仪式。不久，由有关人员护送到北京。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瞿秋白的遗骨送到北京的协和医院。医院的几名专家专门对遗骨进行了整理。江西瓷器厂特地烧制了一个瓷盒以装殓遗骨。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瞿秋白殉难二十周年。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隆重举行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主祭，董必武、康生、彭真、陆定一、周建人、叶圣陶、许广平陪同，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及生前好友参加了安葬仪式。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心里，永垂不朽！

瞿秋白墓，位于任弼时墓的东侧，地下是水晶棺，地面以上是汉白玉石的墓体和立碑。立碑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题写的“瞿秋白同志之墓”七个字，背面刻有瞿秋白的生平事迹。

“文化大革命”中，在九泉之下的瞿秋白蒙受不白之冤。一九六六年十月，北京航空学院等大专院校造反派的学生手持铲、镢等工具冲进革命公墓，将瞿秋白的墓夷为平地，墓碑也被砸碎。他们用炸药试图炸破墓穴，因墓穴是用水泥灌注的，未能炸开，棺槨等地下葬物才得以幸存。

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瞿秋白平反昭雪，并拨款一万多元修复了瞿秋白的墓地。原墓地破碎的墓碑碎石块中的几块，后来被江苏常州瞿秋白故居纪念馆取回去，留作纪念。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又为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杨尚昆在纪念大会上说：

秋白同志伟大的共产主义献身精神和开拓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时，由于他世界性的地位与声誉，国民党反动派不敢阻止人民公祭。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后三十分钟，冯雪峰、宋庆龄相继赶到鲁迅寓所商量成立了治丧委员会。由冯雪峰起草了讣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毛泽东的名字也被列在其中。第二天，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哀悼鲁迅的电报就发到了上海。电报全文如下：

为追悼鲁迅先生  
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之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于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茨基派，想用甜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



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起见，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基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已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及全世界拥护和平、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人士，一致起来要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南京国民政府执行上列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尤其是文学界，一致起来继续鲁迅先生光荣的事业，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为中国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鲁迅灵堂，设在万国殡仪馆楼下一间不很宽敞的殡室里。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而简朴。自十九日至二十二日，由胡风、黄源、雨田、周文、萧军轮流守灵值夜。殡室的周围，摆满了上海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和花篮。灵堂正面墙上，挂着鲁迅遗像。遗像下面，放着许广平的《献词》：“……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遗像前面，是一张窄长的灵桌。灵桌上，陈放着鲁迅手稿、笔架、笔和墨水。灵桌前安放

着鲁迅的遗体。鲁迅的遗体，穿白纺绸衬衫裤，咖啡色薄棉袍，白袜，白底黑面布鞋，外裹咖啡色棉衾，上面覆绯色面子湖色夹里的彩绣棉被。来吊唁的人，分批依次进入灵堂，他们牵动着沉重的脚步静静地环绕着灵床，向鲁迅作最后的告别。吊唁的人们中有作家、教授、青年学生，也有穿着短衫的工人，上海工作救国会的挽联上写着：“民族之光”。上海丝厂工人的挽联上写着：“我们的朋友。”吊唁一直持续到十月二十二日上午。

二十一日下午举行“入殓式”。鲁迅的遗体被安放在宋庆龄赠送的深红色楠木棺内。棺木为西式，里面有内盖，上半部装有玻璃，头部可露出，任人瞻仰。

二十二日下午举行“启灵祭”。由十多位青年作家扶灵柩上灵车，送葬者多达万人。行列前头的是自行车队，接着是一幅“鲁

迅先生丧仪”特大横额，然后是挽联队、花圈队、遗像、灵车、家属车、执绋者、徒步送殡者、送殡汽车。

到达万国公墓时，已近四点半。奏哀乐后，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内山完造、章乃器、邹韬奋等先后作安葬演说。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鲁迅的密友冯雪峰没能去为鲁迅送葬，他只有躲在一个秘密地方默默地悼念鲁迅。

安葬演说完毕后，民众代表王造时、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将一幅长二百零二厘米、宽一百零三厘米的白地黑字锦旗覆于棺上。锦旗上是沈钧儒所书“民族魂”三个大字。在一片悲痛之中，鲁迅的灵柩被缓缓放入墓穴之中。此时，人群中发出了“鲁迅先生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声。

鲁迅的坟墓是一个圆形土堆，土堆的后面是一块梯形水泥墓碑。碑土镶有瓷制的鲁迅遗像。碑下端刻有年仅七岁的鲁迅之子周海婴写的“鲁迅先生之墓”六个字。

一九四七年九月，许广平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对鲁迅墓进行了改建。改建后的墓，正方形南向，面积六十四平方米，用三十多块花岗石筑成。从南边正中入口，踏上三级石级，迎面是四只供瞻仰者插花的石花瓶。后面是墓廊。再后面是许广平设计的圆头墓碑。碑面嵌黑石板，上面镶椭圆形瓷制“鲁迅先生遗像”，像下面刻有周建人所书“鲁迅先生之墓”等文字。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九五六年一月，经国务院决定将鲁迅墓迁于上海虹口公园，并以上海市市长陈毅为首成立了“鲁迅墓迁墓委员会”。同时成立了“虹口公园鲁迅墓建筑设计委员会”。图纸设计完成报国务院批准后，交由上海文化局和鲁迅纪念馆组织安排施工。七月二十九日破土动工，十月九日落成。

新落成的鲁迅墓在虹口公园的西北隅，正南向，建筑面积一

千六百平方米。整个墓地，用两千多块细密坚实的苏州金山花岗石建成。

从墓道口登三步石级而上，中间是一块长方形的绿地。绿地中央是著名雕塑家肖传玖作的鲁迅铜像。再登七步石级而上，是方形的墓前大平台。平台上植有鲁迅生前喜爱的广玉兰。平台正面竖有一座照壁式大墓碑，上面是毛泽东题写的“鲁迅先生之墓”六个大字。

墓碑前，是安放鲁迅灵柩的墓，上面用花岗石密盖着。左右两株桧柏为许广平和周海婴所植，象征鲁迅精神万古长青。

十月十四日，举行了鲁迅灵柩迁葬仪式，鲁迅塑像揭幕典礼和鲁迅纪念馆落成开放仪式。清晨，鲁迅灵柩移柩仪式在万国公墓礼堂举行。礼堂正中，安放从公墓墓穴中起出的、经过整修的鲁迅灵柩。鲁迅的生前战友、亲人和学生们团聚在周围。仪式开始后，金仲华和巴金代表上海人民将绣有黑绒字的“民族魂”红缎锦旗，献盖在鲁迅灵柩的上面。随后，茅盾、周扬、许广平、巴金、章靳以、唐弢、金仲华等十人，扶灵柩上灵车。灵车队从万国公墓向虹口公园缓缓驶去。

当灵车抵达虹口公园门口，鲁迅生前的亲密战友宋庆龄、茅盾、周扬、许广平等扶灵柩向新墓地走去。这时，一阵秋风，卷起了“民族魂”旗的一角，许广平取下戴在胸前的一只水钻扣花，把旗子与棺罩扣住。灵柩徐徐从墓道树丛中通过，气氛庄严肃穆。

九时，在“丧礼进行曲”乐声中，迁葬仪式开始，灵柩徐徐下葬。行礼默哀后，巴金、茅盾、许广平先后致辞。接着进行了封墓仪式。

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友好人士前往悼念，缅怀鲁迅的不朽功绩，追忆鲁迅和各国

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事迹。

瞿秋白与鲁迅虽然离开我们很久了，但他们生死相交共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息的精神。将铭刻在人民的心里，永远激励着人们为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瞿秋白与鲁迅这两座历史的丰碑，永远不朽。

## 后 记

说起撰写这本书，是一个偶然的机。一九九六年金秋的一天下午，在图书馆里碰上了华文出版社编辑部主任高建中同志。我问他最近忙些什么？他说正在组织编写一套统战人物丛书，并问我能否参加。我说以前曾写过一个瞿秋白小传，对秋白比较熟悉，就目前所见，还没有出版过将瞿秋白与鲁迅结合在一起撰写的长篇。高建中同志认为符合要求，可以纳入选题计划。于是，出书的事便定了下来。

在写作过程中，我翻阅了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的许多研究著述，但本书并不是一部学术著作，我只是在史料的基础上将瞿秋白与鲁迅交往、并肩战斗的感人事迹，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加以描述，编写出来，以此来表现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战工作，歌颂党的统战工作的伟大业绩。当然也通过对瞿秋白与鲁迅交往、友谊的描写，展示两人战斗、生活的光辉历程。通过生活细节表现瞿秋白、鲁迅对待工作、生活乃至生命的态度，表现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给读者以思索、启迪。我自认为想法是好的，思路也是对的。

经过一冬一夏的笔耕，《瞿秋白与鲁迅》脱稿了。望着一摞书稿，经过一阵轻松、喜悦之后，又感到有几分忧虑。我是第一次从事长篇传记人物的写作，在人物刻画、评述、全书结构等方面都显得匆忙和不成熟。因此，能否达到出版要求，我心里没底。带着这样的忧虑和担心，将书稿交了上去。

书稿很快被送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钱听涛先生审阅了全

书后，在总体上给予肯定。他在审稿意见中说：“本书政治观点正确，史料丰富，是一本适合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年阅读的人物传记，也是一本普及性史学著作，可读性较好，经过加工修改后可以出版。”这对我来说，是关心、帮助，更是支持和鼓励，使我有勇气将书改好。

现在书已付梓，其中的未尽之处，只能留待以后有机会再去修改、补充了。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钱听涛先生。他对本书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如全书的结构问题、史实的核对问题乃至文字上的错讹也都一一做了订正。我被他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在此深深地感谢这位未曾谋面的好同志。在出版社编辑认真把关、辛勤劳作之后，我带着书稿去请我的老师李保初先生作序。李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在写作和文艺学方面多有著述，且乐于为人作序。重要的是他还负责系里的统战工作，我认为请李先生作序是合适的，但李先生却没有应允。他说原因有二：一是近来诸事缠身，一是非他的研究范围。于是又将书稿推荐给师大中文系著名教授、现代文学博士生导师蔡清富先生，蔡先生在百忙之中写了序言，使本书增色不少。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引用了大量专家、学者的研究著作，在此也一并致谢。

许京生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瞿秋白与鲁迅

作者 =

页数 = 29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序 言  
第一章

## 风云突变

- 一、家世与童年
- 二、苦闷与探索
- 三、“饿乡”行
- 四、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 五、支持毛泽东
- 六、做最高领袖
- 七、教书和写文章
- 八、参加“六大”
- 九、“顶撞”米夫
- 十、被排挤出中央

## 第二章 重返文苑

- 一、文化阵地
- 二、建立联系
- 三、神交已久
- 四、安排会面
- 五、回访秋白

## 第三章 领导“左联”

- 一、大论争
- 二、成立“左联”
- 三、鲁迅与左翼文化运动
- 四、遵命文学
- 五、文台两领导

## 第四章 避难生活

- 一、第一次避难
- 二、第二次避难
- 三、第三次避难

## 第五章 并肩战斗

- 一、短兵相接
- 二、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 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 第六章 告别鲁迅

- 一、接到命令
- 二、惜别之情
- 三、在中央苏区

## 第七章 转移被俘

- 一、战略大转移
- 二、突围
- 三、被俘之后
- 四、狱中斗争

## 第八章 不朽的丰碑

- 一、奔走相救
- 二、饮弹洒血
- 三、“捏着一团火”
- 四、不朽的丰碑

后 记  
附录页